

OXFORD

李金銓



超越  
西方  
霸權



Beyond Western Hegemony

**MEDIA** and Chinese Modernity

傳媒與  
文化中國  
的現代性

李金銓教授認為，「現代性」追求：政治生活民主而開放，**新聞自由**而負責，經濟發展富足而平等，文化表達多元而自主。「文化中國」正迎接了波瀾壯闊的「現代性」挑戰：中國大陸從「反現代性」的意識形態治國到擁抱全球化的黨國威權資本主義，台灣從威權統治走向形式的民主秩序，香港從殖民管治到主權回歸。

作者以社會理論為底蘊，以批判的自由主義為出發點，企圖全方位刻劃**傳播媒介**與現代性的辯證聯繫，一方面從政治經濟文化脈絡動態地關照**傳媒**的結構、過程、內容及其影響；一方面從**傳媒**的變化窺視政治經濟文化脈絡的遞嬗與互動。從世界看中國，從中國看世界。以局內人參與生活，以局外人冷眼旁觀。他參證「文化中國」的三條現代性軌跡，力圖超越西方霸權，與主流學術平等對話。

李金銓：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教授，香港城市大學傳播學講座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學出版社

www.oupchina.com.hk

ISBN 0-19-597250-3



9 780195 972504

# 超越西方霸權

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

Beyond Western Hegemony  
*Media and Chinese Modernity*

李金銓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in

Oxford New York

Auckland Bangkok Buenos Aires Cape Town Chennai  
Dar es Salaam Delhi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olkata  
Kuala Lumpur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Mumbai Nairobi  
São Paulo Shanghai Taipei Tokyo Toronto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First published 2004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10 8 6 4 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the address below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book in any other binding or cover  
and you must impose the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超越西方霸權

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

李金銓

Beyond Western Hegemony  
Media and Chinese Modernity

Chin-Chuan Lee

ISBN 0-19-597250-3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 目 錄

---

## 一 社會理論

- 1 視點與溝通 1  
——中國傳媒研究與西方主流學術的對話（代序）
- 2 媒介政治經濟學的悖論 25  
——中港台傳媒與民主變革的交光互影
- 3 論社會理論對中國新聞業的解放潛力 45

## 二 歷史經驗

- 4 從儒家自由主義到共產資本主義 61  
——記者角色的衝突與匯流
- 5 九十年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媒介建構（黃煜、李金銓） 95
- 6 建制內的多元主義 117  
——美國精英媒介對華政策的論述
-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35  
——台灣報業與民主變革的崎嶇故事
- 8 電視文化何處去？ 165  
——處在大陸政治與海洋經濟的夾縫中
- 9 國家控制，科技顛覆，文化自主 185  
——台灣有線電視政治

10	政治經濟的分與合	205
	——香港媒介結構、新聞自由和政權遞嬗	
11	敲打民主之鼓	239
	——美國傳媒對香港回歸的議題建構 (李金銓、潘忠黨、陳韜文、蘇鑰機)	
三	世界脈絡	
12	跟隨權力結構起舞的傳媒	263
	——兼評喬姆斯基的「宣傳模式」	
13	超越東方主義話語	277
	——薩伊德、亞洲媒介、民主化	
14	中國媒介的全球性與民族性	291
	——話語、市場、科技以及意識形態	
	附錄：中國傳媒研究、學術風格及其他	317
	跋	343
	參考書目	347

## 視點與溝通

中國傳媒研究與西方主流學術的對話<sup>1</sup>

(代序)

---

我們的視野應該既是華人的，也是世界的。本書企圖從政治經濟學和社會理論兩條路入手，探討媒介與中國的現代性，並且嘗試從中國看世界，從世界看中國，聯繫普遍理論與具體情境，隨時爭取與西方主流學術對話和溝通的可能。

應邀作客於溫伯敦，主人英國倫敦大學著名的傳播學者科倫(James Curran)是多年好友，酒酣熱了耳根，不拘禮隨便聊起來。他突然問我：「你在美國中西部教國際傳播這麼久了，滋味如何？」我任教於明尼蘇達大學二十多個年頭了，總覺得美國學生不認為他們的國家是國際的一部分，而是國際的對立面；「國際」學生是「外國」學生，「國際」傳播就是「外國」傳播。所謂傳播學當然就是美國傳播學，不必標明「美國」，因為那是人人皆知的基本「常識」。講起新聞傳播，只有美國有資格給世界提供標準答案，豈容他人噙噙置喙？初識者總認定我靠中國文學或中國歷史吃飯，一旦發現我沒有那麼多學問，只配勉強在他們最自豪的新聞傳播學院蹲點，那個吃驚又尷尬的表情堪以入鏡。他們隨後知道我教的只是化外的「國際」傳播，頓然好像釋懷一點。今天在北美洲我敢說沒有哪間新聞傳播學院不把「國際傳播」當成點綴品的——聊備一格，聊勝於無，可有可無，這就是美國高唱「全球化」聲中的一幅諷刺畫。「全球化」未始不是擴張美國霸權的飾詞。

---

<sup>1</sup> 原載於《新聞學研究》(台北)，2003年10月，第77期，頁1-20。部分載於《讀書》(北京)，2003年11月，頁69-75。

四年一度的世界足球賽經過電視轉播，每每風靡半個地球的球迷，只有美國人老神在在，無動於衷。美國人唯我獨尊，他們玩的那套美式足球決賽叫做「超級杯」(Super Bowl)，全國棒球決賽乾脆直呼為「世界盃」(World Series)，世界是美國，美國就是世界。我參加的學會美其名為「國際傳播學會」，每四年在外國挑個希爾頓之類的五星級飯店開一次年會，不就是以美國學者為主、在國外例行熱鬧一番的世界盃儀式！

美國的民主制度穩定，日起日落，天底下冒不出新鮮事，學者們關注的無非是體制內的一些技術問題，也就是如何完善美國的生活方式，難怪選舉(美式民主)和消費(資本主義)的研究鋪天蓋地，有的見微知著，但不少是微枝末節、瑣碎無聊的，鮮有成一家之言的學派者。華人學術圈一時恐怕無暇專注於這些細微的問題，至少得擺一大部分精力在媒介與第三世界革命、專制與民主這些翻天覆地「體制變化」的宏大敘述。他們的問題也許「不完全是」我們的問題，我們的問題幾乎「完全不是」他們的問題。我們侷促在全球學術市場的邊緣，既不願意隨着他們的音樂指揮棒翩翩起舞，又渴望跟他們平等對話，如何是好？

### 多元的視野，多重的解釋

知識生產不是價值中立的。證據是最後的審判者，但證據必須靠人識別和解釋。知識生產者總是受到興趣、背景、師承、學派、政經條件——別忘了還有更大的時代氣氛——層層的制約，現象學家稱這些因素為「相關結構」(relevance structure)。嚴格訓練使人言之有據，反覆省思讓人明白偏見之所由，縱然如此，沒有人能夠完全擺脫知識的盲點。克服這些盲點的第一步，就是正視這些盲點。

我們得承認美國是世界體系的核心。美國學者看中國，好比站在廬山之外看廬山，不必措傳統華裔學者的心理和文化負擔，的確出現不少觀察敏銳、分析透徹的佳作，旁觀者清，而且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他們這個知識系統有獨特的偏見和盲點：一般美英學術界和新聞界從來



想當然耳，按照自己的現實需要和腦中的偏見，描繪出以偏概全、自以為是的圖像。他們建構的當代中國，有太多東西隨着國際冷戰的大氣候和美國國內的小氣候流轉，反覆顛倒而多變，對中國的認知總是徘徊於浪漫情懷與懷疑抹煞之間，搖搖擺擺，覓不到持平點。

尤其是文革時期，許多美國學者和記者罹患「天真的革命浪漫幻想症」，看到叢林的尖端，便當作天邊一片雲；抓住一些有限而可疑的材料，居然就拚命建造封閉的理論空中樓閣，根本經不起起碼事實的驗證，難怪風一吹就塌得片瓦不留。那個歲月正逢美國反戰運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種族運動的高潮，毛澤東高呼甚麼「為人民服務」、「造反有理」，那些口號全給美國激進份子聽進去了，他們對國內社會怨懟的情緒一腦兒投射到中國的文革，找到宣洩口，建構一幅浪漫而虛脫的想像。毛澤東的死亡象徵這種想像的破產，學術和媒介論述一時陷入完全否定的另一個極端。八十年代中期以後，美國媒介又把中國改革的勢頭解釋為「資本主義的勝利」，結果給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當頭棒喝，緊跟着再度陷入九十年代的悲觀與否定。美國媒介塑造中國的形象，不僅反映中國的現實，也反映美國的現實，更反映中美關係的起伏(見本書第六章)。

我們要求在互為主觀(intersubjective)的基礎上，建構多元(plural)而多重(multiple)的詮釋。多元而不單一，庶幾學術不被權力壟斷，不定於一尊。多重解釋才能曲盡其致，欣賞「遠近高低各不同」的景觀，避免簡單粗糙的理解。是非本無實相，互為主觀把問題適當的相對化，容許大家在寬容的詮釋環境裏尋找定位，並保持不斷的民主對話。華人傳播學術圈應該趕緊建立相輔、相成、相爭的詮釋社區(interpretive communities)。「對話」要有「對手」，不能喃喃獨語。除非我們入乎西方學術霸權的核心，然後出乎其外，否則勢將沒有資格爭鳴或對話。從知識論來看，局內人靠經驗與觀察求知，局外人以反省與詮釋見長，各有千秋，各具盲點。華裔學者看華人社會，更能解讀微言大義，更能

掌握各種網絡關節，但這不是必然的或與生俱來的優勢。我們自己有許多文化包袱和思想弱點要用掉，卻又偏偏習焉不察。所以，唯有裏裏外外虛心交流，放棄霸權形態，才可能截長補短。

### 所謂的「跨文化」：技術問題與宏大敘述

七十年代初抵美國，我在新興的傳播學門外張望，無意間接觸到一本《創新傳佈》，當即驚為「奇書」。作者羅吉斯教授(Rogers, 1962)年方四十，已紅遍半邊天。他地毯式搜集兩千篇相關實證研究，一半以上是在第三世界做的，然後整理出框框條條的理論假設，逐一歸納統計每個假設獲得百分之幾「跨文化研究」的證實。我頓時像觸了電，深為其科學客觀、條理分明所折服，何況他文字簡明，的確讓初學者有豁然貫通的錯覺。我不僅心嚮往之，甚至從學於他兩年。後來因別的因素轉益多師，遂懷疑羅吉斯援引那些貌似客觀的「跨文化」研究，本質上莫非把深植於美國文化土壤的理論挪到國外去「再生產」，把理論背後的假設「全球化」和「自然化」，變的只是一堆代表某些現象的數字。

中國大陸的學者喜歡講「語境」，台灣學者稱之為「脈絡」，講得好。這個語境畢竟是受制於政治、經濟和文化脈絡的。一個時空背景下的學術偏流，可能躍居另一個時空背景下的主流，孰主孰客，要看社會怎麼建構它，真的沒有必然或絕對。此外，在不同的語境下，相同的概念可能產生特殊的意義，建立不同的因果關係。有人潛意識裏覺得，外國學者提供普遍理論，中國學者只能證明那個理論在特殊環境的真偽。果其然，我們搜集材料豈不只为給西方理論當注腳？我們學術成績薄弱，長期缺乏自信與自覺，接受強勢學術圈所界定的現實而不自知。

談到羅吉斯，南京大學石琳同學送來電郵說，她讀罷羅氏的《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Rogers, 1994；中文譯本：羅吉斯，2002)，一時間深為其脈絡清晰、語言淺白生動所吸引，但讀了我對羅吉斯的描述，反而有些不知所措。我說，那本書的確娓娓道說一些動人的故事，

可惜淺出而不深入，對於傳播學與時代背景的聯繫，對於社會科學的動態發展都講得太簡略了。書寫得通俗化而不簡單化，清楚明白而寓意豐富，見樹又見林，談何容易？說起這類書，我以為勃格(Berger, 1963)的《與社會學有約》實在無出其右者。

她又說：「同時精於技術問題與宏大敘述的學者總是有限。其實不管精於哪一邊，都是深刻的片面。我們需要一個成熟的學術環境，讓精於宏大敘述與技術問題的兩類學者相互啟迪、鞭策、印證。」

我無意把技術問題和宏大敘述黑白二分，宏大敘述必須以技術和證據為基礎、為襯托，技術問題最好有宏大敘述的關懷，它們彼此層層滲透，應該有辯證的聯繫。我一向尊敬那些把技術問題處理得乾淨俐落的學者。任何人學好學精一套工具和方法，不憚其煩，費時費力，絕不簡單。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許多問題只能靠某些技術工具來解決。只是「利其器」以後，怎麼「善其事」？技術問題的背後是甚麼？技術不應該只為技術而存在，成為一種學苑內的嬉戲。反之，宏大的敘述不是放言空論，如果沒有堅實的證據和嚴謹的理路，說得再天花亂墜，還是口水多過茶，等而下之則是意識形態，不是學術研究。社會科學畢竟是實證科學，受哲學的影響，但不是哲學。儘管學術研究和意識形態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其間卻不能畫上等號。

我服膺穆爾斯(Mills, 1959)的為學態度，他認為社會學者必須念茲在茲，結合個人的興趣和重大的社會議題，而且置社會問題於世界為經、歷史為緯的座標上。這個說法對「做怎樣的社會科學工作者」甚有啟示：從個人最深刻的經驗向外推，思考擴及普遍的社會現象，最後竟聯繫到一些根本的關懷，以至於發展成一種學術志業，那麼學術工作就構成一個整體，不是割裂。基本關懷(例如自由、平等)必是每個社會永遠存在而無法徹底解決的問題，需要因時因地從各領域注入新的內容和詮釋。社會科學屬於公共領域的自由獨立論述，一旦疏離於社會實踐，則滋長知識的專橫。社會科學工作者參與公共論壇有兩個角色，一是公

民，二是專家；他們應該從專業視角對公是公非有所承擔，維護普世價值，但不能像傳統儒家士大夫享有泛道德的特殊地位。

鑒於當今中國眾聲喧囂的語境，我得趕緊澄清可能的誤會：我反對「假、大、空」。在華人傳播學術社群裏，許多人論多證少，有人甚至只論不證。他們沒有傳統樸學或西方經驗(empirical)的嚴格訓練，但憑直感和空話鋪成一篇篇「應該」(should)如何如何的論文，獨獨說不出「是」(is)甚麼。然而未知「是」，焉知「應該」？他們只敢大膽假設，不肯小心求證。他們不但缺乏看問題的理論架構，也很少落實到技術的層面——包括建立嚴謹平實的論據，關照證據搜集、假設證明等一連串明辨的過程。技術不及格的人，且莫大言炎炎。環視當今華人社會的語境：大陸最欠缺樸實的技術訓練，太多聰明人盡講些華而不實的套話和空話，太少人願意踏實深入分析點滴的材料；港台學者多半經過美國的學術洗禮，參考架構也容易流於美國式的瑣碎化和技術化，如不及時提升到對一些終極關懷的境界，恐怕只能勤於給西方理論當注腳；在美華裔學者為了讓主流思想和權力結構接受，可能自覺或不自覺地放棄批判的本能，但求附麗或同化其間。——美國社會和學術市場多元而未必開放，趨同(conformity)的力量極大，這一點早已為托克威爾(A. Tocqueville)道破，所以長期在美國教書的人的確需要一點膽識和灑脫，願意學貓頭鷹站在邊緣位置冷眼旁觀，若即若離，獨來獨往。

法蘭克福學派諸子避二戰於美國時，與美國重實證主義的文化土壤格格不入。阿多諾(Theodor Adorno)最早寄居哥倫比亞大學，拉查斯斐爾德(Paul Lazarsfeld)邀請他合作，希望用量化的方法驗證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理論，卒因想法實在南轅北轍不得不分手。法蘭克福諸子後來陸續學習一些實證方法，阿多諾在柏克萊加州大學發展出一個量表，測量法西斯的「權威人格」。戰後他們當中多數回到德國，在面對論敵時，反而站出來為實證方法(而不是實證主義)辯護。他們用實證的技術闡發宏大的敘述。我贊成實證，但反對實證主義。以前老師總教學生寧可小題

大作，不要大題小作，以免空疏無當。但若把大題目分成許多小題目，緊密聯繫，每個小題目都做得紮紮實實，證據確鑿，論理清澄透徹，大題仍然可以大作，技術問題與宏大敘述無妨相輔相成。

## 文化中國的中心與邊緣

八十年代期間，海外知識界提倡「文化中國」，以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的闡述最明白透徹。「文化中國」的提法當然是相對於「政治中國」和「經濟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互動關係，剝到最後一層也許糾纏不清，界限難分。特別標出文化中國，無非希望賦文化領域以較大的自主性，不讓政治經濟勢力獨吞公共領域，以致把文化邊緣化為一個「剩餘範疇」。經濟在商言商，利之所在，無堅不克；政治利益的短暫考慮夾着太多權謀恩怨，沒有永遠的敵人，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害。唯有文化源遠流長，視野比較高亢，可以冷靜看問題。文化了解有助於打開政治僵局，但文化的意義在我看來是超越政治，相對獨立於政治而存在。

杜維明(Tu, 1991)把文化中國分成三個圈圈的象徵世界：第一圈包括中港台和新加坡的華人社會；第二圈包括北美和東南亞的少數華人社區；第三圈則無關乎血統，凡在知識上促進對中國的了解，不管是學者、專家、記者、商人和實業家，都算是文化中國的成員。他說，對於當代文化中國的了解，這幾十年來貢獻最大的不是來自於核心的第一圈，而是來自最邊緣、最鬆散的第三圈，這就頗有後現代「中心即邊緣，邊緣即中心」的味道了。

最內圈的中國大陸和台灣，專制政權分頭把文化政治化，文化自主的空間幾被擠壓得蕩然無存，在口號治學的歪風下，許多研究當代的學術文化轉變成意識形態和宣傳叫囂。三不管地帶的香港，經濟大，文化小，雖是整個文化中國的運轉站，但它的文化淺盤貢獻不大。

文化中國的第三圈，說穿了，最主要的基地還是在美國。當代中國

研究和所有的區域研究一一被編織於冷戰所需要的知識系統裏，都具有強烈的實用目的。這是美國學者觀察世界的基本「文法」，但千萬別一竿子打倒學術，貶之為維護美國帝國利益的工具。對我們來說，最難解的弔詭是甚麼？一方面，我們理解的當代文化中國，多拜賜甚至依賴於美國學術文化界的成果，否則眾瞎所摸到的中國巨象一定更殘缺；另一方面，美國社會卻普遍以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彷彿別的國家存在只為襯托它的偉大，中國研究附麗其中，注定是一支邊緣的偏流，短期內（甚至長期內）很難進入主流的殿堂。中國研究倚重在文化中國圈最邊緣的美國，而它本身又在美國學術文化圈的邊緣，面臨一種「雙重邊緣」（邊緣中的邊緣）的尷尬。

除了中國研究的困境，美國主流傳播本身也有學科發展的問題。傳播學界把中國（或「國際」）畫出雷達的範圍，姑且不論；一般傳媒研究的理論關懷地平線未免太窄太低，又自外於社會實踐，幾乎放棄公共辯論的話語權。坦白說，走出本行還有影響力的傳播學者寥寥無幾；假如華人傳播學術圈照搬美國這套主流的東西回去自己的文化脈絡，不加思索改造，只顧一逕奮勇再生產，那麼注定要淪入「邊緣的邊緣的邊緣」的命運，對於目前驚天動地的社會變革，如果不是無動於衷，也只能默然旁觀。

### 美國傳播研究逐漸向內看

美國崛起於二十世紀，取代了英法帝國主義而稱霸世界，美國佬因此以為地球只繞着他們轉。美國打個噴嚏，全世界都得傷風。美國人文化孤立主義的心理情結一脈相承，唯其政經勢力獨尊，一般人覺得天下之大之美盡在於斯，沒有了解異文化的迫切感。跟中西部和南部那些充滿奶油味的純樸農民說幾句話，你立刻明白東京、南京、北京對他們都一樣遙遠而模糊。奈何當今社會科學的思潮唯美國馬首是瞻，我們無法忽視它的巨大存在。十幾年前，我在美國校園碰到幾位德國來的交換教

授，向他們探詢法蘭克福學派的動態，不料他們迅速轉開話題。後來才恍然大悟，他們根本不懂法蘭克福學派——二戰以後，德國媒介研究沒有繼承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術資源，反而跟隨美國的實證主義亦步亦趨，早就把「德意志意識形態」一筆畫出界外了。

三十、四十年代期間，芝加哥大學開山的社會學家們開闢了一些原創的媒介研究，以杜威的實踐主義(pragmatism，或譯實用主義)為世界觀，他們把媒介當作社會有機體的制度，聯繫都市化、工業化和大量移民引發的迫切問題，例如派克(Park, 1922)研究各移民報紙如何促進民族大融合，處處表現了淋漓的社會改革精神。二戰以後，美國的勢力如日當中，社會學重心東移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拉查斯斐爾德發展的大型調查研究，受墨頓(Merton)，1968的中距離理論(middle range)和結構功能論(structural-functionalism)引導，取代芝加哥學派，躍居主流，基本精神從批判改革變為給美國國力持盈保泰。結構功能論的政治傾向保守，但無妨哥大氣象恢宏的第一代大師，以及他們優秀的弟子們，分領美國社會學界風騷達數十年。

後來整個美國社會科學過份追求專業化，忽略通觀通識，學術的崇山峻嶺紛紛變成了丘陵起伏，隔行如隔山，甚至連同行也壁壘分明，紛紛為技術化和窄化推波助瀾。最糟糕的，實務傳統的新聞系開始引進的傳播課程以後，學殖淺，拾人牙慧，一頭走入「天真的經驗主義」(naive empiricism)削足適履的胡同，凡是跳出它狹窄範圍的都不是問題。窄化到這個田地，社會批判的刀鋒磨蝕殆盡，研究旨趣和社會脈絡脫節，簡直坐井觀天，最多枝枝節節地給權力機制(政府和商家)提供合理化的解釋(Hardt, 1992; Carey, 1992)。直到六十年代末，激進的社會抗議風起雲湧，少數學者正面挑戰保守的結構功能論，回頭去芝加哥學派找靈感(但此時芝加哥的旨趣已經遠離媒介)，並期望借這座橋吸取歐陸的法蘭克福學派的神髓。說到底，美國總以實證主義為基調，即使英國文化研究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後陸續滲透到美國人文、社會科學各領域，它

還是被吸納到自由多元光譜中的一點，始終是一支偏流，只能從弱勢的邊緣抗衡實證主義的支配霸權。

實證主義旨在把複雜的宇宙化約為最精簡的元素，並建立這些元素之間的因果關係。這是近代自然科學的主要方法，成果輝煌，有目共睹。但社會科學要是「完全」模仿自然科學，接受實證主義，最大問題是人間事除了客觀規律，還有一層一層的意義必須主觀闡釋。實證主義追求理論的普遍性(*generality*)，甚至把普遍性擴張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性(*universality*)，不惜抹煞歷史的特殊性為「例外」，殊不知社會科學的「例外」有時比「常態」更富弦外之音。實證主義者也不太理會本體論和知識論，往往把看問題、看世界的「方法論」(*methodology*)簡化窄化成為研究技術(*methods*)，以為這就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或最後的標準。他們從頭起就凍結第一層次的根本問題，逕向美國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基本假設靠攏，並以這些假設為出發點和歸宿點，只顧在建制(*establishment*)的範圍內回答一些技術的問題。他們躲在「科學」的門牆下，關起宏大學術思潮的活水源頭，當然碰不出什麼辯論的火花。他們在既定的範圍內向內看，埋頭經營，山頭愈分愈支離破碎，連有意義的對話溝通都不可能。美國傳媒研究更是抽象層次低，理論薄，關懷窄，即使在實證主義的架構裏恐怕也位階不高。

人類學家紀爾茲(*Geertz*, 1963)早年曾用*involution*一字，概述當年爪哇島土地肥沃，使得人口愈來愈膨漲，幸虧農業社會人多好辦事，個人需求也不高，只要多排些筷子大家都有飯吃，但這樣不斷安插過剩的勞動力不啻火中取粟，愈耕耘愈沒有生產力，最後良田變廢墟。這個景象正是美國主流傳播研究的寫照。蘇鑰機(*So*, 1988)曾分析傳播主要學術期刊所引述的文章，發現以前引用很多其他社會科學學科(如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的文獻，後來轉變到以徵引傳播文獻為主。我認為，「自給自足」未必象徵傳播研究的成熟，反而是*involution*的過程。傳播學門逐漸制度化(開設更多博士班，出版更多期刊)以後，自然而然會產生莫名的



壓力、誘惑和錯覺，以為必須建立不假外求的系統而後已，結果題目炒得太細，走火入魔的那些簡直如紀爾茲所形容的「技術化細分髮絲」(technical hair-splitting)，表面熱鬧非凡，但再怎麼精確計算頭髮的分法，也彰顯不出整個頭的輪廓。

甚麼是美國的「主流」傳播研究？每個人繪的圖像多少不同，我無意言過其實，卻難免顧此失彼。我心儀的美國傳媒學者遍布各學科，基本上他們必須能見其大，又能見其小，宏觀和微觀並舉，經常縱橫幾個山頭或領域；其中有實證的，有非實證的，有反實證的；有自由派的，也有激進派的。我鍾意明尼蘇達大學退休同事提奇諾(Phillip Tichenor)和他的合作者用尋常的調查方法和內容分析探討媒介產生的「知識鴻溝」(knowledge gap)，不斷呼喚着社會公平。卡茲(Elihu Katz)涉及面更廣，舉凡媒介效果、「媒介事件」(media event)和有關文化帝國主義的辯論，均另闢蹊徑。薛德森(Michael Schudson)結合社會學細緻地分疏新聞史，斐然可觀。我佩服當年老師社會學家蓋姆森(William A. Gamson)解讀權力和媒介話語。塔克曼(Gaye Tuchman)從現象學以濃筆描述媒介如何建構新聞，吉特林(Todd Gitlin)從「霸權」理論分析媒介對社會運動的建構，甘斯(Herbert J. Gans)以人類學方式研究記者、新聞機構和通俗文化，凱瑞(James Carey)從實踐主義堅持傳媒的民主角色，俱屬經典之作，其他的無法一一枚舉。這些學者多半是社會學出身，如果新聞傳播科系閉關自守，只讀「行內」書不旁騖，則必導致知識蓄水池的枯竭。可惜上面提到的這些學界領袖採取國際視野的少之又少。我涉獵大量英國學者的著作，以便告別「唯美(國)主義」，也借助它們接通歐陸的重要思潮。

英國社會學家季登斯(Giddens, 1996: 4)說，美國學界過份專業化，只問耕耘自己的田壟，不管外面廣大天地的氣候變化，目光愈變愈窄，關懷愈變愈技術化，因此社會理論的重心已經從美國渡海轉移到歐洲去。過去二三十年來，英國學者吸收德國法蘭克福學派、法國結構學派

和義大利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又融合本土的激進思想，形成統稱為「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傳統，與美式媒介研究一方面分庭抗禮，一方面互相滲透。有趣的是法蘭克福學派大師們俱屬文化精英，集中火力批評通俗文化和文化工業摧殘精緻文化的品味；英國文化研究大師多出身寒微，<sup>〔</sup>他們追求文化霸權的解放，並認為通俗文化和大眾媒介是文化霸權的重要製造者。<sup>〕</sup>

文化霸權的「壓迫點」大抵包括階級，性別，種族。但像文化研究這麼激進富生命力的取徑，都只看到階級，忽略性別或種族的壓迫。先驅大師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出身威爾斯的鐵路工人家庭，學術旨趣聚焦於英國階級和「內部殖民」的壓迫，但他向薩伊德(Edward Said)坦承「帝國主義」從未進入他的學術意識範圍，簡直令人匪夷所思。另一位大師侯爾(Stuart Hall)，牙買加的黑人移民，一輩子環繞英國的階級問題轉，近年才回頭認真反省種族、膚色的文化意義。可是，到頭來，女權主義者怪罪這兩位大師忽略性別的壓迫。最後，我不得不再指出兩點：其一，英國文化研究仍以歐洲為本位，並不是那麼國際化，不能簡單移植到別的文化土壤；其二，文化研究脫胎於文學批評的傳統，有時未免令人覺得「文學」太少「批評」太多，文化批評也不應該限於意識形態的批評。總之，我們勤收西學，取精用宏，但切忌囫圇吞棗。這是一項艱難、漫長但又不可逃避的功課，只能靠整個學術社群長期努力。

## 華人的傳播學術視野在哪裏？

這個世界需要更多元的文化視野，華人學術圈哪天能夠了解美、英、法、德思潮的精髓，又能共同提出原創的問題、方法和理論，哪天就可以建立主體性，脫離學術殖民地的境地，而站在平等的立場與強勢的學術傳統對話。「華人傳播視野」不過是一個籠統的簡稱，尚待仔細分疏甚至解構：

一、華人傳播視野建立於「共同民族文化」的基本假設上面。甚麼

是文化？我個人比較傾向於接受文化研究者的立場：文化是一般俗民過往生活(lived)的經驗以及他們日常活生生(living)奮鬥的過程，而不光是陳列或塵封在歷史博物館的文物，更不僅止於供奉於廟堂之高的一部部典籍。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籠統的「華人視野」，將來也不會有。中、港、台的生活經驗和傳播視野勢必多元、複雜而矛盾。我不喜歡把東西解構到絕對或虛無的地步，毋寧相信文化有穩定性和共同性。但這個共同性不能抹煞特殊性，這個穩定性是經歷動態變化的過程，不是靜止不變的狀態。用佛家語，就是展現「無常」之「常」，我們捕捉的正是「常」與「無常」的辯證性。

二、民族性不能定於一尊，不能壓抑民族內部次級團體的各種觀點，更堅拒以任何政權功利的霸道立場為準繩。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面臨殊異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內部條件的互動差別很大，即連三地傳媒研究的路向也是有同有異，頂多求同存異，休叫霸權的文化遮蓋地平線。學術的原創力未必和地理面積的大小成正比。大陸內部的發展失衡，漢民族和少數民族、沿海和內陸的矛盾顯豁，廣州看到的中國和青海看到的中國是兩樣的。北京向「一國」的傾斜，正如香港對「兩制」的維護，這在媒介論述看得很清楚。

三、在某些問題上面，「華人」的傳播視野未必是問題的第一性，階級、性別和種族的觀點也許才是主要的矛盾。上海新貴的時尚向紐約或巴黎看齊，身不能至，而心嚮往之，翻一翻《上海壹周》那些花花綠綠的名錶、LV皮包、化妝品、內衣和紅酒廣告也過足癮，社會心理學家說這是替代式參與歐洲小資的消費幻象。他們跟遼寧的失業工人、安徽的農民有多少靈犀默契？但碰到若干議題(例如民族主義)，這些階級群體可能自動短暫會合，可見立場的分合因脈絡和條件而定。目前中港台  
的媒介都依市場邏輯運作，盡量討好有錢和有閒階級，而忘記了弱勢團體在掙扎。

如何建立華人的傳播視野？我支持實證精神，但反對實證主義；正如我服膺科學，但反對科學主義。現階段且莫在先驗上決定好壞，不要畫地自限，寧可抱着開放的心靈，百家爭鳴，不怕嘗試錯誤，而要爭取在摸索中總結經驗，庶幾經過長期實踐逐漸形成共識，琢磨出幾條切實可行的途徑。台灣社會科學學者嚴肅提倡本土化二十多年，如今已經建立了主體性的共識，但在知識論和方法論的層面分歧仍大(參考朱雲漢，2002；石之瑜，2002)。換句話說，他們已經明白「不要」走甚麼方向，還沒有確定「要」走甚麼方向。現有許多學者在嘗試各自的道路，假以時日，有的會從實踐中自然而然匯流在一道，有的則繼續堅持向自己認為對的指標邁進，這樣合力造就一個更豐富更成熟的學術環境。這是一條漫長的過程，快不來，急不得，但只要「主體性」的原則登上議程，就不會不分青紅皂白跟隨西方的流行之風搖擺了。

台港傳播學術圈已初步討論這個問題，可惜交集點不夠集中。在種種論述之中，祝建華(2001)的提議最值得注意。他主張先從本土實情出發，再從國際學術界「嚴格選擇直接相關而又能夠操作化的概念、命題或框架」，在這個基礎上發展出整合性的中距離理論。同為實證主義者，祝建華的高明處在於先從本土出發，不像往常一般人拿所謂的「國際」理論來套取「本土」經驗。國際理論為「體」、本土經驗為「用」的迷信不破，主體性的建立無期。接着，我們面臨另外一個問題：操作化必須經過化約(reduction)的過程，不是所有重要的問題都可以(或應該)操作化，就算要操作化，其程度也因知識論和方法論的取向而有粗細；人類學家、精神心理學家或文學批評家在剖析、解釋層次分明的意義時，未必可以(或必要)像經濟學家、社會心理學家那樣嚴格的操作化。前者畢竟以追求意義為第一性，規律頂多是第二性。我充分明白而且同情祝建華的選擇，他也有傲人的成績，但追求「意義」的學科正逐漸影響媒介研究的方法，卻不可等閒視之。

在方法論上面，管見以為：華人傳播學術圈除了熟悉實證主義，在

現階段不妨多多探討韋伯式的卓識。韋伯(Max Weber)當然不是唯一值得效法的，但韋伯式的方法出入於實證論和現象學之間，從社會演員的意義世界入手，然後由研究者居間引進理論和概念，以便在歷史中照明一層層社會演員的意義結構，幫助他們闡釋生活的世界，這個方法可以兩頭兼顧實證的因果(抽絲剝繭，執簡馭繁)和現象學的意義(多元、複雜甚至矛盾)。換言之，實證主義假設宇宙、社會只有單一的、可知的外在客觀規律，研究者的任務在於發掘這個客觀規律，文化特殊性只是普遍性的特殊「條件」或「狀況」，是異於常態的例外。現象學先注意不同群體建構不同的意義系統，然後研究者進場接通理論和這些意義系統的聯繫，但研究者只是第二性的助緣，不能取代社會演員的主要角色。

容我不嫌詞費，再次強調：現象學以「社會演員」為主，以外在理論為客，求取文化特殊性和理論普遍性的平衡，它可以救濟實證主義的偏枯，更應該跟它爭鳴個長短；而且它所建構的不是單一的現實，而是多元現實(multiple realities)，其實有利於我們爭取主體性，有了主體性再尋求如何和西方學術平等對話。讓我打個不盡恰當的比喻談主體性：中國歷史上以儒家和道家為主體來理解、吸收佛教，終至於儒釋道融合發展成為一家，互相豐富滲透，但從來不是視儒家和道家為客體去附會佛教，馴至替佛教充當補充的注解。換言之，儘管在交流的過程總有會合點，但原則上和順序上都應當以西經注我們，不是以我們注西經。

在實際作法上，有人提倡整理古籍，只是實踐至今多半落得「牽強附會」四個字。閱讀古籍的能力一代不如一代，但這還不是最大的挑戰——如果是，我們可以結合多學科逆水行舟，截長補短。在我看來，有兩個癥結更棘手：其一，如果只看文本，強作解人，用現代的名詞附會古代的語脈，以致脫離整個時代背景和生活語境，終歸是非歷史的，片面的。其二，如果把communication看作廣義的「溝通」，定義可能大而無當，用中國古籍勉強附會未必獲得同情而深刻的了解；但如果把它解作狹義的「媒介」(media)，則近代中國報業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始自

西方引進，中國古籍對於探索媒介和中國現代性的啟示多大？我不敢妄言此路不通，但整理古籍是需要好好辯論的。當然，我們不妨擺脫古籍的束縛，走入華人社會日常生活經驗的肌理，從中尋覓深層的規律和變化，梳理並提煉系統的理论概念，然後與西方學術互相參照發明，得到廣義「溝通」的理解。社會學界(如黃光國、金耀基)對於人情和面子的現代闡釋是頗具深意的。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看最實事求是的，莫過於平時深入了解「西方」(這個名詞尚待解讀))的主要社會理論、學科理論(例如社會學理論，有別於社會理論)的脈絡，熟悉它們的重大辯論，以儲蓄自己的學術理論資源。當我們面臨思考具體的問題時，則不妨先跳進去參照自己生存的場域，從中提出最有意義的問題，接着反芻平時留心的理論，一方面分析，一方面綜合，從小見大，知微見著。上焉者，如薩伊德，提出了另類(alternative)和針鋒相對、分庭抗禮(oppositional)的解釋、理論和視野。中焉者更清楚燭照文化的特殊意義，並聯繫理論的規律。主流理論通過了嚴格考驗仍巍巍屹立，起碼證明它的文化霸權不足為畏。說來說去，最根本的在掌握文化脈絡裏的內在理路，然後援引外在理論，刺激我們思考問題，幫助我們解釋證據和意義。老實說，深入認識自己已經很難，透徹理解主要西方理論絕不容易，難上加難，欲踏出長途學術跋涉的這一程，需要有膽識，有訓練，有熱情，切忌浮誇。

我最怕聽到一些浮誇的講法。甚麼要以「中華中心」取代「西方中心」，這是夜行人吹口哨自我壯膽，當真不得。其一，凡稱得上理論的東西必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不是誰可以一手包辦壟斷的。其二，社會科學是外來的，不是固有傳統文史哲的遺產，無論言語、敘述、思考方式，我們只能虛心學習，方期有所進境，才能把人家的學術系統「內在化」，變成自己的財富，然後在這個基礎上推陳出新。其三，唯有具備國際視野和比較眼光，才能知己知彼，成其大，成其遠，而不至於固步自封，自欺欺人。其四，我們的學術傳統不穩固，不能傲然獨立，干

擾太多，社群太小，學術紀律和業績太薄弱，遠遠不足以創造一個有文化特色的視野，只配在邊陲的學術殖民地裏關起門來自鳴得意。其五，「中華」和「西方」的簡單二分容或有分析上的需要，但最後還是要彼此滲透，互相學習；反對西方學術霸權，不是為了建立另外一個霸權(先別說建立霸權得有實力，我從不相信西方霸權這麼容易打倒)，而是追求一個具有文化特色而又有普遍意義的視野，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爭取平等對話的權利，從爭鳴中促進彼此的了解。

### 中國傳媒研究的隊伍逐漸成形

美國學術界對於當代中國媒介的研究，最活躍的恐怕不在傳播領域內，而在政治學。傳統美國傳播學像駝鳥，一味自我中心，凡是落在美國邊界以外的制度統稱為「國際傳播」，欠缺世界體系的視野，許多著作看不出理論的關懷。而中國傳媒研究只侷促在國際傳播的一個小角落。同時，美國對中國媒介的關心主要集中在政治和政策的層面，政治學家把中國媒介黨國喉舌作為了解政治鬥爭和外交政策的窗口。這個觀點沒錯，只是窄了些。這十多年來，傳播研究受到多元學派的挑戰，新一代的學者人才輩出，對中國媒介的了解已經逐漸成熟了。

八十年代以前出版的著作姑不置論。回顧八十年代初，英國人霍金斯(Howkins, 1982)自詡寫成第一本根據實地訪問中國媒介主管和記者的書。當時，我寫過一篇書評，援《紐約時報》把書分成「小說」(fiction)和「非小說」(non-fiction)之例，稱之為「非書」(non-book)。作者對中國政治文化的隔閡實在到了驚人的地步。當時，剛從文革牛棚放出來的驚弓之鳥，面對疑狐的外國問探，除了開留聲機重複官方濫調，不知還能說些甚麼？中國政治鬥爭慘烈無情，只有官方在事後揭發政敵的黑材料最可觀；倘若當時有人讀一九七九年驚心動魄的《人民日報》，左手批四人幫，右手批「凡是派」，保證比霍金斯寫得出更有勁的著作。八十年代末，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韓裔教授張元鎬(Chang, 1989)，乘為

中國記者培訓之便，由學員搜集官方資料，編撰《中國的大眾媒介》一書，了無批判精神，更未聯繫中國的政經變化與矛盾，讀來索然無味。這兩本書所寫的如果是美國媒介，絕無問世之日。

中國傳媒研究不再賣野人頭了。但美國社會科學各領域對當代中國的建構，無論議題、旨趣或是資源，一向由美國的學術要角一錘定音。華裔學者好不容易開始在發言台上贏得小小的一席之地，頂多與有榮焉當個資淺夥伴(junior partner)。儘管無法撼動原有的霸權，華裔學者對自己所最關心的問題不再缺席，不再沉默，更不必唯西方觀點為觀點了。他們一時得不到主流學界應有的重視，但這是沒有辦法也不必太計較的事。他們正在培養一個有形無形的學術社區，遵守一般的學術紀律，大家用文化中國的角度，既分頭而又共同提出一群有意義的問題。這樣經過二三十年的學術薰陶，努力不懈，可望逐漸形成一派獨特而深邃的學風。

我這篇文章反覆提到對話和交流，何嘗不是反映弱勢者的焦慮？我們急，人家不急。只有我們建立高標準的學術社群，拿得出漂亮的東西，人家才不能漠視我們的聲音，我們才能在全球化的脈絡找定位。華裔學者來自文化中國的各地區，又在西方學府接受嚴謹學術傳統的洗禮，各欠了兩邊深厚的知識債。他們必須拒絕義和團式的坐井觀天，夜郎自大。友朋之間許多卓然有成者，例如趙月枝(Zhao, 1998)從社會理論來探討中國媒介與民主化的關係，潘忠黨(Pan, 2000; Pan and Lu, 2003)從媒介社會學的角度分析中國新聞改革的變化，何舟(He, 2000)從政治經濟學探索中國媒介組織內外角色的調整；此外還有陳光興、馬傑偉的文化研究，祝建華的實證媒介效果研究，張讚國的國際傳播研究，陳韜文和馮建三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都初步帶來可喜的信息，證明中國傳媒研究和學術潮流接得上軌，可以為有意義的對話鋪路。學術的內緣因素為主，「國際」肯定與否還在其次。人家喝采不喝采，既非操之在我，便毋須耿耿於懷。



## 入乎霸權，出乎霸權

十八、十九世紀是英法帝國主義的世紀，二十世紀美國取而代之稱霸天下。在冷戰期間，「美國社會科學」(如現代化理論)除了擴張為「社會科學」，又於正統學術之外設置所謂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像螺絲釘般被編納於冷戰知識工業的體系內，為現實利益和政策需要服務，成為域外的野狐禪。區域研究者酷似學術情報員，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範圍內的東西甚麼都懂一點，理論興趣在其次，以至於被專業學科認為不登大雅之堂。冷戰期間各區域行情的冷熱，宛如寒暑表的上下，凡是美國安全和利益之所繫，那個地方便突然行情看漲。七十年代間，中美兩國輾轉為關係正常化探溫，中國學的經費不至於捉襟見肘，及至中國神秘的面紗揭開，中國學的地位急轉直下，從顯學頓入冷門。捱到冷戰結束，拉丁美洲和俄羅斯研究都面臨相同的困境，甚至連區域研究的存廢也成了問題，學界爭辯是否該讓它回歸主流學科的建制。冷不防爆發九一一恐怖屠殺事件，美國忙着進兵直搗窩藏恐怖組織頭子的阿富汗。儘管山姆大叔曾積極介入阿富汗對抗蘇聯的侵略，這時卻猛然發現沒有幾個專家能對這個神秘落後的山國說出個所以然。反恐救了區域研究一命，一時廢不了。

美國本身的社會科學其實也是「區域研究」，只是這個詞意已經給綁架了，特指從美國的眼光看第三世界所得的知識。冷戰結束，美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更獨霸全球，但它在人文學和社會科學的霸權卻一直受到歐洲的挑戰，也逐漸為許多第三世界學者所抵制。華人傳播社群欲向霸權爭取發言權，必先擺脫區域研究的窠臼，踏入以區域為基地的研究(area-based studies)<sup>2</sup>。老實說，挖掘華人社區的材料，不是為了取悅西方國家的知識工業。我們應該汲取人文學和社會科學的理論創新和研究方法，接通區域的經驗意義，對話溝通。唯有不亢不

2 這個名詞借自 Prewitt(2002: 8)。

卑，對具體的經驗現象提出原創的解釋，既照顧理論的普遍性，又充分豁顯文化的特殊性，在各層次展現同中有異和異中有同，最後才能向支配的結構爭鳴。這是從本土出發，超越本土，進而與世界接軌最切實的一條道路。

薩伊德對「東方主義」的學術業績最具啟發的意義。他的觀點深受到早期傅科(Michel Foucault)和威廉姆斯的影響：傅科認為論述(discourses, 或譯為話語)本來就是社會的建構，背後有權力的關係在主導；威廉姆斯(Williams, 1977)闡揚葛蘭西(A. Gramsci)的「霸權」(hegemony)理論，強調文化分析必須着眼於主流、另類和敵對意識在日常實踐當中互相「爭霸」(becoming hegemonic)的動態過程，也就是看主流意識如何吸納、削弱、聯合非主流的意識，以及非主流意識如何抗拒、顛覆主流意識。秉此，薩伊德(Said, 1978)先分析英、法、美帝國主義者在19、20世紀間對中東建構了各種符合它們利益、想像和偏見的論述，再從根批判它們為列強服務的「東方主義」的文化霸權。在另一本書中，薩伊德(Said, 1993)的視野從西方列強在中東建立的文化霸權，延伸到第三世界抗拒、顛覆西方列強的霸權。他的著作逼所謂的學術主流回應戰帖，更為後殖民主義的理論開啟新河。

由此可見兩點：一，薩伊德的成就代表庫恩(Kuhn, 1970)所闡述的典範(paradigm)變化：當正統的學術典範(假設、概念、定律)碰到相悖的零星證據時，往往歸之於「例外」；但如果例外出現愈來愈多，不能隨意抹煞，這時窮則變，變則通，有原創性的學者修正幾個根本假設，改變大家對世界的看法，嶄新的典範於焉誕生，成為「新正統」，影響所及遍佈整個學術社群。二，薩伊德是卓越的文學批評大家，畢生從未教過所謂的區域(中東)研究，但他從文學跨越縱橫許多領域，自由自在，不拘一格。他向來反對那些「向內看」的專業學者坐井觀天。

## 本書的問題與結構

一位教哲學的朋友說我屬於脈絡學派(contextualist)，我想了一想，欣然接受。我常覺得社會理論很少有絕對的是非，通常是角度變化，觀點自然不同。在一個脈絡之「是」，可能是另外一個脈絡之「非」；在同一個特殊的脈絡裏，甚至可能亦是亦非，端看條件、時間、議題而定。為了減少一些可能的誤會，容我喋喋不休，再補充幾句話：我不贊成絕對化，只有基本教義派才會無限上綱，結果就是看問題僵化、教條而失準。我相信是非無實相，所以要把問題「適當」相對化，但不是漫無邊際、「絕對」相對化。要之，我反對絕對化，也反對「絕對」相對化。假如世界上果真沒有甚麼深遠價值值得護衛，學術工作豈不成了不折不扣的犬儒虛無？即令「無常」還是有「常」的一面，而那個「常」在我看來就聯繫到民主、自由、平等這些基本價值上面了。這些基本價值應該萬古長青，我們配合時間和空間的脈絡不斷給它們嶄新的解釋。所以我主張要「相對」的相對化，千萬別連根拋棄那些基本價值，別把基本價值虛無化。辯證地看問題，我們才不會陷入絕對化或「絕對」相對化的兩極陷阱。

我前前後後一直強調建立華人社會的主體性，又強調對話與溝通，完全沒有排外的意思，更反對閉關自守的保守心態。吸收西學，接受學科紀律和標準的檢驗，這些都是不待贅言的。然而對話權和溝通權不是天賦的，如同民主只能靠弱勢者不懈的爭取，不能靠強勢者的施捨或讓渡。鑒於西方長期佔領學術霸權，我們需要發揮文化的特殊性，去消解它們(也是我們)「西方就是世界」的世界觀。我們爭取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平衡，反對以西方壟斷的普遍性來壓抑甚至取代我們的特殊性。在世界的脈絡裏面，許多人視為必然(普遍性)的「西方」經驗，其實可能只代表歷史或地理的偶然(特殊性)。以「西方」本身而言，穆爾(Moore, 1967)指出英國、法國和德國走過的現代化道路截然不同，提利(Tilly,

1975)也說西歐在十八世紀建造民族國家的過程未必能複製於當代的第三世界。沒有普遍性不成為科學，但究竟甚麼是社會科學的普遍性絕非一成不變，值得我們常常停下來思考一番。自然科學只有規律的問題，社會科學卻牽涉規律和人文意義兩個問題，所以社會科學界需要而物理學界不需要強調華人的主體性。

本書試圖呈現並貫穿《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的主題，分成三部分：理論視野，歷史經驗，世界脈絡。

第一部分除了這篇導言，還有兩篇。第二章綜合比較自由多元和激進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這兩個取徑孰是孰非，文章取名為「悖論」，正是表達上面所說脈絡化的觀點。我寧可把這兩個看似矛盾的取徑看作一種靈活的、變化的辯證關係，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兩元對立，所以我試圖把它們脈絡化、相對化。我認為，激進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集中批判市場資本，用來分析西方民主國家的媒介壟斷極好；但在中港台國家機器支配經濟秩序，激進派理論似乎隔靴搔癢，因為市場至少部分是制衡政權的力量，自由多元學派的說法反富洞見。但是中港台的權力和資本都在急遽重組，我覺得這兩個理論又矛盾不安同時交錯存在，當然這三個華人社會有同中之異，異中之同：大陸的市場自由化是削弱了政權對媒介的控制，還是權力與金錢造成奇異的勾結，更使媒介陷入雙重異化的境地？台灣在解嚴以後，政治的壓制力量逐漸從媒介撤退，但市場壓力不斷加大，自由派和激進派的解釋都有部分道理。香港的主權回歸如何與市場秩序互動，對媒介自由產生甚麼影響？

第二章代表一個粗淺的綱領，給個案研究(本書第二部分)提供整體的視野。如果一定要問我偏向哪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取徑，我的答案是：(一)先看哪一個說法比較符合經驗；(二)再看哪一個說法在特殊脈絡裏面更能促進民主。追究到最後，自忖帶有西方意義的自由左派或社會民主色彩，一邊反叛專制政權的壓迫，一邊對抗經濟腐蝕勢力的宰制。這也是許許多多權力邊緣的知識份子所站的立場。當然，有人會覺得我太

右，有人會覺得我太左，怎麼標籤無所謂，因為左左右右也沒有實相，取決於觀察者本身的位置所在。請先考察我的學術工作是否合格，再比較立場不遲。立場不同的人可以爭鳴，可以聯盟，可以對抗，也可以求同存異。

第三章涉及幾個社會理論(自由主義、黨內改革派馬克思主義，和新左派)，看它們如何詮釋中國大陸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控制的矛盾，以及對媒介解放的意義。我想讓宏大的社會理論和中國大陸的現實進行有意義的對話(dialogue)、協調(accommodation)，或對峙(confrontation)。社會理論勾勒「理想社會」的遠景，又有解釋社會、批判社會的作用。自由民主的概念源自西方，但現在已經是普世價值，也是人類共同的願望，雖然每個社會和時代可能賦與不同的內涵。我處理的是中國大陸的語境，對這些宏大的社會理論自然有些述評。

為學的甘苦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我平常對社會理論粗有涉獵，但沒有想過如何用來解釋中國傳媒。另一方面，我陸陸續續針對中港台三地的媒介也做過許多個案研究，旨趣總離不開媒介與權力的交光互影，現在收八篇，構成第二部分，互相引證。這些個案記載歷史的一鱗半爪，都是我親身經歷和體會的，在我卑微的生命中是不可磨滅的印記。這些個案研究和我平時對社會理論的興趣匯合時，水到渠成，便寫出第一部分的三篇文章，其間實有內在的軌跡與聯繫。到目前，我還只在綜合分析、解讀重構「西方」社會理論的階段，不敢虛妄造次自稱建立甚麼理論體系；我完全明白自己踏出的步伐很小，思想不成熟，但對於交流與對話倒一直心所繫繫，對於建立「主體性」也無時或忘。

第三部分有三篇文章，頭兩篇是對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和薩伊德的述評，第三篇論述中國大陸媒介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企圖聯繫中國傳媒研究與世界脈絡，也是我的讀書報告。另外一篇附錄是和學術同道對談，希望再度從側面點明我的學術旨趣，補充一些未盡之言，亦寄寓回顧與展望的心跡，因此我無暇計較自己透露多少淺薄或愚妄了。

歸根結柢，我們的視野應該既是華人的，也是世界的，本書企圖從政治經濟學和社會理論兩條路入手，嘗試從中國看世界，從世界看中國，聯繫普遍理論與具體情境，隨時爭取對話和溝通的可能。這種對話「既回響着悠久的歷史傳統的回聲，又同時受到當代人和當代語境的取捨與詮釋」（樂黛雲，2002：24），而且也要用現代性語言在世界文化語境表述獨特的文化風格與價值。我在本書中除了分析中國大陸的媒介變化，也檢查台灣的媒介與民主轉型，以及香港的媒介與主權回歸的互動，這三個華人社會所編織的光譜，所提供的比較視野，相信是彌足珍貴的。我希望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命題貫穿全部的篇章。我贊成後現代主義戳穿一些虛妄浮誇的、教條的全稱(totalistic)命題，但倘若因此而無限上綱，甚至把民主、自由、平等、解放這些宏大敘述都一併解構，則將不知置學術關懷於何地？

## 媒介政治經濟學的悖論

中港台傳媒與民主變革的交光互影<sup>1</sup>

---

幫助資產階級拉下封建主義的武器，正被用來對抗資產階級本身。

——《共產黨宣言》

全球化的步伐隨冷戰結束而奔騰躍進，前蘇聯集團的政體紛紛崩解，亞洲、拉丁美洲各威權政體發生戲劇性的轉變，全世界媒介研究蓬勃發展，顯示以西方為中心的媒介研究必須重新定位。英美的媒介政治經濟學家通常漠視比較的視野，他們的理論架構孕育於工業先進和政治穩定的富裕國家，無法完全解釋第三世界複雜而曲折的經驗。學界假設媒介必須服務、提倡並參與民主，其實媒介可以增進民主，也可以破壞民主。人類社會從來沒有完美的民主，將來也不會出現。不同的社會理論建構不同的民主想像。媒介與民主的關係論爭不休，常取決於用甚麼規範性的標準和在哪一個社會脈絡中看民主。達格倫(Dahlgren, 2000)站在後現代的角聲稱，在西方國家人們對宏觀的代議民主已失去興趣，他們遠離以國家、國會、政黨為長期認同的政治，轉而投注到日常生活中的身份認同，這種微觀政治的特徵是以階級、性別和種族差異建立短暫的聯盟。此外，論者說，在穩定的民主國家裏，媒介日趨瑣碎，向商

---

1 原載於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2003年6月號，第77期，頁3-17。Chin-Chuan Lee (2001a), "Rethinking Political Economy: Implications for Media and Democracy in Greater China," *Javnost-the Public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8,2: 7-20.

業壓力低頭，製造無知，讓大眾滋生失落感。對此，我贊同薩伊德(Said, 1993: 329)的觀點：「在非西方，現代性(modernity)還是方興未艾，對那些被傳統與正統束縛的文化來說仍是巨大的挑戰。」《共產黨宣言》說：「幫助資產階級拉下封建主義的武器，正被用來對抗資產階級本身。」這說明了現代性在西方和非西方具有不同的解放潛能。如謂西方人厭棄代議政治，「非西方」的個人飽受國家暴力壓迫，追求代議政治而不可得。後現代主義者一味歌頌「生活方式的政治」(lifestyle politics)，但如非西方人無懼於喪失他們牢固的代議權，「生活方式的政治」不知有何積極意義？後現代主義者又主張「全民民主」(popular democracy)，但假如沒有堅實的自由(liberal)制度為基礎，恐怕也只是空中樓閣罷了。

西方批判派學者質疑人們安於現狀，為什麼人們不多反抗一點？人們要反抗的，我想不應是代議民主本身，而是代議民主的不足。西方批判派學者站在西歐和北美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或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社會的邊緣地位，向權力中心的意理霸權發出戰鬥。他們追求理想的「第三條道路」，反抗資本主義的剝削，又反抗列寧主義的獨裁。其中最吸引人的莫過於哈貝馬斯(J. Habermas)提出的「公共領域」。科倫(Curran, 1991; 2000)用這個概念設計一套民主的藍圖，兼容並蓄民間、專業、社會市場和私人企業各領域的媒介。凱瑞(Carey, 1997)從杜威實踐主義的立場提倡「重獲公共生活」，所謂「公共生活」在歷史上可能沒有存在過，但這個概念可以刺激我們想像：除了成為現狀的俘虜，還有哪些「可能的政治」？冷戰結束，列寧主義破產，資本主義成為全球化的驅動力，季登斯(Giddens, 1994)從自由左派建構以社會民主為基礎的「新第三條道路」，企圖跨越代議民主的限制，並把民主從政治延伸到經濟和文化領域。科倫(Curran, 1991)在一篇媒介與民主的宏文裏，呼籲讓自由派的構想「安息」，因為這些舊理念「與當代現實沒有太大關係」。在我看來，他的呼籲只會讓自由主義的觀點早夭，而不一定是「安息」。非西方國家多半沒有自由制度，媒介受到獨裁體制的控



制，大家習以為常。哈林(Hallin, 2000)指出：「新自由主義的勝利，表示自由派觀點漸失意義。」痴肥症和厭食症是富人的問題，窮人病在營養不良，問題截然不同。在自由民主國家剖析自由派的神話陳義過高，和在專制國家摧殘自由多元的價值(例如抹煞新聞自由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完全是兩回事。本章旨在援引中台港媒介的實據，來闡釋政治經濟的複雜悖論。

### 媒介政治經濟學的兩種取徑

我曾經比較自由多元主義(liberal-pluralist)和激進馬克思主義(radical Marxist)的媒介政治經濟學，它們刻畫兩個不同的政治圖像，對媒介的民主潛能有殊異的期待。<sup>2</sup>表2-1綜述一個對比的「理想型」(ideal type)，刻意放大文化的差異以便對照觀察，但我們在推衍時務必謹慎為要。首先我得說明，特定的中文語境常賦「激進」以「不理性」的貶意，尤其是「激進」和「四人幫」合在一起時更容易引起「瘋狂」的聯想。我在這裏用「自由」(liberal)和「激進」(radical)基本上與庸俗的列寧主義及其變種無關，而是形容兩個(西方)社會理論對變革所採取的態度，本身沒有褒貶的意思：自由派贊成溫和漸進的局部變革，激進派鼓吹大刀闊斧的根本變革；自由派覺得激進派太冒進，而激進派覺得自由派不夠徹底，但它們歸根究底都在追求合理的社會和人類的解放。縱觀西歐歷史，早期資本主義從封建主義解放出來，自由派理論支持「負責任的資本主義」(responsible capitalism)，反對專制王權踐踏個人主權。激進派企圖從晚期資本主義解放出來，站在理想化社會民主的立場，批評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累積漫無止境，財富分配不公。自由派強調自由，激進派鼓吹平等，兩派觀點都是現代性的一部分。激進派解放先進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自由派解放大部分受封建主義和專制主義統治的國家。我要

2 詳細討論，見 Lee (2000a)。

強調：裁斷這兩派孰是孰非，不是一個先驗的問題，最後得看它們在甚麼脈絡(context)內能解釋多少經驗現象。這裏我僅能以粗筆描繪兩派之間的異同，無法細緻討論兩派內部的差異。

表 2-1 媒介政治經濟學的两个取徑

	自由多元主義	激進馬克思主義
政治綱要	現實的、實用的和注重實效的政治，支持「負責任的資本主義」。	理想主義、批判資本主義、支持各式的社會主義。
政治經濟學的類型	「政治的」政治經濟學。	「經濟的」政治經濟學。
適用的地區	「晚生的發展中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主要處於威權統治下。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推行自由民主或社會民主。
政權的角色	首要的。塑造經濟和媒介政策，威脅媒介自由。	次要的和從生的。
市場的角色	提倡多樣性，抵消專斷政權的權力。	資本積累和集中限制媒介多元，並產生傳播資訊分配的失衡。
媒介專業主義	提倡媒介多元和自主，「可信度的信條」。	「策略上的儀式」、強化既定秩序；媒介專業人員在表達公眾聲音時專斷粗暴。

來源：Lee (2000a) p.27

激進馬克思主義者(譬如Garnham, 1990; Murdock and Golding, 1997; Mosco, 1996; Schiller, 1992)從上往下看，我稱之為「經濟的」政治經濟學("economic" political economy)。他們抱持激進的人文主義理想，居高臨下，批判自由資本主義的市場背叛民主的理想，特別是「軍事與工業複合體」肆無忌憚地追逐經濟利益，製造文化霸權，導致「不完全的解放」和資源分配失衡，以至於扭曲公共領域。這個批評鞭辟入裏，但對國家(state)角色的解釋往往失之片面，而且頂多一筆帶過。激進派學者批評多元主義者太注重國家與媒介的關係，而忽視資本主義私有化對傳播工具產生甚麼影響。他們自己何嘗不是把「國家」的角色邊緣化？揆其所以然，乃因為西方自由國家的政權對媒介的管制不像專制暴力那麼

赤裸裸，何況在法律和制度上還保障媒介自由。激進派馬克思主義談到國家政權時，立場迥異：工具派學者(如Schiller, 1992; Herman and Chomsky, 1988)認為國家權力逕自為大公司的利益服務，國家與資本異床同夢；其他學者(例如Golding and Murdock, 1991, 1997)卻認為國家與資本也有緊張的一面，國家是民主鬥爭的中心場域，只有國家的力量足以挑戰大公司的利益，只有通過國家的機制才能促成社會財富的公平再分配。為此，後者鼓吹國家應該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場，矯正市場對公共表述所產生的扭曲，例如湯姆森(Thompson, 1990)主張國家積極干預媒介的產權秩序，以營造「管制的多元」(regulated pluralism)。莫斯科(Mosco, 1996)呼籲批判派學者分析國家如何干預傳播工業的市場化、私有化和國際化。

無論如何，激進派學者始終未曾嚴肅分析過「專制政體」。耶魯大學媒介法學者費斯(Fiss, 1996)認為國家與民主既敵又友，國家「補充」市場的缺陷，卻不能「取代」市場的力量。但我敢斷言，開發滯後的國家由專制政權全面支配政經和文化資源，不僅掌握關鍵的新聞喉舌，建立整套新聞檢查和政治高壓的制度，並收編私有媒介到侍從關係去。有的激進派學者(如Schiller, 1976; Smythe, 1994)提倡以前蘇聯、中國(文革時期)、古巴那樣粗暴的列寧主義取代剝削性的世界資本主義。這些專制統治如今已一一破產。這種先入為主的全稱命題碰到處理細緻的政治問題，實在無濟於事。

激進馬克思主義者從根本上批評資本主義。媒介專業主義孕育於資本主義的邏輯，他們認為這是一套為現有體制服務的意識形態神話。施雷辛格(Schlesinger, 1978)指出，媒介專業主義的前提是深信現有的自由民主秩序，根深柢固到不言自明的地步。換言之，唯有凍結社會制度的基本假設，才可以談客觀、平衡這些專業技術的問題；我們一旦質疑第一層次的假設，專業主義必將失去立足點，更遑論向既有秩序挑戰了。塔克曼(Tuchman, 1978)認為，媒介專業主義建造「策略性的儀式」

(strategic ritual)，幫助媒介維持一種客觀的假相，其實整個新聞網都是圍繞合法的**中心機構**，新聞節奏跟官僚機構的運轉同聲共氣，以致支配性的觀點瀰漫於主流媒介，抹煞甚至消滅社會上的異見。媒介的長期的意識形態效果，就是葛蘭西(A. Gramsci)說的製造社會同意基礎，從而建立文化霸權。換句話說，激進派抨擊客觀報導拒絕審察權力與特權的基本結構。凱瑞(Carey, 1997)譴責媒介專業主義賦專業人士太多權力，以致公眾從政治的「參與者」淪為「旁觀者」。此說糅合了對傑弗遜式民主的緬懷以及對哈貝馬斯式民主的憧憬。激進派知識批判的火力強勁，但對於新聞實踐影響微弱。

另外一面，多元主義者從下向上看，建構各種圖像和概念(如媒介專業主義、意見市場、制衡)，用以對抗國家暴力的機制，我稱之為「政治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political economy)。自由派講究實效，不追求浪漫，卻給各種群眾抗爭和解放運動(包括民族、種族、性別、階級)帶來希望，並賦其以正當性。當代中國的學生運動，從1919年的五四運動到1989年的六四運動，無不以「民主、自由、科學和人權」為訴求。免於國家政權直接蹂躪的市場秩序，當然比各種貴族式的、寡頭式的、獨裁式的政權轄下的市場更自由更解放。

激進馬克思主義抨擊媒介專業主義，自由多元主義則視之為一個理想，既促進意見多元，又鼓舞媒介制衡權力結構。自由派的政治是可能的(possible)政治，目的不在建造理想的道德王國；它承認人類的不完美性，提倡溫和改良，懷疑任何宏大的設計，反對大規模狂風暴雨式推翻整個既有秩序。從台灣、南韓、墨西哥、南非以及南美這些例子來看，市場競爭的確有助於擴大自由表達的空間。<sup>3</sup>即令中國大陸媒介在非政治領域的言論尺度也比以前寬廣多了。媒介專業主義與自由民主的原則一脈相承，從未幻想政治的烏托邦，但在新聞實踐上畢竟建立了堅實的記

3 例如Lee (1993), Hallin (2000), He (2000), Waisbord (2000), Yoon (1989), Gunther and Mughan (2000)。

錄。美國的媒介多元主義深植於一群恆久價值，溯及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的「進步運動」，媒介揭發政權腐敗和財團濫權不遺餘力(Gans, 1979)。「可信度的信條」(creed of credibility)為媒介創造空間，也為弱勢團體提供防衛的武器。

這兩種政治經濟學的取徑不能放諸四海而皆準，它們在本體論不分先後，否則不但忽略政經與全球脈絡的重大差異，也犯了懷海德(A. Whitehead)所說的「具體情境錯置的謬誤」(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它們代表現代社會生活中兩種不同而相關的歷史情境。我要重述兩個論點：第一，「政治的」政治經濟學可以用來分析威權媒介，而「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可以用來分析資本主義民主的媒介；第二，在許多轉型的制度裏，不管是從威權轉向民主統治，或從民主轉向威權統治，兩個取徑可能不安而矛盾地並存。華人社會處在大轉型的前沿，給觀察媒介與民主化提供生動活潑的社會實驗室：儘管(也可能正因為)中國大陸的媒介歷經政治高壓，二十多年來媒介在國家資本主義中生猛而扭曲發展；台灣歷經了混亂、曲折而動人的民主化進程與媒介變化；香港媒介似乎熬過了主權轉換的風浪。我的關注點集中在媒介與民主間的錯綜關係，希望帶進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的個案研究，探討媒介政治經濟學的兩種理論取向。

## 中國大陸：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控制

自由多元學派聲稱，資本主義市場培養相對獨立於國家控制的社會領域，是民主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這個命題可以分兩點來闡述：第一，歷史上，沒有市場化基礎而能建立民主者，未之有也；第二，市場化未必導致民主的實踐，但從西班牙到智利，從匈牙利到俄國，媒介的確「加劇了威權主義的崩潰」(Gunther and Mughan, 2000: 25)；台灣的媒介結合社會運動，更如虎添翼。某些國家以媒介自由化為手段，政權為了取得其他政治目的不得不然；在智利，媒介自由化卻是「皮諾切特政

府對自由市場經濟的承諾所產生的意外副產品」(Gunther and Mughan, 2000: 13-14)。中國領袖最羨慕新加坡那個「沒有民主的資本主義」。中國在政府控制下發展市場機能,當然談不上民主,卻導致了消極的自由化,其特徵是沒有了文革式漫天遍海的群眾動員,我稱之為「降低動員的自由化」(demobilized liberalization),比毛澤東專政時期有三大不同(Lee, 2000c):

首先,中國的媒介自由仍居世界之末,但其媒介制度已經從全權主義轉變成為具有國家資本主義特色的威權主義;政治與經濟兩條脈絡若即若離,市場既和國家的權力相糾葛,又試圖與之分離。政治控制與市場自由化的矛盾降低了經濟、文化的政治化程度,給媒介創造若干喘息的空間。雖然國家政權仍然高度威權而武斷,干擾民間生活,但因為必須因應市場自由化,帶來各種或隱或顯的變化,使中國不能像文革時期一味靠「抓革命」來「促生產」。媒介是市場的得益者,沒有理由反對黨國的意識形態;在政治領域它們當然是黨國的喉舌,而在非政治領域,市場自由化也擴大了媒介免於政府干預的「消極自由」(Berlin, 1969)。只要與黨國統治地位無涉,媒介開始有相對的自主性,程度雖然遠遠不夠,但比起文革時期卻有天壤之別。媒介促進政治變化的「積極自由」仍低得令人扼腕,而政治邏輯與經濟邏輯的鐘擺勢必造成意識形態的矛盾、派系的鬥爭和政策的反覆。

其次,市場日漸多元,為了爭取受眾,媒介競相在新聞風格和市場策略上推陳出新,做各種大膽甚至冒進的嘗試,但由於受制於政治風向而搖擺不定(Pan, 2000)。媒介為黨服務,還是為市場服務?沿海城市的大眾化媒介受市場之惠,與內陸媒介的差距愈拉愈大。1970年代黨國媒介籠罩一切,1980年代當紅的是逃避政治的軟性晚報,1990年代得寵的是貼近日常生活的都市報。都市報新興,資金雄厚,乃拜賜於都市居民收入日豐,廣告成長迅速。媒介在新聞方式和內容都必須滿足市場的需要,但怎麼嘗試總盡量避免踩意識形態的地雷。沿海和內陸省份媒介的

差距拉大當然不是好事，黨報的式微卻未必是壞事。

1980年代多項調查研究顯示，媒介受到胡耀邦和趙紫陽改革氣氛的鼓舞，許多記者自許扮演「看門狗」的角色，以制衡政府的濫權和腐敗。經過1989年的天安門鎮壓，媒介放棄了活躍的政治角色，不敢逾越政治雷池半步，卻投入商業化的汪洋大海，盡量撈取商業利潤。總編輯們坦承患了精神分裂症，報紙前幾頁支持計劃經濟，中間幾頁提倡混合經濟，剩下的就鼓吹市場經濟了。記者們對於有償新聞已經習以為常。有人說市場化是媒介腐敗之源，我卻首先要歸咎於威權政體與市場失序肆無忌憚的勾結。當局像痙攣似的，想到了才下令打擊一下腐敗，當然毫無成效。媒介的腐化和有償新聞散布各階層，黨的宣傳幹部也是整個腐敗場景的一環，道德不比別人更優越。

第三，何舟(He, 2000)形容以市場為導向的黨國媒介是「資本主義的身體」戴一張「社會主義的臉」，身心分裂。他說，媒介從原先的黨國喉舌轉變成為「黨的公關公司」，任務不在洗腦，而在維護黨的正面形象和正當性。從許多研究調查拼湊的總體印象得知，縱然記者們仍帶有濃厚的國家主義與精英傾向，愈來愈少人自認是黨的宣傳員，愈來愈多人以提供資訊自居(Lee, 2001b)。在這種背景下，揭露腐敗和違規的「樣板」可以為媒介帶來尊敬、聲望和利益。有時個別領導會默默鼓勵調查報導，以對付無處不在的官僚主義；但絕大多數矛頭還是針對低級官僚，不敢觸及位高權重的官員(Zhao, 2000a)。市場意識為媒介孕育了新節目和新種類，敏銳把握一些公眾熱衷的議題(如消費、環保以及其他日常生活層面的焦點事務)。消費和環保意識抬頭，表面上沒有直接威脅黨國，但如果台灣的經驗可資借鏡，經過長期潛移默化，它們卻可能培植政治公民權之所繫的權利與義務觀念。

媒介不再鼓吹宏大的政治改革了。數家都市報的總編輯向我坦承，他們的政策就是「只拍蒼蠅，不打老虎」。其實連拍蒼蠅都得冒風險，蒼蠅背後的老虎可能反撲，責怪媒介揭露其下屬劣行是和他們過不去。

我們覺得這些事平淡無奇，但在中國要走出這一步卻使少數報紙的發行與廣告激增。從1980年代後半期政治改革的高峰撤退以後，媒介專業主義一直委頓不前，黨國仍然隨時可以掐死它的苗頭，特別是當局自認陷入敵對力量的包圍、或權力高層派系鬥爭如火如荼時尤然。

黨國控制的市場化媒介面臨很大的限制。政府進退維谷，一方面不得不釋放經濟的能量，以作為維護正當性的主要來源；另一方面竭力將市場化納入官方的軌道。質言之，黨國進行經濟改革原是迫不得已的，絕無意破壞自身的權威。而是在文革和天安門鎮壓以後，只有經濟改革才能挽回它的正當性於崩潰邊緣。「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有獨裁特色的國家資本主義」，私人不許擁有媒介，個個記者都是國家雇員。話說回來，經濟改革需要更多和更好的資訊，以改善管理、財政和科技的基礎結構，與僵硬的國家意識形態並不相容。宏觀的經濟政策變化所孕育的媒介生態是一個利弊兼具的混合體：一方面借社會主義之名，行資本主義之實，雖距離民主化非常遙遠，卻提升了在非政治領域的消極自由；但媒介並未培育民主的公民意識和核心價值（如公共意見和制衡）。媒介的試驗流於短視，易受到政治風向左右。

媒介集團化把黨跟市場的矛盾演繹得淋漓盡致。為了應付進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抵禦外資的激烈競爭，黨國糾集一群財力雄厚的核心機關報組建媒介集團，它們像一隻隻海綿，吸收那些不賺錢、混亂又不聽話的小媒介。這些媒介集團大抵是長官意志和行政命令的產物。當局以前猛批西方的傳媒集團，現在重蹈覆轍，所為何來？官方說西方媒介集團由「腐敗的資本家」所控制，而中國的媒介集團受黨直接領導。其實，媒介集團讓黨國振振有詞擺脫對媒介的財政負擔，也讓核心機關媒介從接管和兼併中獲利。報團以黨為靠山，一心一意獲取巨大的財政利益，但顯然低效、浪費而且官僚氣息濃厚。黨國畢竟要尊重資本的營運，或吸納之，或利用之，或妥協之，再也不能像文革時期那樣赤裸裸鎮壓，也算默認黨國的權力有時而窮。



我在這裏不擬辯論中國是否應該以自由的民主或大眾的民主為終極目標，我要評估的是這兩個政治經濟學的取徑和經驗證據有多吻合。提倡大眾式民主的人必須證明西方激進批判派足以解釋中國的問題，反之亦然。趙月枝(Zhao, 2001)追述1970年代末爭取的主要是大眾式的民主，1980年末知識份子和學生追求帶有精英色彩的自由民主，而到1990年代新興資本主義則剝奪了農民和工人的媒介話語權。她說，有些改革者擁抱自由的民主，以圍堵普羅大眾的聲音。我對她犀利的分析沒有異議，但對於其他新左派的言詞卻有點看法。他們認為今天中國媒介的首要問題不是國家政權壓制人民，而是全球資本主義的支配力量及其所伴生的商業文化，也就是盲目的市場崇拜促使新聞實踐偏離大眾民主(進一步的討論參見本書第三章)。中國的新左派受到後馬克思主義、後現代、後殖民、後結構批判理論的影響，認為市場與民主(或言論自由)之間沒有必然的關係。他們應和西方的批評者說，市場導致了「民主的失落」以及公共領域的危機。中國沒有民主，沒有哈貝馬斯說的「公共領域」，不知以市場為導向的媒介如何腐蝕掉本來就不存在的東西？(哈貝馬斯在2001年春天訪問中國，批評中國新左派急於建構反帝的論述，誤用他的理論來為國家民族主義和獨裁傾向辯護。見徐友漁，2001a)歸根結柢，這些激進派學者認為大眾(民粹)的民主比自由的民主更勝一籌，但他們的論述承襲了破產的毛澤東主義烏托邦。他們的理論如要立足，先得把如何實現這些激進的目標講個明白。以全球化的論述來看，激進派學者似乎把「國家與全球化」的軸心傾斜到全球化那邊，嚴重忽略了國家這邊的因素，甚至與毛澤東在革命年代提出的「反帝、反封」的雙反原則背道而馳。今天中國新左派「反帝」比「反封」還熱衷。

中國緊鑼密鼓全面進入世界貿易組織，會為國內媒介的政治經濟帶來巨大而不可預測的挑戰。外國主要的媒介集團多年來一直在積極開拓與中國高層領導的關係，虎視眈眈，環伺在側，隨時想進軍中國市場。如果中國市場打開以後，外資最可能攻堅的是極具潛力的電信業或某些

媒介經營領域(如廣告業)，但政權絕不會將其言論要塞拱手交給外資或私資。壟斷使媒介的盈利高達一般企業的雙倍，這個意識形態和經濟最後的禁嚮，黨絕不會輕易交給挑戰者去品嚐的(見本書第十四章)。

## 台灣：在民主變革的前前後後

台灣和南韓媒介在右翼資本主義專制政權統治下爭取自由，激進馬克思主義似乎無力解釋這個鬥爭的過程。台灣從1949到1986年戒嚴時期，媒介受制於寡頭結構的政治生態。國家政權與少數精英結成侍從結構，寡頭統治源自政治壟斷，而非靠資本在「自由」市場的累積。解除戒嚴使新聞檢查告終，固然是了不起的成就；但以前受壓制的市場能量解放以後，卻反過來壓抑財力較弱的新生聲音，嚴重背離民主的理想。台灣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國家機器與資本互相滲透，關係愈形錯綜複雜，這時激進派的觀點開始有解釋力，供我們檢驗資本集中如何限制媒介多元，但這並不意味多元主義觀點已失去意義(Lee, 2000d)。

台灣當局當年以戒嚴為名，鎮壓大眾參與；聲稱政治穩定是經濟發展的前提，反共必須有統一的領導。媒介是國家意識形態的機器。當局壟斷黨、政、軍的「三結合」，控制龐大的言論喉舌，並吸納私營媒介為意理輔助機構。如同拉丁美洲的「官僚威權政權」，台灣的國家政權也一手拋胡蘿蔔一手揮大棒，私人關係是侍從結構的潤滑劑，關係互惠但不平等；當局嚴禁媒介與其他社團或工會建立橫向聯盟。敢向權力結構挑戰者，則必備受迫害。

威權黨國容忍林茲(Linz, 1974)所說的「有限的多元」，媒介在政治上的限制很嚴格，在非政治領域則有相當的自主權，這是典型的「國家統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台灣的威權政體，如史坦尼蘭(Staniland, 1985: 75)所敘述的，「組織政治表達，但並不巨細無遺或全面決定它的內容」。對國家意識形態的挑戰主要來自邊緣的另類媒介，特別是70年

代的黨外雜誌，以及90年代的有線電視。戒嚴期間歷經37年的報禁，停止發放報紙和電視台營運的新執照，但當局低估小媒介(黨外雜誌和有線電視)的顛覆力量。它們只在生存的邊緣徘徊，不惹當局操心，不料後來與方興未艾的政治運動結盟，共同生猛對抗強大的國家機器。它們跟新聞檢查官捉迷藏，公開挑戰官定的「真理」，啟迪民智，動員群眾支持反對派候選人，最後還灌輸運動團體內部的敵愾同仇。

在體制內，《中國時報》站在國民黨開明派那邊，《聯合報》支持黨內保守派。解嚴後，國民黨權力結構內部分裂，為媒介提供了一絲喘息的空間。在戒嚴時期，儘管主流媒介大抵上支持既有秩序，卻大力提倡民主價值(如公眾的知情權，制衡，憲政)，間接試探官方的底線，又營造文化氣氛，催化民主轉型的水到渠成。尤其是《中國時報》不畏橫逆，突破封鎖，毅然刊登警備總部密謀圍剿陶百川的事件，以及報導民進黨成立的消息，阻止民主化的逆轉。有趣的是，當時許多自由派記者紛紛投稿黨外雜誌，批評和揭露政權的陰暗面。不管政治運動還是媒介莫不深受美國理想化的自由民主概念和實際的人權運動所鼓舞。

解嚴以後，國庫不再通黨庫，黨國媒介斷了津貼而迅趨式微。政治景觀丕變，國民黨內部分裂，反對黨獲得合法的地位；主流媒介作為社會的指標，為了維繫其本身的正當性，必須如實反映權力結構變化的動態，因此出現比以前寬廣的聲音。可惜視野仍然局限於選舉政治、派系鬥爭、族群衝突和反共統獨這些狹隘的議題，很少觸及一般勞工的情況。國家認同懸而未決。解嚴後商業資本勢力不斷抬頭，逐漸與國家建立新的聯盟，反對黨在2000年第一次扳倒國民黨而執政。自由派的政治開始冒頭，當然比威權統治好得太多了，但它的缺陷也開始暴露，激進派的觀點於是登場。

解嚴以後，一百多家報紙趕着進入市場，卻只有25家能夠生存，其他盡遭淘汰，其中《自由時報》不惜殺雞取卵，藉着自殺式的價格戰以及隨贈，在市場上立足。它自稱是唯一以台海利益為優先的報紙，攻擊

其他報紙向北京磕頭。90年代報紙廣告殺出一個想不到的競爭對手——有線電視。報禁解除多年，國家政權仍牢牢壟斷電視不放，反對勢力接二連三抗議罔效，只好不顧禁令，公然非法播放粗糙的有線電視。後來海外衛星信號溢播進來，給捉襟見肘的有線電視增加了許多免費頻道，吸走不少政府控制的電視網觀眾。接着發生一連串的事：美國要求台灣阻止有線電視網侵犯其智慧財產權，包括電影、音樂和錄影帶，否則將以關稅制裁台灣的進口。國民黨政府盡可不理睬反對黨的抗議，卻不能敷衍來自其保護國的壓力，於是加速立法，將250家非法而粗糙的有線電台合法化，並放鬆了外國進口節目的限額，引起有識之士對文化自主的憂慮。台灣的規模經濟有限，最後由兩家經營媒介的商業集團瓜分全島的有線電視。2001年以來台灣經濟惡化，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持續緊張，又適逢全球市場不景，媒介經營困難。2003年5月《蘋果日報》在台創刊，更將重寫市場遊戲規則，齊向庸俗化和瑣碎化邁進。解嚴以來，民主轉型鬥爭不懈，在媒介領域的確看到國家與資本的互動變得複雜而多變。

### 香港：自由媒介秩序的喪失？

港英在殖民統治時期維持了一個開明自由(liberal)的媒介秩序。它明知無法排除「中國因素」，於是退而控制遊戲的規則，讓親中和親台勢力出版報紙互打擂台。香港媒介涵蓋整個意識形態的光譜，盡可放心攻擊北京和台北，但不能攻擊港英政權；直到1980年代初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英國和港英政府才成為媒介批判的對象(Chan and Lee, 1991)。媒介大體支持英國「以主權換治權」的主張，只是惱怒英國在談判中節節潰敗，一再失信。到了1990年代，媒介再度支持港英臨去秋波、姍姍來遲的有限度民主政制改革，但這正是中國當局所憎惡的。香港是逃離共產黨革命的大量政經難民棲身之地，政權變化激發民眾深沉的疑慮和焦急，以致資金外逃，大量中產專業人士移民國外。主權轉移引起媒介兩

種反民主的傾向，一是所有權的改變和集團化，二是新聞的自我檢查以及道德淪喪(Lee, 2000b)。

第一個反民主的傾向是所有權的改變和集團化。整個新聞輿論的光譜大量減縮了：親台報紙覺得前途茫茫，紛紛自動關門大吉；親中資本家購買了批判性政論雜誌，不旋踵間把它們關掉。主流報紙在1980年代末期開始上市，用以分散政治不明朗所帶來的財政風險；其中好幾家貿然投資房地產而大蝕其本，另一些試圖跟大陸媒介建立商業夥伴關係緞羽而歸，還有一些通過上市聚集雄厚資金，在擁擠的市場大量購買媒介。此外，國際資本家(如默多克)和海外華僑資本家(例如《南華早報》的郭鶴年和《明報》的張曉卿)紛紛購入香港主要媒介。他們在大陸的投資可觀，還千方百計拓展那邊的市場，他們屬下的媒介是否能夠恪守言論自主？局面如此動蕩，資金外流還來不及，黎智英卻挾重金入市，於1995年創辦《蘋果日報》，裹挾着性和暴力這兩大「法寶」，接連爆發好幾輪割喉的價格戰。惡性競爭導致好幾家財力薄弱的家庭式報紙雜誌倒閉，成千媒介工作者失業。《蘋果日報》和《東方日報》佔領七成的報紙市場，報導風格和市場策略引得媒介爭相仿效。許多主流媒介的市場地位下降，甚至被併購，買方通常與北京當局有密切的私人、商業或政治關係。鳳凰衛視開播時，默多克信誓旦旦要用先進的傳播技術擊敗極權政體，結果跟大陸資本愈黏愈緊；默多克多年來一直開拓與北京高層領導人的親密關係，犧牲新聞原則在所不惜。大陸資本還擁有亞洲電視，另一家無線電視台也小心翼翼，不敢激怒北京。

第二個反民主傾向是記者的自我檢查以及新聞道德的沉淪。為了躲避新政權對媒介造成真實的或想像的危害，媒介自我檢查言論。媒介再也不能靠港英政府的絕緣而逃避中國的壓力，北京明白警告香港不許變為「顛覆祖國的基地」。北京有巨大的資源進行獎懲：它可以控制新聞來源，決定給不給誰報導的機會；也可以在商機上提攜某些媒介老闆，特別是中資在港的勢力愈來愈大，可以拿廣告費邀寵特定媒介；北京可

以給某些媒介老闆政治地位，讓他們接近政治權勢人物(Chan and Lee, 1991)。許多企業大亨、媒介老闆和知名記者都被收編，有人沾沾自喜，有些人表裏不一，有人謙恭臣服。調查研究顯示，大部分記者在理念上贊成西方客觀的專業規範，但在日常工作卻頗有顧忌，不敢批評中國當局(Lee, 1998a)。有些媒介機構採取不專業甚至是違反專業精神的做法，例如將敏感話題設立禁區，轉換社論的語氣和立場，停用某些敢言的記者和專欄作家，為的就是怕激怒北京。

以往所謂的「專業報紙」政治上膽小，言論閃爍。聳動性的報紙對政治不感興趣，以渲染性和暴力為能事，販賣這些東西不止政治安全，而且商業獲利；北京當局縱然不喜歡性和暴力，也樂於裝聾作啞，任其發展。聳動性的報紙罔顧商業道德，偽造故事，侵犯隱私，並且無理取鬧，騷擾批評它們的人。非政治化、聳動化和小報化的傾向無處不在。儘管民眾有時怒吼，政府不時威脅要立法管制，但聳動性報紙不但在市場上得意，還使得專業性的報紙(特別是《明報》)迫於商業壓力向低級趣味低頭。與自我檢查大相逕庭的是《蘋果日報》，它出於商業考慮，故意激發香港社會潛在的反中情緒。

通常，自由媒介秩序受到危險時，自由多元的觀點才會跟着凸顯。媒介專業主義建立「可信度的信條」，使媒介能在資本市場裏維護正當性。即使證據確鑿，沒有媒介老闆和從業人士願意承認自我檢查。話說回來，雖然媒介有自我檢查的趨向，畢竟沒有淪落為北京的玩物，政策報導的透明度仍高。媒介發展出一套「策略性的儀式」(在這裏我把 Tuchman, 1978提出的概念重賦新意)，來阻擋權力結構加諸於它們的壓力。所謂「策略性的儀式」是媒介利用公眾利益或社會所認同的價值為名，發展出一套論述方式，以增進自身言論的空間。媒介如何維護專業自主，而又避開政治風險，這是一種防禦性的姿態，並不浪漫，但假如沒有專業主義意識，情況會更悲慘。

我在另文列舉了三個策略性儀式(Lee, 2000b)。第一，媒介訴諸新聞

的平衡原則，把各種不同意見(無論支持或反對北京)並列；第二，社論與專欄作家分道揚鑣，社論避免觸犯北京，言辭閃爍溫吞，但有些專欄作家卻在內頁嚴厲批評北京，例如《明報》副刊專欄擺出左中右平衡的形式，政治利益和商業利益的矛盾於焉獲得辯證的統一；第三，新聞敘述方式趨於溫和，鈍化批評的棱角，盡量以事實取代意見，陳述時採用圓滑的及條件式的語句。政權遞嬗以後，媒介不再將矛頭對準北京，轉而批評北京任命的特區行政長官。當香港的利益與北京所持的立場相悖時，媒介可以用「一國兩制」護身，對北京比平時批判嚴格一點。當然「一國」的原則是不容媒介質疑的。金錢與權力的互動將決定香港自由媒介秩序的前途。

## 餘論

本章根據中港台三個華人社會的經驗，說明自由多元主義與激進馬克思的觀點如何互動，着眼點在媒介的政治經濟及其解放和民主的潛能。我提出了兩個論點：第一，自由多元主義主要批判的是國家政權，可以用來解釋威權的第三世界國家和前共產國家；而激進的馬克思主義集中於批判資本，可以用來分析自由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媒介。自由多元主義似乎適合解釋戒嚴時期的台灣媒介、受威權政府威脅的香港媒介，在某個程度也解釋得了中國大陸市場化的威權媒介。中國的新左派不強調國家政權的鎮壓，而強調全球資本主義結構的強制力量，因此把國家與全球化的天平向全球化傾斜，我看是片面的說詞。

第二，在轉型的制度中，這兩個觀點不安而矛盾糾纏共存在一起。在這三個華人社會，台灣率先完成了缺陷的民主轉型，媒介一如在其他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可以批判執政當局及其領導人，但對私人資本比較寬厚。換言之，代議民主的相對勝利致使自由多元主義的觀點略失意義(然而其意義仍然是可觀的)，這時引入激進馬克思主義，可以解釋媒介集團化如何限制表達的空間。相對之下，在香港，當自由媒介的秩序和成熟

的資本主義受到威脅，人們對於媒介專業主義和自由的關注也登上了議程。中國大陸的新聞媒介仍受嚴厲控制，比前共產波蘭(當時國家控制的媒介必須跟反對派的團結工會以及教會媒介競爭)或蘇聯在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開放改革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當今中國媒介的集團化是國家政權指揮棒下的合奏，但政府畢竟必須和它所製造的市場力量協商。

我們仍然有四個問題懸而未決。第一，從中港台獲取的證據能夠概括到甚麼地步？我們還得做許許多多的比較研究才會有較清晰的線索，但前蘇聯也許是個比較的對象。戈爾巴喬夫推行政治改革，解除中央集權的共產黨機制，引進一些脆弱的代議政治和新聞自由，但終因經濟失敗，自由機構並未真正生根，最後全盤崩潰；媒介失去經濟依靠，十多年來陷入官僚主義、腐敗和外國併吞的泥淖中(吳非，2003)。鄧小平在中國採取相反的途徑，先以市場化阻止急劇的政治變化，中國媒介的轉型是不是比前蘇聯順暢些呢？

第二個問題，冷戰結束以後，這兩個取徑是不是仍有意義？我相信，不論在知識論上或在政治上，它們對資本主義及其媒介的基本看法與冷戰無關。冷戰結束，這個世界還有許多地方不自由，自由派對國家政權的批評仍饒富深意。西方激烈馬克思主義學者所批評的是市場對媒介的扭曲，而不是辯護蘇聯的媒介控制和濫權。針對前共產國家媒介日趨商業化和集團化，為老精英份子和西方跨國公司聯手兼併，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應該是擲地有聲的。

第三個問題，全球性與民族性如何互動？全球結構為國內媒介帶來機會和壓力。跨國公司和國際組織權力愈來愈大，國家和資本的互動漸漸搬上國際舞台。香港和台灣希望世界媒介盯住中國，以約束它的行為。中國日漸嵌入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制度，也會給媒介結構和角色帶來巨變。中港台之間的政經與媒介互動值得更進一步研究。

最後，本文提出了一正一反的觀點，尚須進一步在更高的抽象層次



提出一個「合」的看法，辯證分析國家與資本相輔相成的關係。國家對資本一方面促進，一方面阻撓。市場跟國家政權討價還價，同時又削弱國家政權的力量；國家政權倚重市場，又壓制市場。就算在民主國家，政府還是可以用市場來約束特定的媒介組織，遑論一般威權國家？在美國，大部分人反對政府過度干預媒介；一隻「看不見的手」幫助媒介逃脫政府的控制，卻也使媒介受制於商業利益的瘋狂邏輯，引發扭曲的惡性競爭。在中國大陸，黨國一手培育的市場力量對媒介產生了壓力，同時又削弱黨的權威。在台灣和香港，國家和資本之間的交叉關係愈來愈不確定：台灣的國家政權結構重組，國民黨失敗迫使政治經濟媒介再洗盤；香港的政經變化產生了反民主的傾向，表現在媒介的集團化和新聞道德的淪亡，但媒介以專業化為名，保持某種程度的自主性和公信力。這篇文章還沒有發展出一個全盤整合的觀點，希望能夠藉以引導未來的思考。



## 論社會理論對中國新聞業的解放潛力<sup>1</sup>

---

學說的衝突不是災難，而是機會。

——懷海德(A. N. Whitehead)

中國經歷二十多年的市場改革以後，權力與媒介的錯綜關係起了重大變化，如何闡釋這個變化並不容易。我在這章想粗略地討論一個問題：社會理論對於解放中國媒介與新聞實踐有何意義？這個母題包含幾個子題：放在全球化的架構來看，國家與市場的交光互影如何影響我們對媒介自由和平等的建構？新聞從業人員和公眾在這個解放的過程中擔當什麼角色？各種社會理論建基於什麼認知的旨趣和社會立場？

我打算從三種社會理論着手。首先，自由多元論視市場為抗衡國家控制的積極力量。第二種理論可以泛稱為80年代中國的「黨內改革左派」，與當時方興未艾的政治力量結盟，企圖在理論上解放官方的機械馬克思主義，如今回頭看，他們的努力似乎功虧一簣了。第三是90年代中國新興的「新左派」，他們憑藉西方各種批判理論力抨中國媒介的商業化。這三種理論有內在的聯繫，也彼此對立，其勢力的消長反映了國內外社會政治背景的變化。我的取徑一方面檢查經驗研究對具體問題的勾勒，一方面關照社會理論的總體闡釋，期使具體的研究得以在寬泛的語境中評估。

---

1 原載於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2000年10月號，第61期，頁186—196。劉擎譯。Chin-Chuan Lee (2000c), "China's Journalism: The Emancipatory Potential of Social Theory," *Journalism Studies*, 1, 4: 559-576

國內外學者對中國媒介的變化，有的從內往外看，有的從外往內看。張旭東(Zhang, 1998a: 1)似乎認為對中國社會的瞭解不是多寡的問題，而是病在觀點僵化。果如是，幾個互異學說的競爭與對話未始不是像懷海德所說的提供「一種機會」，對於建立內外滲透互融的觀點也許是個好的起點。

### 自由多元論的觀點

中國當代前仆後繼的民主運動，從1919年的「五四」到1989年的「六四」，沒有一次不以自由民主為訴求，沒有一次不高舉言論和新聞自由的旗幟。儘管(也正因)官方把自由多元主義看成洪水猛獸，我們更能夠從它理解後毛澤東時代的新聞特徵，我稱之為「降低動員的自由化(demobilized liberalization)」，與毛澤東時代的「動員性極權主義」迥異其趣。

自由多元主義肯定人民主權和個人自主性，長期與民主鬥爭互為表裏，聯合反抗各種封建的、專制的和獨裁的勢力。它首先強調「消極自由」(Berlin, 1969)，即是不論個人和團體都有權免於國家權力的壓制，自由表達各種不同意見，而所有體制和政策都是為了保護這種自由而設置的。媒介是制約國家權力的機制之一，市場運作讓國家不得假借社會的名義來吞食社會。勃格(Berger, 1986)認為資本主義市場是民主的前提，因為它提供一個「與國家控制相對獨立的社會區域」。魯許邁爾等人(Rueschemeyer et al., 1992)也說，資本主義的發展轉變了階級結構，所以和民主密切聯繫。勃格(1986)附加一個「但書」：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自由化只是民主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沒有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沒有民主；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雖然自由，政治卻不民主甚至反民主。準此而論，沒有市場經濟作後盾，中國的新聞自由不可能有實質的進展，但市場經濟卻不能保證中國會有新聞自由。

我所謂的「降低動員的自由化」大致有三項主要特徵。首先，中國

的媒介體制當然是極不民主的，當局操縱媒介搞派系爭鬥(Goldman, 1994; 王若水, 1997)，壓制異見，又利用它粗暴地攻擊當局認定的各種真假敵人(包括異議人士、反抗的民眾、宗教組織和外國的領導人)。今天中國對媒介控制之嚴厲，遠甚於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蘇聯，與當年共產波蘭的差別更不可以道里計(波共媒介必須與團結工會的反對派媒介、教會的媒介競爭)。話說回來，經過二十年的經濟改革，中國的「指令新聞」(Lee, 1990a)和「文化專制」(Su, 1994)畢竟多少被市場釋放的能量所消蝕，弱化成爲「威權型」體制，不再是至高無上的「極權型」體制了，兩種體制的差別絕非微不足道。國家為了現實的需要，走市場改革的路線，市場遷就實用，與毛澤東的烏托邦格格不入。毛死後的領導人只要保得了權，不一定要侵犯社會與私人生活的「每個」領域，人民和媒介因而獲得一些喘息空間；當局鎮壓異議人士和反對派，所憑藉的是國家機器，而不是發動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國家機器對媒介的管理逐漸走向世俗化、形式化和規範化的道路(Dittmer, 1994; Polumbaum, 1994)，媒介不再像過去塑造一個無所不包的、排他的、絕對的社會主義理想。在80年代的改革歲月中，新聞專業意識曾一度迅速抬頭(Polumbaum, 1990)，可惜到90年代反而被商業狂潮所淹沒。

第二個特徵，媒介紛紛採取各種應變措施，以求在政經相對分離的局面下制勝(Pan, 2000)。媒介為了擴張市場，必須滿足更多的受眾，於是逐漸淡化國家意識形態。隨着中國整體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媒介愈來愈不強調階級鬥爭，紛紛轉向實用目標，強調經濟現代化。經濟改革要求更多更好的信息服務，以改善管理、金融和技術的基礎設施，這些項目與抽象的階級鬥爭抵觸(Hamrin, 1994)。在90年代，政府取消對媒介的財政補貼，進一步衝擊媒介的微觀經濟，迫它進入風雨多變的商海爭奪廣告。中央和地方黨的機關報式微，大塊地盤流向晚報、週末版以及主要沿海城市的小報。媒介的運作環境、職業獎懲結構、機構內部的權力分配都跟着丕變(Chen and Lee, 1998)。媒介伺候黨和錢兩個老闆，充

滿了衝突的張力。媒介推出五花八門的編輯或市場策略，有的看似荒誕，說穿了，無非為了在官方的尺度內開拓商機(Pan, 2000)。非政治化的娛樂日增，知識精英也許嫌它們庸俗無聊，但群眾寧可要這些東西也不要喧囂的說教。大致上，中國對報紙和電視的控制要比對雜誌、廣播和書籍嚴厲，而對電視新聞的控制又比電視娛樂更詳細。許多報紙的編輯坦承，他們的頭版講計劃經濟，中間的頁面講混合經濟，其餘的則倡導市場經濟。難怪何舟(He, 2000)描述這種「分裂報格」是資本主義的身體戴着社會主義的面具。

第三個特徵，媒介由黨喉舌的角色轉變為何舟(He, 2000)所謂的「黨的公關公司」，它們的任務是提升黨的形象及合法性，而不是對民眾洗腦。有人擔憂(Yu, 1994; Zhao, 1998: 147)，市場不但沒有削弱黨的媒介，反而讓官方意識形態重新包裝，既有利可圖，還可加強黨媒介的威信。這種擔憂不是沒有道理，但其他論者(Pan, 2000; He, 2000; Lee, 2000b; Pan and Chan, 2000)以為目前黨國用經濟特權為誘餌換取媒介的效忠；然而不管市場怎樣扭曲，怎樣為國家所操控，只要有競爭，總會逐漸削弱頑固的黨國意識形態，並在非政治的領域拓展一些空間。近年來有些內容創新(例如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北京青年報》或《南方週末》)的確令人鼓舞(Rosen, 2000; Zhao, 1998; Pan and Chan, 2000)。

西方學者(Keane, 1991; Jansen, 1991; Fiss, 1996; Thompson, 1990)抨擊媒介產權逐漸集中壟斷於少數財團之手，加劇媒介資源分配的不均，甚至箝制言論自由的範圍。從英美的歷史來看，市場勃興，廣告取代發行行為主要收入來源以後，激進言論和工人階級的報業因缺乏廣告支持而不斷萎縮(Curran, 1978; Bagdikian, 1992)。許多學者受到羅爾斯(Rawls, 1971)「正義理論」以及柏林(Berlin, 1969)「積極自由」的啟發，視國家為主要的社會中介力量，要國家出面促進「補償性正義」和社會公平，保護社會弱勢團體的權益(Touraine, 1997)，甚至規劃媒介領域以保障多元的聲音(Thompson, 1990)。左翼自由派媒介法律學者費斯(Fiss, 1996)認為國

家只能糾正市場的偏差，抗衡市場對公共辯論的扭曲，不能取代市場或完善市場。自由民主的新聞企圖在自由與平等、個人與公共權利、國家與市場、尤其是在限制國家權力與利用國家確保公民權之間，達成某種溫和的平衡。

自由與平等乃一馬之兩轡，對民主的存在都同樣不可或缺。如果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象徵極端平等，那也只能說是奴役式的平等。平等必須以自由為先決條件，不能反對自由。趙月枝(Zhao, 1998)感嘆市場化驅使一些以農民、婦女、老年人及其他經濟弱勢群體為對象的出版物無法生存。這種憂慮出於高尚的情懷，但我們千萬不能因此美化那些弱勢媒介，須知它們根本沒有自主性，充其量只是黨國控制網絡延伸到各個細胞的一枚棋子。中國以往譴責西方財團壟斷媒介，目前卻又在全國組建巨型的報業集團，其實就是要以黨的機關報為核心，吸納一些賠錢或出軌的報刊，以便管理控制，又有利於政府擺脫財政負擔(Chen and Lee, 1998)。坦白說，中國新聞界當前迫切需要的是免於國家干涉的「消極自由」，而不是讓國家機器滲入各社會部門的「積極自由」。

總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實就是「有威權主義特色的國家資本主義」。在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的過程中，國家官僚機器不得不從一些非政治領域撤退，因而助長了新聞業的「消極自由」；雖然國家企圖操控媒介，但也不得不與市場力量做有限度的妥協或合作。反過來，國家通過市場延續它與媒介的「侍從關係」。必須指出，中國的新聞業絕不是反體制的，媒介更未在一些核心價值方面(例如個人權利、權力制衡以及公共輿論的重要性)建立公民共識。目前這種缺乏整體框架的媒介改革必然是短視的、脆弱的，只能揣度變幻莫測的政治氣候，見風使舵(Pan, 2000)。最可悲的則是政治濫權，市場規範殘缺，金錢的力量無遠弗屆，深刻而全面地腐蝕了中國的新聞界。

## 中國馬克思主義改革派的觀點

1949年以降，中國共產黨一直敵對自由多元主義，從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甚至禁絕「資產階級」的新聞教育。即使80年代的改革派學者和新聞工作者也未將自由主義當作抗爭威權主義的力量。他們在官方軌道裏靈活闡釋馬克思主義，減少教條的束縛，我統稱他們為「黨內改革左派」，以別於90年代的「新左派」。黨內改革左派多數領導過宣傳和意識形態陣地，在文革後慢慢偏離「正統」，但始終沒有發展出統一的立場，他們能夠運用的理論資源也比較龐雜而貧乏。

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囿於意識形態，或為了政治必要，他們總是選擇性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反普魯士新聞檢查)、列寧(反沙皇)和毛澤東(反國民黨)的語錄，加以靈活解釋，作為立論的根基，庶幾肅清斯大林主義和晚期毛思想的流毒。可惜他們對外在世界的新聞實踐所知甚少，理論往往過於抽象和哲理化，提不出具體運作的方案。陳力丹(1993)的力作分疏馬克思傳播理論，雖然他沒有聯繫到中國的現況，但會心的讀者自然會得出自己的結論。有些改革派學者逾越官方劃定的界限，開始接受歐洲馬克思主義的某些論點，這時黨內負責意識形態的官員就立刻出擊了。

第二，他們都表現着很強烈的國家主義傾向。文革劫後餘生，使他們寄望英明領袖鄧小平及其接班人胡耀邦、趙紫陽撥亂反正。「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對他們來說是天經地義的，所以他們提倡體制內(黨內)變革，反對根本改變體制(Ruan, 1990)。他們脫離群眾運動，當魏京生等人在體制外抨擊共產黨和鄧小平的專制時，這些體制內的改革精英是不以為然的(蘇紹智，1996：33)。劉賓雁(1985)鼓吹「第二種忠誠」，不是醜化黨或反對黨，而是企圖以揭發弊端來加強黨的合法性。想不到「反精神污染」運動(1983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1987年)、六四天安門野蠻鎮壓(1989年)，一波接一波，把這些意識形態犯忌的黨內知識精英刷出黨外。1989年之後一度加強思想控制，接着1992年以後中國經



濟捲入全球化的過程，掀起眼花繚亂的消費文化浪潮，流亡海外的知識精英與國內情勢的變化更脫節。整體來說，黨內改革左派對馬克思主義的新聞理論本身並無重大原創性建樹，但他們的勇氣卻發揮過若干解放的力量。

蘇紹智(1992)、阮銘(1992)、孫旭培(1988)等人回到毛澤東早年的著作，重溫他激憤地向國民黨爭取言論和公民自由的讜論。毛澤東認為中國唯有實行民主和言論自由才能醫治歷史上的循環治亂。他援引羅斯福(F. D. Roosevelt)的「四大自由」來理解自由，還以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來解釋民主。這些自由色彩的文字早從欽定的《毛選》中失蹤了。退一步說，在官本《毛選》裏面，毛也提出「新民主主義」，設想革命後中國應該先有幾十年的過渡(其理念有相當的自由色彩)，等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以後才邁進社會主義。他在這些文獻中拒斥了民粹思想，認為不應該跳過資本主義階段直接由封建主義進入社會主義。諷刺的是掌權後的毛澤東所做的，恰恰和他在奪權時爭取民主所說的相反。因此蘇紹智(1992)提倡恢復「新民主主義」思想。毛澤東的言論往往為策略的需要立場不一，改革派理論家們不得不挖掘他的「自由面」，來對付共產黨的蠻橫專斷，以毛之矛，攻毛之盾。孫旭培重複毛的話說，共產黨的媒介應該像和風細雨，通過溫和的思想教育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要動不動像狂風暴雨，搞激烈的階級鬥爭，事事無限上綱為「敵我矛盾」。對毛思想提出「另類」(如果不是相反)的解讀，縱然不敢保證不出事，卻大致符合80年代體制內改革的精神。

新聞媒介除了是階級鬥爭的工具，也是傳達信息的工具。連這麼簡單的命題，都得喋喋不休，引起激烈的鬥爭，在外人看來簡直匪夷所思。官方的教條說媒介的「黨性」就是「人民性」，兩者同義。《人民日報》的老社長胡績偉(1989)卻說「人民性」高於「黨性」。他指出歷史上黨的路線走錯，報紙也跟着錯到底，還會受到表揚。但在70年代末，黨被「凡是派」(華國鋒、汪東興)控制，《人民日報》沒有跟風，

反而堅定支持鄧小平復出。他說，正因為報紙站在了人民的一邊，才沒有重蹈黨犯錯的覆轍。他從實踐的經驗中體會到，新聞界應該置人民利益於首位，而不應盲目執行黨的指令。主管意識形態的沙皇胡喬木隨着攻擊他，胡績偉於是補充說，人民性高於黨性，但來自黨性，保守派仍不滿意。此外，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王若水，負責《人民日報》理論部，80年代初期王若水(1986, 1997)從法蘭克福學派中發現「青年馬克思」的思想。他引用「異化」的概念，批評斯大林主義和毛冒進主義在中國產生的極左遺毒，以致人民公僕搖身變為人民的壓迫者，所以王若水呼籲把激進的人道主義思想注入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胡喬木的打擊如影隨形，聲稱馬克思的異化只能發生在資本主義，譴責王若水醜化黨和社會主義。王若水和胡績偉終於在1983年去職。

政治經濟學家蘇紹智(1992)吸收蘇聯和東歐某些異議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強調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是斷裂的，而具有歷史的承傳。他主張「具有人性面目的社會主義」，不止脫胎於資本主義，更應當繼承並超越資本主義。他說，法國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和博愛等口號，這是工人階級和新興的資產階級聯合的光輝勝利；時至今日，社會主義國家應該發揚這些價值，以支持世界工人群眾繼續向資產階級抗爭。他強調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實行普選和議會制度，監督權力，保障新聞自由；此外，由於社會主義化生產工具(包括媒介)為公有，故優於資本主義(頁168)。蘇紹智的觀點沒有具體展開，但批判黨國的教條已具有潛在的顛覆性。

沿着這條理論線索，孫旭培(1988)在有限的空間內做出可敬的努力，提出社會主義新聞自由的理論。他先承認資產階級出版自由體現了「普遍形式」，民辦媒介有權自由報道和批評政府事務，但由於資本的壟斷，這種形式自由對工人群眾空洞無意義。他繼而抨擊蘇聯模式的異化，原先列寧只壓制反蘇維埃和反革命的出版物，斯大林卻把所有的言論渠道國有化，成為黨的宣傳工具，以致剝奪了人民言論自

由的權利。他引證恩格斯的話說，黨報應該是黨的「旗艦」，而不是「喉舌」。最後，他提出一樁看似完美的婚姻，也就是一方面堅持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控制，一方面堅持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形式，兩者綜合為一(頁63)。在這個新的模式下，新聞記者代表人民(可惜他未為「人民」下定義)，在共產黨劃定的權限內自由報導、表達觀點和進行批評。他還擬出一個宏大的媒介結構(頁92)，允許各種社會、政治和職業團體出版非黨報刊。他說，黨報必須對憲法和黨負責，而非黨報刊只需服從憲法就得了。

改革派的觀點有點像空中樓閣。列寧主義政黨果真那麼仁慈，願意接受憲政的制衡，願意面對正當的挑戰，豈非天下太平？論者總是先讚頌體制一番，才含蓄地批評黨的僵化。有人甚至以為西方民主就是開明專制。他們在先驗上肯定共產黨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至於黨與人民的矛盾無法解決怎麼辦，他們從無答案。他們本質上絕非徹底拒絕黨，相反表現出對黨曖昧的支持。他們的藍圖很模糊，只有孫旭培(1988)提供一個比較具體的範例，但他所推崇的鐵托(南斯拉夫)媒介模式早已不復存在是否那麼理想又當別論。論者在讚頌馬、恩、列寧和毛澤東反對新聞檢查制度時，難道不知道自由民主國家早已在制度和法律上落實這些保障了？他們的「拿來主義」，無視於資本主義和「現行」社會主義兩種媒介體制水火不容，卻從中篩選一些要素，然後放在一個更高的理論抽象層次上糅合。如何在這兩種不同的體制中去蕪存菁，充滿了內在矛盾，勢必要進行複雜的辯證鬥爭，而不是用超驗的形式可以輕易解決的。但無論如何，改革派的論述暗示了中國當局背叛「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具有顛覆意義。

相比之下，趙紫陽的幕僚圈認為民主不合中國落後的國情，只醉心於「新威權主義」。他們用可疑的東亞例證，辯說政治控制可以促進經濟成長，中國必須集中政治權力，而分散經濟權力。其中陳一諮(1990)的自戀情結最為露骨，他主張只有10%以下的人(最有知識、最有遠識、

最有能力)才有資格獲得權力，由這10%的精英來教育和代表90%民眾。另有一些人認為威權主義是民主的前奏，因而讚揚蔣經國利用他的獨裁權力引導台灣進入民主轉型(參閱阮銘，1992)。80年代中末期，趙紫陽的幕僚與改革報刊(如《世界經濟導報》)建立脆弱的聯盟，看來是戰術上的權宜之計。

改革派的衰落使馬克思主義的理想進一步邊緣化。90年代，消費文化甚囂塵上，金錢是唯一的新教，新聞界總在黨與錢之間搖擺掙扎。如同共產黨解體以後的東歐，粗鄙的民族主義在中國復甦，填補了官方馬克思主義所留下的意識形態真空，政府小心翼翼地利用這種情緒，又怕民眾不滿的情緒失控。《中國可以說不》和《妖魔化中國的背後》都具體而微地反映並煽動狂熱的民族主義，張揚非民主和排外的危險情緒，根本談不上嚴謹的學術研究。一旦理論革新在極度商業化和粗鄙的民族主義浪潮中隱退，我們就進入了「新左派」的批評。

### 激進批判的新左派觀點

在90年代中國出現一個「新左派」的小圈子，尖銳批判80年代的自由多元主義派和黨內改革左派。國家支配的市場改革產生各種扭曲的後遺症，在90年代末畢露，自由多元主義和黨內改革左派都未曾觸及這些問題。先將「新左派」與「黨內改革左派」做一個簡要的比較：

一、他們是兩代人。許多黨內改革左派年輕時追隨共產黨革命，這些儒家化的共產主義知識份子涉足黨內改革，卻終被清洗出黨。「新左派」出生在1949年以後，有的在文革中當過紅衛兵。他們在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中接受大學教育，不像前輩遭受過國家恐怖的折磨，但也不覺得要以官方教條作為議論的出發點。他們接觸到自由多元主義，始則嚮往同情，後轉為刻薄批評。他們與西方激進批判的學術亦步亦趨，在不同程度上迷戀毛澤東式的烏托邦。

二、他們的社會立場不同。黨內改革左派與改革官僚結構結盟，共

同分享經濟、社會與思想特權。為此，新左派(Zhang, 1998b; Gan, 1998)攻擊他們帶有精英主義、貴族化和保守傾向，責備他們只提倡自由，沒有民主擔當。在中國，《讀書》月刊是新左派的重鎮。許多成員受過西方教育，生活在海外，從屬於西方學術機關，他們的論述在左翼西方學界顯然比在中國國內更吃香。黨內改革左派是由內向外看，新左派則由外向內看。

三、他們的中心論題、社會語境和理論資源互異。黨內改革左派摘取馬恩列毛的部分原典，來支撐政治與媒介改革的論述。80年代還有許多毛派份子激烈地反對市場的萌芽。黨內改革左派的論述定位於政治，除了附和鄧小平經濟改革的言辭，除了寄望市場經濟從根本上沖淡政治威權主義，他們很少論及經濟動力。到了90年代，張旭東(Zhang, 1998b: 111)認為市場所創造的文化思想「比毛時代的中國更齊一、更同質」。黨內改革左派的政治敘述在1989年天安門鎮壓後中斷，新左派的文化敘述則在1992年後的中國發端，那時商品化已產生了嚴重的異化現象。90年代，黨國只顧着掌權，人民只顧着致富，知識份子更加邊緣化，講什麼都沒有人聽。新左派從馬克思主義、後馬克思主義、後殖民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等西方激進批判思想中尋找理論依據，批判全球化經濟中文化資本對中國黨國媒介商品化的影響。

新左派認為中國新聞業的主要問題，不在於國家對民眾的壓迫，而是來自全球資本所支配的消費文化。他們批評市場拜物教為實踐草根新聞民主的大敵，是另一種形式的專制，讓人不禁想起法蘭克福學派馬爾庫塞(H. Marcuse)批判發達資本主義為「單面」社會。他們追隨西方激進論述，通常過度臆想和誇張中國的資本支配，造成「具體對象錯位的的謬誤」(任劍濤，2000：200)，有時甚至與國家主義和粗鄙的民族主義合流。他們重拾迷惑西方激進學術界的毛主義語言，例如張旭東(Zhang, 1998b: 135)呼籲，社會主義是對全民的承諾，必須「創造一種超越資產階級模式的新民主、自由和平等」。他試圖從「餘存的社會主義框架

內，重建烏托邦期望，以為發展政治參與和民主開拓新的可能」(1998b: 130)。總之，新左派想像的「社會主義民主」(socialist democracy)遠比「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更激進。<sup>2</sup>黨內改革左派和新左派都相信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民主，但新左派比黨內改革左派更無情鞭打自由主義。

至今最重要的激進派媒介著作出自趙月枝(Zhao, 1998)。她認為，中國新聞業不應只爭取「狹窄」的自由主義民主，並應進一步保存「社會主義革命的進步成果」。她追求的民主政體，既要監督政治權力，也要「制衡市場力量所導致的結構性偏差」(頁 191)。她對毛澤東思想的若干遺產既批評又同情，比自由多元主義者激進，但比其他新左派(如張旭東、甘陽、崔之元、汪暉)溫和。

在此我們必須檢查激進批判派的三個前提。首先，在處理民主的內在緊張時，自由派傾向於自由高於平等，而激進派傾向於平等高於自由(Wallerstein, 1999)。左翼自由主義者(Giddens, 1998; Fiss, 1996)支持「負責任的資本主義」(responsible capitalism)，提倡以國家來「糾正」市場的偏差，但激進左派否定資本主義與民主之間有必然關係。趙月枝否認資本主義(市場力量、商品化)是言論自由和民主的前提條件(Zhao, 1998: 10)；她承認市場有某些「進步因素」，卻筆鋒一轉，更贊成基恩(Keane, 1991)視市場為一種宰制新聞的力量。她說目前中國的新聞業集黨國新聞與商業主義罪惡之大成(頁152)。

第二，西方新左派抨擊資本積累與流通造成媒介的不民主，他們站在民主國家的邊緣，向支配性的中心意識形態進攻，打游擊戰，鞭辟入裏。只是這些浪漫的想像可以整個硬搬硬套到中國嗎？趙月枝(Zhao, 1998)響應西方批評家，宣稱市場機制導致「民主的衰落」，造成公共空間的危機。中國本來就沒有民主，怎麼「衰落」？中國本來就沒有公共

---

2 「社會主義民主」的主旨是公有制，而「社會民主主義」還是在資本主義的架構裏運作。威廉姆斯(Williams) 1989: 245-322對「社會主義民主」的重新定義，值得參考。

領域，何來「危機」之有？中國的公共空間與哈貝馬斯所說的不同，不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中介」，而是「社會滲透到國家的特定領域」的結果(Wang, 1998: 33)。趙月枝(Zhao, 1998)借用葛蘭西(A. Gramsci)的「霸權」概念，質疑自由派的論述，否認中國媒介的意識形態已經淡化。她強調霸權無所不在，有意識和無意識、或明或隱，而媒介是活躍的鬥爭現場，人們透過它在日常生活中反對意識霸權。使用廣義的霸權概念當然無可厚非，但這種全稱命題切莫混淆了自由主義、威權主義與極權主義媒介之間的界限(Su, 1994; Arendt, 1968)。文革時期任何事物都無限上綱到政治問題，思之實在令人不寒而慄。何況中國官方的宣傳粗糙不堪，哪用得着細緻的「霸權」分析？

第三，斯巴克(Sparks, 2000)以托派的情懷分析後共產主義的東歐媒介。他主張研究焦點應該從國家與市場的關係移開，擺在如何實現群眾民主的理想上。他說，除了政治精英和新資本家，媒介專業人士和公眾對媒介政策和操作都應該有發言權。趙月枝(Zhao, 1998)的看法與此接近，她承認新聞專業化儘管已開闢若干空間(Polumbiaum, 1990)，更重要的是為公眾參與提供更多的渠道。陳意甚佳。一些新左派的論調彷彿是毛澤東「群眾路線」的陰影不散。毛那矛盾重重的激進浪漫主義，在象徵意義上很迷人，而在實踐層次上卻令人幻滅。儘管一些激進知識份子仍迷戀它，中國人民卻早已徹底唾棄它了。老百姓經歷韋伯(Weber, 1958)所說的「世界解魅」(disenchantment)的過程，終於揭開了毛主義魔力的面具。憑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借屍還魂，以民主之名加諸在人民頭上？理論上說得天花亂墜是一回事，細節上怎樣實踐是另外一回事。總之，他們長於「破」，短於「立」。

### 結語

我所分析的三個社會理論都希望威權官僚的黨國體制能夠民主化，但它們對資本主義市場的評價不啻南轅北轍。東歐的開放並非拜賜於精

英的善意，而是政經壓力產生精英階層內部的分化所致(Sparks, 2000)。自由派特別強調「消極自由」(Berlin, 1969)，中國媒介的「消極自由」很差，但比過去好得多。自由派相信，即便一個扭曲的、國家所操控的市場也會創造某些空間，阻隔無所不在的國家權力。一些後現代主義者更天真地肯定消費市場已在中國開創民主文化(Zhang, 1998b; Wang, 1998)。激進派指責國家資本主義加深媒介非自由和反民主的傾向，又說消費文化與國家意識形態合成一體，媒介鼓勵個人的消費欲望，置平等與公正的理想於不顧。馬傑偉(Ma, 2000)指出國家與媒介「表面上衝突，但結構上是共存的混血兒」。

我認為(Lee, 2000a)，激進的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是一種「經濟的」政治經濟學("economic" political economy)，拿來分析西方社會中新聞異化，是一把利器。理由很簡單：西方媒介相對自主，國家機器干預較少，激進學者盡可高高在上，站在各種人道主義的立場批評資本的種種扭曲。科倫(Curran, 1991)提出一幅深刻的「民主媒介體制」藍圖，以公共服務的媒介為主體，兼容民間的、專業的、社會市場的和私人的多元聲音。這個構想極好，只是對飽受威權肆虐的媒介來說未免奢侈。它們必須從下到上反抗赤裸裸的國家壓制，對此，自由派的「政治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political economy)可以發揮極高的解放作用。市場自由化未必保證媒介的民主化，但要是沒有強大市場的發展，民主簡直不可想像。

我們必須面對三大挑戰：其一，自由派強調自由，激進派重視平等。沒有自由的平等是威權主義的、壓制性的；但是沒有平等的自由是排他的，而最終是非民主的。為了兩者兼顧，沃勒斯坦(Wallerstein, 1999: 99)把自由(liberty)和平等(equality)合並成為「平等自由」("egaliberty")一個字。其二，如何兼顧理想和實踐？如果默默接受自由派的實用主義，危險可能是附和現狀，導致想像力枯竭；但空有理想，無法實現，充其量是一場筆墨的空頭戰，我稱之為「抽掉政治的文化批



判」(Cultural critique without politics)。其三，世界中心發展出來的論述，如何配合區域的、民族的和地方的論述？有哪些西方論述可以借鏡(不是照搬)來分析一層層的具體問題？

冷戰終結，全球化的進程加劇。歐洲共產主義崩潰導致媒介的自由化，讓不同精英派系可以公開辯論，然而民主的「市民社會」尚待形成，舊的政治精英已經和新資本家(本國的和國際的)勾結，媒介漸有被他們操縱之虞(Sparks, 2000)。同樣的，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會不會加速威權主義國家與世界經濟動力的尖銳衝突？中國已同意讓西方跨國公司投資電訊和互聯網市場，各種信息會不會通過新舊科技滲入中國？會不會擴大國內年齡、社經地位和城鄉之間的信息差距？會不會衝擊黨國對媒介的控制？

最終，地方性、民族性和全球性的關懷逐漸相互滲透，中國媒介如何平衡普世原則(人權，言論自由)與民族論述(主權)？毛澤東是一個激烈反帝而極端封建的君主，但他曾提倡反帝和反封建同時並進。我們應該排斥義和團式的民族主義囈語，或一些新左派只反帝不反封建的論述。托瑞音(Touraine, 1997)指出，我們必須既保護又限制民族國家的權力，因為只有國家才能抗衡操縱資本與信息的全球跨國企業。任何新的民主論述都必須以此為起點。中國媒介必須掙脫國家控制與全球資本的束縛，這對塑造新的、民主的國際傳媒文化都有深意。



## 從儒家自由主義到共產資本主義

記者角色的衝突與匯流<sup>1</sup>

---

我們始終是有理說不清的秀才。

——《大公報》胡政之(引自張育仁，2002：485)

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一個「有」「無」的問題了。

——儲安平，1947(引自戴晴，1989)

白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鄧小平

在歷史上，報業與新聞理念的延伸象徵了民主參與的普及。實踐民主媒介的第一步，就是要賦受眾以權力，讓他們成為公共社區的一員。本章探討當代中國三個報業模式的延續與斷裂，特別注意它們如何看待記者和受眾，焦點始於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現代報紙在中國建立，接着追述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報業發展狀況，直到共產政權執政的轉折。<sup>2</sup>我在表4-1綜述三個報業典型的廣泛歷史背景，以及它們如何看待新聞記者和受眾。我的目的不在建構宏大的歷史敘述，但望勾勒現代中國記者的三個典型。

---

1 首次發表。

2 1949年以後台灣的媒介見本書第七至九章，香港媒介見十章。

表 4-1 近代中國新聞媒介的三個模式

	儒家模式	毛澤東模式	共產資本主義模式
時期	1900年代-1940年代	1949-當前	1980年代之後(尤其在1992年之後)
媒介角色	啟蒙	動員、宣傳	意識形態與商業獲利的雙重角色
收入來源	發行(通常規模很小)、 沒有或少許廣告	政黨津貼	廣告為主、混同其他市場活動
記者的典型	文人論政	黨的骨幹與記者	提供信息、打擦邊球牟利
受眾的典型	受知識精英教化	政治群眾	政治群眾，消費大眾
受眾研究的路徑	無細法，建基於道德性的 精英批判、少量採訪	讀者來信、小組 討論、訪問、樣 板分析	調查訪問，民意測驗，及其他 經驗性方法；讀者來信
代表人物	梁啟超、張季鸞、王芸 生、儲安平、徐鑄成	鄧拓、胡績偉	劉賓雁(1980年代)、胡舒立、 黎元江(1990年代)

關於中國報紙的起源，有兩說：戈公振認為漢朝時已有邸報；方漢奇等認為唐代是中國報業的起點，至少可溯及八世紀初，已由官文書游離出來為報紙的雛型，可稱為官報。無論如何，現代意義的中國報業不過區區百年，正如帕辛(Passin, 1963)談到第三世界報業時所言，大抵是受西方影響的結果。他聲稱，早期中國報業有「強烈的現代化傾向，反對以儒家和傳統為底蘊的力量和意識形態，也反對國家的政治現實，包括政治分裂、軍閥割據，以及遲遲未能建立代議制度的現代國家」。質言之，中國報業的第一要義是救亡圖存，反抗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是新文化運動場景的一環，旨在啟蒙和宣傳，提供資訊反而次要。

我以綿延不絕的儒家知識份子為背景，比較中國第一批恪守儒家自由理念的記者與其他兩個報業模式。毛澤東式的報業和儒家的報業都強調精英份子的責任，但毛澤東又以群眾為名，反抗精英份子。毛式的「群眾路線」在口頭上是民主的、反精英的，在實踐上卻是專制的。1990年代，在毛澤東主義的基礎底下，引進以前被謾罵得一無是處的市場經濟，部分改寫了媒介運作的規則和文化生態；記者、受眾和正在形

成的消費文化結盟，但並未挑戰既有的政治權力架構。西方市場主導的報紙跟自由民主的勃興密不可分；鄧小平所謂「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下的傳媒，就是「有威權特色的共產(後共產)國家資本主義」下的傳媒，這種傳媒和中國的民主化的進程關係何在？

我的初步論斷是：由於政治不民主，經濟不發達，沒有現代化的基礎，中國報業從來沒有視受眾為共同決定命運的政治公民。儒家模式把受眾當成教育、指導和啟蒙的對象；毛澤東的模式把他們當成動員和洗腦的對象；而「共產資本主義」模式把他們當成意識形態同化和商業剝削的對象。換言之，儒家的記者是啟蒙的老師，毛澤東模式的記者是共產黨的革命幹部，而「共產資本主義模式」的記者一方面是意識形態的鼓吹者，一方面又是牟利者。公共領域在哪裏？公民權在哪裏？只要勘察新聞記者和受眾的歷史，則現代中國為何在民主道路上蹣跚前行，便知過半矣。

### 儒家自由主義：文人啟蒙與論政

隨着滿清政府逐步分崩離析，儒家傳統的至高無上的權威開始動搖，必須跟各種舶來的「主義」競爭，以維護其固有的正當性。在儒家的論述系統裏面，個人必須為國家服務，個人責任比個人權利更重要，個人道德的約束力凌駕於法律和制度的保障(Fairbank, 1979)。許多反傳統的改革者，在儒家的架構裏面反抗儒家，身上還是接受濃厚儒家的洗禮。儒家把知識份子理想化，認為他們應該秉持良心，以天下為己任——張載的豪言壯語：「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以言論報國，自然而然利用報紙鼓吹改革和現代化。他們改革的動力來自儒家的情懷，但又從西方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獲得「解放」的想像。

文人論政充滿了追求國家現代化的焦灼，強調國家意識形態，糅合西方自由主義，謀求救亡圖存之道。從清末洋務運動開始，文人論政莫

不以迎頭趕上歐美為主旋律，他們意識到學習船堅炮利之不足，紛紛嚮往英美的自由民主制度。但自由主義只合生長於安定而多元的社會土壤，橫向移植到列強環伺、軍閥割據、派系傾軋、經濟落後的中國，注定水土不服，其命運可卜。再者，文人論政的立足點何在？簡言之，大抵憑藉一些道德概念或抽象理想，而不是運用經驗方法具體而準確地理解現實。自由主義注重個人主權，儒家片面強調個人對國家盡義務，而忽略國家保障個人權利，僅此一例，可見問題之一斑。到目前，我們還沒有看到有重要的著作闡發中國記者出生的階級背景，但我相信他們多數來自大都市和省會，而不是廣大貧困的農村；而且，多數是文人或官吏家庭出身，多由江南一帶的城市搬到上海和北平發展。<sup>3</sup>再說，一旦記者被吸納到知識貴族的最底層，便逐漸與他們想要啟蒙的受眾疏遠脫節，心中之「民」毋寧是抽象模糊的概念。<sup>4</sup>

#### 以言論改造民眾

二十世紀初，中國工商落後，交通不便，晚清報刊估計只覆蓋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一(Nathan, 1985: 147)。為了逃避政治迫害，它們多數在通商口岸、外國租界的保護傘下——甚至在東京——出版。幾乎所有的啟蒙精英知識份子都希望言論救國，從清末的王韜開始，歷經維新派(康有

---

3 張詠補充：目前沒有完整調查記錄，但據我閱讀記者自傳和當時新聞期刊零星發表的記者小傳，「名記者」(如黃遠生，邵飄萍，林白水，胡政之等)都是士大夫知識份子家庭出身。至於普通記者，上海《申報》新聞函授學校學員背景分析也印證此說。據1934年資料統計的籍貫分佈為：江蘇113，浙江65，廣東53，福建31，安徽25，湖南17，湖北17，河北17，山東17，河南11，四川12，江西11，廣西、雲南、貴州等22。其原來職業分佈為：教職員90，商店職員82，公務員53，學生50，無業44，新聞界42，未詳33，郵電19，銀行工廠17，軍界13，運輸7，醫生7，商店經理5，農工4。

4 張詠補充：關於報人對「受眾」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辦報實踐，有兩個時期常被忽視。一是1896年到1915年左右，大量出現地方白話報以及婦女報紙，為普及平民教育和後來新文化運動奠定實踐基礎。二是1920年代末30年代中期，大量討論怎樣辦平民報紙和地方報紙，和當時的平民教育相呼應。這兩個時期值得研究。

為、梁啟超)和革命黨(孫中山、章太炎)，以至於五四運動各派領袖(蔡元培、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無不深受儒家傳統薰陶，而後力圖反抗腐儒的保守，引進自由主義的思想和新聞觀(張育仁，2002)。中國新聞教育先驅(徐寶璜、邵飄萍、戈公振)提倡客觀公正、追求新聞與意見分離，體現國民的「公共意志」，他們莫不以美英自由思想為藍本(黃旦，2003)。<sup>5</sup> 儒家自由主義是中國新聞的原始基調。這些先驅人物創辦五花八門的雜誌啟蒙論政。我在這裏想用兩位典型的傑出報人——梁啟超和張季鸞——來闡述儒家自由主義的特徵。

列文孫(Levenson, 1959)描述梁啟超為「反儒家的儒家」，說他在情緒上懷念儒家的過去，但在知識上與它疏離。黃宗智(Huang, 1972)則稱他為「儒家的自由主義者」。梁啟超二十六歲於戊戌政變失敗，逃亡日本。明治維新時代崇尚西學，梁啟超開始接觸新思潮。中國士大夫階層認為新聞是賤業，但作為被政治邊緣化的知識份子，梁啟超對報紙的啟蒙潛能深具信心，他又崇拜西方報紙的種類繁富，社會影響大，因此毅然轉以報業推動未竟的政治志業。他前後出版了九個刊物，壽命皆短，但他從日本引介西方自由主義思潮，對下一代心靈的啟蒙和解放功莫大焉，從胡適、陳獨秀到毛澤東的身上，都看得到他的思想印記。很多後來的名報人，也都受其啟發和鼓舞進入報業。東京出版的《新民叢報》，堅持六年，最高峰發行一萬四千份，輾轉傳閱，讀者達二十萬知識份子，在當時是相當可觀的。他的立場是「以自由為本，以民主為用」。《新民叢報》，顧名思義要「新民德」，即是有社會意識的知識階層必須啟迪教化民眾，梁啟超筆下的民眾是愚昧無知、奴性深重的。他的報紙以議論為主，很少新聞報導。

黎安友(Nathan, 1985)形容梁啟超在1903年以前是「樂觀的儒家改革

---

5 徐寶璜等新聞教育先驅多在美國受過新聞教育，對新聞的理解和梁啟超等前輩不同。即使在同時期內中國的報界和學界，留美派和傳統派對報紙功能和廣告作用也常見相左。他們都秉承儒家傳統，但程度不同。

者」，後來卻採取反民主的立場。1896年，梁啟超在一篇著名的《論報業有益於國事》，嘆老百姓對本國和鄰國的事務一無所知，並析論上情下達和下情上達的重要。梁啟超在1903年遊歷新大陸，對美國民主的各種現象——例如反華情緒、黨派上台後占領顯位、一年到頭耽於選舉、官員腐敗，以及帝國主義的傾向(參見Arkush and Lee, 1989)——感到失望。回國後，他稱，國人「奴性」太重，民族性太多缺點，民主只會推向暴民統治。他提倡開明專制，讓一群貴族統治，保護公共利益，維持社會秩序(Chang, 1971; Nathan, 1985)。他的立場與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格格不入。梁啟超攻擊官紳階級，但也反對社會主義；他認為中國尚未工業化，沒有進入資本主義，不可能有階級衝突。中共官史稱呼他為「資產階級改良派」(方漢奇，1992：658)。

### 自由派新聞的濫觴

《大公報》創刊於1902年，主辦人英歛之曾追隨維新派的康梁，報紙一開始即定位為社會公器：「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以宗教精神支持自由主義。1926年由胡政之、吳鼎昌、張季鸞接手，更把自由精神發揚光大。<sup>6</sup>他們延續梁啟超為代表的文人論政傳統，也如梁氏從日本吸收歐美自由主義，期望向倫敦《泰晤士報》和曼徹斯特《衛報》看齊。

從1920年代到1940年代，中國社會發展遲滯，很少報刊在政治上舉足輕重。大報盡多風花雪月，對重大問題啞口無言，林語堂(Lin, 1936: 141)說：「甚至蚊子的嗡嗡聲也受歡迎，讓人鬆口氣。」他諷刺上海最老的《申報》和銷路最好的《新聞報》，一個「編得很爛」，一個「根

---

6 胡政之1916年先入《大公報》任總編輯，後張季鸞1926年加入，任總編輯，形成三駕馬車。其實《大公報》一直有財閥的背景，1916年《大公報》是由安福系財閥王某買下接辦的。



本沒編」。<sup>7</sup>《大公報》銷路三萬五千，僅及它們的三分之一，但林語堂讚它是「最進步、編得最好的報紙」，「肯定是訴諸教育過高的民眾」。《大公報》獲得1941年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外國報紙獎，盛讚其國際和全國報導全面，評論「無畏而深刻」，政策「自由而進步」。該報言論聲譽卓著，無與倫比，張季鸞(1944a, 1944b)從1929年到1941年所寫的社論至今仍然被奉為圭臬。以前官方批評《大公報》對蔣介石「小罵大幫忙」。現在，史學家(吳廷俊，1994; 賈曉慧，2002; 張育仁，2002)的看法已有修正，並公開推崇它的專業水準。

《大公報》有四個特徵，殊堪與西方媒介專業主義互證異同。第一，該報不求權，不求財，不求名，自許為文人論政、言論報國的工具。財務故意保持輕簡，以免為權和財左右。創辦之始就決定，報紙若無法以五萬元立足，寧可關門，也不接受政治或商業捐獻。張季鸞(1944b: 126)推崇英美自由報業，卻維持傳統儒家知識份子輕財重義的作風，痛恨金錢對西方報紙的腐蝕。他認為報紙言論獨立來自知識份子的良心，他不相信商業利益保護言論自主。其實，《大公報》的經營相當成功，卻仍以「文人論政的企業」自我定位。

第二，《大公報》提倡的新聞觀，在精神上(如果不是在實踐上)神似西方專業主義。但西方專業主義在歷史上是市場經濟勃興的產物(Schudson, 1978)，而《大公報》的專業標準則立基於儒家知識份子的道德責任，對市場的作用多持疑慮。1931年，張季鸞(1944a: 30-31)揭櫫「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原則，允為中國新聞界樹立最高的標竿：

- 不黨：純以公民的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

7 當時報界的記載和後來的回憶錄對《新聞報》評價較高，可能林語堂對知識份子和自由主義精神要求更嚴格。

- 不賣：不以言論作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於智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
- 不私：除願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務外並無他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用，而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
- 不盲：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為盲信，感情衝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陷於盲。

為求言論獨立，《大公報》拒聘任何黨員，但這份自由派報紙卻容忍不同政治傾向的記者和作者。1934年至1949年間，刊登「星期專論」凡750多篇，兼容並蓄，作者達200多人，多為自由派大學教授，其中三分之一的文章討論「民主與獨裁」的問題(張育仁，2002；Wang, 1994)。

西方報業在追求利潤的過程中形成多元報導的風格，讓各種利益在意見市場互相競爭制衡(Schudson, 1978)。傳統儒家知識份子本質上重義輕利，自命清高，把錢財叫做「銅臭」，不了解也輕視市場力量。但到1920年代後期，多數報人和學界認識到市場的意義，重視報紙管理和廣告經營，他們不反對報紙商業化，但反對報紙庸俗化和媚俗傾向。用谷德納(Gouldner, 1976: 173)的話來敘述，他們是「文化機構」(cultural apparatus)的成員，以追求社會公益為目標，不是所謂「意識工業」(consciousness industry)的代理人，孜孜爭逐個人和市場利益，以致受到權力和錢財的腐化。儒家知識份子社會的老師，居高臨下，以提供專家學者的權威意見為榮；但西方媒介工作者自認是專業人士，不是知識份子，與受眾地位平等，他們在理念和形式上盡量不摻雜意見於新聞報導裏，以吸引最大多數受眾的青睞(Schudson, 1978)。

第三，《大公報》比梁啟超時代甚至同時代的同業更注重新聞報導。它痛陳中國政治和企業只顧都市，棄佔全國人口九成的農民於不

顧。它派記者巡迴全國各地，為民間疾苦把脈。有一次在報導華北縣份的災情以後，該報大肆抨擊當局未悉心照顧窮人，不能清除貧困和無知（張季鸞，1994a）。儘管《大公報》不同情蘇聯和中共的激進主義，仍然派記者前往蘇聯和共區實地採訪。當然，《大公報》零星撒佈的「新聞網」（Tuchman, 1978）不夠全面，無法系統覆蓋廣大而矇昧的中國。即使如此，兩版要聞有一半是本報記者寫的，不像其他報紙幾乎全靠通訊社供稿（方漢奇，1996：475）。徐鑄成、范長江、蕭乾都在《大公報》的培養下，成為名滿大江南北的記者，他們反對國民黨，但解放後卻橫遭共產黨迫害。

第四，《大公報》和其他自由派知識份子都展現了強烈的國家主義傾向。抗日戰爭以前，該報時常抨擊國民黨和蔣介石獨裁；在抗戰砲聲中，張季鸞以國家存亡為念，轉任蔣的「諍友」。在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下，該報呼籲全國（包括共產黨）團結在蔣介石的身邊，為國奮鬥（吳廷俊，1994；方漢奇，1996；張育仁，2002）。它自願接受軍事檢查，以防泄露國家機密，犧牲專業自主在所不惜；它批評的只是檢查者態度惡劣，方法落伍。中國的自由派普遍相信覆巢之下無完卵，只有國家獨立，個人才有自由，個人和國家從來不是尖銳對立的。

#### 自由主義文人的歷史悲劇

四十年代的言論重鎮——自由主義最後的堡壘——包括中間偏右的《大公報》，中間偏左的《文匯報》，和《觀察》雜誌。它們左批國民黨獨裁腐敗，右批共產黨激進冒進，希圖開闢「第三條道路」，即政治上追求英美式的民主，經濟上追求社會主義的平等。左右開弓，卻落得左右不討好。這是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的大集結，執筆者多為專家學者，以大學教授為主。最後，自由派報人眼看國民黨大勢已去，終於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號召下，紛紛向左轉，不料後來連同自由派知識份子在1957年統統被打為「右派」，幾無倖免（張育仁，2002）。過去中共

官方用黑白兩分的史觀，認為國民黨是「黑暗專制」的，共產黨是「光明進步」的，自由派人士是軟弱的小資產階級、國民黨的幫兇。官方學者不惜曲解史實，以迎合黨化的史觀。所幸現在有些學者放棄這種簡單粗暴的史觀，實事求是，重新評價自由主義。

1941年王芸生接張季鸞主持《大公報》筆政。他鼓吹言論自由，民主憲政，給國民黨的《中央日報》罵為新華社的應聲蟲；但他主張共產黨應該督促國民黨，以國民黨為中心，走向民主建國的大路，不應該「另起爐灶」，因此又被共產黨的《新華日報》罵為國民黨的幫兇。《中央日報》刊登中宣部副部長(兼總主筆)陶希聖的三篇文章，批評王芸生是「民族失敗主義」，支持學生運動，煽動在野黨推翻黨國，鼓吹國際干涉。難怪胡政之慨乎言之：「我們真是有苦自己知。...我們始終是一個有理說不清的秀才」(張育仁，2002)。徐鑄成離開《大公報》，1938年辦民間獨立報紙《文匯報》，也是先走第三條道路再向左轉。

儲安平負笈倫敦政經學院，師從費邊社巨擘拉斯基(Harold Laski)教授，1938年中斷學業，返國抗日。他是《中央日報》主筆。1946年創辦《觀察》雜誌，扉頁標榜「獨立的，客觀的，超黨派的」，鼓吹自由、民主、進步、理性，為人民說話，吸引很多青年學生和自由派知識份子。儘管他聲色俱厲地抨擊國民黨，卻在1947年預言：「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一個『有』『無』的問題了。」<sup>8</sup>他的話不幸而言中：共產黨執政，他果然默默無聞，直到1957年方受命擔任《光明日報》總編輯。這下趕上了「大鳴大放」的陽謀，他逆鱗直言，批共產黨「黨天下」，結果只當了68天總編輯就打成「右派」，神秘失蹤，死因未明，至今尚未平反(戴晴，1989；章詒和，

8 胡適也說過，在國民黨統治下沒有講話的自由，在共產黨統治下既沒有「講話」也沒有「不講話」的自由。毛澤東於1955年發動全國「清算胡適思想運動」。批胡健將(包括王若水)晚年多表悔意。

2004)。儲安平의 遭遇令人扼腕，具體而微地刻劃了自由派記者在「解放」後的命運。

無論國民黨多霸道或多惱火，總是允許報刊公開出版，容忍共產黨的《新華日報》在國統區對國民黨採取「憤怒控訴，徹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態度；左派文人(例如魯迅)砲轟國民黨專制獨裁，毛澤東本人更振振有辭向蔣介石爭自由爭民主——在共產黨執政下，這種景象是絕難想像的。蔣介石是國家主義者，相信「法家化的儒家」，他敬重張季鸞、陳布雷之類的「諍友」或「國士」，因為他們名望高，沒有政治野心，可以幫助蔣介石提高道德威信；可是他又相信日德法西斯的若干鐵腕措施，箝制新聞自由，敵視西方自由主義如寇讎。右派獨裁者多半不懂得用媒介來洗民眾之腦，只斤斤計較如何保護實際權力與利益。蔣介石對一般報紙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凡脅及國民黨統治權者，則必不留情鎮壓之；《申報》因為揭露國民黨貪污，導致老闆史量才為特務暗殺，引起國際輿論大嘩。

國民黨既要對付共產黨，又要對付自由派。黨報系統大肆宣傳黨化的三民主義，並以它為統一的中心思想，打擊異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鼓吹政治民主和經濟平等，但黨化的版本卻把它推向自由的對立面。國民黨習慣用特務逮捕著名的文化人，粗暴阻嚇政敵，但不像共產黨用無孔不入的黨組織嚴密控制民間社會。黨內派系林立，各據山頭，新聞控制漏洞多，力量相互抵消。黨報必須和民營報競爭，可能的話也盡量淡化黨性，講求經營；新聞審查制度不但引起民營報紙反感，甚至連黨報(包括《中央日報》)都屢屢撰文批評(蔡銘澤，1998)。陸鏗(1997；Lu, 1994)回憶，1946年到1948年擔任南京《中央日報》副總編輯期間，除了國民黨中宣部陶希聖控制報紙社論，記者對下達的其他「宣傳指示」均可置之不理。《中央日報》很少轉載中央社稿件。陸鏗後來在報上揭發孔祥熙、宋子文的貪污案，簡直在蔣介石頭上動土，終於被迫離開《中央日報》，人身自由則有驚無險。政權易手後他成為「國民黨特務」和

「極右派」，坐足了共產黨21年的牢獄。第三勢力的自由派人士多中間偏左，陸鏗乃中間偏右，然而共產黨給他們的待遇如出一轍。

中國自由主義為何一敗塗地至此？揆其原因，得五：<sup>9</sup>

一、如同社會史家穆爾(Moore, 1967)著名的論斷：「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中國從未經過資本主義的萌芽發展，社會上的中產份子不成其為「階級」，民主政治缺乏堅實的經濟基礎。

二、老實說，這幾百個嚮往英美制度的自由派文人教授不能構成政治勢力，他們在廣大中國的人海中，不過是一座若隱若顯的孤島。他們手無寸鐵，缺乏組織，單打獨鬥，唯一的聯繫就是「反國民黨」。即連知識份子的「民主共同聯盟」，亦如烏合之眾，後來靠攏共產黨謀發展，以對付國民黨，結果反被共產黨吞噬(章詒和，2004)。

三、他們憑藉良心和理念講話，針砭時弊，徒有抽象的想法，沒有具體的主張或運動的策略。儘管風骨嶙峋，然社會地位高高在上，他們所關注的民主憲政和言論自由，對那些為溫飽掙扎的廣大人民，未免陳義過高。我不是說中國不需要民主自由，而是說自由派文人的確和他們所捍衛的「人民」、「百姓」脫節。<sup>10</sup>

四、文人諫諍的傳統，面對獨裁政權的迫害，沒有法律和制度保障，簡直有理說不清。

五、中國讀書人不管怎麼反儒家，總是流着儒家的血液，既有讀書

9 從社會科學的角度，我們可以逆向印證這五個原因的合理性。台灣民主轉型和新聞自由的落實，無論如何殘缺，都是華人社會第一個相對成功的試驗。質言之，台灣(1)社會已經充分接受資本主義的洗禮；(2)知識份子結合政治運動，不但坐而言，而且起而行；(3)中產階級壯大而穩定，民主自由的訴求水到渠成；(4)他們放棄傳統諫諍的角色，轉而以行動向當局爭取權利；(5)精英發展的道路多元，毋庸擠破政治窄門。詳見本書第七章。

10 姜義華(1998)所見略同。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胡適、羅隆基、徐志摩、潘光旦等自由派知識份子組織平社，呼喚英美個人主義的思想和言論自由，抨擊國民黨的「訓政」，終因游離於中國城鄉廣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之外，只能繼續成為「多少不合時宜的書生」。

報國的情懷，又孤芳自賞，一旦獲得當權者的垂青，當即感激涕零。王芸生接到毛澤東的親筆信後，幾夜睡不着覺，結果決定投共，用他自己的話是獲得「新生」，即為明證。這些自由派文人在五十年代初接受思想改造，不管如何交心洗腦，詆譏自由主義，作賤人格，扭曲歷史，還逃脫不了後來百般凌辱的厄運。若幸未被整死，也要等到文革以後平反才得到喘息，奈何時不我予，垂垂老矣。

自由主義思想1949年以後慘遭清算，以致消聲匿跡，直到九十年代才在若干知識份子和記者的話語中初步復活。他們背腹受敵，被當局和老左派迫害，與新左派論戰。這幾派在中國的特殊語境值得進一步釐清（見本書第三章、第十三章）。

### 極權共產主義：黨的喉舌

費正清(Fairbank, 1979)說「毛澤東主義」是披上列寧外衣的儒家。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都反儒家，但身上充滿了儒家黑暗面的色彩；他們選擇性吸收馬列到儒家架構，形成自身的中心思想。毛主義和儒家都是政教合一的系統，強調意識形態和道德倫理，而不重視制度上如何制衡權力和保障權利。儒家的「道統」面對帝王的「政統」顯得蒼白無力；共產黨自稱「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包辦權力和道德，不假外求。儒家知識份子和列寧的黨幹部都帶有精英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傾向。除了這些雷同，儒家和毛主義畢竟有許多相異之處：第一，它們雖然都相信私利與公益是和諧的，但共產黨幹部的紀律取代了儒家知識份子的「良心」。第二，兩者雖然都有精英傾向，毛澤東提倡群眾崇拜，認為他們代表革命的理想。第三，儒家知識份子致力於教育人民，毛式新聞工作者要進一步在黨國體制內動員群眾，用共同的意識形態和絕對的權力重新鑄造他們的人格。1949年後成立的人大新聞系，1952年改造燕京和復旦新聞系，集中體現了毛對新聞工作和記者角色的認識和期待。

蔣介石不懂宣傳，絕非毛澤東的對手。國民黨只求消極杜人悠悠之口，深怕媒介過份熱衷政治。蔣介石的文稿俱出幕僚之手，官樣文章，虛應故事，對上不對下。一般人讀不讀他的訓詞無所謂，讀了不信，只要表面順從、不捋虎鬚就得了。1949年以後，共產黨不止嚴禁私人辦報，毛澤東更時時自撰煽動力極強的文稿，鼓動全國風潮，雷厲風行，不眠不休挑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運動。共產黨積極干預媒介，動員群眾，唯恐天下不亂。人人被迫在運動中積極表態，沉默是落伍，奈何路線變來變去，全國上下巨細無遺跟得團團轉，時常自打嘴巴，生怕跟錯風淪為政治鬥爭的祭品。當年的自由派報人(如徐鑄成，1998；蕭乾，1999)晚年出版回憶錄，描述國民黨的新聞控制總是生動具體，然揭露共產黨的控制則似乎心悸猶存，張口結舌，念念不忘「新生」以前《大公報》的自由作風。

毛澤東強調政治掛帥。他繼承列寧的報業觀，發揚光大。他們兩人都宣稱「民主集中」(Schram, 1974)，但毛比列寧更民粹，更激進，更「唯意志」，因此不斷擾亂政治穩定。毛宣稱，思想決定行動，群眾思想「正確」，行動也會「正確」，為此媒介必須依照意識形態和政治路線行事。毛追求永久革命，將人的意志力提到無限上綱，輕視官僚組織的常規化、角色的分殊化，以及專業技能。他仇視知識份子如糞土，一切政治運動都針對他們。群眾路線逼迫成千上萬「反動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記者下鄉，到偏遠的鄉村或工廠，接受革命群眾、意識形態狂熱份子再教育。毛澤東的政策不是完全沒有挫折的，其實也受過政敵反撲，但最終還是擊敗了劉少奇的「正統」政治路線。劉少奇的立場較近布爾什維克，鼓勵宣傳機構和意理專業人員發揮說服功能，長期塑造全國的文化和意識(Lee, 2001b)。劉少奇要「促生產，抓革命」，毛澤東要「抓革命，促生產」。毛劉之間有權力鬥爭和政策衝突，但劉從未發展出有異於毛的群眾路線、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新聞理論(Dittmer, 1973, 1974)。要說有甚麼差異，那就是毛比劉更無限上綱。蔣介石和毛澤東有



「質」之分，毛澤東和劉少奇就只有「量」之別。

這一類師承列寧和毛澤東的理論文章，鸚鵡學舌，千篇一律。文化沙皇胡喬木寫過不少訂調的東西，儘管每個時期講法不一，總有些人跟着煞有介事大肆鋪陳發揮。文革以後，黨內改革派痛恨極左惡行，《新聞戰線》之類的雜誌不時緬懷陸定一(1941)為延安《解放日報》改版時寫的一篇舊文。陸定一在文章裏譴責自由主義客觀新聞唯心片面；聲稱只有無產階級可按本來的面目理解事物，只有堅持共產黨黨報的立場，堅持密切聯繫人民的方針，才能真實反映現實。他提倡「用事實說話」，說穿了，就是「用事實說黨要說的話」。之後，范長江提出報紙和記者面向群眾，為群眾服務，報導「群眾欲知、應知而未知」，反映新中國的社會現實(黃旦，2003)。這是《人民日報》1956年新聞改革的基本精神，焉知反右、文革的浩劫接踵而至。陸、范之文實無新意，這些話毛澤東在不同時期不同場合不知講過多少遍，只是此一時彼一時，毛為了各階段鬥爭的需要經常自我矛盾。他自己的矛盾是「高瞻遠矚」，但別人失察而未緊跟他「當下的」路線或旨意，卻可能以「反革命」入罪。文革後，改革派回去文革前甚至延安找範本，措意標榜陸、范(廣義的劉少奇派，也是文革的犧牲者)，而且流露深情厚望，實乃暗寓「此毛攻彼毛」之意。這些改革派人士在文革期間被整得死去活來，痛定思痛，還只能出此「溫故知新」的伎倆，一是不得已，蓋全面公開「非毛」必動搖鄧小平權力繼承的正當性；二乃旁無其他範本可依，在體制內能找到最「開明」的就是這些了。

毛澤東(Mao, 1979)宣稱：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群眾路線旨在結合黨的紀律和群眾意志。即使做了調查，記者如果僅僅拘泥於狹隘的經驗主義，不能了解階級鬥爭的主要矛盾，他們仍應該被剝奪發言權。一旦黨定了政策，幹部必須搜集群眾意見，寫成報告給黨的各級委員會考慮，最後應該把中央的訓示帶回群眾，解釋給他們聽，並加以推行(Dittmer, 1974)。劉少奇(1998)在1948年一篇著名演講中呼應群眾路線的

新聞學，呼籲記者要反映群眾的聲音，並且服從黨委書記的領導。此外，他堅持記者用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和唯物辯證法來分析具體現象。

群眾路線實踐的結果如何？蘇紹智(Su, 1994)的總結是「文化專制」：一個全能(totalist)的黨，壟斷一個全能的意識形態，黨政軍合一，黨指揮政軍，黨聽命於領袖，全面指揮槍桿子和筆桿子，以維護統治的正當性。意識形態的控制縱橫交錯，無孔不入，橫面有六大系統(軍事、政法、行政、統戰、群眾組織、宣傳)，縱面則貫穿中央、省、市、縣、鄉鎮等五個層次，一經一緯，交織成天羅地網，滲透到各個社會細胞內。共產黨在這個網路裏發動正面學習、運動、政治批判，塑造民意，箝制新聞言論的流通，禁錮思想文化的發展。這是典型的「指令媒介」(command media)。

《人民日報》50年代總編輯鄧拓的經歷一葉知秋。鄧拓是忠貞共產黨人，在知性上自然擁護新的社會主義；但他才情頗高，對共產黨蔑視文化和「無產階級文化」的庸俗，在情感上則是疏離的(Cheek, 1997)。在這個意義上，他未始不是個儒家的列寧主義者。50年代，他把「重點報導」的概念帶進《人民日報》，從政策的角度貫穿所有的寫作，包括新聞報導、通訊員來稿、雜文或社論。他規定所有讀者來信必須回覆；鼓勵記者在群眾中生活，爭取群眾投稿，吸收當地熱心份子為通訊員；報紙歸納綜合各地方報的報導，以反映全國問題和整體形態。即使如此盡心費力，毛澤東還在1957年怒罵鄧拓領導的《人民日報》是「死人辦報」，諷刺他們要「付板凳折舊費」(王若水, 1989)。在毛看來，鄧拓並沒有全力配合宣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鄧拓先被解職，後自殺。

1959年到1961年的人禍餓死了三千萬人，毛暫時讓權給劉少奇，退居第二線。劉少奇宣佈，新中國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媒介要為社會主義經濟重建努力，為全民(不止無產階級)服務。《人民日報》1957年受毛咒罵在前，如今劉少奇又指責它製造虛假，以致加深了大躍進的巨大

錯誤，真是進退為難。劉少奇批評報紙是「無生命的傳聲筒」，而不是「具有頭腦的喉舌」(胡績偉，1989：100)。他說，「說謊的報紙比沒有報紙還要糟糕。」1961年，《人民日報》員工追隨劉少奇到他的湖南家鄉，學習如何做農民調查。他告訴記者不要隨便給人「貼理論的標籤」，特別是跟黨的政策意見不同的人。他要記者多聽聽親友們「發牢騷」，最好帶他們到遠離熟人的地方，私下聊天，以避免當地幹部的壓力。他希望記者以小見大，聽到群眾的心聲。

劉少奇倡導「為讀者服務」，文革被批為修正主義的「毒草」。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意識形態的疾風驟雨，均達歷史的毫巔。革命言辭只是各種幫派鬥爭(包括毛與他的親密戰友之間)合理化的工具。政治動蕩不已，普爾(Pool, 1973)說，中國「提供一個精密的試驗，讓我們知道宣傳的極限能夠到哪裏」。權力鬥爭造成政策的反覆無常，人事傾軋，而媒介不斷打自己的嘴巴。

共產黨的政治一向以調查、讀者來信、批評與自我批評為搜集意見的主要方法。文革時期禁止讀者來信，文革以後再度出現，大受歡迎，《人民日報》在1978年10月間每天平均接到三千封讀者來信，痛訴極左暴行(Chu and Chu, 1983)。發表的信件都用「編者按」起頭，當作「樣板」支持政策，並將英雄與敗類戲劇化，強調意識形態的角色。這些信的作用是強化黨和群眾的「魚水深情」，拉近黨和群眾的行為聯繫，鼓勵群眾認同黨的目標(Rosen, 1989)。

這些搜集群眾意見的方法粗糙，源自當年的游擊隊基地，農民多不識字，幹部須以口頭渠道深入田間地頭與他們溝通(Dittmer, 1974; Zhu, 1988)。中共向來敵視西方代議制度，認為幹部與群眾必須直接接觸，統一步調。毛澤東(Mao, 1979)強調記者不但要提出問題，還要提出解決方案。他認為，每到一地，先把人劃分為政治進步、一般、落後三階層，再從每一個階層找出兩三個人談一談。這種半人類學式、半臨床式的方法，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原來用在人口簡單、同質性高的游擊基地，

搬去複雜而異質性高的人口卻捉襟見肘，何況用意識形態定位常被當權者濫用。

「群眾路線」出了甚麼毛病？在哪裏探測民情，怎麼探測民情，這些技術問題倒在其次；主要的問題是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無法解決民主與集中、群眾聲音與黨的政策、參與與動員的辯證關係。記者服侍的兩個主人(黨和群眾)權力絕對不等，但黨在先驗上卻自稱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代表群眾的聲音，這個前提不准懷疑或挑戰；黨和人民的矛盾即使表面用巧辯的方式抽象解決了，在實踐上卻完全落空，連「修正主義者」劉少奇也明白這兩難，但他能怎麼樣？他說：「(記者)一方面要服從黨委領導，要遵守紀律性；一方面也要敢於向黨委反映問題，提出意見，堅持原則性」(見胡績偉，1989：110)。他說，記者不要怕被黨委書記報復，因為「如果你的看法是正確的，你被(黨)開除，那是你的光榮」。劉少奇(Liu, 1967)講起共產黨員的修養，立場絕對得很：黨員務必歷經長期的革命塑造，大公無私，完全奉獻給黨。諷刺的是這種循環邏輯竟應驗在劉少奇的身上，文革時期他被迫害致死。

鄧拓的助手胡績偉，文革時期曾遭貶掃報社廁所，1978年復出接任總編輯(後升任社長)，銳意革新，直到1983年解職，在胡耀邦或明或暗的鼓勵下，把《人民日報》辦成開放改革的旗手。連胡績偉(1989：326)這樣鮮明的黨內改革派，也只能寬慰受制度迫害者：「從長遠來看，我們黨報的作用會越來越大，報紙批評的重要性會被愈來愈多的人重視，黨委會愈來愈支持我們的批評，人民群眾會越來越支持我們的批評。」他說：「我們一定要相信黨中央，相信我們的黨」。胡績偉要求黨委書記在報紙上或通過內部參考討論重大問題；他鼓勵記者提高政治或專業水平，揣摩黨委書記的意向，贏得他們的信任。要是黨委書記不准刊登某些重大問題，他認為暫時撤消「也不是什麼壞事」(頁333)。這種扭曲的論證好像面面俱到，其實只開幾張空頭支票，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只能證明黨內改革派有心無力，難以跳出共產黨機械的宰制架構。胡績偉

在1989年以後對共產黨的批評愈來愈大膽，他無悔於當初追隨革命，一輩子貢獻黨報，晚年卻從內心深處重點理想的火苗，愛恨「兩頭真」。他的遭遇和心路歷程在同輩進步人士中是很普遍的。

記者和黨委書記的界限極其武斷，變動不定，沒有章法可循。記者只能憑個人信念和政治經驗，揣摩黨委書記的好惡。共產黨一味要求黨委書記和黨報記者道德高尚，大公無私，不犯錯，就像官方塑造的雷鋒形像——這不啻是儒家「內聖外王」的共產黨樣板，如同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所說的，是「傳統中國把掌權人道德化的一個新版本」(轉引自White, 1983)，結果講一套，做一套，口號叫得響亮，卻與行為脫節甚至背馳。在這個權力公式裏面，誰監督權力，誰監督監督者？把他人道德化，和被他人道德化，兩邊都「糾葛在相同的國家機器裏面，受到相同的層級邏輯所左右」(White, 1983)。共產黨說「從群眾來，到群眾去」，搜集意見的渠道都在官僚組織內部進行，只講黨的紀律，不講用法律和制度保障群眾；只強調黨報記者個人的道德勇氣，從未認真討論如何保護他們的權利。記者只能看黨委書記的臉色辦事。

每隔一段時候，當局總會重提「黨內民主」的舊話。民主只有靠實踐來能證明，不能靠口頭宣示來完成。實踐的結果證明是徹底失敗的，失敗的原因不僅僅是「時間太短，經驗不夠，假以時日，必可求其完善」之類的話；失敗的根本癥結在於權力缺乏制度的制衡，權利也無由獲得保障。從劉少奇鼓吹的「共產黨黨員的修養」，到毛澤東塑造的雷鋒形象；以至於江澤民重提「以德治國」的論調，都是一脈相承的「道德化」教條說辭，簡單假定良好的「意圖」或「情操」就保證良好的「效果」。社會學家墨頓(Merton, 1968)曾經反覆申辯，意圖可能獨立於後果，後果不以個人的意圖為轉移。西諺有云：「通往地獄的道路鋪滿了善意。」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標準，如果連最低標準的法律當局都要藐視或踐踏，只一味寄望於領袖和群眾發揮「善意」，這是主觀的人治，不是客觀的法治；可能是偽善，是道德的氾濫。新聞自由欲求充分保

障，必須先遵守有道德基礎的法律；空談沒有法律約束的道德，這是不折不扣的本末倒置。

## 共產資本主義：權、錢、意識形態

「共產資本主義」的記者統一了「共產」與「資本」兩個矛盾的角色，一方面執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控制，一方面在「半資本主義」市場運作。有兩點必須說明：第一，80年代的主調是政治改革的啟蒙，90年代的主調是市場化。80年代「共產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引進媒介廣告，當時曾經激辯「人民性」和「黨性」是否對立，有沒有絕對的新聞自由，後來又有「新聞商業化但新聞不是商品」的討論，反映了啟蒙與掣肘兩股勢力的鬥爭，改革方向猶疑不決。90年代伊始，蘇聯及其東歐附庸國即如骨牌效應紛紛解體，冷戰走入歷史塵堆，鄧小平於1992年重燃市場化的火把，以挽救天安門事件後的信任危機，「後共產資本主義」於焉登場。總之，沒有80年代改革的基礎，就不會有90年代的國家資本發展；這兩個十年有延續，也有斷裂，分野在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第二，如今，中國沒有共產主義，剩下的是喪失革命理想卻碩大無朋的共產黨，壟斷了暴力和資源。中國的市場沒有「健康」資本主義社會的透明度和紀律，私有資本不准染指媒介，記者名義上都是國家雇員。這種奇怪的發展模式是「市場列寧主義」，或稱「共產(後共產)威權國家資本主義」。

八十年代：政治啟蒙，媒介的市場誘因

鄧小平開啟1980年以來的經濟改革，官方說是「撥亂反正」，或是「把顛倒的秩序再顛倒過來」，其實是反叛毛澤東的文革專制。經濟改革帶動了新聞和媒介領域的種種變化。鄧小平回到權力中心，對毛式階級鬥爭感到不耐煩，但無論如何不能容忍任何人挑戰他的權力和意識形態。媒介必須維護、不能削弱共產黨的認受性。鄧小平推行經濟現代

化，以預防公眾要求政治變革；戈爾巴喬夫正好走相反的路線，企圖以政治改革化解經濟危機，而卒告失敗。整個80年代，中國走哪一條經濟道路，黨內鬥爭不已：一派堅持引進更大的市場誘因，另一派追隨蘇聯中央計劃的「烏籠經濟」。媒介常在兩派鬥爭中變成夾心餅，無所適從。有時，權力鬥爭的當事人迂迴「出口」一些秘辛給境外刊物，再「內銷」於內部各類「參考」，媒介成為高層鬥爭的工具(Hood, 1994)。

鄧小平把心腹胡耀邦和趙紫陽推向台前，可是後來派系權力鬥爭失衡，他棄車保帥，犧牲了他們。媒介政策如鐘擺，一會兒偏向經濟自由化，一會兒偏向意識形態控制。胡耀邦在70年代末運用媒介，既清算文革暴政，又討伐「凡是派」(以華國鋒和汪東興為首的毛派殘餘)；他從外圍媒介(黨校的《理論動態》)包抄，進逼中央的《光明日報》、《解放軍報》和《人民日報》，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邁出「非毛化」的重大一步(Goldman, 1994)。胡耀邦後來在胡喬木的壓力下退卻，聲稱作家可以接受黨的「友好的建議選材」，但記者的報導必須「八二開」，即是八成宣傳黨的光明面——這麼保守的言論折損胡耀邦的開明形象，但媒介揭發陰暗面實在遠不及「允許」的二成。趙紫陽也隨着政治風向猶豫不決，立場矛盾叢生。一方面，他提倡「新權威主義」，抑制媒介自主的成長；一方面，他又提出「輿論監督」的口號，促進政府決策的透明度。政治風向搖擺不定，然而鄧小平鑄平異見份子和反對力量，用的畢竟是國家機器，不是從下到上的群眾動員。國家機器從群眾運動撤退，降低革命意識形態的調門，文化種類變得比較多元，媒介娛樂趨於活潑，反正不威脅國家政權最要緊(Lee, 1990a)。改革的勢頭躲過了短暫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1983)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1987)，但最終在「天安門運動」(1989)功虧一簣。

鄧小平的政策是「以市場管理政治」，為此必須仰賴更多更好的資訊，才能改善經營、財政和科技的基礎結構。他呼籲知識份子解放心靈，無意間為知識份子和媒介改革創造了若干空間。毛澤東的意識系統

駁雜，各時期為了革命需要說不同的話，充滿內部矛盾。黨內改革派抓住這個矛盾，突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中較開明的那一面，提倡「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新聞自由」、政策透明度和「輿論監督」(詳見Lee, 2000c; 本書第三章); 他們以毛之矛攻毛之盾，引述毛在未奪權以前向蔣介石爭取自由民主的講話，來打擊文革那些倒行逆施的法西斯行徑。雖然他們反話正說，其實大家心知肚明。他們努力打破禁區，提出公眾知情權，強調民意在決策過程中的角色。80年代後半葉，在趙紫陽主政下，開始草擬一部新聞法，可惜後來因為天安門事件而夭折。根據吳國光(1997)參與高層會議的記錄透露，趙紫陽的智囊團內部討論涉及很多敏感的結構問題，包括西方多黨制、普選和新聞自由，坦誠開放，改革的兆頭令人鼓舞。

80年代新聞改革的熱情高漲，政治氣氛比較寬鬆；經濟改革帶來社會失調，大家意識到經濟自由化如無政治民主和媒介制衡，必導向腐敗一途。從1986到1989年，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用「擦邊球」的方法，把精英政治改革的議題推上了辯論台。朱迪(Polumbaum, 1990)的調查報告發現，領導人、讀者和記者都普遍不滿意媒介的表現；記者們特別不滿要同時服侍黨和人民，偏偏這兩個「主人」的矛盾無法解決；他們更不滿給層層的控制機制綁得動彈不得。他們抱怨新聞沒有自主性，渴望做批判性的、調查性的和多元的報導，寧願「向人民那一邊傾斜」。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在1987年到1988年兩年間做了五項大型調查，反映當時整個精英份子對於政治和新聞改革的殷望(喻國明、劉夏陽，1993；喻國明，1993)。祝建華的第二手資料分析(Zhu and Rosen, 1993; Zhao et al., 1994; Zhu et al., 1990)也佐證80年代整個社會熱衷政治改革。

劉賓雁(1989)的遭遇說明了黨內改革派的極限到哪裏。在80年代的前半期，他幾乎扮演了「包青天」的角色，每天在報社和在家裏都接見很多受到冤假錯案迫害的群眾。他們從全國各地投奔首都，尋求一線希望讓冤屈得直。劉賓雁(1985)鼓吹「第二種忠誠」，絕不是要醜



化共產黨，而是希望以筆歌頌光明，揭發黑暗，幫助黨延年益壽。他這種層級的記者有「半官方、不成文的調查權」(Nathan, 1985: 156)，可以到工作單位訪問當事人，調閱他們的檔案。他在《人民日報》的調查報導一時膾炙人口，但不多時，許多黨委書記到中央告狀，批評他破壞安定團結。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劉賓雁從內部渠道寫信給胡耀邦，說明他的處境，奈何胡耀邦自身難保，無法救援。劉賓雁於1987年被開除出黨。

#### 九十年代：市場的汪洋大海

80年代市場機制開始介入媒介經營，可是要到90年代才全面發揮威力。鄧小平為解決天安門事件後的國際孤立，重振內部停頓的經濟發展，在1992年重新點燃市場自由化的火炬，形成了媒介在思想上的斷裂和突破。媒介紛紛跳入商業化的汪洋大海，不再繼續依賴國家補貼，同時從迅速發展的廣告中獲取暴利。只要不對抗黨國，賺錢不是甚麼罪大惡極了。經濟多元化和文化多元的呼聲高漲，淹沒了80年代政治改革和知識啟蒙的訴求。媒介不再鼓吹宏大的政治改革，但想出各種編輯和市場的策略，包括一些不尋常的新聞種類、方式和技巧，在不違反官方禁令的前提下爭取市場的青睞(Pan, 2000)。何舟(2000)這樣形容這種身心分裂的媒介：「資本主義的身體」，戴着「一張社會主義的臉」。他說，中國的黨報已從政府「喉舌」轉變成為黨的「公關公司」，任務在於提高黨的形象和認受性，而不是洗腦。現在分幾方面來闡述：

**消極自由與輿論禁區** 市場化對於媒介的影響充滿了混沌與矛盾。市場把極權主義洗刷為威權主義，現在的威權當局最關心的，當在保權，不在洗腦；媒介的自主度跌跌撞撞，進兩步，退一步，市場化帶來了我所說的「降低動員的自由化」(Lee, 2000；詳見本書第二、三章)。媒介享受較多的「消極自由」，削弱國家的指令主義，在「非政治領域」和不脅及政權穩定的話題上自由度尤其顯著增加。然而政治的「積

極自由」不見蹤影，商業邏輯愈來愈顯著。黨報通過籌組集團的方式嘗試邁進市場，故意錯開龍頭黨報的喉舌功能和外圍報的文化消費功能。都市報興起，貼近市民生活。專業報方面以國際新聞時評、財經和體育類最活躍。媒介軟性消費內容增加，着眼於都市專業人士和富裕階級，罔顧農民和工人的需求(Lee, 2003a; Zhao, 2003)。西方學者批評商業化造成瑣碎化和無聊化，背離民主的理想，但麥康勉(McCormick, 2003)認為在中國的情境下商業化促進媒介的多元化和國際化。

媒介的政治輿論地雷處處，私人談話幾乎百無禁忌——於是公開場合講私事，講冠冕堂皇的話，講無關緊要的話，講打哈哈的話；私人場合則大談國事；由於媒介通道阻塞，人們只能編造順口溜，透過小道消息表達政治情緒。這就是林培瑞(Link, 1992)所說公開、私下兩套矛盾但彼此心照不宣的「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小媒介(雜誌、書籍、互聯網)比大媒介(報紙和電視)迴旋的空間大，娛樂和時尚比新聞鬆動。朱學勤(2003)感慨道：「一個公開發言的『喉舌』中國，多半為虛擬；而另一虛擬的『網絡』中國，則反而顯真實。」<sup>11</sup>

政治和社會熱點新聞噤若寒蟬，許多記者坦承經濟問題報導的餘地較大，但腐化事件不要追蹤到高官及其子女身上(Keatley, 2003)。打擊經濟犯罪的報導(例如央視的《焦點訪談》)有時是當局授意或默許的，殺一儆百，而又不傷特權結構。在中國沒有官商勾結無法致富，打擊枉法商人很難不扯出背後的貪官污吏；重大弊案即使喧騰海外，沒有當局點頭，國內媒介只能諱莫如深，一般得靠「出口轉內銷」、海外網站或境外媒介(如鳳凰衛視、美國之音)獲得部分消息。當局肯不肯點頭，牽涉到內部權力的鬥爭與平衡。法輪功已被定性為叛亂團體，媒介唯有隨着叫罵的份。2003年春，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瘟疫在廣州和北京

11 例如2003年自由派人士李慎之(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逝世，官方報刊只發表一簡短消息，但網上追思文章二十天內已逾百篇。

蔓延，貽禍香港和世界，官方和媒介通力隱瞞，若非世界衛生組織施加壓力，當局不會改弦更張。同時期，中央電視台卻鋪天蓋地報導伊拉克戰事，除了譴責美帝的侵略，還為獨裁者薩達姆唱讚歌。<sup>12</sup>

以在全國最舉足輕重的三個大都會來看，媒介的開放程度與權力結構和改革思路有關。廣州得全國風氣之先，最早形成三大報系，各為其主，而其主管部門廣東省委和廣州市委存在微妙的利益關係，報系互搶新聞，市場競爭比較良性。北京是全國政治權力中心，媒介各有複雜的權力背景和政治靠山，市場競爭亦屬激烈。上海雖然是全國經濟樞紐，但地方勢力一統天下，文新和解放兩大報業集團按長官意志寡頭壟斷，瓜分市場，改革勢頭落後於廣州和北京。根據這條思路窺探三地報紙殊異的風格：廣州《南方週末》是地方報紙，卻面向全國精英，有全國影響。它以告訴公眾真相、表達社會良知自任（「給弱者以關懷，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特別推崇儲安平、徐鑄成這些自由派報人，不啻是全國自由知識份子的精神堡壘，也是90年代中宣部最頭痛的報紙，總編輯「衝過頭」以致更迭頻仍，竟成為報紙光榮的指標。廣東一般居民反而鍾意更花俏的、在地的《廣州日報》和辛辣的《南方都市報》。《北京青年報》猛在市場衝刺，政治調門沒有這麼高，編輯技術勇於創新，擅長製造社會議題，鼓動市場風潮，時而觸犯官方禁忌。上海《新民晚報》反映海派文化，以「短些，廣些，軟些」貼近尋常百姓，政治上沒有太多雄圖，自從被迫與《文匯報》合併以後逐漸萎縮。

**媒介專業意識的消長** 經濟改革既促進也抑制媒介專業化的發展。

---

12 中央電視台播報美英聯軍進攻伊拉克的遙遠戰事，可以用鋪天蓋地來形容，但對國內蔓延的SARS病疫卻視若無睹，難怪英國《經濟學人》的標題說：「請少說點謊」(Please lie less)。又，據《明報》(2003年6月25日)報導，中中共中宣部點名批評十多家報刊，包括《財經》雜誌，因為它們犯禁報導「敏感題材」，例如SARS的反思，上海「首富」周正毅舞弊案，廣州孫志剛案(年輕學生無暫住証，逛網吧時被警察逮捕毆打致死)，北京蔣彥永醫生就SARS給美國《時代》雜誌寫信事件，楊斌舞弊案，361潛艇事件，和北韓核問題。

80年代末期，記者普遍感到挫折，不滿缺乏專業自主，不滿黨國對日常新聞工作頤指氣使(Polumbaum, 1990; 喻國明、劉夏陽, 1993)。相反的，90年代調查顯示，60%至70%的記者反而自認享有「相當大的工作自主權」，或頗受上司同事尊重(Chen, Zhu and Wu, 1998)。這個落差如何解釋？我看，物質條件愈好，記者參與政治的熱情愈低；反正媒介不再熱衷政治改革，記者毋須硬闖紅燈，物質待遇又普遍提高，自我感覺自然良好。綜觀幾個全國記者調查報告顯示，經過市場的洗禮，記者們仍相信媒介是黨的喉舌，但宜避免洗腦式的老伎倆；記者不止替黨宣傳政策，也提供信息，但不願單純做黨的高音喇叭；他們支持新聞改革或民主，但態度高高在上，宣稱要指導輿論，教育人民，監督政府，並反對開放媒介為公共論壇；明明腐敗橫行，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他們卻口頭聲聲譴責貪污，言行不一(Lee, 2001b: 249)。

但自由主義經過幾十年的打壓，畢竟猶如一盞幽暗的燈火，只要條件許可，環境改變，它總會死灰復燃，不斷呼喚着一些知識份子和記者內心深處的理想。這種藕斷絲連的精神素質，終在九十年代市場自由化的場域下，以殘缺的媒介專業主義面目復活。它經過黨的話語武裝和包裝，既滿足記者個人的英雄浪漫情懷，又促進媒介的市場利益，一舉兩得。這種黨化的自由主義，借助於黨口號、理想、言詞掩護，在日常新聞實踐中獲得某種程度的正當性。例如胡舒立辦《財經》雙周刊，顯然受美國新聞作風的影響，敢於「耙糞」，曝露股市操縱、公司腐化的重大舞弊案，她宣稱蒼蠅老虎都打，為美國《商業周刊》稱為中國金融界「最危險的女人」(中國新聞傳播學評論, 2003)。許多調查報導的電視記者刻意模仿美國CBS廣播網的《60分鐘》節目，效法新聞英雄的事跡，重新審度受眾的興趣。市場訴求和互聯網迅速普及，有助於人們解構黨國傳媒的意識形態。

在日常的新聞實踐中，如同潘忠黨和陸曄(Pan and Lu, 2003)所指出的，媒介運用種種論述上的資源為「戰術」，來逃避、吸納、抗拒權力

中心的各種「戰略」；它們利用官方的言辭，給市場做法提供合理化的解釋。許多媒介機構互相模仿，製造賺錢的欄目，擺明打蒼蠅不打老虎。他們所憑藉的，一是市場化的媒介專業主義，二是共產黨「群眾路線」的提法，三是為民請命、憂國憂民的知識份子傳統。三套「文化資源」有意識無意識地揉合為一，分不清楚來源。質言之，我以為在當今意識形態的場景上，「新左派」對若干知識份子有吸引力，然對新聞實踐的影響甚微；自由主義的話語時隱時顯，一方面吸納一方面規避黨的話語，既合又分。媒介改革缺乏貫穿全局的思想，以致流於短視和投機，常跟着政策搖搖擺擺。前述現象借陸曄(2003)的引話來總結：「在一個集團裏把不同報紙分割，母報對上，子報對下；在一張報紙上把版面分割，一部分版面對上，另一部分版面對下。」既然「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媒介和記者須善於揣摩「政策」和「對策」的邊界；胡舒立了解「邊」在哪裏，要把握好「度」，球才「擦」得準，既為受眾所喜，也為當局所容。這種揣摩是心照不宣的，當局的框框條條再多，不可能巨細無遺形諸文字，得靠經驗把這些禁忌內化成為行動準則，耳濡目染，潛移默化，以至於習焉不察，最後習慣成自然。美國學者布里德(Breed, 1955)稱這個過程為「新聞室的社會控制」。陸曄(2003)的田野訪問顯示，「學習避開政策宣傳的雷區」是中國記者必須掌握的基本功；但當新聞理念和領導牴觸，則「沒甚麼可協調的，聽領導的」。記者總是在幾個不同的場域之間游離、談判、斟酌，既求生存，又謀發展，顯得反覆無常。

再舉調查研究和民意測驗為例，說明市場話語與政治話語的關係變化。它們在80年代初引進時，經過重重關卡刁難，最後終於定位為「群眾路線」的一部分，而不是資產階級的把戲，這才平息政治顧慮(陳崇山、弭秀玲, 1989; Womack, 1986)。儘管遭遇許多折磨，當時做民意測驗為的是奧援政治改革，而不像90年代一味謀求經濟利益。現在民意測驗公司多如雨後春筍，北京一地即近千家，都為市場需要而存在(喻國

明，1996)。廣州有很多民族品牌調查，上海外資企業和海外調查公司多。2001年4月，全國市場研究行業協會成立。調查技術愈來愈精密，毛澤東式的調查訪問幾乎絕跡。許多媒介機構(特別是中央電視台)做很多受眾調查，分析市場，先絞盡腦汁研究民眾的生活形態，看如何提高收視率以牟利，然後再想如何小心翼翼表達他們的聲音。全國最大的央視市場研究發展公司，於2001年改制為股份制合資企業，由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51%)與TNS集團(46%)擁有，調查範圍包括消費者、廣告、媒介與產品和電視傳播。然而，市場調查服務的這一切，首先是新興消費主義，不是民主的公民權。

市場化改變媒介運作<sup>13</sup> 從前在計劃經濟的指令體制下，級別至上，媒介依附行政級別，分屬於國家級、省部級、地市廳局級、縣處級、鄉鎮科級和股級。媒介負責意識形態和宣傳，90年代以前多數獲得政府的全額或部分資助。市場化以後，媒介成為「事業單位，企業管理」，1992年政府宣佈停止媒介補貼，並削減預算中撥備專款的公費訂報(隱蔽性補助)，導致各級黨政機關報銷路慘跌，<sup>14</sup>而以身份、職業為主的官方和半官方「對象報」(如《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也逐漸式微，政府部門或大型國營企業的行業/企業報遭整頓或削減。在政治上沒有分量的城市晚報和「都市報」反而在市場上一枝獨秀，發行和廣告收入均遙遙領先，而且廣告收入比發行收入愈來愈重要。

為鼓勵媒介爭取市場收入，政府允許它們自行支配部分利潤，媒介獲得更大的經濟自主權。以前，員工的報酬以基本工資為主，加上福利

13 這個單元取材自陳懷林、李金銓(1998)、〈九十年代中國報業財政改革及其影響〉，鄭宇碩編《中國評論一九九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517—546；Huailin Chen and Chin-Chuan Lee (1998), "Press Finance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in Joseph Cheng (ed.), *China Review*, 1998.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pp. 577-609.

14 1986年公費訂報占《光明日報》收入54%，《經濟日報》的61%，《工人日報》的70%，《中國青年報》的77%。這四家中央級報紙公費訂報收入達7850萬元，佔總收入的61%。

(住房、醫療)和若干「大鍋飯」的花紅，而工資的高低又取決於員工所屬報紙的行政級別(即是上面提到的六級別)以及自身的專業職稱(高級記者/編輯，主任記者/編輯，記者/編輯，和助理記者/編輯)，詳見表4-2。1994年以後，媒介的贏利能力成為決定個人收入的主因；營收好的媒介發出豐厚的獎金，基本工資無足輕重，其記者賺錢多於贏利差的媒介內資深前輩。中央和省級黨政機關報的的優勢頓然化為劣勢，照顧在職和退休員工力不從心，反而大眾報紙有能力吸引人才跳槽。

表 4-2 中國報紙的專業職稱、比例和對應工資的比較(1986 和 1993)

	高級記者/編輯	副高級記者/編輯	中級記者/編輯	助理記者/編輯
I 工資(人民幣 元)				
1986	220-350	130-240	105-130	70-105
1994	390-670	275-555	205-245	165-313
II 不同級別報紙專業職稱的比例				
中央級(如《人民日報》)	5%	25%	50%	20%
省部級(如《解放日報》)	2%	18%	50%	30%
地市級	0%	15%	45%*	40%*
縣處級	0%	0%	40%	60%

資料來源：國家人事部(1994)；中宣部(1992)。

\* 估計數。

市場的生態促使報社重組內部機構：(1)1990年之前，由於報紙背靠國家的財政補貼，編輯部門獨攬大權，總編輯是意識形態「把關人」和「靈魂」。經營方面的負責人遠離報紙決策中心，少有發言權。後來各報紛紛引進國外「三駕馬車」式的管理，在社長的領導下，總編輯和總經理平起平坐，共商大計。(2)從前全國報紙發行由郵局系統壟斷，發行費率固定為報紙售價的25%，反正是把國家的資金從一個帳戶轉到另一個帳戶而已。現在愈來愈多(包括大部分城市報紙)自辦發行，與郵局發

行渠道並存。(3)以前，同一地區或城市發行的報紙，有如同一政府機構的兩個部門，各司其職，相安無事。現在必須在同一個發行和廣告市場一爭高下，其中廣州、深圳、南京、杭州、成都等城市的競爭尤烈，甚至相互攻訐。

**媒介集團的形成** 在中國，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和中外合資企業已如雨後春筍，但新聞媒介仍是政府的禁脔。媒介集團化是怪異的現象：當局一向激烈抨擊西方報業集團為資產階級控制輿論的一種戰略形式，1996年國務院批准《廣州日報》成立全國首家報業集團，政策逆轉，官方說是要使中國的報業發展「由規模數量型向優質高效型轉移，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移」（徐光春，1997）。這句空話的實際意圖是：由盈利的「核心」報紙收編不賺錢、不聽話的小型報刊，替政府減輕財政重負，並便於行政控制。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只有實力雄厚的媒介集團才有能力同「入侵」的外資抗衡（雖然新聞媒介是不會對外資和私資開放的）。「核心」報紙自有打算，希望加大資本累積的速度和規模，並且通過接管和合併而獲利。各報利用政策「鬆綁」，發財心切，紛紛「下海」經商，甚至插足同媒介毫不相干的地產、酒店和餐飲等行業，然因經驗缺乏，決策失誤，管理不善和資金不足，多數血本無歸，唯沿海地區（尤其是上海、廣州、深圳和北京的媒介）財力雄厚，是例外。

當局似乎以為媒介集團是萬靈丹，因而希望到2010年有10%報紙的經營規模超過1億元。目前，中國媒介的廣告分配已經形成「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局面：全國媒介廣告2002年達250億元（人民幣），電視占六成（其中，中央電視台60億元，占40%），報紙占四成（其中前10家報紙合計47億元，占報紙廣告收入的42%；前30家報紙的廣告占有率達70%）（孫玉勝，2003：58）。即使中國黨政當局獨擁媒介集團，仍難解釋何以如此健忘以前對西方資本主義媒介集團的批評。組建媒介集團有一定的社會代價，當局似乎未曾深思熟慮。反正中國的政策往往靠行政命令而改變，缺乏透明度，幕後交易更鮮為人知。媒介集團的運作勢必觸



及傳統列寧主義制度的陳規陋習，有許多問題必須進一步觀察。

總之，市場化具有解放意義，卻也造成道德污染。媒介的腐化現象比80年代更深入日常生活。上面提到，黨國機器以長官意志組建了一連串的媒介集團，充分顯示權與錢奇怪的結合(Zhao, 2000b)。它們拚命爭廣告，經營和媒介毫無關係的企業(如飯店和旅遊業)，做法乖違道德倫理的標準。黎元江案可能較戲劇化，但絕非孤例：他把《廣州日報》辦成中國最早、最大、最富的報業集團，但成功帶來腐敗，終因被控侵占公款、生活失檢而遭革職。天安門鎮壓的前車之鑒，歷歷在目，識時務者避免碰政治禁忌；何況錢的確太吸引人，終使社會主義的理想靠邊站。黨國所培養的市場化競爭是癩腿的，產生各種非常殘暴扭曲的後果，始終沒有建立商業紀律、公平競爭、公民參與的規範。媒介追逐購買力，討好都市專業和商業階級，放棄了農民和工人等弱勢團體(Zhao, 1998)。

### 公共領域在哪裏？

這三個模式——儒家自由派的、毛澤東式共產極權的，和共產資本主義的——表面上水火不容，其實都以報業為工具，以追求國家富強為目的。民主政治和新聞自由的概念於1900年左右引進中國，從頭就着眼於追求國家現代化。既然民主證明不是救亡圖存的盤尼西林，可以隨便撿起，也可以隨便丟掉，難怪民主多災多難。梁啟超倡導民主在先，1903年以後突然大逆轉，改而鼓吹開明專制。五四運動激烈反傳統，提出以「德先生」、「賽先生」建立自立自強的現代國家，以掙脫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蹂躪；在西方脈絡裏，民主自由是價值理性，是基本目的，科學是手段，位階懸殊，但到中國反正都是富國強兵的工具，殊無二致。這個轉折也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具體表現。

1930年代，日本侵華期間，許多留學美英的知識界領袖(如丁文江、蔣廷黻、錢端升)原來是民主的倡導者，此時卻轉身背棄民主；像早

30年的梁啟超，他們相信中國沒有資格奢談民主，必待施行某種形式的開明專制，用西方科學和技術救國，打敗日本救了國再談民主不遲；唯胡適獨排眾議，力戰群雄，直斥其非(張忠棟，1987)。歷史忘記了毛澤東當時寫下許多力主民主抗戰的文字。他說，沒有民主，不能抗戰；有了民主，抗戰八年十年，必可擊敗日本(見笑蜀，1999)。當然，在台下，他的民主是向國民黨爭取的。上台後，他要的是「輿論一律」，接着導演了「反右」和「文革」等一連串災難。

80年代末，中國政治氣氛轉趨寬鬆，連較開明的趙紫陽都抬出「新權威主義」的盾牌，意味中國為了追求經濟成長，需拿出鐵腕維持安定的政治環境。90年代經濟掛帥，一切向錢看，為的是疏解政治改革的壓力，維繫共產黨專政；但經濟成長卻加劇貧富懸殊，變為「成長而未發展」(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的局面。「富國強兵」和「救亡圖存」，經歷滿清、民國和共產政府翻天覆地的改朝換代，喊了一百年，犧牲的總是個人主權和民主的公民權。國民黨退守台灣以後，仍歸咎大陸失敗於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其實三民主義師法的正是自由主義的「民權」和溫和社會主義(費邊社)的「民生」。而在海峽的另一邊，共產黨敵視自由主義為「反黨、反人民」，五十年如故。

今天中國的意識形態傳教士，像奇克(Check, 1994)所說的，做的是「滿大人(mandarin)的志業」：愛國者，以上對下施恩者自居，表達方式充滿父權的精英特質。但因共產主義的革命話語和市場的實用話語滋生混沌與矛盾，媒介變成意識形態抗爭與匯流的場域。在日常生活與新聞工作，媒介表現英國文化研究巨擘威廉姆斯(Williams, 1977)所說的，即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支配結構」(黨宣傳)如何同儒家(知識份子的道德)的「殘餘結構」，和自外引進市場邏輯(媒介專業主義)的「新興結構」進行動態抗爭。

「受眾」是一個不盡恰當的名詞，因為它讓人想起一群被動接受信息的人。在中國的歷史脈絡裏，受眾成為啟蒙、動員、傾銷的對象，名

義上都為國家利益；他們不是自由在公共領域參與民主對話的公民。個人是客體，不是主體；是工具，不是目標——他們只是集體目標的一部分。這三個模式當中，以儒家自由派最寬容，但證明是浮游無根，與社會基礎脫節；毛的模式說得最天花亂墜，滲透力最強，也最專制最獨裁；現在市場力量逐漸削弱「毛主義」的某些專制成份，但也製造了另一套新的問題。在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裏，消費者和公民的辯證關係永遠是知識份子辯論的焦點，從杜威到哈貝馬斯皆然(Dahlgren, 1995)。今天在中國，不管公私論述裏，這種覺悟明顯消失，取代的是90年代勃興的消費文化，並充滿排外的民族主義色彩，在全球的架構裏頗具「反自由」的味道(Huang and Lee, 2003; Lee, 2003a)。現階段，中國還處於初級資本累積，從幾十年物質禁欲一下子跳到物質崇拜，錢為老大，正義、公平和民主這些價值卻愈來愈乏人問津了。



## 九十年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媒介建構<sup>1</sup>

---

將美國形象霸權化，並將其描繪成一個企圖支配世界、企圖遏制與主宰中國的國家是絕不真實的……然而，這類報導卻不斷在中國媒介中出現，這只會在我的國家引起負面的反應。

——美國前國防部長威廉·科恩，2000年7月，北京

科恩7月份在北京不負責任地發表誤導性的言論後，美國媒介——包括《華盛頓郵報》、《今日美國》和有線新聞網絡——緊跟着發表妖魔化中國媒介的文章。鑒於美國自身陷於其中的尷尬局面，美國媒介實在應該先照照自己的鏡子，而不是忙着朝別人身上潑污水。

——英文《中國日報》，2000年7月31日

2000年7月13日，美國國防部長威廉·科恩抵達北京。這時距離美國戰機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已經過了14個月。他的訪問要恢復中美高層的接觸，尤其是軍事領域的雙邊交流，不料當天官方的英文《中國日報》頭版卻以這樣的頭條標題歡迎他：「美國是世界和平的威脅」。該報記者列舉美國近年來在全球擴張的累累「罪行」：以人道為借口軍事干預其他國家，試圖興建導彈防禦系統，阻擾中國解決台灣問題等，此外還嚴厲譴責美國不顧世界的意願追求軍事霸權。很諷刺，儘

---

1 黃煜、李金銓(2003)、〈90年代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媒體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50期，頁49-79。Yu Huang and Chin-Chuan Lee (2003), "Peddling Party Ideology for a Profit: Media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1990s," in Gary Rawnsley and Ming-yeh Rawnsley (ed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Greater China: The construction and Reflections of Reality*. London: RoutledgeCurzon, pp 41-61.

管中美政府私下表達了和解的誠意，官報的頭條報導還是彰顯了中國主流媒介對美國愛恨交織的民族主義情緒。這類報導製造劍拔弩張的氣氛，數天後科恩在北京的國防大學發表演說時特地指責這類報導不真實。等他一走，《中國日報》就在7月31日撰文反擊，歷數美國媒介如何妖魔化中國。

這是當今中國媒介把握時機炒作民族主義的寫照。自從李希光和劉康在(1996)年提出美國主流媒介「妖魔化」中國的命題以來，「妖魔化」已經成為官方和民間的強勢煽情話語，媒介不斷製造民族主義的象徵符號，並把它轉化成為暢銷的商品。1990年代，中國的主流媒介不但政治上要求安全，經濟上還要賺錢；尤其是天安門事件以後，市場化一浪高過一浪，主流媒介發現民族主義竟是賺錢的法寶，於是它們在官方允許的界線內製造議題，煽動大眾情緒，然後通過生產和兜售民族主義的產品大獲其利。引導公眾消費這一類民族主義的產品，以經濟發展為名鼓吹享樂主義，變成了媒介重要的企業行為。在與共產黨、市場和受眾的互動關係之中，主流媒介置身於類似「柏瑞托佳境」(Pareto optimality)：照理說，媒介煽動大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往往會玩火自焚，但在1990年代的中國，媒介打民族主義牌卻如在安全地帶玩火。

質言之，自從8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國市場自由化使媒介體制和經營方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黨國喉舌逐漸與市場導向的媒介共存，單一體制向雙軌制轉型，兩者經濟和政治上「各占一方，共存補缺」。原先，媒介在政治上是黨的喉舌，在經濟上由政府財政統包；現在，它們言論上還聽命於黨國，財政上卻日益自主，經營上貼近市場。媒介在黨國的保護下放心賺大錢，以至於被稱作「新世紀最後一個暴利行業」，媒介是既得利益者，根本不會去捋黨國的虎鬚(Lee, 2000a)。主流媒介包括由黨宣傳部直接控制的機關報以及市場導向的商業媒介(如發行量大的都市報，晚報等)，它們共同壟斷公共話語的資源。黨喉舌只能傳遞官方指令，但商業化媒介則多少必須反映大眾的需求和情緒。在1989年天安

門事件以後，媒介不斷尋找一些政治上安全，經濟上得利，又能吸引大眾的話題，生產輿論，製造文化消費。其中煽動民族主義和鼓吹消費主義是兩條貫穿的主線，媒介利用其特殊地位營造一種「多贏」的局面。至今甚少有文獻探討中國1990年代民族主義興起與大眾媒介的關係，本章旨在分疏這個主題。首先比較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主流媒介不同的話語建構，並從90年代的市場炒作揭示媒介與社會思潮的互動起伏，以理解媒介在後天安門時代、日愈高漲的民族主義思潮中所扮演的角色。

### 中國歷史情境中的民族主義

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一個近代的歷史現象。中國在漫長的文明史上是封建王朝統治，是一個「文明體系，而不是一個民族國家」(Duara, 1996; Pye, 1996)。民族主義發端於近代歐洲的民族國家運動，中國被迫進入一個由西方主宰的現代世界體系時，本土的民族主義運動應運而生(Levenson, 1959; Townsend, 1996)。從19世紀至20世紀中葉，隨着節節敗退與許多不平等條約的屈辱，中國產生了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思潮，其主要的訴求就是救亡圖存，強兵富國，和對抗西方帝國主義(Zhao, 2000)。如果民族主義在西方民主政治發展中是保護個體自由的一種集體訴求，在近代中國的語境裏卻成為「集體主義」或「國家主義」的代名詞，為的是集體的啟蒙和救亡，而不是爭取個人自由和權利(李澤厚，1987)。因此史華茲(Schwartz, 1994: 247)認為，民族主義在近代中國產生，「代表着現代中國文化的重大轉變」。民族主義更給共產黨抗爭國民黨帶來動員的力量(Chalmers, 1962)。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中，西方既是含有敵意的外來者，也是現代化的老師；「外來影響」一詞包含着接受與排斥的雙重含義，現代化經常是西方化的同義詞。對西方愛恨交織，決定了中國民族主義運動及現代化進程中複雜和游移的特性。

近年來學界對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看法不一(如Shambaugh, 1996; Unger, 1996; Rosen, 1997; Zheng, 1999)。懷丁(Whiting, 1995)將中國當代的

民族主義分為三類，即「肯定型」(affirmative)，「武斷型」(assertive)和「好鬥型」(aggressive)。「肯定型」突出本民族的長處和成就；「武斷型」除了肯定民族的自豪感，還加上具有競爭與敵意的「他者」；「好鬥型」則更進一步視「他者」為嚴重威脅，必須加以還擊。有學者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已經從「肯定型」發展到「武斷型」(見Segal, 1996)；有的認為199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興起，是為因應外來的挑戰，而不是甚麼預謀(Zhao, 2000; Yan, 2001)；也有人認為當局借煽動操作民族主義來重獲政治上的合法性。更有人認為近年的民族主義浪潮比以前更具侵略性，更富沙文主義(Friedman, 1997; Liu, 2000)。

以下，我們將分別敘述和分析1980年代大陸主流媒介上親西方的自由主義啟蒙運動，以及1990年代崛起的以反西方(尤其是美國)為特徵的民族主義浪潮。

## 八十年代新啟蒙運動

199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反西方，與1980年代的親西方形成了鮮明的對照。80年代是伴隨着「三個信念危機」開始的。共青團中央的《中國青年》雜誌登了潘曉的一封信，卻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集體思想危機。潘曉抱怨周遭人們自私冷漠，缺乏利他精神，他質疑黨義的合理性。編輯部在25天內收到18603封讀者來信，許多批評直指黨的宣傳灌輸，並表達對現實的失望與不滿。「三個信念危機」指信心危機、信仰危機和信任危機，是對毛澤東實踐共產主義失敗的曲折表述，反映公眾對其激進統治的幻滅。用韋伯(Weber)的話來說，它標誌着一個「世界解魅」(disenchantment)過程的開始，也意味着引進以自由主義為特徵的「新啟蒙運動」(詳見Wang, 1998；蕭功秦，2002)。

整個80年代直到89年天安門事件為止，知識份子和黨內高層的改革派官僚結成聯盟，運用媒介討論一系列公眾議題，諸如思想解放、經濟開放、政治改革、新聞自由等，並時常將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經驗作為參



照系(Lee, 2000a)。這個以改革派主導的「官方話語」和自由派為主的「精英話語」共同構造的媒介現象，在民間獲得巨大反響，其中心命題是引入西方的憲政民主制度、科學技術、文化價值，同時也激烈批判傳統文化，視其為現代化的障礙(Barme, 1999)。新啟蒙運動的思想解放使個人意識開始甦醒，1980年代中期一項頗有影響的全國調查顯示，媒介在塑造公眾意見的過程中發揮了極大的影響力，大眾與精英對現代民主價值和自由理念的在認知層面上有較強的趨同(閔崎，1989)。當時，新聞界和黨內改革派結成了鬆散的聯盟，媒介成為威力巨大的公共啟蒙論壇，加速自由思想的傳播。例如《人民日報》的胡績偉、劉賓雁、王若水，在黨內改革派支持下，積極鼓吹改革開放，迂迴鞭撻毛澤東的烏托邦理念(胡績偉，1989；王若水，1997)。另外，上海《世界經濟導報》(週報)在9年間(1980-1989)扮演新聞改革的先鋒，系統引介當代西方主流理論，為改革開放提供思想及理論資源，還大膽發起了多次推動政治改革的辯論。<sup>2</sup>

媒介在新啟蒙運動中的角色，不僅僅局限於新聞領域。不少知識份子刊物和系列叢書紛紛面世，鼓吹西方新觀念，範圍涵蓋哲學、經濟、政治、科學與文學等。代表刊物是《讀書》(1979創刊，1990年代中期以來成為新左派的旗艦)、《走向未來》(1984)、《青年論壇》(1985)、《文化：中國與世界》(1987)、《新啟蒙》(1988)、《思想家》(1988)等。此外還大量翻譯出版西方人文社科經典著作。其思想、理論、觀念廣泛傳播於各領域，知識份子的思想解放運動借助媒介日益深入人心。

2 如1988年初，就中國是否應該加快改革開放融入全球化進程的問題，《世界經濟導報》展開了一場著名的「球籍」大辯論，其主要論點是呼籲中國加快全方位開放，如不加速進行有效的包括政治層面在內的體制改革，將會喪失地球大家庭成員(「球籍」)的資格。它的自由色彩鮮明，89年北京民主運動期間被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下令封閉。

中央電視台1988年播放六集電視紀錄片《河殤》(蘇曉康等, 1988), 一周內收到3000多封來函, 報章和電台的討論更是鋪天蓋地, 社會反響熱度及公眾討論的廣度大出人們的意料。這是80年代新啟蒙運動中的高潮。這部片集借古諷今, 批判兩千年中國的專制統治, 強調全方位對外開放, 引進西方的海洋文明來改造古老的黃河文明。1989年官方把它和《世界經濟導報》並列為「六四反革命暴亂」的樣板。

簡言之, 80年代的自由主義思潮和親西方的話語傳播, 是對毛澤東烏托邦激進教義的幻滅和反動。它的產生和發展與四個因素相關: (1)80年代初開始了相對成功的市場經濟改革; (2)舊的共產主義思想與話語在文革後喪失了意識形態的合法性, 民主自由理念逐步成為新的思想資源; (3)媒介與改革派官僚集團及知識份子結成聯盟, 積極充當社會變革的代言人; (4)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對實現現代化目標和手段有相當程度的共識。但1989年天安門六四鎮壓挫折了自由主義發展的勢頭。

### 天安門事件後的官方民族主義話語

天安門事件是中國新啟蒙運動劇變的轉折點, 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親西方力量與保守力量的一場大攤牌。政治精英們在80年代對民主化和政治改革的浪漫期望, 以及啟蒙運動倡導的自由民主理念, 在六四鎮壓後顯得不合時宜, 不少人由推動政治改革轉向追求物質財富。當局意識到鎮壓行動徹底毀掉了共產黨統治最後的、傳統的合法性基礎。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 新的領導集團除了大力推動經濟自由化, 更企圖抓住民族主義的話語, 改以「愛國主義」在媒介宣傳包裝, 以重建合法性。黃亞生(Huang, 1995: 57)指出: 「當局在天安門時期以後熱情擁抱民族主義, 將其視為合法性的源泉。這個戰略看來已經奏效, 從日益高漲的大眾反美情緒中得到證明。」

如前所述, 六四鎮壓後, 共產黨急需物色文人新貴, 建構民族主義的話語想像。90年, 它發動龐大的宣傳機器, 捧出一位原本藉藉無名的

「學者明星」——何新，由他建構愛國主義和反西方的言說。何新是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在天安門事件後迅速成為官方寵兒，發起一場他稱之為「捍衛中國國家利益」的戰役。他嚴厲譴責80年代的新啟蒙主義運動，認為傳播政治改革和民主自由的思想會顛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他及時為當局辯護：只有鎮壓天安門事件，才能維護社會的穩定。官方把天安門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何新把對天安門事件的血腥鎮壓升級為維護中華民族長遠利益、捍衛中國選擇發展道路的合法權利之鬥爭(何新，1991，1996)。何新這一套「新穎」的敘述和解釋，為陷入內外交困的當局提供了救命稻草。為此，《人民日報》1990年12月11日破天荒發表「何新與日本經濟學者教授S的談話錄」，由何新單方面編撰，未經對方認可。全文近二萬字，題為〈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在談話錄的前面，《人民日報》加了一篇八百字的「編者按」，盛讚何新堅定的「愛國主義立場」。官方稱何新的文章「在國內外引起了巨大反響，在讀者中產生了大面積的、多層次的、長時間的『轟動效應』」，又說該文引起的讀者來信之熱烈踴躍，是《人民日報》編者「辦報20多年沒有見到過的現象」(孫永仁，1991)。至此，民族主義受到官方青睞，是天安門事件後維護一黨專制和社會穩定的思想資源。當然，出於策略的考慮，官方媒介稱之為「愛國主義」。有些新一代民族主義者甚至將何新定位成當代新愛國主義的理論教父，因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最有影響的愛國主義思想無不延着(何新的)這一思路生發」(房寧，王炳權、馬利軍等，2002：87)。

1991年9月，一群中共高層子女為主(被稱為「太子黨」)的新保守派炮製了另一個准官方版本的民族主義話語。他們在流傳深廣的一個綱領文件中提出：中共要在後冷戰不利的世界格局中生存和發展，對抗西方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之策略，必須改用民族主義作為政治統合的法理基礎，因為，「新時代的國際形勢演變，已經將階級鬥爭的表現形式從國內轉化為國際間民族國家的利益衝突」(《中國青年報》理論部，

1991年9月9日)。

為了挽回民眾中的形象，當局運用媒介發起聲勢浩大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向青少年進行「國情教育」。上任不久的黨總書記江澤民親自上陣，他要求媒介讓年輕人明白，只有共產黨才能代表中華民族的利益，才可令中國強盛繁榮。江還指定一系列愛國主義宣傳材料列入中學和大學的政治課程(Barme, 1999)。黨中央最高理論刊物《求是》社論說：「愛國主義具有特殊的歷史性，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具有不同的內涵。今天，如果我們要成為一位愛國者，我們應當熱愛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新中國。鄧小平同志在1981年的一次講話中指出：有人說不愛社會主義並不同不愛祖國，難道祖國是一個抽象概念？假如你不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你還能愛甚麼呢？」(《求是》，1990：9，8—9)。

通過這一系列媒介操控，官方艱難地轉化政治話語：由毛澤東時代的「烏托邦」激進理想，到80年代啟蒙解放，到「六四」後以「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為主軸的實用主義話語，強調法統和經濟改革績效。中共當局通過媒介的輿論導向和話語建構，將自己塑造成中華民族福祉的化身，中共統治由「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變成了帶領中國人民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的愛國主義。因此，白魯恂(Pye, 1996: 106)指出，當時在中國如果公民批評或挑戰當局的制度方針，就會被指責為不愛國，並受到懲罰。

## 九十年代反西方的中國民族主義興起

經過媒介系統地宣傳，愛國主義的官方話語開始注入大眾意識。1993年，北京競逐2000年奧運會主辦權敗北，官方愛國主義話語和民間民族主義情緒開始匯流。官方媒介以「給中國一個機會」為口號，把這件事解釋成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聯手反對中國(宋強，張藏藏，喬邊，1996；Yan, 2001: 36)。一位北京律師說：「從這刻起，中國人開始相信

是美國在遏制中國」(Chanda and Huus, 1995: 20)。

天安門鎮壓以後，中國發動「反西方和平演變」宣傳，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及其主流媒介和北京當局尖銳對立。中國當局不斷聲稱只有它能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西方主流媒介本來就較關注中國政治與社會的陰暗面，如人權、異見份子、西藏問題和宗教自由等，並常黑白分明，簡單劃分「我們對他們」，對中國民眾的民族情緒推波助瀾。一些新聞被視為對抗中國、侮辱中國人，例如NBC體育節目主持人寇斯達(Bob Costas)在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開幕式時，暗示中國運動員成績好是靠定期服興奮藥；例如台灣總統李登輝1995年訪問美國，台灣1996年首次全民總統選舉；例如美國國會每年辯論要不要給中國最惠國待遇，成為定期嚴批中國人權紀錄的論壇。

西方一些學者和記者在90年代中期出版《中國覺醒》(*China Wakes*) (Kristof and WuDunn, 1994)、《圍堵中國》(*Containing China*)(Rachman, 1996)和《即將到來同中國的衝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Bernstein and Munro, 1997)等書，中國媒介引之為西方敵視中國、阻止中國強大的明證。民族主義本已騷動不安，現在又夾雜反美情緒。1995年7月14日共青團機關報《中國青年報》公布「中國青年眼中的世界」的調查結果，87.1%的回應者認為「美國是最敵視中國的國家」，81.6%以電視為了解美國的主要渠道，76.1%靠報紙，25.5%靠「朋友介紹」。仇美意識固然和官方媒介宣傳美國是八九民運幕後黑手有關，更與90年代初期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與中國當局敵對有關。國際關係學者閻學通(Yan, 2001: 36)指出：中國人民開始相信美國不願見到中國強大，不斷打壓中國，以便繼續支配世界。

與此同時，有影響的刊物開始討論民族主義與當今中國的問題。一些極煽動蠱惑的文章回響熱烈，民間的民族主義情感不斷升溫，並獲得知識精英的支持。許多討論言詞激烈，批評嚴厲，不僅着眼於民族主義，還涉及當代西方激進時髦的學術思想及後學話語。其中，《戰略與

管理》、《讀書》、《天涯》、《國學》、《開放時代》、《東方》、《中國文化與學術》、《視界》是他們主要的平台。它們的湧現迎合新左派冒升的需要，知識精英普及民族主義思潮，也反過來增加其大眾基礎和正當性。《讀書》雜誌主編汪暉指出：「中國的現代民族主義從一開始便具有世界主義或國際主義的特點」（汪暉，2000：11）。

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之火愈燒愈旺。1996年，一群年輕大學生撰述《中國可以說不》，由學者和記者寫《妖魔化中國的背後》，都成為轟動一時的媒介暢銷書，成為反美宣言的代表作，我們將在稍後討論它們的論點。此外，香港回歸是媒介精心設計的另一齣大戲，通過舉國狂歡的場景，宣揚民族主義的預設主題，反覆歌誦中共領導下的「光榮成就」（Lee et al., 2002）。

總之，中國媒介在整個90年代建構的民族主義愈來愈煽動，愈激情，主導話題總是反西方、反美國。這股思潮始於90年代早期，至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2001年中美軍機在南中國海相撞時達到沸點。其間，民粹式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狂熱認同愛國主義，主流媒介獲得議題設置的主動權，也贏得了巨大的商機。他們不僅僅是黨的喉舌，還為自身的利益充分塑造輿論。政治需要結合市場邏輯，提倡消費文化，造就了媒介生產民族主義的有利條件。

## 當前中國民族主義的代表論述和主張

90年代中國流行的民族主義主要有三套話語：愛國主義的官方話語，民粹式民族主義的民間話語，以及聲稱抵抗西方霸權的新左派知識精英話語。在操作上，主流媒介的民族主義立場和話語容或不同，卻都沒有逾越當局可以容忍的範圍。有關論述的主題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種：

### 逆向種族主義

所謂逆向種族主義，是要把80年代中國知識界崇洋媚外、自我貶低

的情緒「反過來」。王小東是北京大學數學系學生，曾留學日本，他1996年在香港《明報月刊》用筆名石鐘提出：美國以「糾正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的政策給弱勢少數民族特殊的利益和機會，以補償他們在歷史上遭受的歧視；但有白人抗議這個政策是「逆向種族歧視」(reverse racial discrimination)，讓他們的利益平白受損。移植到中國的情境中，他認為80年代中國主流知識界，以電視片集《河殤》為典型，表現「逆向種族主義」的情緒，自卑感使他們動不動看中國人為低級族類(Shi, 1997；王小東，1999)。他認為，90年代興起的民族主義是80年代「逆向種族主義」的正態回歸。王小東被一些青年當作民間的民族主義的發言人。但他強調中國必須實現民主化和政治改革，倒是其他鼓吹大眾民族主義者所罕見的。

「中國可以說不」系列

「逆向種族主義」僅是刺激大眾民族主義情緒的前奏曲，「中國可以說不」系列與「美國媒介妖魔化中國」系列則代表了主旋律。1996年，宋強、張藏藏、喬邊等數位年輕人出版了一本書，題為《中國可以說不：後冷戰時代的政治與感性的選擇》，結集報刊文章，分頭編撰極端的民族主義煽情話語。該書出版時，作者無一人訪問過西方國家，更遑論有在美國生活的經驗。

《中國可以說不》及其續篇《中國還是能說不》(宋強等，1996)、《中國為甚麼說不》(彭光謙等，1996)、《中國何以說不》(張學禮，1996)等系列，掀起了一場大眾民族主義的煽情高潮。這些充滿反美情緒和沙文主義的敘述，引發了廣泛的媒介討論，煽發年輕人建構民族主義的想像空間。這些暢銷書籍讓出版商、作者和乘勢炒作的媒體獲得可觀的商業利潤。據報導，《中國可以說不》在一個月內就賣出25萬冊「合法」的版本(Li, 1997: 159)，還不計數量不詳的盜版本。新華社破例在書剛面世時就發布全國通稿，上海的《文匯報》

隨後在一篇報導盛讚此書表現了「年輕一代的勇氣及愛國主義精神」（《文匯報》，6月26日）。

說「不」系列使用「『我們』對抗『他們』」的二分法論述，主題簡單又煽情。它說，美國為首的西方強權企圖挑起一場新冷戰，把中國當作首要敵手，遏制它的日漸強大；中國必須不惜一切對美國大聲說「不」，並隨時準備和美國打一場全面戰爭（宋強等，1996）。《中國可以說不》描繪美國為道德墮落、邪惡張狂、仗勢欺人、恐嚇征服他國的惡棍。它抓住美國國內的種族主義、暴力、罪行、性騷擾等問題，詰問：「這樣的國家怎麼可以教訓別人？」美國是「討厭而又徒勞」，「可鄙而又可憐」，「不知未來走向」的霸權帝國（頁230）。作者聲稱，21世紀將是中國世紀，中國將是世界和平與進步的源泉，中華文化及其價值將對未來的人類文明影響極大。全書敘述宣洩「蒼天已死，黃天當立」、「不要忌言準備打戰」等民族情緒，一時間在青年中風行。

#### 「美國媒介妖魔化中國」系列

1996年年底出版的《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及其續集（李希光、劉康等，1996；李希光，1998；李希光、劉康，1999），比《中國可以說不》系列更挑動、刺激公眾民族主義的情緒和想像。特別是「妖魔化」系列作者的經歷顯赫，或在主流媒介工作，或在美國大學教學研究，加上敘述技巧嫻熟，更容易轉移公眾的注意力，隨着他們的引導，將眼光從泛泛的反西方造勢集中到攻擊《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等美國主流媒介如何意醜化中國。「妖魔化中國」（demonizing China）一詞不脛而走。他們認為，美國新聞界妖魔化中國，是為美國反華全球戰略而服務；中國近年在國際上聲名狼藉，要怪美國媒介的蓄意妖魔化。作者將共產黨當局和國家民族等同，其實西方媒介批判天安門事件以後的專制統治，未必就是反華反人民。作者無視於共產黨控制媒介和壓縮言論，避而不談政權反民主的本質。



1997-1999年間，作者們圍繞「妖魔化」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和書籍，包括《中國有多壞？》(李希光，1998)，《妖魔化與媒介轟炸》(李希光、劉康等，1999)，《讚賞與遺憾：我看美國媒介》(熊蕾，2000)等。他們認為，美國妖魔化中國是出於美國記者的意識形態，是盎格魯撒克遜白人資產階級狹隘的優越感。他們開列一張表格，說明美國妖魔化中國可以得到甚麼好處：破壞中美關係，嚇走到中國的投資者，轉移世界對美國霸權與擴張的注意力，加強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及反華聯盟，使中國「南斯拉夫化」，最終搞垮中國等等。他們還列出美國媒介妖魔化中國的手段，即以「人權」攻擊中國，塑造中國為敵人，使用虛假消息、捏造事實、玩弄損人利己的語言遊戲，操控新聞資源進行媒介轟炸等等。「說不」系列用民粹話語鼓動中國青年對抗美國，而「妖魔化中國」系列則以新聞專業術語和學術辭匯包裝，罔顧大眾憤怒情緒的內因，一味歸咎於美國主流媒介「妖魔化」。

### 「新左派」建構抵抗西方話語霸權論<sup>3</sup>

廣義而言，中國大陸90年代民族主義的復活，與新左派知識精英的崛起同步。新左派精英份子為大眾民族主義奠定理論基礎，而民族主義思潮則通過新左派反對資本全球化的運動而具體化。

90年代中以來，新左派在大陸思想界嶄露頭角，日趨活躍。新左派是相對於大陸語境的「老左派」而言。「老左派」通常指80年代一群捍衛中共正統意識形態的黨官僚，首腦人物為胡喬木和鄧力群。他們把黨內改革派知識份子紛紛掃地出門，不料自己卻在90年代的權力洗盤後靠邊站。新左派主要是一群學者、作家、知識份子等思想文化精英，沿襲反西方霸權的「抵抗話語」，在中國推進反國際資本全球化的運動。他們大多受過人文社科訓練，不少在美國著名學府取得博士學位後任教。

3 參見本書第三章及第十四章的討論。

他們聲稱站在社會公義立場，批判中國大陸自由派所鼓吹的市場經濟和議會民主的理念，其代表人物甘陽自稱為「自由左派」(Gan, 1998, 甘陽, 2000)。

他們最關注媒介的再現(representation)與文化身份認同的問題。他們宣稱，中國知識精英缺乏一套理念和構架去抗衡西方支配性的話語。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的張寬(1995)指出：有時候我們完全失去了抗衡西方霸權主義與殖民主義話語的勇氣，每當與西方國家談判人權、開放市場、知識產權時，就顯得非常被動，因為我們缺乏擺脫西方框架的話語方式。然而中國新左派所建立的批評話語和論述，其所用的理論資源正是西方的。他們從西方左翼批評理論和話語中汲納理論資源，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文化多元主義、後殖民主義，以至於女權主義等。但一如薩伊德所批評的，他們將特定時空意義的前衛理論極不恰當地轉變，供其「在新時代、新地點採用的新方法、新立場」(Said, 1983: 227)。

新左派認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主要問題已不是改造專制列寧主義國家機器，而是反抗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資本擴張和市場霸權。因此，他們把當代中國的現實問題視為歐美社會的既存問題來批判，認為中國利益和西方是根本衝突的。據此，新左派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是抗衡全球資本化的國際抵抗運動的組成部分(汪暉, 2000)，支持方興未艾的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也就成了新左派的根本戰略。他們並企圖重建「烏托邦」的中國社會，實行「平等的自由，全面的民主」(香港《信報》，2000：15)。一些激進的成員甚至提出，只要適當地修正，毛澤東的大躍進、甚至文化大革命都是制度創新、解決中國難題的良方(崔之元，1994，1996)。蕭功秦(2002)認為，新左派從批判資本主義全球化，提出社會正義與平等的價值訴求，具有自封的「底層」平民意識、反精英主義的民粹主義傾向，與強烈的道德優越感和反西方情緒。

但中國新左派終究不能迴避中共一黨統治的本質，不能一味把黨國看作抗衡披着民主、自由、法治、人權外衣的美國霸權之聖徒，也不能無限上綱地詛咒美國和西方媒介對中國的批評。在這個意義上，新左派的立場看似激進，實則保守，因為它受制於黨國所規限的文化市場和政治話語中，充分反映了天安門事件以後大陸所謂的激進批判力量的困境和無奈。

### 超限戰

超限戰鼓吹軍事較量和戰爭立竿見影的效果，這個賣點比以上各種民族主義更精彩、冷酷及富有想像力。1999年市場上出現《超限戰：對全球化時代戰爭與戰法的想定》一書，兩位作者均為空軍大校，鼓吹超級戰爭不受任何現存戰爭打法的約束，也無需考慮任何國際公約。他們認為，中國目前軍力不夠強大，要在未來的戰爭中打敗美國，必須研究「超限戰」，「這是一種可以超越實力局限和制約的戰爭方式，因此，它對處於強勢和弱勢的國家都具有同樣的價值和意義」（喬良、王湘穗，1999：255）。書中的一張流程圖總結了24種驚人的超限戰戰術，例如恐怖戰、網絡戰、金融戰、毒品戰、生態戰。作者認為，在常規意義上不道德的方式和武器，只要有助中國擊敗美國，就是正義的；美國有最先進的軍事力量，中國不可能打常規戰，只能在未來打「超限戰」制勝。

此書指出未來戰爭是無疆界的、無節制的、不分平民或軍人，是全方位的。此書出版立即暢銷，在短短的一年間再版七次，銷量高達七萬冊，創下了近年同類書籍的紀錄。作者之一喬良表示，有120位將軍向他索取此書，一位空軍副司令員要求軍中高級將領研讀此書。美國軍方於1999年夏組織了二十多人用兩個月時間將之翻成英文，西點軍校將它列於參考書目中，而美國國防部則將此書配發給高級將領（《亞洲周刊》，2000年10月12日；香港《文匯報》，2001年10月15日，頁C1）。

## 媒介炒作的民族主義產品特點分析

政治需要加上商業誘因，使媒介大肆生產民族主義的產品。1996年至2000年間，中國報刊雜誌發表了大批這類文章，出版商則紛紛推出鼓吹民族主義的暢銷書，如《中美軍事衝突前前後後》(洪永宏，1996)、《中美較量大寫真》(陳峰等，1996)、《與美國對抗》(吳一夫等，1997)、《傾聽中國：新冷戰與未來謀略》(何德功等，1997)、《中國九次說不》(李健，1999)、《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與改革陷阱》(楊斌，2000)、《人類的希望在中國》(瞿湘，2000)、《穿越臺灣海峽的中美較量》(宋連生，鞏小華，2001)、《何處是「美利堅帝國」的邊界》(張海濤，2002)等。它們大致有以下的特點：

第一，論述都建立於「我們」對抗「他們」的武斷型框架，抓住對方痛腳(美國的超級霸主地位，天安門事件以來中美關係的摩擦起伏)嚴厲譴責。它們聲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企圖以武力遏阻上升中的中國(例如95年李登輝訪問美國觸發台灣海峽危機，美國派出兩艘航空母艦進入台海干涉)，對中國進行政治顛覆(支持不同政見者、西藏獨立運動、法輪功，以及每年一度譴責中國人權狀況)、文化滲透及媒介妖魔化中國。

第二，缺乏學術的嚴謹(新左派的學術報告除外)，敘述語言情緒化，混雜憎恨、懼外或侵略性心態，有時甚至病態或歇斯底里。如在「說不」一書中，到處可見「賤胚」、「報復」、「打仗」、「完蛋」、「不許放屁」等詞語。許多敘述充滿煽情，混雜自滿、自怨、虛無，競用極端的文字激發眾怨。這種文風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大批判」極為相似。誇大、歪曲、誤導、錯謬層出不窮，有些甚至故意運用敘述技巧誤導公眾。多數中國人不能閱讀英文，操控翻譯語言可以產生很大的說服效果。

第三，除了少數新左派的學術論文，它們沒有從社會科學角度去收

集系統資料，沒有根據紮實的經驗分析或嚴肅的研究方法。它們先採取對抗性的立場，再選擇片面的軼事證明其觀點。不少作者甚至引用自己的經歷來反美，或反映他們在西方生活的挫折經歷。「說不」的作者之一宋強(1999：134)公開承認，寫此書不是真正為了向美國「說不」，而是為了勸說女友不要到美國深造；結果對美國說不，既留住女友，又名利雙收。

第四，追求商業利益，題目、內容與風格雷同，大都是煽情文章的彙編，製作馬虎粗糙。例如1996年的幾個月內，他們趁市場熱推出一堆「說不」的書籍：「還是說不」、「就是說不」、「如何說不」、「不僅說不」、「為甚麼說不」等等。1996年，「說不」一個月銷出25萬冊後，續篇在北京以外地區印了40萬冊合法版本，盜印本不計在內；「妖魔化」一書首版四萬冊，一個月內銷售一空。其他同類書籍因為讀者嫌它們太粗糙，嘩眾取寵，沒有這麼暢銷。商業指數成了多數出版者與新聞界的首要考慮。媒介不僅操控公眾輿論，獲可觀利潤，更不必擔心犯政治錯誤。這是大陸主流媒介在後天安門時期生存致富的法寶，即是前述的「柏瑞托佳境」的具體運作。

### 民族主義的四種媒介敘述模式

民族主義思潮崛起，這是90年代中國政治生活的重要現象，其間媒介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通過民族主義的話語建構和議題操控，主流媒介與國家的關係發生深刻的互動。概言之，媒介建構民族主義話語的模式有四(表5-1)：

表 5-1 媒介論述下的中國民族主義四種類型

類型	肯定型*	武斷型*	好鬥型*	理性/批判型
媒介框架/ 核心內容	只有共產黨才能 代表中國利益， 國家尊嚴	中國與西方抗 衡，中國百年屈 辱	美國是主要敵人 (美國圍堵崛起 的中國)	呼籲政治改 革，民主強國
議題設置 策略/情形	按黨的宣傳方針 和策略設置	黨的宣傳策略加 部分自主安排	商業主導，自主 安排為主	替代性，走政 治邊緣路線(打 擦邊球)
主要特點	和黨的路線保持 一致	在官方設定的話 語空間中盡力拓 展	在商業/市民空 間和官方話語空 間游移	倡導理性的民 族主義
訴求主題	官方版本的民族 主義，即「愛國 主義」	官方主導下的民 族主義	民粹式民族主義	理性民族主義
例證 媒介主導的宣 傳戰役	愛國主義教育香 港/澳門回歸申 辦2000及2008年 奧運	中國駐南斯拉夫 使館被炸之報 導，中美軍機相 撞之導，《環球 時報》	「中國可以說不」 系列，「美國媒 介妖魔化中國」 系列	《南方週末》 《開放時代》 一些網上論 壇，如「問題 與主義」
論述特點與 話語的採用	動員和宣傳型官 方話語體系	迎合大眾激情和 煽情混合型， 民間與精英話語 混合	好鬥的， 聳人聽聞， 煽動型， 民間與精英話語 混合	知識份子精英 話語， 分析與批判的
官方的態度	全力占據主流輿 論空間大力推銷	贊同，支持	某種程度的合 謀，收編及利用 和認可	對立的， 監視和警覺， 必要時鎮壓

\*注：關於術語「肯定型」(affirmative)、「武斷型」(assertive)和「好鬥型」(aggressive)的定義及論述，請參看懷丁(Whiting, 1995)。

第一種宣傳模式，遵循官方旨意，以「愛國主義」為核心。媒介奉命提醒人民莫忘帝國主義一個世紀以來欺侮中國人民，並大力宣傳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成績輝煌。港澳回歸，中國運動員在奧運會獲佳績，都是典型例證。這是「肯定型」的民族主義，媒介跟官方的主旋律話語

翩翩起舞，獲得巨大的經濟回報與社會影響。

第二種比較符合「武斷型」模式。媒介與黨的路線保持一致，但如果於己有利，它們會根據需要，將單調的消息處理得武斷煽情。例如1999年5月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人民日報》附屬的《環球時報》大量煽情報導，一時銷量急升，吸引其他媒介紛紛模仿。沈大偉(Shambaugh, 1996: 205)說，這樣的報導「形式上雖然是武斷的，本質上還是反應性的」。媒介出於商業需要，盡量利用黨所容忍的底線迎合公眾情緒。媒介在黨設定的基調加上自己的議題，增加戲劇性，引人注目。

第三種是屬於「好鬥型」的模式。媒介從新左派精英中獲得靈感與理論資源，抓住民眾的怨情，以好鬥的姿態攪活民族主義的議題。這種模式的媒介不必時時緊跟黨的路線，只要在黨設定的「愛國主義」界線內外設置議題。例如媒介為了圖利推出「說不」系列，儘管當局想與美國修好，宣傳部門不願見到它們大張旗鼓在市場流通，但面對公眾反美情緒和媒介炒作，政府只能認可。媒介訴諸公眾情感，追求商業利潤，一舉兩得。中國媒介小報化，更適應了這個模式的需要，前述的英文《中國日報》和美國國防部長的罵戰就是一個佐證。媒介採用這種策略，在市場與黨的底線之間轉換；當局默許媒介存在，雙方在民族主義話語上有共通點，各取所需。第二種和第三種模式保護自己，反抗外來侵略與欺凌，是媒介構建大眾民族主義話語的動力，其中以「中國可以說不」與「妖魔化中國」為典型代表。

第四種可稱為「理性民族主義型」。無庸置疑，這個模式提倡民族自強，但呼籲當局進行政治改革，或質疑黨專政統治的合法性。因此，主張理性民族主義成為鼓吹政治改革的間接方法。可想而知，這種策略對黨國體制有潛在的顛覆效果，目前僅處於邊緣地帶。廣州出版的《開放時代》、《南方週末》及其他幾類刊物艱難地走這條道路。一些互聯網上的自由論壇則是另一個主要載體。

這些模式的關係如何？第一至第三種為主流媒介廣泛採用，以製造與銷售民族主義的盈利產品，策略有效安全。第二、三種策略是媒介發起的，並與部分新左派精英聯盟，具有大眾性和煽動性。第四種模式對黨國的話語有顛覆性，不屬於主流民族主義的話語範疇，而且常遭當局週期性的打壓；例如2000年當局勒令湖南《書屋》停刊整頓(因發表何清漣分析大陸社會總體結構演變的文章得罪當局)，次年又全面撤換《南方週末》編輯部管理層(作為鼓吹民主自由理念的重鎮，屢屢挑戰當局的言論底線，已經數度撤換主編)。

## 結 論

中國的民族主義興起於90年代，這股大眾思潮是媒介與社會在特定的誘因互動下產生的，與80年代親西方啟蒙運動背道而馳。傳統馬列主義教義已經失去公眾，而政治改革路向又被天安門事件粉碎，民族主義填補意識形態真空，為當局建造統治合法性。媒介反映、塑造公眾輿論的影響愈來愈大，經濟自由化結合媒介的發展空間和商業利益，主流媒介在向黨負責的前提下，拼命迎合受眾及市場競爭。主流媒介的市場自主性提高，增加選題的議價能力。它們採用民族主義的話語框架和議題建構，滿足各種複雜的需要，也回應90年代中國和西方一系列衝突。媒介採用了眾多策略和模式，表現形式及內涵也各有不同。

主流媒介已經找到一個既有商業吸引力，又得到黨和公眾認同的民族主義主題。當然，這種民族主義並不是同質性的，官方的版本是愛國主義，而民間版本則較為混雜，包括反西方的、支持民族復興的、地域認同的，甚至顛覆反叛的。恩格(Unger, 1996)指出，這種民族主義包含開放的樂觀主義和仇外情緒。中國正在迅速醞釀都市中產階級，雖然貧富懸殊加劇，卻為媒介提供了龐大的消費市場。這個市場反過來推動媒介的進一步商業化，愈來愈向民粹主義發展。特別是「小報化」(tabloidization)迎合受眾對煽情新聞的需求，從而操控大眾情緒，影響社



會主流輿論的形成。但在中國，媒介仍有明確的禁區，不能鼓吹政治改革或直接挑戰一黨專制；如果當局急於和美國合作或推行多邊外交，媒介必須在輿論上配合對外宣傳。傳播革命已經帶來若干內容變化，互聯網促進資訊自由流通，對中國大陸今後的社會演變有着重要影響。

近年來主流媒介仍限在當局允許的範圍內。在政治權力、市場誘因和媒介運作的關係中，黨將繼續視媒介為宣傳愛國主義的工具；公眾情緒起伏不斷時，媒介則可從中獲取商業利益；另外，公眾認同國家民族身份和愛國情感，在複雜多元的話語建構中，媒介有很大的空間發揮民族主義。

「九一一」恐怖襲擊後，世界局勢丕變，中國當局希望藉反恐統一戰線和美國發展合作關係，故開始壓制民粹式民族主義，主流媒介製造民族主義的議題(尤其是反美的話語)也跟着收斂，但長遠的發展趨勢還有待觀察，本文僅對90年代的情況作一初步疏理。此外，自1999年人民網上的「強國論壇」在塑造民間輿論、尤其是民族主義議題上，扮演着不可忽視的角色，那不是本文所能涵蓋的了。



## 建制內的多元主義

美國精英媒介對華政策的論述<sup>1</sup>

---

埃及學是埃及學，不是埃及。

——薩伊德(Said, 1993: 117)論歌劇《阿依達》

贏得冷戰使美國自信滿滿，正如哈佛大學教授納伊(Nye, 1990)所說的，「注定要領導」全世界。美國重建冷戰後的國際新秩序，充滿了「濃烈的自得，無保留的勝利意識，和宣告莊嚴的使命」(Said, 1993: xvii)。冷戰期間中美聯合對抗蘇聯的戰略聯盟崩解了，中國變成了美國建立國際新秩序的首要障礙。美國朝野對殘暴的天安門事件始終憤怒不休，中國則懷疑美國針對它搞「和平演變」。中國國家民族主義高漲，它的經濟和軍事成長不但沒有贏得國際承認，反而引起亞洲乃至舉世的關切。90年代期間，美國這邊出現了許多學術與通俗的論著，從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到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芒羅(Ross Munro)充滿敵意的《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中國那邊則出現了《中國可以說不》和《妖魔化中國的背後》等歇斯底里的反美言論，雙方劍拔弩張，

---

<sup>1</sup> 原載於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2002年2月號，第69期，頁71—82。任曉雯譯。Chin-Chuan Lee (2002a), "Established Pluralism: U.S. Elite Media Discourse on the China Policy," *Journalism Studies*, 3, 3: 383-397, 並收入 Chin-Chuan Lee (ed.) (2003),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pp 76-96。

構成了90年代媒介論述的背景。本章分析1990-2000年這11年裏《紐約時報》社論和專欄對中美關係的論述，來闡述我所謂精英媒介「建制內的多元主義」(established pluralism)。

## 處理民主和資本的緊張關係

美國的外交政策從來就是理想主義、道德主義、現實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混合體。由於它在國外沒有領土的野心，只追求政經和文化利益，所以常自覺與眾不同，不是甚麼帝國主義者。在冷戰期間，美國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是反共，其次是以現代化為名推廣資本主義的民主；一方面支援右派專制政權，一方面在勢力範圍內推行民主制度。美國自命為自由世界的領袖與西方文明的監護者，忙着「在全世界到處矯枉為正，緝拿獨裁者，保護自由，任何地方任何代價在所不惜」(Said, 1993: xvii)。美國在東西冷戰中猛烈對抗共產陣營，卻敵視南北半球的貧富衝突，因為窮國認為美國是全球經濟和資訊失衡的罪魁禍首。

每個國家都必須建構一個「他者」，才能安頓「我們」。美國國內的進步聲音，碰到國際事務，每每變得冷漠。美國主流媒介大肆渲染共黨政權蹂躪人權，對其盟國的人權暴行為卻輕描淡寫(Herman and Chomsky, 1988)。媒介對華報導始終徘徊於浪漫與懷疑的兩極之間，既反映了中國和美國發生甚麼，更是兩國關係起起伏伏的寫照(Lee, 1990)。以反共起家的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80年代中訪華歸來，宣稱中共是好的共產黨，蘇共是壞的共產黨；為了戰略需要，美國採取雙重的人權標準，嚴以責蘇聯，寬以待中國。沃麥克(Womack, 1990: 239)指出，中國80年代發生種種變化，美國人沾沾自得，以為這是資本主義的勝利和共產主義的破產；天安門事件又讓他們發現中國沒有變，於是他們駝鳥式地印證了共產主義的極權本質。及至90年代，冷戰結束，天安門事件餘波蕩漾，美國媒介的焦點轉移到中國的人權問題上面。

美國外交政策的兩轡是民主與資本主義，經常攜手同進，有時卻步

伐不一。美國以商立國，在冷戰結束後推動的國際秩序，企圖用鬆綁的政策、自由貿易和新傳播科技來營造單一的市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證明了「貿易即政治」的道理。美國想在中國占領市場，又想在政治上改變中國，兩套目標未必完全契合。中美關係的癥結在於：美國推銷資本主義民主給中國的過程中，如何處理民主(人權)與資本(貿易)的緊張關係。精英媒介對此目標一致，方法分歧。

美國總統在外交政策的權威是無可匹敵的。張讚國的研究發現，為美國精英報紙設立對華政策的議題的，主要是總統，其次是親信幕僚和主要閣員，國會瞠乎其後(Chang, 1990)。每當精英的共識一致，媒介不是唱好政策，就是唱衰敵人。萬一共識破裂，議題進入「合法爭議區」，媒介乃如實報導精英團體、建制機構之間的矛盾與衝突，甚至向既定的政策挑戰(Hallin, 1986a)。權力結構是現實的第一建構者，媒介才是第二個建構者。但媒介並非無足輕重，它們不斷報導精英失和、政策錯誤或各種醜聞，總統可能逼處守勢，許多政策因此窒礙難行。克林頓(William Clinton)抱怨《紐約時報》老批評他。派特森(Patterson, 2000)惋惜美國媒介刻意攻擊政治人物，使之失去公信，難以有效統治。綜上所述，難怪每個總統都要雇一大批公關專家，定期展開媒介和民意攻勢。話說回來，媒介再怎麼攻擊白宮主人，對美國制度和基本利益畢竟維護得不遺餘力。

## 建制內的多元主義

在美國的精英媒介中，《紐約時報》具有神話般的聲望，號稱是「政治精英的內部刊物」。國務院、國會和各國大使館都依賴它來建立普遍性的參考框架，社會運動團體也不敢掉以輕心。激進派的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承認它的影響深遠，但抨擊《紐約時報》是一張「官報」，生產「必要的多元主義假相」，其實為美國政府和財團標誌意識形態的邊界：「到此為止，不准出界」(Chomsky, 1990: 13)。他的說法

不無道理，但假如無限上綱式推論《紐約時報》和《真理報》或《人民日報》為一丘之貉，豈不荒謬？

我選《紐約時報》來研究，因為它執輿論之牛耳。我用「建制內的多元主義」來描述它對美中關係的論述，但這個概念的普遍意義超出中美關係的範圍。它的第一個特徵是：美國精英媒介的言論多元，卻拘泥於官方既定的狹隘視野之內，也就是「統一中見分歧」，宛如唱出一個主題的幾個變奏曲。媒介受到政治經濟脈絡所制約，傳統視媒介為制衡權力的「看門狗」(watch dog)，未免太浪漫，也強其所難。而喬姆斯基視媒介為權力結構的「哈巴狗」(lap dog)，則忽略了權力中心不是一成不變或鐵板一塊。我的觀點比較接近視媒介為「警衛狗」(guard dog)：「不是為整個社區，而是為其中有權力創造和控制安全系統的團體看哨」(Donohue, Tichenor and Olien, 1995)。媒介為權力結構服務，但不是無條件聽命於它。回到中美關係上，美國精英的意見本來就分歧，何況中國政府劣迹斑斑，使得《紐約時報》社論和專欄作家的論述比平常多元，但又像是權力走廊的內部爭論。報紙動不動搬出「美國人民」，其實視野很少超過精英層的思考範圍。反對的聲音(例如喬姆斯基的言論)一旦危及權力結構，精英媒介就加以消音或邊緣化。

「建制內的多元主義」的第二個特徵是：精英媒介傾向於把外國現實「內在化」，建構為薩伊德(Said, 1978)所說的「東方主義論述」。美國社會服膺「負責的資本主義」和「利他的民主制度」，認為美國的制度即使需要局部改革，卻無根本上的瑕疵。美國主流媒介評斷其他國家，總看它們是否符合美國的期望，或和美國的制度和意理有多接近，無非從美國社會的主題出發罷了(Gans, 1979: 37)。國際新聞充滿強國的聲音，弱國充其量只在旁噏噏叫，媒介的聚焦對準中心(而非邊緣)國家的闡釋框架及定義。美國媒介對華報導有兩個來源，一是中國，一是美國；《紐約時報》的社論和專欄幾乎是從華盛頓看中國，關注美國應該

如何對待中國，而不是中國本身發生甚麼事。美國國內為對華政策發生的黨派衝突往往喧賓奪主，比中國本身的新聞還重要。媒介偶爾引述從中國發回來的消息，卻立刻扯到華盛頓的議題上，然後居高臨下，進一步建構自己的論述，擔任「旁觀者」兼「裁判」的角色。媒介往往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我們」和「他們」對立，然後誇誇其談「他們」不值得「我們」去救贖。至於台灣、香港、西藏、俄國、古巴或者印度，只是中美關係宏大敘述的配角而已。

第三，精英媒介在組織作業上落實了「建制內的多元主義」，以塑造「客觀性的戰略性儀式」(strategic ritual of objectivity)(Tuchman, 1978)。《紐約時報》對編輯作業諱莫如深，比法國和德國的同行還不透明。佩吉(Benjamin I. Page)發現，《紐約時報》的社論一貫不偏不倚，而另外安排有些專欄保守些，有些專欄激進些，左右平衡。這個編輯政策使報社提出它的政治主張，又展示「多方參與、激烈論爭的形象」(Page, 1996: 20)。在我所涉及的時段內，共有15位專欄作家<sup>2</sup>，其中一位是黑人，一半以上是猶太人，卻無華裔或亞裔撰寫有關中國問題的文章。

## 怎麼對待中國？

我用建構主義的話語分析法(discourse analysis)(Gamson, 1988; Gamson and Modigliani, 1989)，先解構《紐約時報》的社論和專欄，再將主要議題重構為「意識形態集束」(ideological packages)，包括了隱

2 包括 James Reston(退休)，Tom Wicker(退休)，Leslie Gelb(辭職)，Russell Baker(退休)，Anthony Lewis(現執筆)，Flora Lewis(退休)，A. M. Rosenthal(1999年退休)，William Safire(現執筆)，Thomas Friedman(1995開始執筆)，Anna Quindlen(辭職)，Maureen Dowd(現執筆)，Bob Herbert(現執筆)，Gail Collins(現執筆)，Frank Rich(現執筆)和 Paul Krugman(現執筆)。多數從跑新聞爬上事業的高峰，兩位是前任總編輯(Reston, Rosenthal)轉任，有的聘自政府(Safire)或學術界(Krugman同時任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也有的辭職去做人生不同的規劃(Quindlen)或領導智囊團(Gelb)。

喻、範例、口號、描述以及訴求原則等。這些基本框架平常視為當然，心照不宣，卻為評論者和讀者預設一種看世界的角度。我搜集1990-2000年間464篇文章，包括205篇社論和259篇專欄，反覆排比閱讀，再歸納分析。《紐約時報》每天登二到三篇社論，不署名，每篇400-600字。每年平均登18篇有關中國的社論。<sup>3</sup>每篇專欄約650-700字。在11年內，15個專欄作家的筆鋒幾乎都觸及中國，但大多蜻蜓點水，以中國為諷嘲的例證，只有四位持續發表對中國的分析。環繞社論為重心，羅森索(A. M. Rosenthal，共132篇)和薩法爾(William Safire，共54篇)持右派觀點，弗理德曼(Thomas Friedman，共54篇)和路易士(Anthony Lewis，共19篇)持溫和左派的立場。

表6-1總結出三個意識形態集束：圍堵政策(保守派)、來往政策(中間派)和全球化政策(自由派)。它們的意識框架跟克林頓的政策亦步亦趨：保守派反映克林頓早期的強硬主張(1992-94)；社論中間派支援他的主體政策(1994-97年及以後)；自由派擁護他1997年以後的全球主義思路。克林頓承認圍堵政策失敗，轉而與中國來往；但後來發現「有往無來」，乃再轉向為「全球化」的策略。對華政策表面上愈變愈寬，其實掩蓋了一場利益鬥爭，貿易團體擊敗了人權團體的訴求。「全球化」和「來往」的邏輯重疊，但全球化避免正面和中國交鋒，寧可溶化中國到「文明世界」裏去。克林頓放棄圍堵政策多年，保守派還抓牢他早期的立場，譴責他背叛原則。這三大框架有內在變化的軌跡，但新立場未必取代舊立場，有時三個立場各吹各的號。《紐約時報》的同事不便互相點名批評，但意識形態競爭有時呼之欲出，有時躍然紙上。

3 1990年有13篇社論；1991年13篇；1992年24篇；1993年13篇；1994年14篇；1995年21篇；1996年15篇；1997年19篇；1998年23篇；1999年30篇；2000年16篇。



表 6-1 《紐約時報》社論和專欄文章的意識形態集束(1990-2000)

意識形態	圍堵政策	交往政策	全球化政策
結構框架	用貿易懲罰中國的人權迫害。	把貿易同「溫和可行」的人權狀況掛鉤。	納中國於國際(尤其是世貿)組織,以增進美國貿易,並改善中國人權。
隱喻	天安門大屠殺。「向北京屠夫磕頭」。共產中國、威權主義的新加坡,民主的台灣。蓋世太保式的監獄,蘇聯勞動監獄。古巴。	天安門鎮壓。「把中國帶進來,不是把它趕出去。」「別處罰錯的中國」。	全球化的革命。預防衝突的金拱門理論。台灣、香港、伊朗。
範例	中國政治新的游說團。	蘿蔔和棍子。不破壞長久的中美關係,但站起來對付中國的流氓作風。	一邊劃紅色警戒線,一邊搭橋。
譬喻	姑息大監獄的頭頭。「北京的囚徒。」「被縱容暴君、乾脆投降算了。」用人權交換虛無縹緲的貿易。「和魔鬼共進晚餐。」與中國中央政治局結盟。「改變共產主義的唯一方法就是終結它。」「我的老魏。」	「建設性地縱容北京。」「中國:別存幻想。」華盛頓的政策放在自動方向盤上,只向和中國來往的目標前進。	美國的優勢:中國人渴望着巨無霸漢堡、蘋果電腦、微軟和米老鼠。從毛澤東一路直奔密爾根,沒有在麥迪森停一停。
描述	逮捕主要的著名異見人士。迫害基督徒和藏人。克林頓收取中國的競選贊助。中國是核技術的偷盜者和擴散者。	主要的著名異見人士。總統互訪。國會干涉。美國商界的貪婪。抵制中國國有工業的出口。西方經濟制裁。	中國經濟將淪落為泰國第二。人民將共產黨私有化。最惠國是根打錯的棍子。在美國訓練中國的律師和法官。異見人士。
原則	人權	有針對性的制裁	和平演變、法制
作者	羅森索(132篇),薩法爾(54篇)	社論(1990-97年,154篇)	弗理德曼(54篇)、路易士(19篇)、社論(1997-2000年,61篇)

## 圍堵政策

肯南(George Kennan)在1950年代主張圍堵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紐約時報》右派專欄的對華立場也是黑白分明。1990年羅森索宣布：改變共產主義的唯一方法就是「終結它」。他與共產主義勢不兩立，認為它的本質難移，論調和福山、亨廷頓和伯恩斯坦、孟諾等人如出一轍。天安門事件發生後，老布什(George Bush)總統拒絕用貿易手段懲罰中國政府，羅森索說，中國政府堵住了老布什的嘴，布什是中國領導人的朋友，而不是政治犯的朋友，才會用最惠國待遇去津貼中國這所「大監獄」的頭頭們。他從1992年起不斷號召消費者抵制中國貨，但徒勞無功。

總統候選人克林頓抨擊老布什「縱容北京屠夫」。1993年羅森索讚揚克林頓比老布什有骨氣，把中國的人權記錄與最惠國待遇掛鉤，但不到幾個月，卻轉而譴責他把貿易與人權脫鉤。1994年5月27日專欄的標題說：「別縱容暴君，乾脆投降算了」。文中痛斥克林頓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措辭尤甚於克林頓在競選期間對老布什的冷嘲熱諷。四天後，羅森索聲稱北京俘虜克林頓為其新囚，美國政府聞北京的調子起舞。從此「北京囚徒」成為克林頓的標籤。羅森索鞭撻美國的對華貿易說客「急於和魔鬼共進晚餐」，以致克林頓不惜付出任何道德的、政治的、甚至安全的代價，以人權和中國交換「虛無飄渺的貿易」，並出售核技術給中國，造成「世界安全的重大危脅」。1997年，羅森索說，中國出售美國的核武器給巴基斯坦、伊拉克和伊朗，為的是它們都想「削弱美國」。以色列出售先進武器給中國，起碼證明「猶太人都不聰明」，損及以色列「民主燈塔」的形象，更讓中國有能力擊落美台的飛機。他說，美國成了中國的「俘虜」，克林頓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而非中國人民的「戰略夥伴」。羅森索在1999年總結道：「我們不必懷疑美國有何可信度，我們根本沒有(可信度)。」

羅森索最愛用「姑息」來形容老布什和克林頓的對華政策，在很多文章中出現三四次。此外，「北京屠夫」、「向北京磕頭」、「暴君」、「共產獨裁者」和「北京囚徒」也慣常出現。他十幾次把中國比作希特勒的德國、日本軍閥的帝國、史達林的蘇聯、薩達姆(Saddam Hussein)的伊拉克和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伊朗。他推崇魏京生、吳宏達和達賴喇嘛。他甚至公布支援人權的個人和團體的電話、傳真和網址。他說，克林頓敢對古巴強制禁運，敢在聯合國譴責古巴的人權問題，卻讓中國逍遙在外，只因為中國有錢會講話。羅森索從1997年起到1999年退休寫了13篇文章，揭露中國政府迫害基督徒和藏民。

另一位保守派專欄作家薩法爾原是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的演講撰稿人。他在80年代中期曾盛讚中國「拋棄馬克思主義」和「擁抱資本主義」。他坦承沒有領頭抨擊老布什的對華政策，因為期望政治自由會尾隨資本主義在中國出現。但看到政治情勢沒有好轉，1992年起開始攻擊老布什的「磕頭政策」。他原來看擁抱資本主義的中國比蘇聯前景樂觀，但到了1995年卻轉稱俄國的政治情況比中國看好。

薩法爾推崇魏京生為諾貝爾獎的候選人。一篇專欄的題目就是：《我的老魏》，捧他像曼德拉(Nelson Mandela)、沙卡洛夫(Andre Sakharov)和斯奇薩朗斯基(Anatoly Schchar ansky)一樣永垂不朽，不像江澤民、克林頓和勃列日涅夫之輩在歷史上只是過眼雲煙。看到中國的政治自由在原地踏步，薩法爾預言，下個世紀印度會超過中國，成為世界的超級大國。薩法爾責難新加坡「專制資本主義」，表揚台灣的民主選舉和她「令人敬畏的自由病毒」。1999年末，他嚴斥以色列賣給中國十億美元先進的空中偵察和雷達裝置：「要是以色列對島上(台灣)二千二百萬人的自由漠不關心，世界上更少人會在乎六百萬猶太人被扔進海裏去。」他再斥以色列破壞與美國的戰略聯盟，又指責克林頓政策的失敗使中國進一步軍事威脅台灣。

從1997到2000年，薩法爾針對克林頓涉嫌接受中國競選捐款和中國

涉嫌偷竊美國的核機密窮追猛打。在其56篇文章中，將近一半(43%)咬住這兩件事不放。他繪影繪聲，先是報導印尼華商為克林頓籌款，然後雪球愈滾愈大，許多中國領袖的那些腐敗走資後代都牽連在內。至少有五篇文章編織了官商勾結的「情節」，彷彿中國、其代理人和「中國的新說客」已通過間諜網路、競選捐款和其他耳目，滲透入克林頓的白宮。1999年，國家安全顧問伯格(Samuel Berger)否認和中國有私下交易，薩法爾還是炮轟中國一邊買勢力，一邊派間諜偷美國核機密。四篇文章將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文和與中國政府偷竊美國先進技術的「大陰謀」串起來，後來證明是無稽的。薩法爾說，就是因為中國拚命買勢力，克林頓才會從罵「北京屠夫」變成了它的「戰略夥伴」。

### 交往政策

《紐約時報》社論盡量不偏不倚，建基於美國實用主義的中間哲學，它主張和中國有建設性的來往，以平衡美國人權價值及其在華的商業、戰略利益。它的論述大體回應克林頓總統1994年的政策轉變，希望與中國建立「戰略夥伴」的多方關係。克林頓說：「我要把中國帶進來，不要將它趕出去。」這就牽涉到怎麼運用「蘿蔔和棍子」了。《紐約時報》對於何為蘿蔔何為棍子有時搖擺不定。但這些標題顯示了典型的美國實用主義精神：「嚴懲中國，但不要孤立它」(1991年5月13日)；「勿向中國關上大門」(1991年9月30日)；「中國：(彼此關係)在全有全無之外」(1992年9月29日，意即在「全有」和「全無」之間找適當的定位)；「只要有建設性，縱容中國何妨」(1993年11月18日，因為克林頓曾批評老布什「縱容北京暴君」)；「別逃避中國問題」(1994年5月22日)；「中國：別存幻想」(1999年7月14日)。

該報一邊批評老布什姑息中國，一邊警告「不要不分青紅皂白地處罰中國！」從1990到1992年，不斷呼籲美國保護中國改革的根子，包括知識份子、出口區，和資本主義的私有界。它支持美國給中國最惠國

待遇，條件是中國必須在幾個重大領域有改進。《紐約時報》強調對華的制裁不是全面的，而應該是「具體的」、「有目標的」、「溫和的」、「有選擇的」。它斥責老布什對中國要求太少，國會則要求太多。1993年一篇社論說，給不給中國最惠國待遇只應考慮人權狀況，並容許作「彈性解釋」；至於中國的武器擴散和美中貿易的磨擦，則宜尋求其他途徑解決。

1993年下半年，《紐約時報》稱讚克林頓將人權同最惠國待遇掛鉤；1994-97年轉而批評他向商業利益低頭，無條件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導致「政策癱瘓」，讓中國當局肆無忌憚迫害人權。該報要克林頓採取「有選擇的經濟制裁，用最小的經濟代價表達最強的政治資訊」。1994年末，它呼籲國內兩黨站起來合力對付「中國的流氓作風」，但不要破壞雙方的長期關係。中國賣核武器給巴基斯坦，該報說美國必須協調盟國，共同對華經濟制裁，免得盟國乘虛進入中國市場，犧牲美國的利益。

《紐約時報》不滿克林頓的對華政策，唯一的例外是1998年夏。在克林頓訪華以前，三篇社論敦促他效法雷根——雷根1988年訪蘇時，曾接見著名異見人士，並在電視上向蘇聯人談論民主。這回它讚揚克林頓在電視直播上和江澤民唇槍舌劍，侃侃而談西藏問題和個人自由；又說江澤民走出了鄧小平的陰影，顯得「更有自信，更有自由色彩」。這種樂觀轉瞬即逝，1999年四篇社論說，「中國暴君報復民怨」（鎮壓民主人士、異見人士和法輪功），美國的反應只是空洞軟弱。另一篇社論指責克林頓的政策好比擺在自動駕駛盤上，「只知往與中國來往的既定目標前進」，走錯方向，必須矯正。

1998年六篇社論質疑克林頓向中國出售導彈技術，涉嫌接受中國的競選捐助。1999年12篇社論詳論國會發表的一系列調查報告，譴責美國核武實驗室的安全管制鬆懈，致使中國趁機進行間諜活動。回顧當時共和黨控制國會，有心為難克林頓的對華政策，兩黨爭鬥方興未艾，給媒

介的放大鏡一照，成為新聞熱點，幾乎從邊緣占據新聞舞台的中央。這件事符合了新聞熱點的基本要素：情節懸疑，名角演出(考克斯委員會、法院、克林頓的官員們)，合理的嫌疑犯(中國和李文和)和受害者(美國核技術秘密)，整個基本假設當然是中國無法無天。此案涉嫌種族歧視，終因司法部缺乏證據，李文和無罪獲釋。外界批評《紐約時報》為李案煽風點火，為挑起李案的始作俑者，該報在2000年兩篇社論承認過份依賴官方的說辭。

在台灣問題上，社論充分表現了實用的中間態度。《紐約時報》一直同情台灣渴望擺脫中國的控制，1992年一篇社論寫道：台灣和中國「實質上是兩個分離的國家」，克林頓應該注視台灣的民主變革，但毋需激怒北京。1994年一篇社論質問美國何必遵守「一個中國的神話」。1995年和1996年，中國用導彈恐嚇台灣，至少有五篇社論表揚美國政府的立場「堅定而不魯莽」，台灣畢竟「大得不能成為中美關係擺布的棋子」，民主轉型使台灣「最終獨立愈來愈站得住腳……只是目前這樣做得不償失」。等到北京的反應愈來愈強硬，該報突然在1997年轉頭批評台灣，說它「在美國對外政策的處理上扮演過大的角色」。從1997到2000年，該報堅持美國應該抑遏中國的軍事冒險和台灣的外交冒險。陳水扁當選台灣總統，中國怒不可遏，該報催促美國政府堅持一個中國、和平統一」的原則，以冷卻一觸即發的緊張局勢。

### 全球化

儘管鷹派的立場還存在，美國意見領袖的主軸已開始轉向，企圖納中國於世界貿易組織之中，讓它接受國際規範和文明法治的約束。從1997年3月6日起《紐約時報》社論便堅持這個論調。以前該報攻擊美國沒有附加人權條件便給中國最惠國待遇，現在的主張正是無條件給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地位」(即以前所謂的最惠國待遇)。從1997到2000年，社論在不同的抽象層面列舉13條重疊的理由，聲稱中國入世將(1)有

利於西方國家催化中國的改革；(2)給中國的改革者加一把勁；(3)讓中國官僚把權力交給不以人為轉移的市場機制；(4)由「公正的國際法庭」解決中美貿易紛爭，減緩雙方的緊張；(5)協助中國領導人建立法律的可測性、國際標準和法治；(6)聯合美國的人權團體和商業團體，殊途同歸；(7)不止幫助個別異見份子；(8)推進中國的市場紀律；(9)開放中國市場給美國商品；(10)由於外國商品、技術和電信的擴散，帶給中國人民更多資訊；(11)嚴格監督中國侵犯知識產權、工人權益和環境的情況；(12)拓寬中美人民的關係，使中國更趨民主法治和保障人權；(13)幫助美國在全球推進自由，塑造國際商業力量，使美國工人和中國民主兩蒙其利。

50年代冷戰期間的「現代化理論」把發展計劃說成天衣無縫，彷彿只要抓住經濟發展的樞紐，即可帶動一攬子的好東西(Higgins, 1977; Pakenham, 1973: 20)。現在，全球化的鼓吹者開出這一張長單子的好處，有如現代化理論的借屍還魂。《紐約時報》社論突出世貿組織為全球化的象徵，但始終沒有用過「全球化」這個概念，反而是專欄作家弗理德曼給「全球化」下了這個定義：「世界的金融、市場、國家和技術結合了市場競爭，規模之大前所未見」(Friedman, 1999)。這種窄化的論述一味經濟掛帥，無視冷戰結束後全球化會造成甚麼複雜的、矛盾的政治和文化意涵，似乎假設全球化是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卻避而不論全球化的條件、標準和代價。各種反對全球化的聲音(例如反霸權主義者、環保組織者和工會)一概被邊緣化，更遑論西雅圖和義大利熱那亞的反世貿組織街頭示威了。

弗理德曼是「全球化」的傳教士，從1995年(成為專欄作家)到2000年寫的56篇文章全都在傳這個福音。後來他給非洲開藥方，全球化也是解決饑餓和災難的靈丹。可惜他的視野片面，證據薄弱，欠缺理論的嚴謹。1998年3月18日，他寫道：

在意識形態上，中國共產黨已經完蛋了。它還在掌權，卻無訊息可傳了。如今沒有人能自外於全球化。發達經濟所面臨的壓力(如裁減政府冗員，爭取外資，在全球市場插足，增加國家的競爭力和多樣化)也在擠壓中國的鄉村。試聽這兒村長的競選演講，告訴我，跟俄亥俄州托里多市選市長有啥兩樣。政治不再是地方的。政治都是全球性的了。

這段話刻意模糊了中國鄉村和托里多的結構差異。他說，自下而上的革命太爆炸，由上而下的革命不可能，於是據說朱鎔基總理不願死硬派的阻撓，引進全球化，寄望由外而內帶來革命。除非中國與全球融合，否則必重蹈俄羅斯的覆轍。弗理德曼認為，中國入世不啻「給美國的經濟送份禮」，Sprint、AOL、AT&T這些大集團企業可以收購中國公司，幫助中國和世界「連線」。美國在中國有市場優勢，因為中國人「渴望巨無霸漢堡、蘋果牌電腦、微軟和米老鼠」。全球化使得中國如果撒野必須付出更大的代價，全球化也可以稍煞中國的民族主義的氣焰——「他們可以燒美國國旗，卻不能燒美元。」他批評美國工會「鴛鴦式的保護主義」，要求民主黨提出方案，解答美國工人對全球化的憂慮，但千萬不要訴諸貿易設障。他把勞工的憂慮就這麼輕輕提起輕輕放下了。

全球化是中國實行法治的契機。弗理德曼說，「必要時得給中國劃紅線(不准它越線)，但可能的話應該(盡量)搭橋」。從1996年起他宣揚法治比選舉對中國更重要。一年後，他說美國不應該隨便亂揮最惠國待遇這根棍子，因為它傷及中美兩國的利益，何況人權不應簡單化為「最惠國」或者「非最惠國」待遇。1998年，他形容中國「從毛澤東一路直奔密爾肯(Michael Milken，被判有罪的美國金融家)，沒有在麥迪森(James Madison，第四任美國總統，象徵民主)停留過」。比較客氣的說法是「從毛澤東一路直奔美林(Merrill Lynch，證券金融公司)」。換言之，中國一夜間追求市場經濟，沒有經過民主與法治的洗禮。「裙帶資本主



義」釀造了亞洲金融危機，他說中國要是不改革法治，可能「淪為泰國第二」，甚至比馬來西亞還要難看百倍。他相信，中國當局不會釋放異見人士，卻不能完全反對法治。他惋惜道，中國不像印度和香港受過大不列顛的殖民，也不像日本或韓國受美式新殖民主義的影響，所以未曾建立一個「支持自由憲政的精英和官僚體系」。這聽起來好像「東方主義者」的老話：「你們有今天，都因為有我們」(Said, 1993: 35)。他呼籲美國國會給在華推行法治的美國公司稅務優待，希望企業界籌5000萬元，國會再撥5000萬元相對基金，邀請中國的法律學生、法官、律師甚至檢查官來美國學習。

弗理德曼提出一條俏皮的「預防衝突的金拱門」定律，聲稱凡有麥當勞(金拱門)的國家就不至於交戰。他認為全球文化的「麥當勞化」象徵着進步與緊密聯繫，但他卻對麥當勞文化的種種批判置若罔聞。2000年，中國對台敵意升級，他寫了三篇文章說，中國和台灣像世界經濟體系的連體嬰，中國射台灣不可能不射到自己，台灣扯離中國也不可能不扯低自己的經濟。中國進入世貿組織會減少對台的軍事冒進，有一天會「變得更像台灣」。他說下一次起來反抗中國政權的，不是天安門運動的學生和知識份子重新結合，而是入世後面臨失業破產的工人和農民。這是他唯一負面地提到全球化。

弗理德曼喜歡用隱喻、寓言和雙關語來營造文字的鮮活對比。1996年，他引《伊索寓言》比喻俄國為民主烏龜，經濟即將起飛，中國是獨裁兔子，前途堪虞。香港回歸中國「不僅僅把西方的一片還給東方」，也是把「未來的一片還給過去」。數篇文章形容台灣是「順著歷史風向」，是未來，中共政權是「逆著歷史風向」，是過去。但中國再怎麼糟，還是比伊朗強得多：伊朗需要一個鄧小平(他稱之為Ayatollah Deng)，來發展經濟，降低高壓統治。他說中國已跨過「國際換日線」，走進「明天」，擁抱全球化；中東國家還在死守「昨天」，老為認同、文化、宗教和政治這些「老掉牙」的問題廝戰。

另一位自由派專欄作家路易士，寫了19篇關於中國的文章。他沒有提出宏偉的構想，只是不斷同情中國的異見人士和支援中國的法治。很多文章描述異見人士，其中魏京生占了四篇。他把魏京生比成曼德拉、斯奇薩朗斯基，有道德勇氣，吃過大苦大難，敢「向世界上最強大的暴政挑戰」，在「黑暗中放光芒」。90年代初，路易士指責老布什拒絕「要中國暴政負責」，對「暴政的犧牲者」無所作為。後來，他譴責多數西方政府一提到中國的暴行就顧左右而言他。他說，中美「戰略性對話」換得中國方面愈演愈烈的鎮壓。路易士兩次駁斥李光耀提倡「亞洲價值」的威權主義。1998年，他開始支援中美兩國合作訓練律師和法官。自稱受到王丹和達賴喇嘛的影響，他拋棄原有對華貿易制裁的立場，以便把中國帶進「國際生活的主流」。

## 結 論

美國政府想把中國塑造成它心目中的樣子。精英媒介提出的三種意識形態(包括圍堵、來往和全球化)都是「和平演變」主題的變奏。美國自詡負有神聖使命去拯救國內少數民族和外國，和平演變是這種「天命」(Manifest Destiny)精神在政治和道德上的再現。和平演變是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總統的國務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提出的，寄望共產國家從內部變質或瓦解。美國精英媒介的意識形態容或主張完全、部分或者全不對中國進行貿易制裁，卻沒有要求回到像1979年以前孤立中國那樣。在精英媒介內部，評論者的意見微妙較勁，但這種「建制內的多元」始終局限在官方圈和政策範圍內，並不把公共領域裏一些異音當回事。多元的媒介聲音不管支援或反對政府的政策，都擁護美國的根本利益。有的攻擊個別總統簡直無以復加，卻全力維護美國主義。媒介的猛烈批評的確把老布什和克林頓總統擺在守勢，使之看來軟弱無能。然因克林頓擅長抓住媒介論述和民意測驗，把政策挪到中間地帶，最後

幾年的對華政策終於受《紐約時報》讚賞。

媒介論述承襲了冷戰的「現代化理論」和冷戰後的「全球化理論」。現代化理論認為經濟發展會帶動其他領域的進步，最後點燃政治民主的火花。贊成圍堵政策者熱衷於懲罰中國，正因痛恨經濟成長只培養出中國的「專制資本主義」，而沒有踏出民主的步伐。主張來往政策者希望透過談判找出美國較能接受的條件。「來往」和「全球化」的政策有三點不同：第一，前者是個抽象概念，後者是具體政策；第二，來往要軟硬兼施才能「平衡」美國各種不同的利益，而全球化則拋蘿蔔多於使棍子（幾乎不提貿易制裁），以「整合」美國的利益；第三，全球主義者決意把中美雙邊關係納入新自由主義的資本民主全球框架，從內和從外顛覆共產主義。總之，圍堵和來往政策都是零和遊戲，全球化的論述卻似雙贏策略，當然前提是美國操縱遊戲規則。

中國的反應是火山爆發式的「國家民族主義」，強烈表達了仇恨、受傷的自尊及對「和平演變」的恐懼。薄一波在回憶錄中透露，中國從50年代起對美國用「滲透、腐化、顛覆」等方式進行和平演變就深具戒心，毛澤東還嚴厲批判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是向美帝低頭的「蘇修」。天安門事件記憶猶新，共產政權又一個接一個垮台，使得中國當局驚魂未定，更怕美國導演和平演變；在北京看來，美國軟硬兼施，一手來往，一手圍堵，無非在搞和平演變，因此80年代的親美情緒變成90年代鋪天蓋地的仇美主義。在90年代最後幾年，中國當局終於認識到全球多邊機制未必是美國的馬前卒，反而可以用來防止美國片面行動。北京更期望透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來提高國際聲望，吸引外資，鞏固政權。

中國發動民族主義來抵擋和平演變，又急於擁抱全球資本主義，更允許國內的資本家入黨，和美國官方的策略有一部分是合拍的。現在國內反對江澤民最甚者，不是自由派知識份子，而是老左派、新左派，以及入世首當其害的社會領域。江澤民勒令關閉老左派的《中流》和《真

理的追求》，因為它們罵他出賣共產主義。美國方面，小布什上台後宣稱要把中美關係從「戰略夥伴」調整為「戰略競爭者」，但九一一事件以後美國對國際恐怖主義宣戰，而且美蘇關係修好，於是中美矛盾暫擱一旁。相信美國精英媒介對華政策的論述仍將在資本主義民主、新自由主義、市場全球化、和平演變這幾個主軸打轉。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台灣報業與民主變革的崎嶇故事<sup>1</sup>

---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南宋 楊萬里《桂源鋪》

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被囚禁在這個島的孩子，長夜哭泣！  
——《綠島人權紀念碑碑文》

沒有專制政權，不等於民主。  
——托瑞音(Touraine, 1997: 184)

經過四十多年漫長的民間抗爭，埋藏了多少歷史的冤屈，台灣終於決然告別權威統治，至少建立起一種形式上的民主。縱使論者屢屢詬病台灣的民主素質，這場奮鬥的歷程無論如何是華人社會史無前例的民主試驗。在台灣，政府已無法公然干預或控制媒介，這在表面看來彷彿理所當然，其實來時路血跡斑斑可考：如非一批又一批知識份子結合社會運動，前仆後繼，患難犧牲，民主香火不可能薪傳不息。本章主旨在從廣角的歷史眼光來詮釋台灣爭取新聞自由的軌跡，特別關注政論雜誌以小制大，逐漸對抗、顛覆國家嚴控的大媒介(報紙和電視台)，突圍其所建立的言論羅網。

我分析的取徑是從台灣政治經濟的文化矛盾來看媒介。國民黨當局

---

1 原載於 Chin-Chuan Lee (1993), "Sparking a Fire: The Press and the Ferment of Democratic Change in Taiwan," *Journalism Monographs*, No. 138: 1-37, 並收入 Chin-Chuan Lee (ed.) (1994),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pp. 163-204。

在政治上抱持一個虛幻的意識，聲稱代表全中國，任由「大一統」的中國意識肆意壓抑本地政治與地方文化。但台灣在經濟上卻又不折不扣追求現實利益。這樣，政治邏輯和經濟邏輯之間鬥爭，叢生各種難解的文化矛盾，爭取新聞自由的基本癥結應作如是觀。本章圍繞兩個主題展開：第一，內憂與外患挑戰國家的認受性，當局採取甚麼政治經濟策略對抗之？它如何形塑台灣新聞控制的機制，並決定其文化動態？第二，面對國家嚴厲控制報紙和電視台的運作，改革派知識份子和反對派政治人物如何開創言論空間，利用政論雜誌表達理念、組織行動？在第二個主題下還有幾個子題：大媒介與小媒介如何互相影響？政論雜誌的功能如何隨時間而變化，終於顛覆官方的意識形態，並成為民主變革的觸媒？民主變革又如何反過來影響政論雜誌？這些問題都必須置諸歷史脈絡內考察。

在傳播理論上，媒介在經歷急劇重大變革的社會中扮演什麼角色？台灣提供一個難得的社會實驗室，深刻展現出政治傳播的各種動態。舒爾曼(Schurmann, 1968)當年研究中國的組織與意識形態時曾經慨乎言之：「沒有現成的第二手文獻指引，或指出主要問題何在，或介紹概念，或勾勒一堆混亂的材料以做準備功夫。」正因為理論文獻少，舒爾曼求助於歷史和比較文獻，但始終都靠「直覺」來體察問題和建構形態。這種直覺必須靠苦心開拓，長期培養，才能達到深刻的認知能力。本文初撰於90年代初，當時對戒嚴的記憶猶新，禁忌還在，必須從各方面材料(報紙、傳記、分析和訪問)旁敲側擊始能疏理粗略的脈絡。後來材料逐漸解禁，我再回頭來看這篇文章所描述的景象，大致還站得住腳，或許可給其他華人社會提供若干借鏡。

先說一些簡單的背景：大量漢人移民於17世紀中葉明末隨鄭成功赴台，以台灣為反清復明的基地。1683年台灣落入清廷之手。1895年甲午之戰，清廷割讓台灣給日本。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1945年收復台灣。台灣人歡迎祖國軍隊，不料國民黨政權一心一意在島上接

收、承襲日據時代的殖民機構，大肆搜刮財富，以重建飽受戰爭創傷的中國大陸和應付後來的國共內戰。終至於1947年2月28日發生重大的族群衝突，就是著名的「二·二八事件」。兩年後國民黨在大陸潰敗，全盤撤退到台灣島上。佔總人口85%的台灣本地人淪為次等公民，1949年隨蔣介石抵台的大陸人雖只佔15%，卻支配了台灣的政治權力。在以後的數十年間，族群矛盾不斷發酵終至不可收拾，成為社會衝突的焦點。

無論如何，研究台灣的媒介必須從黨、政、軍「三頭馬車」的國家機器着手。這輛三頭馬車先後控制於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兩位「最高領袖」之手，他們通過列寧式的國民黨組織發號施令，黨國不分——黨就是國，國就是黨。台灣成為如同拉丁美洲學者所說的「官僚威權政權」(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regime)(O'Donnell, 1973, 1978; Cardoso and Faletto, 1979; Evans, 1979; Gold, 1986)。但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從來不是風平浪靜的，1949年以後時刻受到挑戰，對外面臨共產黨的威脅和陷入國際孤立，對內還得平息充滿憤恨、不順從的本地人。國民黨以反共為名，從1949年到1987年實施了全世界最長的戒嚴。據此，軍警限制公民自由和政治參與，禁止各種罷工和遊行，鎮壓新聞界，都成了「名正言順」之事。但鎮壓再嚴厲也需要配以勸服力，於是國民黨一手握槍桿子，一手握筆桿子，希望民眾因此潛移默化，馴至漸漸認為獨裁統治是一種自然的生活方式，或是反共所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從比較的觀點來說，中共的新聞政策是鎮壓(repression)，新聞界淪為黨的喉舌，只盡義務不享權利；港英殖民時期深畏合法性不足，只敢採用籠絡(cooptation)策略，多拋胡蘿蔔，少使棍子，以爭取媒介的支援；戒嚴時期台灣(1987年之前)則使用收編(incorporation)政策，既鎮壓又籠絡，賞罰分明。台灣和南韓的新聞界是輔助政府和依賴政府的言論工具，而非嚴格意義的喉舌；它們在政治上縱然服從政府，在非政治領域卻保留活動的空間。願意接受國家招安者固然名(政治地位)利(經濟利

益)雙收，誰膽敢捋權力結構的虎鬚就得準備受到無情鎮壓，喝敬酒還是喝罰酒，悉聽尊便(Chan and Lee, 1991; Yoon, 1989)。

在台灣，國家完全壟斷電視頻道，黨政軍各擁有一台，又操縱大部分的廣播電台。1951年政府宣佈報禁政策，不再發放新的報紙登記證，只允許現有的報證轉手。直到1987年，這36年間台灣報紙的數量就凍結於31家(表7-1)，國民黨的挑戰者只能眼巴巴望着報證興歎。物以稀為貴，報證叫價不斷攀升，只有少數人(說穿了，就是黨國結構，外加兩家民營報紙)配嗜其禁饈，財薄勢弱的社會運動團體盡排除在外。質言之，黨政軍接受國庫的利益輸送，收購了31家報紙的一半，其中只有少數自給自足，其餘多仰賴國家的津貼苟活。而兩家民營報紙逐步收購報紙登記證，漸漸建立報系，掌握了台灣報紙發行總量和廣告收入的三分之二。這種寡頭壟斷的結構是在1970年代形成的，報紙與國家建立了政治學家所說的「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Eisenstadt and Lernarchand, 1981; Wu, 1987; 李金銓, 1987b)，政府給兩個報系巨大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以換取它們的效忠。兩報系發行人均被吸納入國民黨中央常會，《聯合報》與保守派攜手，《中國時報》向自由派傾斜。

國民黨全面控制了大媒介，惟因小媒介的銷路有限，當局估計政論雜誌無力脅及統治權威，遂未把它劃歸報禁範圍。政治異見者無法接觸黨國控制的大媒介，退而利用邊緣的政論雜誌鼓吹他們的言論(表7-2)。政論雜誌多半生存維艱，編寫粗糙，人事浮動，銷量通常只在兩千到一萬份上下，還要提心吊膽，唯恐當局隨時查禁沒收，致血本無歸；廣告商害怕國民黨伺機報復，必須和黨外劃清界限，因此政論雜誌幾乎爭取不到廣告的支持。生存環境和物質條件惡劣至此，怎能想到黨外雜誌後來竟成為民主變革的觸媒？它們刊登的消息在官方媒介上看不到，隨着人際網路一傳十、十傳百，散播於市井之間，甚至時時逼使主流媒介回應它們的報導。政論雜誌成為社會上異見的水龍頭，儼然是政治反抗的中心，最後衝破官方意識形態的堤壩。它們擴張了媒介的言論疆域，甚



表 7-1 報禁時期(1949-1987)台灣電視台和報紙的所有權分配

名稱	建立年份	所有權歸屬
<b>電視</b>		
台視	1962	台灣省政府
中視	1969	國民黨
華視	1971	國防部
<b>報紙</b>		
《中央日報》	1928	國民黨
《台灣新生報》	1945	台灣省政府
《中國日報》(台北)	1946	國民黨
《中國日報》(台南)	1946	國民黨
《民生日報》	1946	民營；無影響力
《更生日報》	1947	民營；無影響力
《自立晚報》	1947	民營；最有本土意識
《忠誠報》	1948	國防部
《國語日報》	1948	民營；面向中小學校學生；無政治傾向
《台灣新聞報》	1949	台灣省政府
《英文中國日報》	1949	英文報紙；名義上民營，但靠國民黨財力人力
《大華晚報》	1950	名義上民營，實際是國民黨《中央日報》的分報
《民眾日報》	1950	民營；偶爾靠國民黨的財力支持
《中國時報》	1950	民營；親國民黨；兩個最大的報系之一
《民族晚報》	1950	名義上民營；蔣介石的前任警衛所有；靠國民黨財力支持
《聯合報》	1951	民營；親國民黨；兩個最大的報系之一
《中國郵報》	1952	英文報紙；民營；親國民黨
《商工日報》	1953	黨民合營
《中國晚報》	1955	民營；無影響力、靠政府支持
《中國日報》	1956	民營；無影響力、靠政府支持
《台灣日報》	1964	國防部
《經濟日報》	1967	民營；從屬於聯合報系
《台灣時報》	1971	民營
《民生報》	1978	民營；從屬於聯合報系
《自由日報》	1978	民營；後改名《自由時報》
《工商時報》	1978	民營；從屬於中國時報報系
《青年日報》	1984	國防部
《新聞晚報》	1985	台灣省政府
《大眾報》	1986	國防部
《金門日報》	1986	國防部；內部流通
《馬祖日報》	1986	國防部；內部流通

註：政府終止頒發新的報紙登記證，但現有報證允許商業交易或轉讓。表中年份是報紙以現名開始發行時使用的名稱。

至促進了主流報紙的報導，逐漸對牢不可破的國家意識形態提出挑戰，人民更是在社會混亂的時刻倚重它來摸索真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台灣政治變遷的歷史就等於政論雜誌的歷史，包括它的興起、鬥爭和衰亡。傳統傳播文獻主張第三世界應該發展科技先進的媒介，本章的分析試圖打破這個神話。一般來說，大媒介的功能在於強固現狀，並因為它對資金和內容的大量需求，無形中製造媒介對國家機器的依賴；反而小媒介所需資金少，機動性強，容易在邊緣位置開拓變革(Tunstall, 1977; Schramm, 1977)，故成為社會運動反抗國家支配的言論重鎮。

### 1950年代：白色恐怖

1949年國民黨退守台灣，歸咎大陸的失敗於黨內派系傾軋，從未覺悟是民主憲政不彰所致。共產黨在海峽那一邊誓言要「血洗台灣」，國民黨退無死所，於是迅速在台灣島上重新集結，圍繞在「最高領袖」蔣介石的身邊建立了一個威權體制。蔣介石的權力漫無節制，全面控制黨、政、軍的三頭馬車，並宣佈戒嚴。國民黨師法列寧式組織，1930年代在大陸時即在軍隊各基層連隊設立政治指導員，到台灣後變本加厲，情治和黨務人員直接滲透到各級政府和教育機關裏，而且遍佈全島成立了數百個鄉鎮「民眾服務站」。國民黨政權為了圖存，寧可錯殺一萬個無辜，不可漏過一個共產黨人。

在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中，數4人為芝麻小事所株連而遭處決。當時顧不了法律上所謂的「正當程序」，而憲法保障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也全部凍結，記者是第一線的受害人：有人失蹤，有人受到拘禁、逮捕和審問，他們或為人陷害，或在許許多多年以前——久得連自己都記不清——偶然參加過一個讀書會、讀過甚麼左派的書、講過一句隨便的話，還有人倒了楣只因為名字出現在某「問題人物」的通訊錄上。記者們時刻生活在恐懼中。

表 7-2 台灣主要的政論雜誌(1949-1986)

名稱	背景事件	組成	訴求
《自由中國》 (1949-1960)	國民黨敗退到台灣。	舊式國民黨的自由派，受美國教育的知識精英，舊式台灣本土的政治人物。受眾是城市知識份子。	民主政治，言論自由。雷震被捕後終止。
《大學》 (1970-1973)	蔣經國上台，台灣失去聯合國席位，尼克森訪問北京。	受美國教育的年輕教授、國民黨自由派、國民黨高官之後。	革新保台，繼承《自由中國》的民主香火，也主張發展福利政策照顧農工。
《台灣政論》 (1976)	蔣介石逝世，第二次石油危機，中南半島陷入共黨之手，泰國和菲律賓相繼承認北京。	台灣本土的政治人物以及中產階級的知識份子(部分繼承《大學》)。目標受眾是中產階級和中小企業主。	公平的權力分配、政治參與，公平選舉，國會改選。出版5期後被迫關閉。
《美麗島》 (1979)	中壢事件(1977)後參選呼聲日隆，美國承認北京，北京加強宣傳攻勢。	台灣本土的政治人物和知識份子。組織「服務站」爭取草根支持。	解除戒嚴，選舉的公開參與。黨外運動的較激進派，於「高雄事件」覆沒。
《六十年代》 (1979-1986)	同上	台灣本土的政治人物/記者。中產階級支持。	繼續高舉《台灣政論》的訴求。黨外運動的溫和派。
超過12種的各式黨外雜誌 (1981-1986) <sup>1</sup>	專業黨外工作者，不滿黨外的議會路線。	多數年輕的台灣本土記者和政治人物，政治受害者的家屬。	熱衷曝光國民黨的醜聞內幕。市場利益驅使，缺乏深刻的政治分析和批評。 <sup>3</sup>

1 包括《亞洲人》和《潮流》雜誌，出版人是康寧祥。

2 它們中有很多為了規避檢查而時常改變名稱。所列包括《前進》、《蓬萊島》、《發展》、《政治家》、《新潮流》、《薪火》、《台灣廣場》、《雷聲》、《關懷》以及《自由時代》系列。參見「『黨外』雜誌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夏潮論壇》，1984年10月，頁2-32。

3 例外的有林正杰出版的《前進》系列、大批記者以及《新潮流》，意識形態上多批評「黨外」對於選舉的狂熱。

1949年，美國總統杜魯門準備放棄蔣介石，台灣完全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蔣介石儘管對島內實行鐵腕統治，對外還是要樹立「自由中國」的形象，以期有別於「共產中國」，重新爭取美國的支持。美國經過一段猶豫不決的日子，決定繼續支持台灣，條件是蔣介石必須進行改革。蔣介石流亡台灣的前幾年，個人權力尚未完全收攏，仍容許有限度的輿論批評，以示和人民同舟共濟，報界也往往直搗問題的核心。連黨喉舌《中央日報》也敢批評腐化的官員，《自由中國》半月刊(1949-1960)尤其是台灣爭取民主的勇敢象徵。

不久韓戰爆發，世棋重布，無意間挽救了台灣的命運於崩潰邊緣。美國政界爆發「誰失去了中國」的辯論，麥卡錫發動讓文化和政治界人人自危的「紅色恐怖」，國會聽證公開質問誰同情左傾勢力或勾結共產黨。其時，美國憎恨中共加入韓戰，「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形成對立的僵局。台灣在反共陣線的地理軍事地位特出，美國只好重新支持蔣介石，維護台灣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席次。1954年，美台簽訂共同防禦協定，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海峽，台灣從此躲入「自由世界領袖」的保護傘下。但蔣介石也被迫承諾，若無華盛頓的同意，不准擅攻中國大陸。

東西冷戰衝突升級，台灣成為華盛頓在遠東「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1958年，艾森豪總統訪台時，中共炮擊金門外島。蔣介石的「自由中國」趁機重入國際社會，備受美國支持。外在威脅舒緩，蔣介石並未選擇開放和民主的道路，反而更無忌憚壓迫政敵，置整個台灣於個人意志之下。正如《自由中國》社論所說的：「用報紙來畫出一幅台灣和平繁榮的虛假紙相。」它說國民黨收買了一批忠心耿耿的政治演員，是職業說謊者、馬屁精和高喊「萬歲」者。

### 自由中國運動

《自由中國》雜誌的起落生動說明了1950年代台灣自由知識份子的

困境。《自由中國》創立於1949年，經費來自國民黨內部，美國政府的週邊組織亞洲基金會也撥款資助。名義發行人是胡適，實際編務則落在雷震的頭上。雷震原來是蔣介石的親近舊屬。他們一開始擁護蔣介石，寄望他切實從大陸失敗中吸取教訓，以民主改革為國民黨的最後希望。後來他們逐漸不滿蔣介石以「反共」之名行獨裁之實，轉而嚴詞批評國民黨踐踏人權，罔顧憲政，同時主張限制秘密警察，要求蔣經國的權力基礎——例如全靠政府撥款資助的青年反共救國團——向國會負責。黨內自由派多受西方教育，希望以《自由中國》作為對外宣傳「新聞自由」的櫥窗，以提升台灣的國際形象；但情治單位對民意置若罔聞，不斷地騷擾雷震。

1954年，雷震被開除出黨。《自由中國》此時已義無反顧，台灣警備總部的迫害隨之加緊。蔣介石堅持國家安全高於一切，只有在收復大陸之後才能實行民主憲政。《自由中國》則辯稱，1954年《中美共同防禦協定》已經清清楚楚地規定，國民黨除非得到美國的准許，否則不可以向大陸發動攻擊；光復大陸已經不是指日可待，所以必須在此時此地實行民主。

1956年毛澤東在對岸搞「大鳴大放」的「陽謀」，蔣介石學樣在這邊發動「獻言」運動，佯言作為送給他77歲生日的壽禮。《自由中國》出版10月31日(蔣介石生日)獻言專刊，總共16篇文章，重印11次之多。論點之坦誠、廣泛和尖銳，前所未有的。例如要求最高領袖選接班人，限制國民黨干預軍隊，勸蔣介石無為而治，莫察察為明。不旋踵間，蔣經國領導的國防部政工幹部對內發佈61頁的「絕對機密」，題目是《向毒素思想總進攻！》，嚴厲批評雷震和《自由中國》的撰稿人反政府(雷震，1978)。

從1959年到1960年，《自由中國》力勸蔣介石毋修改憲法臨時條款，使其連任不受限制，可是沒有效果。雷震終於覺悟到除非成立有效的反對黨，否則改革無異於空中樓閣。儘管國民黨內外好友都警告雷震

不要輕舉妄動，他還是在1959年糾集了一批大陸政治精英，聯合台灣本地的政治人物，宣佈籌組「中華民主黨」。宣佈後兩天，台灣警備總部就以「叛國罪」逮捕雷震，從此銀鐐入獄，在軍人監獄單獨監禁，度過了漫長十年。大陸人和台灣本地人合作的試驗以失敗告終。改革的火炬雖然熄滅，卻已散播民主價值的種子。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1950年代，台灣的報紙八成是官報，其中以國民黨的《中央日報》為核心。多數民營報紙在掙扎求存，商業廣告微乎其微。七成以上的廣告來自政府，主要是保留給官報。特別是銀行受官方控制，官報可以向銀行貸款，改善印刷設備，民營報紙則借貸無門。即使在那種艱苦的環境下，1950年代的報紙卻直言敢諫，並不像以後20年間的那樣完全噤若寒蟬。1954年，內政部下令，政府官員可以憑「國家安全」之名廣泛限制報紙報導。報界和立法院反對聲音大嘩，實行5天內政部即宣佈撤銷。行政院又在1958年提議立法院不需經過辯論直接通過《出版法修正案》。此法案賦權政府機構，使之未經法院批准得直接撤銷報證。這種不顧正當程序的行徑激怒了立法院，100多個委員群起反對國民黨的倒施逆行。有名的老報人成舍我立委說：當年在大陸，軍閥頂多是砍人頭，從來沒有封人報的。

蔣介石震怒，訓令國民黨控制的立法院在本會期通過《出版法修正案》。雖然立法院這個橡皮圖章必定不辱使命如期通過法案，但報界仍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要求政府明智撤銷之。報界，包括台北報業公會，一致反對立法會順利通過這項修正案。報紙對國民黨那些膽小的立法委員冷嘲熱諷。《自立晚報》社論更疾言厲色說：「歷史將會懲罰你們！」但政府對外界反應置若罔聞，一定要通過《出版法》。(政府聲明不濫用《出版法》，果然後來援引更嚴厲的戒嚴法例。)打輸這場仗的報紙被抽掉了脊梁，直到1970年代中期才隨民主運動復甦。

以《聯合報》為例，1950年代的新聞自由鬥士，到1970年代搖身變成既得利益者，不惜反過來撻伐新興的反對力量，責難其他為新聞自由奔走呼喊的人。

李萬居是1950年代爭取新聞自由的另一個典型。他出生於台灣，抗戰期間回中國內地，與國民黨當局建立若干淵源。1947年回台，受命出任由日本人接收過來的《台灣新生報》社長。後來李萬居轉向批評國民黨，並創辦自由敢言的《公論報》。和雷震的《自由中國》一樣，李萬居的《公論報》以效忠蔣介石始，以批評蔣介石而受迫害終。李萬居是台灣參議會副議長，《公論報》是他向政府提質詢的公開論壇——他把質詢稿在報上和盤登出，抨擊國民黨違反民主的行徑。這種對蔣介石政權的公然反叛，最後換得的是家破人亡。秘密員警騷擾《公論報》，記者編輯動輒被捕，甚至李萬居的私人秘書都是情治單位滲透的特務。李萬居和雷震付出生命籌組中華民主黨，因國民黨的迫害而功虧一簣。國民黨羅織各種曠時費日的法律案件，使李萬居窮於應付，最後連《公論報》的產權亦被奪走(楊錦麟，1992)。十年爭取新聞自由的努力終告失敗。

## 1960年代：制度化的審查機制

國民黨政權渡過風雨飄搖的1950年代，進入了穩定沉寂的1960年代。這十年間東西衝突達到高峰，越南戰爭不斷升級，形勢有利於國民黨爭取美國的支持，蔣介石得以在聯合國和其他組織內代表中國。在島內，「白色恐怖」清除了許多當局眼中的潛在威脅，剩下的社會力量全在有效控制內。台灣經濟恰逢起飛，50年代末啟動的土地改革已嘉惠廣大的中下農民，60年代中葉以出口為導向的工業更進一步使台灣的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10%。這十年間，廣告幾乎每年增長21%，1969年總量達270萬美金，其中一半流向報紙。當局不但沒有建立信心，擴大政治參與，反而倡言經濟成長必須先求政治穩定，政

治穩定必須滅絕輿論噪音。經濟發展變成威權統治的藉口。如同港英的殖民政權，國民黨在台灣一心一意維護政權，企圖把公眾精力從政治領域引開，鼓勵他們追求經濟財富。報界的財政愈富，言論的膽子愈小。

國民黨統治控制的機制愈趨系統化，但其殘酷的程度則殊無二致。1964年，蔣介石在第二屆國民黨有關報業的會議上提示，宣傳跟軍事同等重要。會議決議動員報紙、文學和民意進行精神武裝。國民黨喉舌《中央日報》既受黨紀約束，無法報導權威的政府政策，又不能像民營報紙訴諸煽情的犯罪新聞招攬讀者，以致銷路慘跌，卒為《聯合報》和《中國時報》拋在後面。兩家民營報紙避免向官方意識挑戰，轉而在地方新聞採訪下功夫，繪聲繪影的犯罪新聞最受歡迎。

1960年代整個台灣籠罩在文化真空裏，人們沒有機會接觸外面的世界。30、40年代大陸上批評國民黨的左翼「進步文學」都禁絕了。當時最重要的《文星》雜誌(1957-1965)，強調自身性質是文化的，不是政治的——雖然沒有從政治角度正面攻擊國民黨政權，卻提倡「全盤西化」，集中火力攻擊傳統中國文化，因此激怒許多保守的文化精英，紛紛呼籲政府出面干預。國民黨右派得勢，譴責西方自由主義姑息共產主義，企圖為這兩個水火不容的主義搭上一座「陳倉暗渡」的私橋；《文星》卻偏提倡「人權」、「法制」、「民主」等西方自由價值，儼然與官方意識針鋒相對。該刊出版98期之後被迫關閉。當時年輕人對外界的接觸點主要就是各處的美國新聞處。艾普勒頓(Appleton, 1970)的調查顯示，大部分學生對政治非常冷漠，他們最嚮往到美國留學，然後滯留不歸。

1966年，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專注於內部的權力鬥爭，暫時無暇威脅台灣安全。國民黨的權力已經在島上生根，疊床架屋的安全單位收歸擴大編制的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管轄，對報界的控制日趨制度化，然而並不見得比較溫和。1996年，省政府的《台灣新生報》內數十位記者和編輯以「叛國罪」被判刑，從數年到死刑不等。1968年，中國



廣播公司廣播劇導演崔小萍受株連以「叛國」入罪。作家陳映真連同其他35人參加左派讀書會，閱讀包括毛澤東的書籍，而引來牢獄之災。陳映真坐牢十年。諷刺雜文作家柏楊在1968年被判刑十二年，起因是他在《中華日報》婦女版刊登美國卡通「大力水手」，描述一對父子出海捕魚，淪落在孤島，沒有希望回家，柏楊加的旁白仿效蔣介石發表《告全國軍民同胞們書》的演說，警備總部解釋為對蔣氏父子的諷刺。1970年，大陸籍作家李敖(《文星》的前主編)撰文得罪很多知識界和政界人士，被冠以「鼓吹台灣獨立」的罪名關進軍事監獄。最堪玩味的是李荊蓀。他在40年代末任南京《中央日報》總編輯，曾經刊登陸鏗揭發孔宋貪污新聞；初到台北的幾年，續任《中央日報》總編輯，仍以敢言著稱。1970年突遭逮捕，被判無期徒刑，罪名是年輕時參加過左派的讀書會。被捕時，李荊蓀頭上戴着三頂冠冕堂皇的帽子：親國民黨的《大華晚報》發行人、國民黨的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主任、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周至柔(蔣經國權力的勁敵)秘書。

戒嚴的政治受害者為警備總部關押於軍人監獄，至少十年。罪名無非是模糊的、莫須有的「叛亂」，許多人刑滿獲釋仍堅持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當局對文化界的迫害只不過是冰山之一角。那些年間台灣多少家破人亡，報界啞口無聲，毫無作為。他們含冤過了數十年，直到90年代後才一一獲得平反。

## 1970年代：反對勢力的發酵

1971年，聯合國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國民國，幾乎從根動搖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台灣再度成為「國際孤兒」。「反共友人」尼克森總統更在傷處撒鹽，1972年首途訪問中國大陸，在《上海公報》聲稱美國承認北京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權。外交節節挫敗，國民黨無法向人民交代。繼承問題緊迫，年邁的蔣介石準備傳位給兒子蔣經國，但受到不服氣的同輩「重臣」阻撓。1970到1972年間，蔣經國繞過父執輩的老

臣，直接與年輕的改革派知識份子建立溝通管道，特別接見《大學》雜誌編委五、六十人，多半是留美學人。蔣經國掌權後有一個很短的空檔，報紙言論比較開放。《大學》雜誌提出「革新保台」，希望繼承當年《自由中國》的民主香火，也主張政府必須發展一套福利政策照顧農民和工人。

這些年輕知識份子自詡為社會的良心，卻從未爭取草根的支持；他們贊成要有反對勢力，卻沒有以行動組織政黨。他們自鳴得意，認為接近蔣經國是「智者」和「權者」的合作。豈料蔣經國於1972年出任行政院長之後，這種對話嘎然終止。這批「智者」多是國民黨高官之後(所謂「公子」)，相繼奉召入閣，是為利益共同體。蔣經國也提拔少數貧苦出身的台灣人，使他們感恩戴德。對話終止後，有些左傾知識份子因為同情學生運動，受到監禁或被大學開除；另一批本地知識份子和國民黨一刀兩斷，投身反對運動的陣營(Huang, 1976)。

70年代，台灣經濟繼續飛漲，平均每年增長10%，廣告則每年平均增長22%。1979年，廣告總量達美金2億2400萬元。此時，王惕吾的《聯合報》和余紀忠的《中國時報》銷路都突破一百萬大關。《中央日報》的影響力跌得無足輕重。報禁政策把可能的敵手排除於市場之外在先，現在兩大報更有資金收購報紙登記證，建立遍無敵手的報團。70年代末，兩報發行人進入國民黨中央常會，余紀忠聯合黨內自由派，王惕吾與黨內保守派聯盟。國民黨收購了其他的報紙登記證。

### 「黨外」的崛起

時代變了，國民黨政府還以不變應萬變，繼續在台灣維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雙軌權力結構。民眾可以參加底層(包括市長、縣長、省議會)的選舉，卻不能選擇中央層級的官員或議員。高官職位是效忠國民黨的外省人的特權，國民黨政權口口聲聲代表全中國，堅持1948年在大陸潰敗前夕所選出來的國會須在反攻大陸後才能改選——而台灣面積位居

全中國35個行省之末，在三頭馬車的國會(國大代表、立法院和監察院)席次簡直微不足道<sup>4</sup>。國會議員若因死亡而出缺，當局即從來台效忠人士中依其原籍挑選遞補，奈何數十年歲月凋零，議員死亡人數快得讓政府來不及補充，簡直荒謬之極。然佔多數的台灣本地人仍被拒於國會門外，是可忍，孰不可忍？<sup>5</sup> 蔣經國推行行政改革，吸收一些年輕的技術官僚和安排若干台灣人進入政府高層職位，但整個國會結構的基礎絲毫未變，只在1972年增加象徵性的台灣省「增補選」席次<sup>6</sup>。有限的開放居然讓本地一些政客有機會初嚐禁果，得到基本行政能力的訓練，無意間也為政論雜誌的復甦鋪路。

蔣介石於1975年逝世，台灣經濟暫受第二次世界石油危機的中挫，中南半島陷入共黨之手，泰國和菲律賓相繼承認北京，整個台灣籠罩在低沉失望的氛圍中。蔣經國從國庫撥出巨大款項，推行「十大建設」，不但使台灣脫離經濟困境，也提升了它的工業基礎結構，刺激外銷。從《自由中國》和《大學》雜誌關閉，到1976年《台灣政論》出現，其間

- 
- 4 依照孫中山的遺訓，台灣實行五院制。立法院和監察院，連同國民大會，形成三頭馬車的國會。第一屆國會是1948年在大陸選出，任期應該在1951年屆滿。1949年隨國民黨抵台的立法委員總共有557位。他們連續3年(1950、1951、1952)通過議案延長任期，並籲請政府在他們的任期內光復大陸。1954年，國民黨政府怕難堪，只好要求大法官釋憲，宣佈在光復大陸後才改選第一屆國會。國民大會原仿美國的選舉人團，選舉總統以後就應該解散，可是國民黨投鼠忌器，把他們當作經常性國會的一部分。國民大會總共有2000多位代表，幾乎都是外省人，唯一的貢獻就是連續投票推選蔣介石(四任)和蔣經國(兩任)為總統。1987解嚴以後，大法官會議於1991年解釋讓老代表退休是合憲的。經過四十幾年，多數委員和代表年齡都已超出80歲或90歲。每人退休時領取美金20萬元和其他福利。
  - 5 不能到台灣履行任務的委員或代表，政府從屬有當地的省縣找人替補。可是時間久了，代表死亡率比政府能夠找替補代表的速度還快，到最後只好下令不再替補。至1991年，557位立法委員中，有400位(包括1949年當選和後來補上的)都死於任內。反對派政治人物譏笑他們是「表決部隊」。直到1992、1993年全面改選，國民大會和立法委員的本省籍才超出外省籍人士。
  - 6 國民大會代表900人，台灣省增補選50人；立法委員有380人，台灣省增補選50人。增補選國大代表任期6年，立法委員任期3年。1948年當選和以後補選的稱為「老委員」，任期不限。

台灣沒有敢言的報刊。《台灣政論》是反對黨領袖黃信介和康寧祥所創辦的，接續了《自由中國》和《大學》的民主香火。《台灣政論》進一步要求大陸人和台灣本地人分享政治權力，鼓吹開放國會選舉，解除戒嚴，開放報禁，並呼籲國民黨當局追求比較現實的外交政策，而不要死守那個用來剝奪台灣人政治權利的僵硬「一個中國」政策。該刊雖然只出版5期就被台灣警備總部封殺，但已足以為未來的台灣政論雜誌定下基調。

### 《美麗島》雜誌

台灣政治發展的分水嶺是1977年的「中壢事件」。縣長候選人許信良第一次率眾上街抗議國民黨作票。這一年，反對派候選人首次大有斬獲，囊括五個縣長席次，省議會21席（總數為77席），台北市議會六席，總計為普選票數的三成。初步勝利的滋味振奮人心，分散各地的反國民黨人士籌組一個鬆懈的「黨外」組織。自稱「黨外」，一來用以表明並非正式的政黨組織，迴避當局借黨禁之名加以迫害，二來則是和獨裁的「國民黨」劃清界限。國民黨投鼠忌器，怕「黨外」引起一黨專政的聯想，故意稱之為「無黨籍」。

「黨外運動」變成了「黨外雜誌」的同義詞。黨外雜誌是黨外運動主要的組織者和意識形態工具。黃信介在1979年出版《美麗島》，再也不耐於坐而言，而要起而行，反抗意識更鮮明。他在全島組織了11個服務站，由黨外運動的頭面人物來主持，許多是剛獲選的立法委員和省議員。他們借服務站的掩護，推動政治集會，推銷雜誌。《美麗島》銷路達每月8萬份。同時黨外的溫和派康寧祥出版了《八十年代》，鼓吹溫和改革。

《美麗島》雜誌是黨外運動宣傳和組織的堡壘，揭穿當局的宣傳，協調實際的行動，培養反對派的集體意識。黨外決定要求國民黨遵守它自己所訂的憲法和法律，許多律師和職業政治人物投入黨外運動，採取邊緣策略，把黨外言論推向當局容許的最大範圍。由於1949年共黨作亂

的記憶猶新，國民黨對任何群眾組織(特別是黨外的遊行)特別敏感，以致衝突時起，終於在1979年12月10日爆發了震驚中外的「高雄事件」，其意義的深遠比中壢事件有過之而無不及。那天是國際人權節，黨外不顧員警禁令，在高雄舉行戶外燭光遊行，引發警民衝突。黨外領袖除了兩位外全遭逮捕，接受軍法審判。

海內外輿論喧騰，蔣經國決定讓報紙刊登軍事法庭審判對答全文，此乃前所未有之舉。結果許多群眾讀了這些報導，覺得黨外領袖未必有罪(呂秀蓮，1991)。但《美麗島》雜誌仍被迫封閉，領袖銀鐐入獄，刑期從數年到終身監禁不等。接着，國民黨自覺四面楚歌，高層人事變動，強硬派抬頭，更加強控制新聞界。

### 從《自由中國》到《美麗島》

1950年代的《自由中國》與1980年代的《美麗島》，不論在形式、訴求和戰術上都有顯著的差異。《自由中國》扮演傳統中國士大夫諍諫者的角色，期待當局為國為民善納其言。雷震和他的戰友們後來相信除非有強大的反對黨制衡當局的權力，否則改革必將落空。但當雷震奮不顧身積極籌組反對黨時，原來敢言的知識份子卻反而畏首畏尾，例如胡適勸雷震籌組新黨須做國民黨的「諍友」，而非西方意義的反對黨，更千萬不要觸怒蔣介石(張忠棟，1987)。1970年代初的《大學》雜誌也傳承了這種「諍諫」的角色，改革派知識份子自許為社會良心，卻從不爭取群眾的支持。

這兩個雜誌的名字深刻地透露，革新派知識精英所關注的興趣已從抽象的中國轉向具體的台灣。《自由中國》發抒當年大陸來台自由派知識精英的心聲，鼓吹建設台灣為民主基地，將來回到大陸可以垂範中國，並主張島內的大陸人和本地人平等分權合作。隨着《自由中國》運動失敗，大陸人和台灣人合作的嘗試終於畫上句號。省籍糾紛自此越陷越深，日積月累，根深蒂固。

《自由中國》以精英進言為定位，《美麗島》以爭取群眾支援為導向。前者是知識份子的工程，後者是政治人物的企圖。《自由中國》的讀者圈僅限於都市知識份子、教師和公務員。1970年代中期由《美麗島》領頭的黨外雜誌，多由台灣本地人所操控，銷路遍及中產階級和草根群眾，希望打破國民黨的特權，爭取平等的權力分配和政治參與，以配合他們提升的經濟地位。政論雜誌探測國民黨容忍的限度，衝破國民黨對真理的壟斷，公開挑戰當局設立的政治遊戲規則。它們破解國民黨的政治神話，啟迪民智，讓普通民眾獲得到官方報紙接觸不到的新聞，開拓言論的疆域。很諷刺的是，50年代許多敢言的大陸籍改革派立法委員這時已成既得勢力，對於黨外要求國會全面改選深感不快。此時黨外運動受到愈來愈多民眾的支持，再也不滿足於美麗的辭藻，黨外領袖要的不是向當局獻言，而是向它的權力挑戰。

### 1980年代：封閉和開放

美國總統卡特於1978年末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但台灣對美國武器和貿易依賴續增，並未受到斷交影響。卡特提出「人權」為外交政策的主軸，連帶嚴厲批評台灣的人權紀錄。北京提出「一國兩制」，希望與台灣「三通」（通商、通航、通郵）。台灣認為這是中共的統戰陰謀，提出「不接觸、不談判、不撤退」的「三不」對策。

1970年代初，蔣經國以行政改革、擴大政治參與，解決權力危機。1970年代末，他卻選擇相反的路線，賦秘密警員以更大的權力，大量吸收、分化台灣本地派系，並實行經濟國際化。這是蔣經國的「柔性」威權主義，其父的「剛性」威權主義一去不復返(Winckler, 1984)。中共統戰攻勢猛烈，蔣經國批准成立「少康辦公室」(1979-1983)，由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上將主持，協調政府各部門反共和反黨外的活動。少康辦公室名義上是臨時編制，權力卻漫無節制，一時風聲鶴唳，受害者遍及知識份子、記者、作家和黨外人士。當局指控他們的罪名，不是

鼓吹台灣獨立的叛亂份子，就是共產黨同路人，兩者都有入獄之虞。以今視昔，這場恐怖風暴不過是當局的最後一搏，黎明前的黑暗，但處在當時的氣氛下卻不得不興長夜漫漫民主遙遙之歎。

### 「黨外」的復興與內鬥

高雄事件爆發後，黨外領袖僅有兩位逃脫牢獄之災(包括康寧祥)。一般認為黨外在短期內無法恢復元氣，豈知一年後，入獄者家屬和他們的辯護律師(包括二十年後當選總統的陳水扁)紛紛奔向反對派的台前，投身1980年立法委員選舉，呼籲民眾「重審美麗島」。黨外雜誌一時如雨後春筍，各式各樣的選舉傳單漫天飛，嚴厲批評國民黨。時候畢竟不同了，以往政治犯家屬普受社會唾棄，到1980年卻在選戰中大獲全勝。有些家屬躍身上前，不必闡述施政綱領，只要攻擊國民黨就可以贏得群眾的選票。

選舉維繫政論雜誌的命脈。儘管當局的騷擾無所不用其極，政論雜誌已在台灣的言論市場上生根，拔不掉了。政論雜誌既是黨外的宣傳工具，也是它的非正式指揮部，把鬆散的反國民黨勢力的言行組織起來。在黨外雜誌的輿論壓力下，兩大報為了增強公信，只好出版自己的政論雜誌(例如聯合報系的《中國論壇》和中國時報系的《時報雜誌》)，言論上比母報開放，但仍在國民黨容許的限度內。

黨外意識形態林立，利益衝突愈演愈烈(Domes, 1981)。溫和派領袖康寧祥在美麗島事件中被蔣經國特赦，倖免入獄，他繼續出版《八十年代》，並參選立法委員。但年輕激進的職業黨工以及受難者家屬在他們的雜誌上攻擊康寧祥向國民黨妥協，致使康在選舉中落敗。年輕激進的黨工甚至認為，國民黨開放這麼少席次競選，黨外(包括受難者家屬)都不應參選，以免點綴當局雞肋式的選舉；他們鼓吹黨外走向街頭抗議，進行體制外的改革，不要追求無望的體制內改良。他們動員大規模群眾集會，在街頭向國民黨施壓，迫使其加速變革。毫無疑問，高雄事件非

但沒有沖淡民眾的政治熱情，反而激發了狂熱的群眾參與。隨着派系林立，出現了各式各樣的黨外雜誌，不但一同攻擊國民黨，也指手畫腳互罵。這些雜誌完全淹沒、消磨於台灣的政治鬥爭浪潮中，無暇他顧，甚至中國大陸發生「文化大革命」和其後種種天翻地覆的變化它們都毫無興趣。

### 沒收黨外雜誌

1981年，警備總部宣佈秘密的第三號「安基專案」，動員一切情治和媒介單位打擊黨外候選人(所謂「陰謀份子」)及其競選總部。1982年10月，蔣經國親自指示國民黨中央常會，密切注意批評政府的記者和反對人士的動機。在他的命令下，國民黨設立特別委員會，爭取各議會、社團、廣播電台、電視、報紙和雜誌的支援，有組織地詆譭黨外運動，稱其「擾亂社會安寧」。

警備總部查禁黨外雜誌愈來愈頻繁，非但沒有章法，簡直為所欲為，理由通常是模模糊糊的「混淆社會視聽」。從1979年到1985年，有340份黨外刊物問世，其中60%被查抄(馮建三，1995：130)。許多雜誌在印刷廠和裝訂廠即被沒收，連申辯的機會亦不可得。即使根據《戒嚴法》的行政命令，雜誌只要取消若干文章和詞句，仍應可在社會流傳。何況沒收也須在成品階段為之，而不是在印刷廠裏執行。黨外一再抗議警備總部違反自己的規定。王昇將軍的情治單位還推出林林總總的雜誌，跟黨外雜誌針鋒相對，但影響力極弱。特別值得一提的，當局吸收投台的大陸紅衛兵，由他們編輯《疾風》雜誌，不但在紙面上攻擊黨外，還在黨外集會上使用暴力恐嚇群眾。台灣僅有的三家電視台的總經理職位都是政工將軍霸佔，許多報紙高層編輯人士也由王昇的政工學生出任。例如80年代初《聯合報》有八位副總編輯，一半畢業自政治作戰學校。

警備總部大權獨攬，政工人員橫行，其角色凌駕於行政院新聞局和



國民黨文化工作會之上。許多國民黨的審查人員原是記者出身，他們每晚致電各報總編輯(尤其是黨內人士)，指令如何處理敏感消息。警備總部跟蹤黨外領袖，監督他們的行動，沒收他們的雜誌，其總司令(三星上將)卻無需赴立法院備詢，出面的是文職的新聞局局長。《八十年代》常遭警總查禁，其發行人立法委員康寧祥質問新聞局長宋楚瑜「混淆社會視聽」是什麼意思，宋無法回答，推搪說新聞局從未憑「混淆視聽」沒收出版物，言下似乎抱怨警總做的事由他受過。

警備總部漫無邊際地沒收黨外雜誌，引起黨外憤怒、加劇朝野對立，卻無法阻止低成本的出版物一個一個不斷冒出。禁歸禁，黨外雜誌還有21家在市面流通，而且學會運用各種策略打游擊，在法令漏洞中申請各種「備胎」的出版執照：週刊、雙週刊、以及月刊，一旦正刊遭禁，備胎可以上路填補真空。例如康寧祥向新聞局申請三張登記證，一旦《八十年代》被禁，《亞洲人》和《潮流》立刻派上場。至於《亞洲人》是月刊或半月刊，《潮流》是週刊或半月刊，端看情況需要而定。這時當局倘再將政論雜誌納入報禁範圍來管理，必將引起公憤。黨外雜誌已經立足，無法除根。黨外雜誌發行人當選立法委員，就受言論免責權的保護，他們愈來愈公開向當局挑戰。

### 國民黨的內鬥

鑒於情治單位濫權，素有清望的國策顧問陶百川1982年在《自立晚報》撰文，呼籲文化檢查權由警總回歸新聞局，並施行普通的《出版法》，取代非常的《戒嚴時期管制出版物條例》。警備總部密召會議，圖以優厚稿費慫恿一批幫閒文人圍剿陶百川。內部檔案外洩，立法委員向行政院長孫運璿質詢，孫院長坦承不知情，但允予調查。國民黨當局立刻發動封鎖機器，然而《中國時報》和《自立晚報》拒絕撤銷新聞。《中國時報》發行人余紀忠身為國民黨中常委，報紙言論支持該黨的大方針，但對個別政策時有批評。警備總部圍剿陶百川的醜聞經報紙披露

後，王昇將軍只好向陶百川道歉。余紀忠一直是黨內保守派的眼中釘，這次更落其話柄，只好採取低姿態，退居紐約避難數月。此時，他在紐約出版的《美洲中國時報》銷路蒸蒸日上，但因為言論尺度較聯合報系的《世界日報》自由開放，激怒了台北國民黨高層保守派（見中國時報社，1990）。少康辦公室甚至支持極右派出版《龍旗》雜誌，登載大量文章和匿名投書，詆譏余紀忠為不愛國的投機份子。戒嚴令管制外匯的進出，余紀忠申請匯款到紐約補助《美洲中國時報》遭拒，當局要求他放棄言論權否則封報，他斷然選擇後者。

### 解除魔障

情治單位的控制愈來愈硬，台灣的民間社會卻歷經韋伯(Weber, 1958)所說的「解除魔障」(disenchantment)的過程。少康辦公室於1983年解散，可見國家暴力的魔力不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時入獄是黨外人士競選必要的資歷。康寧祥被蔣經國在高雄事件後特赦，他必須嘶聲力竭向選民解釋，以示清白。

黨外人士由怨恨情治單位發展到毫無忌憚，他們公開揭發國民黨官員的贓底，包括蔣經國的私生子等等，揭開權力的面紗。黨外雜誌憑着成本低，和情治單位玩起捉迷藏的遊戲。情治單位在黨外雜誌佈置線民，通常接到線民的舉報後在印刷廠「守株待兔」，隨時沒收整期「有問題的」雜誌。黨外雜誌犯禁的次數日多，情治單位人員不勝其煩。黨外雜誌也慢慢學會如何跟情治人員討價還價，一邊故意主動繳出若干本雜誌，以便他們向上級交差，但另一邊卻把查禁的雜誌轉到別的印刷廠印，然後廣泛在地下流傳。

哪一期遭禁，那一期大家就特別好奇。黨外雜誌刻意登一些犯禁的文章，先惹警總查禁，剩餘的雜誌則待高價而沽。黨外人事內訌，眾多黨外雜誌又被迫在有限的市場空間內競爭，為迎合一般人喜歡聳動內幕的心理，黨外雜誌不得不火中取粟，登許多在倫理上新聞上都站不住腳

的東西，犧牲了嚴肅的政治分析和批評，以致損傷公信，埋下自毀的種子。一到1986年，檢查制度開始崩潰，這些黨外雜誌失去生存理由，迅速走向式微。

當局有兩條路可走：繼續鎮壓，或追求民主。多年來國民黨內部的自由派和保守派明爭暗鬥，新聞界跟着政治氣候轉舵。1985年，「十信案」醜聞(巨款信託借貸倒閉)爆發，幾乎威脅台灣財政的穩定，兩位部長下台，許多人丟官，國民黨面臨信任危機。那一年，情治單位從台北派遣流氓到三藩市暗殺作家江南。警備總部接着逮捕洛杉磯《國際日報》發行人李亞蘋。李亞蘋當年能在台灣發跡，全拜國民黨所賜。現在政府認為她的報紙投機親共，故在返台期間逮捕她。但她已歸化為美國公民，美國國務院要求台灣立即釋放她，國民黨政權只能尷尬從命。民眾對當局的批評沸騰，士氣低落的警備總部更瀕臨瓦解。

1986年，亞洲鄰國變局重重：南韓全斗煥、菲律賓馬可仕相繼下台，民主浪潮在台灣引發了波瀾效應。年邁的蔣經國知道鎮壓不但無效，甚至會不可收拾，最後決定把他的命運和民主力量結合在一起。他毅然走向改革的前沿，以自身無上的權力清除了民主化的障礙。他下令研究如何回歸民主憲政，節制情治單位濫權，並批准國民黨與黨外人士溝通(主要的協調人就是陶百川)。黨外不等國民黨批准，就在1986年9月28日正式成立民主進步黨。

儘管政府一再警告，未經批准而組黨違背戒嚴法，必將嚴懲。但黨外人士拒絕接受恐嚇，120多位黨外領袖準備集體入獄。國民黨下令封鎖新聞，卻又被《中國時報》和《自立晚報》破格捅出。情勢緊張，持續數周，氣氛繃得猶如拉滿的弓，最後蔣經國讓步，決定新政黨只要遵守憲法、反對台灣獨立即可成立。蔣經國顯然深知高壓恐怖失效，他也不願意看到類似南韓幾個月前的流血事件再現，從此大步走改革之路。

1987年，長達38年的戒嚴終告解除，報禁開放，箝制新聞自由的劊子手——警備總部——走進歷史的塵堆。1988年初蔣經國逝世，蔣家陰

影迅速從舞台消失，台灣踏入一個新的世紀。根據戒嚴法設立的各種規定一一廢除，國會全面改選，新聞界免於政府檢查。政府第一次宣佈與北京緩和關係的意向，數百位記者訪問大陸。台灣與大陸的貿易於1993年達美金100億，其中不計台商在大陸的直接投資。曾經因言賈禍入獄(1968-1977)的作家柏楊說這是台灣政治與新聞的「黃金時代」：「中國有四千年甚至五千年歷史，從來沒有像台灣今天的這種世紀。」他說，「沒有一個時候人民這麼富裕和自由。」(Kristof, 1992)

### 結論：新聞自由的窗口、空間與反諷

#### 小媒介的政治角色

早期的傳播文獻總勸喻第三世界追求技術先進的大媒介，以取代傳統媒介和小媒介(Schramm, 1964; Lerner and Schramm, 1967)。這個觀點實在有必要商榷。大媒介在財政上增添第三世界的負擔，在內容上製造對外依賴。本文分析顯示，大媒介的老闆是既得利益份子，承載着支配性的意識形態，沒有理由向權威挑戰。台灣的運動團體財源匱乏，又無法接觸與官方接近的大媒介，他們採用小媒介毋寧是無可奈何的。不料正因小媒介的財政和科技要求簡單，造就它成了反對運動「有組織的情報」(organized intelligence)中心。

類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伊朗國王的高科技廣電媒介，居然被霍梅尼(Khomeini)陣營的傳教士、商人和學生組成的原始人際網路(他們所散佈的不過是一些傳單和卡式錄音帶)所擊敗(Tehrani, 1979)。地下刊物對於東歐和蘇聯的異見份子也很重要。具有諷刺意味的例子是，在中國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發動紅衛兵造反，到處張貼粗糙的大字報，對抗劉少奇一派控制的北京報紙和電台。這些另類的傳播或稱為「游擊媒介」(guerrilla media)，或「激進媒介」(radical media)。台灣剛剛解嚴時也有「綠色隊伍」(Green Team)利用移動的VCR鏡頭以人民的觀點記錄社會

衝突，以別於官方控制的隊伍，最後無疾而終。

小媒介固然發揮顛覆建制的功能，但其本身的內在限制並不容易克服。它們達及的受眾範圍小，以政治活躍份子為主。它們傳遞資訊間接，財政拮据，無力佈置完整的採訪網路，又接觸不到官方消息，往往必須依靠小道消息，有時嚴酷考驗它們的公信力。如果站在道德高地向官方控制宣戰，即使條件差，報導偶有失誤，它們仍然大有可為；一旦向市場靠攏，喪失理想主義，訴諸低俗趣味，唯恐天下不亂，故弄玄虛，重複製造一些不道德的曝光、虛假內幕和閑言蜚語，則必迅速喪失群眾，怎樣也競爭不過主流媒介。1950年代的《自由中國》表現了高度的道德性，1980年代中政府控制開始減弱時，許多政論雜誌卻因市場壓力競逐聳動。1987年後，各種選舉和集會活躍，政黨爭取民意空間，主流報紙重獲活力，黨外雜誌乃壽終正寢。

### 抗爭的公共空間

台灣檢查制度鬆動，政治參與擴張，都和國民黨控制的雙重性攸關。國民黨是個威權政體，卻無法全面封閉抗爭的公共空間。質言之，國民黨自稱是孫中山的信徒。孫中山除了揭櫫反滿的漢人民族主義，他的民權主義乃根據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理想，民生主義則以費邊社的社會民主經濟理念為藍本。國民黨當局從未否定抽象的民主自由，實際上卻藉口國家安全，進行威權統治。講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提供黨外雜誌攻擊當局的最好靶子。反對勢力向國民黨抗爭，就是訴諸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以及有自由進步色彩的中華民國憲法。黨外叫得最響的口號是：「回歸民主憲政！」

從比較的視野觀之，如果左翼的中共把民間社會政治化，右翼的國民黨就是把民間社會非政治化。在中國大陸，黨國壟斷國民生計和正確思想，文革時期更巨細無遺干預民間生活的每個領域，連娛樂甚至體育都國家化。國民黨只顧動員媒介，為的是合法化它的統治，此外疏導民

間的精神力遠離政治，鼓勵他們到商界大展雄圖。國民黨經過數十年的社會「去動員化」(demobilization)，但等到經濟繁榮到一個地步，人心求變，轉而接受黨外的啟蒙。政治參與在短期內也許和追求經濟財富相抵觸，因為70年代期間國民黨辯稱只有政治安定才能夠經濟繁榮，而為了政治安定必須犧牲公民自由。但經濟富裕最終會促使公民社會成長，要求相對獨立的報業和更多的政治參與。

報紙、國民黨和反對勢力

反對運動和黨外雜誌對台灣的民主化的貢獻厥功甚偉，但它們獨力難撐天，需要與盟友並肩作戰。官方的報紙和廣電視民主改革如寇仇，固不論矣，主流民營報紙的角色比較複雜而矛盾：《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在意識形態上和黨內的保守派和自由派聯盟，緊跟着政治風向。黨內自由派佔上風時，言論空間比較寬鬆；保守派抬頭時，言論轉趨緊張膽怯。《中國時報》社論是政治風向的指標。在報導個別重大政治敏感議題時，例如《中國時報》揭發警備總部圍剿陶百川事件，它們對民主化的進程功不可沒，只是這類特例並不多見。

主流報紙鼓吹民主自由和反共的理念，自70年代開始，兩大報內部都成立專欄組，經常向國內外著名學者約稿，轉彎抹角批評國民黨的戒嚴和報禁。20年間幾乎沒有一天不刊登這類的學者文章，有的還儼然被捧為學術明星。選哪一位作者撰文當然反映了報紙的意識形態。學界明星各取所需，摘錄引述中國古人(孔子的「行仁政」)和當代西方政治學家(如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強調政治「穩定」)，不斷鼓吹自由理念，如制衡、人權、憲政，這樣把國民黨的控制襯托得更不合理。兩大報銷路各超出百萬份，它們普及「抽象的」民主價值和新聞自由理念，促進民主變革水到渠成，功莫大焉。隨後黨政軍各報也東施效顰，紛邀極右派學者駁斥自由派學者，只是影響力不大，聊備一格罷了。

主流報紙和黨外雜誌在某個意義上算是「異床同夢」。那些乾巴巴

而沒有公信的黨報、政府報和軍報相繼失勢，兩個私人報團成為輿論重鎮。它們很少為反對運動辯護(《中國時報》時受黨內保守派的騷擾，有點自身難保。)，許多時候更站在當局的立場，口誅筆伐反對勢力「無法無天」，黨外刊物也常斥責兩大報懦弱和偽善。但反諷的是兩大報無意間為黨外雜誌延年益壽：黨外雜誌窮困得很，因陋就簡，請不起專業記者，人事不穩定，又接觸不到官方消息，最後求諸主流媒介記者的奧援。有改革理想的記者普遍信仰美國新聞自由的理想，不滿本報的膽怯，於是暗地背着老闆，紛紛將報社不敢登的稿子投向黨外雜誌。為了生計，他們給有錢有勢的母報寫些「恰當」的東西；為了良心，又給捉襟見肘的黨外雜誌寫別樣的東西。他們用各種筆名寫文章，以防老闆不快，以避警總耳目；要不是他們，許多內幕消息和批評國民黨的文章必無法見天日。從這個角度來講，黨外雜誌和主流報紙「異床同夢」了15年，直到1986年解除戒嚴為止。

解嚴以後，1987年到1995年期間，國民黨權力階層鬥爭白熱化。李登輝是第一位本地人當選總統，他公然藐視中共政權，仇視黨內「外省」政敵；郝柏村將軍領導的外省集團批評李登輝的分裂傾向，勢同水火。有一陣子，《中央日報》冷嘲熱諷郝；軍報支持郝；《聯合報》與郝同盟；《中國時報》兩邊都不得罪；《自由時報》堅決挺李，韃伐他的政敵。1996年總統大選，中國大陸在台灣海峽發射導彈，文攻武嚇，議題進入哈林(Hallin, 1986a)所謂的「正當爭議區」(sphere of legitimate controversy)，多數報紙在三個候選人中保持中立，不偏不倚。迨李登輝以壓倒性多數票當選，權力一統，言論中心回歸權力結構，重畫媒介「同意區」(sphere of consensus)和「異議區」(sphere of deviance)的界限。解嚴後媒介言論百無禁忌，但多半集中炒作統獨問題和權力鬥爭(Lee, 2000)。民進黨於2000年擊敗國民黨，首次執政，媒介和權力的關係繼續微妙演化。民進黨缺乏大資本辦報，市場對政黨報紙也沒有興趣；選舉中民進黨答應推動政黨退出廣電媒介，當選後遲遲未能兌現，社會批評此起彼落。

## 市場檢查

本章集中分析國家的檢查，但戒嚴以後經過十五年的實踐印證了一點：國家檢查制度不是威脅新聞自由的唯一來源，另外一個威脅來自市場壟斷，尤以媒介所有權高度集中為然(參考Jansen, 1991; Garnham, 1990; Herman and Chomsky, 1988; Murdock, 1982; Bagdikian, 1982)。在台灣，政府箝制媒介的威力降低，市場集中的危險更為鮮明，這時有必要在自由多元的政治經濟學之外(或之上)引進激進的觀點，詳見本書第二章。開放報禁後，200多報紙一窩蜂搶着登記，新報之中只有《自由時報》在市場立足。報紙市場早已為兩大報瓜分：戒嚴時期，台灣媒介廣告大致由兩大報瓜分三分之一，三家官資商營的電視台壟斷三分之一，其他媒介只能分食剩下的三分之一。解嚴後，兩大報在原有的厚基上，各灑下二億元台幣的投資，高薪延攬人才，更新設備，擴版擴張，在中南部成立印刷廠。新報進入市場的門檻太高，除非財力雄厚，否則沒有競爭的空間。主流報紙發揮意識形態的彈性，吸收各式各樣的觀點，而排除一些邊緣的觀點。反對黨雖獲得合法身份，卻無錢經營報紙。以前出版《八十年代》的康寧祥，集資創辦《首都日報》，慘澹經營15個月，虧損1600萬元美金，黯然關門。<sup>7</sup>《自立晚報》自恃戒嚴時期言論較開放的優勢，增辦《自立早報》，準備大展鴻圖，終因兩大報釋放的能量，伸張到晚報市場，《自立》報系的市場打不開，日報晚報先後壽終正寢。《中央日報》從大報變小報，苟延殘喘；次要黨報《中華日報》喪失國庫的挹注，關門大吉。軍方的《台灣日報》出售給私資。中央通訊社由黨營變為國營。在夾縫中生存的地方小報(如《民眾日報》和《台灣時報》)頓失報禁政策的保護，紛紛夭折。

《自由時報》的興起象徵權力與金錢關係的重組。媒介給新興資本

---

7 康寧祥等人申請電台執照為官方所拒，反對黨不顧官方禁令於全島範圍成立了所謂的「第四台」，見第九章。



家和新興政治勢力增加政治影響的機會。《自由時報》老闆林榮三以地產致富，原來當監察院副院長，任滿爭取院長題名，頗受國民黨高級黨工反對，並為兩大報奚落為「金牛」，題名失敗後乃決定辭官辦報。1992年，他斥資一億二千元台幣發動宣傳攻勢，兩年後又拿出五億元台幣辦理贈獎，使銷路直衝上60萬份。到1996年初，各報聯合漲價到15元，《自由時報》維持10元的價格，兩大報無意間各流失20%銷路到《自由時報》。《自由時報》一不做二不休，免費贈報30萬份，逼得兩大報跟進，各免費贈送十萬份。為了侵襲兩大報的發行網，《自由時報》給報販多一成利潤；有些住地的兩大報訂戶均獲免費贈閱《自由時報》。1996年該報廣告漲價四成，但仍入不敷出，兩大報的增長卻為之停頓。原來兩大報與老國民黨結合的侍從結構失去作用。三報從此鼎足而立，掌握報業競爭的遊戲規則。及至90年代《自由時報》緊跟李登輝的路線，黨同伐異，國民黨喉舌《中央日報》變得多餘(Lee, 2000b)。2003年，走性和暴力聳動路線的《蘋果日報》，從香港挾巨資在台北辦報，市場搶奪戰更形白熱化。

台灣整個傳播政策包括各種新科技，例如衛星、公共電視、有線電視，在在需要通盤重新檢討。衛星電視從日本和中國大陸的溢播，信號長驅直入台灣千家萬戶客廳。新科技顛覆了原來三台的壟斷，但也危及台灣的文化自主權，當在下一章詳述。台灣在政治新聞自由獲得重大的勝利，然而民主變革也帶出了國家認同的問題：台灣應該與中國統一，還是應該脫離中國？台灣媒介必須善用辛苦獲得的自由，回應四個重要的挑戰：媒介集中化的傾向，科技發展模糊了國界、顛覆了政府權力，日本和中國大陸的文化溢播，以及國家認同等問題。



## 電視文化何處去？

處在大陸政治與海洋經濟的夾縫中<sup>1</sup>

---

「中國結」延續了中國近代受帝國主義欺凌的歷史經驗，因而將自己設定在「帝國主義——民族主義」的主軸上。……對中國和台灣人民一方面促成了自救，而在另一方面它也造成民族內的「自我剝削」。

——南方朔(1986)

今天台灣的困局在於它的經濟是海洋中國的一部分，而政治意理卻仍然是大陸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一直參與東亞成長的經濟奇蹟，卻甩不掉大陸政治理想的遺產。過時的想法與合時的作法並存，這是一個顯例。

——費正清(Fairbank, 1976)

### 政治意理與經濟現實的分分合合

四十年來，「中國結」與「台灣結」的瓜葛始終是個最敏感的政治禁忌，社會上一般人只能心照不宣。但時代在變，潮流也在變，近數年來知識界終於打破了長期的沉默，走出心頭上抹不去的陰影，以嚴肅的態度「再發現」歷史的面貌(譬如：蕭新煌，1986；戴國輝，1985；尹章義、黃光國、南方朔、張茂桂，1987；謝長廷，1986)。本章旨在從「大陸政治」和「海洋經濟」的辯證關係，透視台灣政治文化的本質，以為

---

1 本文最早成稿於1978年，是我的博士論文中的一章，兩年後論文出版成書(Lee, 1980)。1986-87年在中央研究院客座，配合當時政治改革的情勢，以中文改寫此文發表，並收入拙著《傳播帝國主義》(台北：久大，1987a)。該書已絕版。現在我決定收入本文，為本書提供背景參考，但文章裏指涉的年份和口氣一仍其舊，以反映當時台灣的氛圍和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

盤根錯節的「兩結」問題清理部分脈絡。

「中國結」是甚麼，目前尚未發展出嚴謹的學術概念，但粗疏地說，是指以中國為凝聚認同的一叢核心(Core)標準、信仰、價值和態度。它一方面凸顯「我群意識」，以別於「非中國」的國家、民族社群；一方面又與次群體的「台灣結」具有結合與分離、和諧與矛盾的辯證關係。這種關係一旦被扭曲而不能獲得統一，則可能演變成一種中心對邊陲的支配、邊陲對中心的反支配關係。放在台灣這四十年的環境來看，大致說，在1972年以前，統治結構的力量獨大，民間勢力的自主性微不足道，「中國意識」被窄化成為泛政治的意識形態，然後滲透到經濟及文化各生活領域裏去。1972年以後，「台灣經驗」的現實性反過來制約「中國意識」的理想性，以致經濟動力衝破了長年的政治神話，民間社會相應地要求統治結構在現實的基礎上重新分配權力資源。(1987年解除戒嚴是一個更大的分水嶺，在第九章詳細敘述。)

### 過時的意理·現實的作法

四十年來，台灣活在一個古老政治的理想中，也活在一個現代經濟的現實裏。這就是費正清說的「大陸中國」與「海洋中國」的對立。「大陸中國」延續、承傳了中國列朝列代的政府傳統，這個以農業與官僚體系為主的帝國始終在不變的格局中求變。「海洋中國」以個人企業為基元，強調以投資風險獲取商業利益，因此積極進取，冒險求變。費正清說：「今天台灣的困局在於它的經濟是海洋中國的一部分，而政治意理卻仍然是大陸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一直參與了東亞成長的經濟的奇蹟，卻未甩掉大陸政治理想的遺產。過時的想法與合時的作法並存，這是一個顯例」(Fairbank, 1976)。

以言「大陸中國」，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回歸祖國懷抱，中華民國與西方四強躋身同列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成員。1949年政府撤台。1971年聯合國大會以七十五票對三十六票，接納中共的席次。國際環境

大變特變，外交節節挫敗，但政府光復大陸的理想、維護法統的信念卻似乎以不變應萬變。龐雜、老化、無代表性的國會繼續行使職權固不論矣，戒嚴體制更以安定現狀為最高原則；政府堅稱人權與反共不可分割，故頗為敵視知識份子以西方民主標準來批評其人權紀錄；一些反映現實的政治、社會、文化、學術思想活動，也不斷被帶上親共或分離主義的帽子，1977年的「鄉土文學」風暴就是最明顯的表徵。四十年來，政府汲汲以中國文化的傳承者自居自許，並且以它作為權源之一；每逢政治挫敗或危機時刻，受傷的文化意識往往凸顯並深刻化，因此視「台灣意識」為相反而非相成的。

以言「海洋中國」，台灣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內進行「依賴性發展」(dependent development)，所付出的生態與人文代價頗高，但其既依賴又發展的業績卻是第三世界較為成功的範例(杭之，1987；Gold, 1986)。以生產面來說，1953年至1984年之間，每年平均經濟成長8.8%，遠比工業化國家(3.5%)和開發中國家(5%)為高。以分配面來說，台灣的經濟果實也比較有效地「向下滴」(trickle-down)，使社會各階層受惠。以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來計算，台灣財富的平均比美日有過之無不及。又如1952年，台灣三分之二的人口僅擁有11%的財富，而最上層的五分之一人口卻佔有61%；1975年，前者升為百分之22%，後者降為百分之39%。可以說「台灣經驗」在經濟生產與分配的指標上都是相當成功的。

經濟繁榮促進社會的大幅進步，例如1970年代中期，海外發展委員會(Overseas Development Council)以壽命年限、識字率及幼嬰死亡率等指標來衡量生活品質，台灣在第三世界可謂鶴立雞群。但是，以經濟繁榮來促進政治參與的步伐卻瞠乎社會面之後；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政治自由指標」，以一百分為滿分，台灣只得四十二分，雖然比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國家高，卻望西方工業化國家和日本之塵而莫及(Time, 1978年3月13日)。即令如此，近年來，民主運動風起雲湧，水

到渠成，其實也就是經濟力量突破、掙脫政治束縛的結果；換言之，中產階級日漸增長，進而至於爭取政治參與的權利。

## 「中國結」與「台灣結」相生相剋

政治意理與經濟現實長期失調，形諸電視文化，便是「中國結」與「台灣結」的扞格——大陸政治與海洋經濟的關係是辯證的，兩面的，其相激相盪塑造了台灣電視文化三種奇特的性格與面相：

一、整體說，台灣的海洋經濟是資本主義的「依賴發展」，在這種體系下孕育的文化建築總是以商業利潤和市場消費為主導，電視自然也是牟利的工具。但大陸政治卻懸特定的文化意識或世界觀為鵠的、為使命，不惜以文化建築(包括電視)來服務這些預設的政治目的。其結果，則形塑了台灣電視文化的雙重性格：一方面以利潤掛帥的娛樂性節目為主體，另一方面則以新聞與言論鞏固保守的現狀與意識形態。

二、上述的雙重性格平時相安無事，因為商業導向的娛樂節目也無非強化既有意理霸權罷了，而未向它有任何挑戰。但在此一前提下，「中國結」打擊了「台灣結」，或者說大陸政治干預了海洋經濟，意識形態超越了市場利潤。其結果則是積心慮慮地壓抑本土語言文化；這不但表現在法律制度之上，也表現在日常實踐之中；不但電視語言政策如此，其他政策亦然。就電視而論，拜經濟成長之賜，電視的基礎結構完備，射程幾乎涵蓋全島，深入95%以上的家庭，不是少數人的專利品。若純以市場利潤為目的，則電視應當以本土語言及內容為主，爭取最大多數觀眾，以符合效益的原則。但大一統的中原意識形態卻不能容忍甚至敵視地方色彩，最後政府出面，以法律手段明白抑制本土語言文化的發展。

三、誠如南方朔(1986)所說的，「中國結」以「帝國主義——民族主義」為主軸。故大陸政治特別強調民族尊嚴，強烈排斥外來文化影響。尤進者，海洋經濟既然使電視變成了大眾媒介，電視更透過市

場機能的運作，以本國製作的節目取勝。可以說大陸政治和海洋經濟在這一交會點上有辯證的統一，以至台灣電視內容自製率之高，睥睨第三世界。

由是觀之，大陸政治與海洋經濟分分合合，有和諧面，也有衝突面，必須置諸具體經驗中省察。以下即以這裏所揭示的三個提綱逐一分析。

### 官資商營的電視制度

不管在經營方式上或節目內容上，台灣的電視總是步美國之後塵，以利潤掛帥。儘管日本軍國主義者治台五十年，將台灣建設成重要的海軍基地和糧食原料的供應地，但日本在台灣廣播史似未烙上深刻的印記。日本嚴厲統制台灣人民的思想，搞皇民化，所恃的工具以學校教育為主，報紙為輔，廣播則微不足道。1947年，台灣光復後兩年，全台灣只有9740台收音機，平均每千人分不到1.5台，當時也只有5個小電台而已。1949年以後，政府強化廣播的發展，電台數目直線上升，一則以干擾海峽對岸的共黨廣播，一則是經濟成長使廣播普及為大眾媒介。

台灣的廣播官商混營，1974年總共有111座電台，80%被黨政軍所囊括，其中不少得仰賴政府撥款輔助，它們彼此之間又缺乏分工協調，論者斥之為浪費公共資源，抵消廣播媒介對國家發展的貢獻。剩下20%乃私營，靠廣告生存，後來電視興起，競爭愈激烈，變成不折不扣的商業至上。

電視：自由經濟的櫥窗

政府口口聲聲以「復興中華文化」為己任，骨子裏卻任令電視台商業化和庸俗化，一切向美國看齊。1960年代初期，國庫拮据，無力支持公共電視；政府夸夸其言大眾媒介應負什麼文化使命，卻未必真正了解媒介的潛能，所以徒有口惠而實不至。從1962年台灣電視公司(台視)成

立，以迄於1976年《廣播電視法》通過，政府竟拿不出一套完整的政策來。60年代正是美國擴張主義的極峰期，「自由中國」急着向國際社群表態，宣示它對「自由企業」的許諾，電視於是適時地扮演了經濟櫥窗的角色。電視之所以誕生，顯然以政治和經濟立場為出發點，文化理想毋寧是事後補貼上去的粉飾。

台灣的電視結合了黨政軍等官僚體系和私人商業勢力，是個典型的「官僚商業結合體」(bureaucratic-commercial complex)，它具體而微地彰顯了台灣若干產業的關係與形態，也包辦了權力、財富與是非。台視成立時，省政府佔49%，4家日廠(富士電視、東芝電氣、日立製作和日本電氣)佔40%，國內私人企業佔11%(《中華民國電視年鑒(民國五十年至六四年)》，1976)。開播頭兩年虧損，但迅即賺取厚利；1969年淨利達美金300萬元，合成長率120%。

### 官僚商業結合體

台視這塊肥肉令人垂涎，商業勢力莫不想啖一口。1969年，蔣介石下令籌組第二台，有意參加的各方面來者不拒，這就是中國電視公司(中視)。談判結果以黨營的中國廣播公司(中廣)投資50%，餘由私營電台(28%)和其他商業勢力(22%)分享(《中華民國電視年鑒(民國五十年至六四年)》，1976：16)。中視進入市場，瓜分廣告來源，一時搗亂了財政均衡；幸因經濟繼續繁榮，台視和中視的財源又回升，滾滾而來。

1971年，教育部決定擴充屬下的小規模教育電視台，挹注500萬美元資金，改稱為中華電視公司(華視)，議定由教育部和國防部分佔49%和51%。華視明白說要倡導社會和軍事教育，並以此作為設台的理由，焉知成立未久，不旋踵間卻改變為「多元目標」(《中華民國電視年鑒(民國五十年至六四年)》，1976)，其實就是商營電視自負盈虧的飾詞。16年來，華視孜孜爭利，與其他兩台無異，早把文教宗旨降



格為聊備一格的次要目標。華視一登場，台視和中視財務立刻受到打擊。1974年阿拉伯國家禁運石油，觸發了全球性經濟衰退，台灣也不能倖免。後來經濟復甦，三台又復舊觀，至1977年，三台合賺500萬美元。

各界籌組中視時，社會上普遍殷望新台打破專利，以為觀眾提供更豐富的選擇，可是實踐的結果似乎適得其反，節目量增加，品質並未跟着多元化。兩台競相追逐「中間市場」，內容向市場低頭，題材更加窄狹；華視參戰後，更是火上添油。耐人尋味的是：華視以文教自詡，卻缺乏文教味道(除了教學節目以外)；為了迎頭趕上，更不惜比兩台更赤裸裸地商業化。據估計，70年代初，華視的廣告比例不但高於台視或中視，並每每「廣告新聞化」，黃金時段更有多至一分鐘一個廣告的紀錄(李瞻，1976)。

### 寡頭壟斷，行政快刀

三台競相以娛樂為號召，爭取廣告，忽視新聞、公共服務與文教節目。由此觀之，寡頭壟斷不但沒有增加觀眾的選擇，反而導致內容的千篇一律。例如，1971年間連續劇為市場的寵兒，華視每晚排滿了四檔連續劇，其他節目一律封殺，借此拉攏觀眾。三台你爭我奪，不啻進行割喉競爭；觀眾要甚麼，電視台就給甚麼。但電視貪婪無厭，日日夜夜狼吞虎嚥，以台灣人才腹地之薄小，實難滿足它的需索無度。一般製作人和編劇人只知「軋戲」，應付眼前工作壓力已經來不及，無暇創作，因此拚命炒冷飯，甚至隨寫隨拍，觀眾怨聲載道，最後只好勞駕政府出面干預、收拾了。

新聞局於是拿出行政的快刀斬亂麻：

——由於觀眾抱怨連續劇拖個沒完沒了，新聞局在1977年製作的《廣播電視節目規範》規定每齣連續劇不得超出60集，翌年更削減為30集。(後又增至40集。)

——各台每晚不得播超出一個小時國語劇和兩個30分鐘的閩南語劇。

——1980年又限制單元劇不得多過20個單元，以集數論最多不得超過60集。

——《廣播電視節目規範》第19條規定：連續劇不宜輕易否定「正面人物」，避免性格矛盾的人物及其特性，避免強調種族、社會階層及上下兩代間的衝突和界限。

——1976年，《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第21條及第22條規定：除新聞外，節目及劇本應於播放前七日送新聞局審查，節目時間表於十天前送核備。

業者所受限制重重，觀眾也厭倦了連續劇。連續劇式微，綜藝節目抬頭。但又重蹈覆轍，唱來唱去就是那些歌，尤其部分歌詞俗穢，為整個社會保守的道德規範所不容。新聞局又下一道命令，要綜藝節目平均分配為藝術歌曲、「愛國歌曲」和流行歌曲。

三台屢犯清規戒律，政府不勝其煩。1978年，政府任命三位有政戰背景的人士出長中視和華視。他們上台後，立即協議停止挖牆腳、拉廣告等惡性競爭，信誓旦旦要提高文教節目水準，「淨化」眾矢之的的商業化節目。翌年，台美斷交，民情沸騰，三台輪流播十多部反共影片，而綜藝節目旦夕間變了個樣子：豪華鋪張的排場不見了，藝人濃妝艷抹不見了，「不健康」歌曲也不見了。綜藝節目以「愛國歌曲」佔三分之二，插播的口號標語還不計在內。一旦群情稍穩，觀眾便迫不及待向電視台抗議「疲勞轟炸」。

綜藝節目在1978年至1982年間盛極一時。1983年間，觀眾興趣減低，綜藝節目乃漸趨式微，由單元劇及鼓勵觀眾參加的益智節目或表演節目所取代。後來又回到以連續劇為主流。

## 《廣播電視法》壓抑本土語言

政府官僚體系要電視台怎麼樣，電視台就得怎麼樣。政府體系不但掌握了電視台最大的股權，還操縱了人事任免權；所任命的董事會成員，不是具有黨政軍背景，便是巨商富賈，他們的基本價值與意識形態以維護現狀為上，碰到敏感政治問題或諱莫如深，或自我設限，甚至扭曲真相。

換言之，在娛樂節目上，電視台以商業掛帥，全面應和「最低公分母」的文化口味；在新聞報道的立場上，電視台卻與所有權的背景黏貼在一起，成為權力結構的意理機器(ideological apparatus)。身為大股東，政府並未分享電視台的利潤，但在1974—1975年經濟不景期間，反需給電視台廣告，以度過難關，是毋庸置疑的「特權」(李瞻，1975)。

觀眾儘管理怨節目低俗，他們並不是要求更多的文教節目，而只是希望提高娛樂節目的品質而已。倒是少數積極鼓吹公共電視的知識份子，與領導官方「文化復興運動」的「新孔教」人士一拍即合，呼籲要改弦更張，全面放棄商業電視。1968年教育部文化局負責草擬《廣播電視法》，最早的構想即是把商業電視變成公共電視，這種主張當然有種種政治顧忌，只好退而求其次，以嚴格管理節目和廣告為重點。

其後文化局裁撤，業務移併新聞局。《廣播電視法》拖到1976年，才由立法院通過施行。業者、立法者、主管單位和社會各界的討價還價，斑斑可考。該法比新聞局原來的草案在管理條例上要弱多了。新聞局獲到的行政責任雖然廣泛，但多囿於技術管理(如節目檢查)，而無權制定整體性、前瞻性的傳播政策。《廣播電視法》根本未動搖商業電視制度的基礎，反而承認其正當性(legitimacy)。商業性娛樂節目照樣一枝獨秀，法律上規定可以高佔整個節目結構的一半(第17條)，節目自製率總在八成以上，但風格和內容卻普遍抄襲自美國。總之，中國文化的大影子在《廣播電視法》的綱領中活現，但法律卻未

有甚麼實質作為，文化關懷在經濟的衝擊下消失得無影無蹤，也就是「講一套，做一套」罷了。

從一半降到個位數

《廣電法》訂外國節目的上限為30%(第十九條)，但把方言(指閩南語)節目壓得更低，而且必須「逐年減少」(第二十條)，其刻意壓抑本土語言文化，昭然若揭。其實節目進口率一向很低。《廣電法》莫非承認現實而已；但對方言的限制卻在實質上有戲劇性的作用。閩南語節目從最高的50%，一壓再壓，直到目前的10%以下，政府的態度和壓力乃其主因。閩南語節目直線下降，可在表8-1清楚地看出來：1970年代初期，三台競以閩南語節目在市場爭利，估計約佔整個節目結構之半，畢竟以閩南語為母語者佔八成人口，電視當然要投其所好。但「中國意識」者卻以為這是為分離主義火上加油，阻礙民族統合。一件文化和商業行為獲得泛政治的解釋，後果就可想而知了。於是，1972年時，三台都已將閩南語降到20%以下，其後續降。要注意的是：當時《廣電法》尚未通過，而方言節目已大降，顯見政府無形的壓力。依據1976年通過的《廣電法》，方言節目還可以「逐年減少」。近年來方言節目比例大致穩定，但1985年更降至個位數字。

表 8-1 閩南語電視節目比例

	1970年代初	1972	1976	1980	1983	1985
台視	*50%	17%	10%	12%	11%	8%
中視	47%	20%	12%	13%	11%	9%
華視	*50%	16%	12%	13%	11%	6%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電視年鑑》(1976、1978、1984、1986)

\* 估計數字

回顧文化局草擬《廣電法》時，已準備對閩南語節目積極設限。後來《廣電法》送立法院審議，若干保守委員更把「中國意識」提為無限

上綱，堅決主張「立即全面禁絕方言」，有的則以為不妨分段逐步漸進取消之，雙方爭論不休。行政院長蔣經國表示，不妨保留若干閩南語節目，播報氣象和農漁消息，以利不懂國語的老一輩觀眾，塵埃始告落定。於是，最後定案的《廣電法》第二十條說：「電台對國內廣播播音語言應以國語為主，方言應逐年減少；其所佔比率，由新聞局視實際需要定之」。

據《中華民國電視年鑑》(1984)記載：(民國)67年行政院組成電視事業改進研究小組，規定閩南語節目每天不得超過一小時，並且必須分兩個半小時，在午間和晚間分別播出。午間三台閩南語節目不得重疊，因此每台必須按兩個月播出閩南語節目、一個月播出國語節目的規定，輪流交替。自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午一小時的節目，三台多分別播出半小時以內的午間新聞，以及半小時的國語或閩南語連續劇或連續式的單元劇。晚間的半小時閩南語節目，又經規定必須安排於晚間七時半以前，但三台亦不得重疊。因此三台晚間半小時的閩南語節目，亦在六時半至七時半之一小時內，輪流交替，更換播出時段。至於閩南語節目形態，不外乎閩南語連續劇、歌仔戲及布袋戲等。

趕盡殺絕而後已？

到了這個地步，若干文化及政治保守份子仍意猶未足。同一年，新聞局長在立法院接受質詢，被譴責未依法再進一步減少方言節目；新聞局長答覆說，閩南語節目已減到全部播出時間表的七分之一以下(《中央日報》，1978年4月13日)。

再徵諸市場上最搶手的閩南語連續劇和閩南語歌唱節目，更可見本土語言的命運之一斑。台視早期的娛樂性節目，以國語電視劇、閩南語電視劇和綜藝節目分類；其中綜藝節目的閩南語也跟國語平分秋色。所謂綜藝節目，共有閩南語歌曲、國語歌曲、西洋歌曲和綜合節目等四類；最後一項的綜合節目以《綠島之夜》為例，早期閩南語歌曲佔四

成，舞蹈佔兩成，國語歌曲佔兩成，外加短劇和西洋歌曲也佔兩成(《中華民國電視事業的回顧與前瞻》，1981：19)。

如今，閩南語電視劇早已式微。閩南語歌曲呢？1977年，新聞局制訂《廣播電視節目規範》，第21條說：「國語節目應全部使用國語播音，不得任意夾雜其他語言。其所播放之歌曲，除報經核准者外，亦應以國語歌曲為主。」每個綜藝節目頂多只能唱兩首閩南語歌曲，外國歌曲卻無此限制。此外，中視在1976年以前有四線連續劇，後來減為三線，即中午時段由國語和閩南語輪流播出，晚間七時至七時半為閩南語，八時至九時為國語(《中華民國電視事業的回顧與前瞻》，1981：21)。可見國語與閩南語連續劇的比例原來大抵相當平衡，但《廣電法》施行後，國語藉着政治力量，以絕對優勢壓倒了閩南語。

即令如此，社會上各角落還有專家學者、立法委員，必欲趕盡殺絕之而後已。只需稍加留意，即可聽到這種禁制的聲音，即可看到這種偏狹的意見，用不着贅舉。政府主管官署一再否認壓抑本土語言文化，一如當年否認黨禁和報禁的政策。以至近年來若干抗議運動走到反方向，抹煞國語的正當性。壓抑本土語文而又不承認壓抑本土語文，從社會學觀點來看，這是政治權力優勢團體與人士根深柢固的世界觀，他們本身未必有此自覺；他們以大一統的沙文「中國意識」為主宰，不懂、不願懂、更不尊重地方語言文化，這在歷史的省察中是非常顯豁的，逃不掉的。

## 自力更生？文化發展？

中國意識凸顯了、延伸了近百年來受帝國主義欺凌壓迫的憂患情結，因此對任何形式的「文化侵略」總是深具戒心。1960年代初，日本的媒介商為了擴張在亞洲的勢力範圍，富士電視與台灣合作簽約，着手籌備台視，咸認條件對雙方皆有利，焉知到了立法院審議時飽受杯葛，許多條文被否決了，最後更演成兩國外交談判的課題。其實，

自早政府便決定：外資不得高於49%，外國投資者只能提供技術援助與訓練人才，不許操縱節目政策。台視開播時，四家日商投資40%，後來台視屢經增資擴大，日商目前只佔股份20%。中視和華視則完全沒有外資介入。

中國意識更進一步表現於節目製作的規定上面，尤其顯著的是節目自製率。台灣的電視節目進口率一向很低，除了1960年代中葉曾一度高達35%，到了1970年代旋即下降為30%以下，目前更低於20%。這個數字在整個第三世界是獨佔鰲頭的。<sup>2</sup>其所以致此，大概有以下幾個因素：

——地理上，台灣海峽為天然屏障，外國電視無法長趨直入。

——語言上，英語人口很小，自製節目對多數人較有親切感，較受市場歡迎。

——政府立法的精神處處以自立自主為原則。

——電視興起以前，台灣的電影業已經欣欣向榮，為它在前頭鋪路。後來電視把大量電影人才和市場吸過去，電影業的生存一度受到威脅。

——市場上，研究調查顯示，佔人口多數的中南部觀眾，教育程度較低者，及本省籍人士，比較嗜好自製的連續劇；都市居民，教育程度較高和外籍人士，則比較鍾意新聞節目和外國影片(徐佳士、楊孝濬、潘家慶，1975)。在市場的壓力下，70年代期間三台競相推出自製(特別是閩南語)連續劇，以致降低了對外依賴的程度。中視誕生，促使台視的節目進口率降低(1970—1971年期間，從33%降為22%)；而華視的出現更刺激台視和中視，紛將外國節目降為17%。

1976年的《廣播電視法》第19條規定：「廣播電視節目中之本國自製節目，不得少於百分之七十。」這莫非承認現實而已，並無多大現實

2 我早年(Lee, 1980)曾經提出四個觀察「傳播帝國主義」的層次，如論(1)節目自製率，台灣似乎「獨立自主」；但從(2)電視節目的取向，(3)整個商營電視的運作，以及(4)它所灌輸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則美國影響的鑿痕歷歷。

意義，但當時業者仍反對不已。該條法令又說：「外國語言節目，應加映中文字幕或加播國語說明，必要時新聞局得指定改配國語發音。」以前的外語節目多半配是中文字幕，近幾年多採國語配音；故以語言論，外語節目已萎縮至10%以下(表8-2)。《廣播電視法》第20條則積心處慮要限制市場上最搶手的閩南語節目。總之，中國意識如一刀之雙面，既禦外，又攘內；在國語至尊的原則下，外國語和閩南語節目都受到嚴格的限制。

表 8-2 電視節目使用語言的百分比(1978-1985)

(以百分比計)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台 視	國語	78	72	75	80	80	8	85	84
	英語	13	15	13	9	9	4	4	8
	閩南語	10	13	12	11	11	11	10	8
中 視	國語	72	70	72	77	79	79	84	77
	英語	17	17	15	10	9	9	5	14
	閩南語	12	13	13	13	12	11	11	9
華 視	國語	73	71	76	80	81	82	87	85
	英語	16	17	12	9	7	7	6	9
	閩南語	11	12	13	11	12	11	6	6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電視年鑑》，1984年版，頁121-123；1986年版，頁20-25。

### 庸俗化，財源滾滾

節目自製率如此之高，話說回來，難道電視不是為「發揚中國文化」的宗旨努力？25年來，電視台利潤如此豐厚(三台的廣告收入和盈餘，見表8-3)，卻一味追逐庸俗品味，文化品質未見相對提升。這是商營電視寡頭壟斷的死結，也許唯其內容庸俗，電視台才能財源滾進。25年來，知識份子的批評如一日，但罵歸罵，做歸做，若干電視台主持人想大刀闊斧地改革，也只是力不從心罷了。問題最大的癥結在於制度。



表 8-3 三家電視台資產及盈餘比較(新台幣)

	1986 年	資本結構
	廣告營收	
台灣電視公司	26 億 9500 餘萬元	台灣省政府(台灣銀行、土地銀行、華南銀行、彰化銀行、第一銀行、合作金庫) 48.94% 日本東芝、日本電氣、日立、富士電氣：20% 台視員工：5.94% 台灣水泥：5% 北區合會：5% 中華開發：4.3% 新竹玻璃：2.5% 中央日報：2.26% 南港輪胎：1.91% 中廣公司：1.66% 台豐實業：1.58% 士林電機：0.91%
	4 億 9000 萬元	
中國電視公司	24 億 8600 餘萬元	中國國民黨黨營事業：60.27% 正聲、鳳鳴等民營廣播電台：39.73%
	4 億 3000 萬元	
中華電視公司	25 億 6500 餘萬元	國防部：30.78% 黎明文化(屬國防部)：25.52% 教育部：10.38% 國防部同袍儲蓄會：10.26% 華視文化基金會：5.38% 中興紡織：5.13% 吳輝生：5.11% 聲寶電器：11.56% 台塑：11.55% 大同：11.3%
	4 億 5000 萬元	

資料來源：1986 年廣告營收：台北市廣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盈餘：《民生報》。資本結構：《中華民國電視事業的回顧與前瞻》(1981)。

台視草創之初，經費固然是捉襟見肘，技術設備容或因陋就簡，但內容上卻較為大膽創新，在許多小規模的嘗試錯誤中摸索前進。把平劇

搬上螢光幕，輔以旁白，引年輕觀眾入藝術的殿堂，便是頗具創新之舉。可惜自從要跟其他台搶廣告以來，台視反而在文化陣線上撤退，一些文教節目叫好不叫座，只好紛紛讓路給技術精巧但內容貧乏的綜藝節目與肥皂劇。台視交響樂團解散，許多有意思的節目也停播了(王禎和，1977；李金銓，1987a)。廣告與收視率結合的魔術棒，將文化理想淘汰出局。

電視台又將各種民俗藝術的市場潛能剝削殆盡，然後一腳踢開，不負任何文化薪傳的責任。例如歌仔戲導源於宜蘭農村，已有70多年歷史，形式自由活潑，雖未臻精緻，卻是年長和教育程度較低的觀眾的寵物。電視台在70年代中期一窩蜂地把它押上電視，但因為透支過甚，無法推陳出新，唱來唱去只是那幾齣戲，不出五年電視歌仔戲即告式微。可以說電視台只顧「摘花」撿便宜，不太做「紮根」的工夫，只隨着市場讓它們自生自滅，從未在根本上幫助它們創新發展。此外，布袋戲的命運也是大同小異。有些民俗藝術脫胎於民間節慶廟會，性質漸與工業社會緊張的生活節拍脫節；有些知識份子鄙夷之，有些民俗藝術業者也不求進步；但電視台的予取予奪，也有揠苗助長的作用(王禎和，1977；李金銓，1987a)。至於用國語演出布袋戲，則更是徹底的沙文主義。

全面庸俗化的商業制度，扭曲社會價值，製造虛浮假相，節目虛無縹緲，與現實脫節，助長笑貧不笑倡的風氣，把觀眾編列到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隊伍裏去。這些為知識份子所詬病的各點如果屬實，則不管是自製或進口節目，都是無補於文化發展的。

### 結語：泛政治與語言的異化

綜觀「中國結」與「台灣結」的矛盾，歷史上的糾纏固然錯綜複雜，其表現方式也不一樣，主要還是台灣的政經分裂性格長期扭曲了文化面目，電視只是其中的一環而已。「官僚商業結合體」借文化的口實，榨取商業利潤。電視台雖然維持高比率的節目自製率，卻與文化責

任背道而馳。過份膨脹的「中國結」肆無忌憚地壓抑樸素的「台灣結」，這在整個語言文化政策上面可以找到許多佐證。這兩結矛盾基本上是「民主」的問題，也就是社會資源如何再分配的問題，而不是「民族」的問題。唯有以「民主」作為解開兩結矛盾的不二法門，大陸政治的理想性與海洋經濟的現實性才能合理地安頓，而文化領域的自主性也才能伸張，而不會被泛政治主義所吞噬。

### 「泛政治主義」壓抑文化自主性

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的矛盾，未始不是大傳統與小傳統的對立。以往為了完成大傳統，往往不惜抹煞小傳統，以致兩者不能在異中求同或同中求異，也不能相輔相成。原來濡沫的關係變質為剝削的關係。40年來，戒嚴體制更主宰、獨佔一切政治、文化與社會生活，「泛政治主義」泛濫成災；凡是追求真相、反映現實的思想和心靈活動，往往反被杯弓蛇影地醜化為破壞團結的分歧份子。電視文化蒙蔽真實，無非是這種扭曲性格的具體表現，絕非孤立偶發的現象。以文學創作來說，50年代的主流翻來覆去無非是懷鄉和反共八股，60年代則師法西方現代主義的末技，及至70年代的「鄉土文學」把焦點拉回到立足點的台灣現實，卻觸發了一場風聲鶴唳的戴帽子政治風暴(尉天聰，1985)。

中國意識的霸道是一以貫之的，不止《廣播電視法》歧視本土語言文化，教育體制也忽視本土人文史地，1985年提倡的《語文法》雖已胎死腹中，更是大陸政治支配性的露骨宣示。以語言來說，政府不但壓抑閩南語，對客家語、山地語又何嘗不然？例如禁制山地原住民的學童說母語，為的是「會妨害說國語」；山地鄉及偏遠地區教會以母語或羅馬拼音傳教，則是「勢力猖獗，且部分人士，居心叵測，必須有效加以制止，並予勸導，並應力求傳教士用國語傳教，以免妨害國語文教育之推行」(1984年10月20日教育部寄發山地鄉各村落函)；山地人被冠上漢名漢姓……壓抑的手法不一而足(李亦園，1987)。原住民意識政府一向壓

抑唯恐不及，最近卻有哄抬它的跡象——假如這是原住民自由意願的表達則可，假如是被用來塑造「他們才是真正的台灣人」的形象，以解決漢民族內部的紛爭，則以「結」換「結」，愈結愈緊，這個「結」如何解得開？

### 尊重本土語言文化

沒有人反對國語，也沒有人反對推行國語。語言是人類表情達意最自然的工具，母語方言是自然物，國語也是這樣一種自然物。假如以政治力量強將自然物定於一尊，甚至變質為形式信仰或政治資本，這種排他性的文化霸權(hegemony)只有把複雜的真實簡單化。用既定、簡單的意識教條當作是非善惡的標準，人類不但無法了解真相，反而受到自己創造之物所奴役(黃宣範，1987)。語文既然出自自然，也應當順其自然。國語是普通話，它和方言沒有高低優劣之別，故兩者必須互相尊重，保持和諧互補的關係。在台灣，本省人學國語，外省人學點方言，目的簡單直接，就是為了增進感情，消除隔閡，促進溝通，哪裏稱得上分離意識？莫論在多語社會(如荷蘭、比利時、法國、瑞士、新加坡)這已是日常的實踐規範，統治香港的英籍官員多諳粵語，也徒有益無害。

當然，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支配者通常視支配為當然，並不以為上面所舉的例子有甚麼不好。他們的世界觀如此，而這種世界觀因為是不自覺的、長期塑造的，也是最中心而牢固的，所以對相反的道理和證據常常視而不見。純從語言學來辯護政府的語文政策(例如：丁邦新，1987)，完全無視於語言在社會結構的意義；長期以來，本土方言已被賦以較卑劣的社會地位；自己的國語南腔北調，也要笑人家的「台灣國語」；電視上演下女角色的，永遠講令人發噁的「台灣國語」，伺候「國語標準」的主人。支配者是看不到語言的陰影的。

### 「中國意識」變質為剝削的象徵

政府在台推行國語的成績有目共睹，用不着揄揚。但根據內政部資料，台閩地區十五歲以上人口，不識字或未受完小學教育的，幾達四分之一，即四百多萬人。他們多半以國語以外的方言為母語，運用文字又有困難，是所謂「功能性文盲」，必須仰賴廣播電視為獲取資訊的來源。再說，全省一半家庭訂有報紙，百分之九十五的家庭有電視機；可見電視無遠弗屆，深入窮鄉僻壤，不但是溝通上下的管道，更可幫助這些低所得、低教育程度、只懂方言的民眾以稍彌補社會群體之間的「資訊差距」(information gap)——但《廣播電視法》俐落地堵塞了這條路。去年(指1986年)年底發生陸花生中毒事件，鄉下阿公阿婆喜歡以它佐菜，格於法令規定，電視台只能在閩南語節目才插播閩南語宣傳短片或廣告，而閩南語節目又只佔十分之一左右，資訊系統無法暢通。如此因噎廢食，削足適履，不但是最典型的「異化」(alienation)過程，根本就違背民生主義社會資源(包括知識與訊息)平均分配的原則。

中國意識四十年來已嚴重變質，在現實環境下變成一種剝削、支配與威脅的象徵。台灣意識以它為水中倒影，也從反方向發展成為反支配的符號。<sup>3</sup>相激相盪，電視已經成為統治意理機器，也成為政治運動的眾矢之的。上自主權結構的壟斷，下至新聞政策的操縱，電視不能以公正公平的立場呈現旺盛的民間社會，總是以有色眼鏡看台灣意識。以簡單的意識教條醜化扭曲民間社會樸素的意願，只能使兩結矛盾愈陷愈深，兩極化的趨勢愈演愈烈。整個新聞媒介倚重倚輕，斷章取義，採信片面之詞，導致公信的低落。去年(1986)中正機場事件的是非得失姑且不論，媒介蒙蔽真相，小道消息猖獗，對支配性的意理霸權產生不可預測的反效果(李金銓，1987b)。

3 解嚴以後，政治透明度提高，閩南語節目紛紛回到電視，蔚為主流。強調台灣的主體性乃應有之義，然電視新聞和時事評論節目「統獨掛帥」，多流於民粹話語，則對於民主建構殊無貢獻。



## 國家控制，科技顛覆，文化自主

台灣有線電視政治<sup>1</sup>

---

秩序的表相底下可能潛伏着離奇的渾池，在混沌的深處裏也埋藏着更匪夷所思的秩序。

—— Douglas Hofstadter (引自 Gleick, 1987)

回顧將近四十年間(1949-1987)台灣的威權官僚政權(authoritarian-bureaucratic regime)(O'Donnell, 1973)玩弄媒介於股掌之間，完全置之於從屬國家意識形態工具的地位。經過民間社會不懈的抗爭，戒嚴的枷鎖終告解除。然而政府只是從控制報業的陣線撤退(詳見本書第七章)，卻繼續牢牢壟斷廣電媒介，不肯開放給公民社會公平競爭，因此又衍生了另一場節外生枝的有線電視鬥爭。媒介本是社會鬥爭的場域，本章旨在考察台灣的有線電視科技和政治的錯綜關係，看國家機器如何通過各種法例和「法外之法」控制傳媒科技和內容，以及社會團體如何用另類(alternative)的乃至敵對(oppositional)的科技來對抗、削弱國家的控制。台灣的有線電視一開始就如宣偉伯(Schramm, 1977)所說的「小媒介」，在社會邊緣非法存在，後來因緣際會逐漸發展成為「大媒介」的一部分。「小媒介」始於寒微，科技原始，組織簡單，不論資金或勞動都不密集；「大媒介」則科技進步，組織複雜，資金和勞動密集。

台灣的威權政體壟斷電視意識形態的空間，但科技發展增加了許

---

1 原載於Chin-Chuan Lee (1999), "State Control, Media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Concerns: The Politics of Cable Television in Taiwan," *Studies of Broadcasting*. Tokyo: NHK. Japanese version (No. 48, pp. 227-259) and English version (No. 34, pp. 127-151).

多意外抗爭的機會，有線電視的發展不啻代表了另一段社會抗爭的複雜過程。台灣的有線電視剛出現時的科技簡直粗糙不堪，連「草木皆兵」的政府都漠不關心，後來用於商業用途，政府也不覺得要嚴厲禁制；直到政治反對團體發現有線電視頻道所需的資金、勞動、科技簡單，可以變成挑戰官方控制的平台——這時政府才開始警覺，於是對有線電視業者採取敵視的態度。其間牽涉到非法的有線電視產業和衛星溢播之間的互動，也牽涉到國家如何回應內在與外在的壓力，產生了許多意想不到的政治與文化含義。我想提出三個主要的普遍性問題：第一，為什麼威權政體允許有線電視非法存在這麼久才取締，最後反而失去政策的控制權？第二，低成本的有線電視如何挑戰國家控制的電視，「小媒介」如何削弱、甚至顛覆「大媒介」？第三，有線電視逐漸變成「大媒介」，而與許多新科技(特別是衛星)聯繫，所謂的「全球文化」如何與地方的脈絡互動，如何影響當地的抗爭？我將在文末回來解答這些問題。

台灣有它的文化特性，但本章的分析對第三世界民主轉型的國家也有普遍意義，因為它們統統力爭改寫媒介的遊戲規則。「威權官僚政體」通常存在於開發較遲滯的國家，與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國家和全權主義的國家迥然不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權力基礎深植於生命力旺盛的經濟系統裏，但許多開發較遲滯的國家則是政治經濟學家所說的「國家統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即由國家統籌主導權力分配和經濟發展的方向。史坦尼蘭(Staniland, 1985: 75)聲稱，國家統合主義的政權「在內部是威權的，但不是全權的；它們組織文化的表述，但不會巨細無遺地決定文化的內容。」它們最關心的是鞏固政權，政治經濟兩條軌道相對分離；國家容許媒介在非政治領域爭取較大的自主空間，但對任何威脅政權的力量必無情鎮壓。威權政權接受商業的利潤動機，容忍媒介以聳動的犯罪新聞牟利，即使逾越法律和倫理，當局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威權國家對高科技有近乎虛幻的迷信，以為愈先進的科技產生愈大的意識形態權力、愈大的社會影響，因此對其控制也愈嚴厲。國家的眼光始終擺在控制「大媒介」（報紙和電視）上面，殊不知「小媒介」（原始粗糙的有線電視和黨外雜誌）其實具有意想不到的潛能。早年提倡國家發展的學者（例如Schramm, 1964; Schramm and Lerner, 1967）熱衷推廣高科技和大媒介，鼓吹發展中國家直接用「大媒介」跳過現代化的各個階段；然而「大媒介至上」適足以拉大它們內部資訊貧富分配的懸殊，並加劇科技上和節目上的對外依賴（Schiller, 1976; Rogers, 1976; Katz and Wedell, 1977; Tunstall, 1977; Lee, 1980）。

「大媒介」和「小媒介」互動對政治變遷意義何在？在市場制度裏，大眾媒介既關照政治認受性又追求利潤，在意識形態上有些模糊地帶，即連保守的媒介也可能採納一些自由的思想，以期提高公信，保持專業形象，爭取新聞獨立性（Curran, 1991）。大致來說，主流媒介假如反映社會衝突，主要是因為權力結構內部爆發鬥爭；除非主流媒介受到另類媒介嚴重的挑戰，主流媒介通常不會主動回應邊緣化的聲音（Hallin, 1986a; Gamson and Modigliani, 1989; Chan and Lee, 1991）。大眾媒介結合社會運動才有力量，媒介本身無力給受壓迫的人什麼權力。從社會運動的觀點來說，被壓迫的或被邊緣化的聲音無法攀上主流媒介發言（Goldenberg, 1975），只好退而以小媒介、地下媒介和另類媒介（Downing, 2001）來替代。擴而言之，大媒介通常代表主流的意見，與既有秩序結合；小媒介支援抗議團體，在社會邊緣促進變革。更重要的，小媒介挑戰主流媒介所界定的支配性現實，整個言論的光譜得以擴張，最後連主流媒介都得跟着擴大言論範圍。

許多社會運動團體運用原始低成本的科技，來呈現反主流的觀點。它們與主流意識霸權以及國家暴力（警察和文化檢察員）打游擊戰（Enzenberger, 1977; Downing, 2001; Hoffman and Duggan, 1988; Kim, 1988; Hayward, 1989; Pomorski, 1989; Tomaselli, 1989）。70、80年代低成本的科

技廣泛流行，讓弱勢團體可借用影像科技拍電視片，對抗國家的控制 (Festa and Santoro, 1987)。運動團體靈活運用各種小媒介，例如錄影帶、傳單、小冊子和游擊廣播，當可繞過、擊敗國家對媒介的壟斷，直接爭取草根的支持。菲律賓阿基諾(Aquino)領導的人民革命(Dionisio, 1986)、伊朗的霍梅尼革命(Tehrani, 1979; Mowlana, 1979; Sreberny-Mohammadi and Mohammadi, 1994)、蘇聯和東歐的知識份子抗爭，都證明小媒介對抗中央控制靈活有效。

我(Lee, 1980)曾經分析「媒介創新傳佈論」以及「媒介傳播帝國主義論」針鋒相對的辯論。前者(參見Pool, 1990身後出版的著作)堅持，發展中國家只有和中心國家保持開放互動的關係，從中學習經驗，才能厚植實力；媒介產品須在市場上接受自由競爭才能茁壯。後者(如 Schiller, 1976, 1992)認為國際資本主義結構，特別是「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是第一世界在第三世界搞文化霸權的罪魁禍首；第三世界國家應該立即切斷和中心國家的聯繫，否則必然繼續沉淪，甚至永遠依賴它們。這兩種說法都有片面性。現在「全球化」理論偏向於辯證動態看資本主義及其文化影響(Tomlinson, 1991)：媒介為我們打開視界，我們繼續在一個「全球化的」經濟脈絡裏面過「當地的」生活。第三世界的政治異見份子往往依賴外國廣播獲得消息，其意識形態或利益可能和接受國文化價值或利益格格不入。「全球因素」插入本地的脈絡有解放的一面，也有限制的一面，既統一，又悖離(Giddens, 1990; Tomlinson, 1994; Featherstone, 1990; Sreberny-Mohammadi, 1991)。以台灣為例，我必須指出，「全球」力量挑戰了威權政權的文化壟斷，解除當局建構的神話，但也產生其他深遠的負面影響。

## 反對黨與「民主台」

蔣介石1949年在大陸潰敗，流亡台灣。他把原來那套統治大陸的列寧式國民黨政權格局，具體而微搬到一個海島上，粗暴而全面壟斷島上

黨政軍的「三頭馬車」。他口口聲聲要維護中華民國憲法，卻堅持「先光復大陸，後實行民主」。他以反共為名，宣佈戒嚴，剝奪憲法賦予人民的參政權利，甚至曲意修改憲法。追隨蔣介石到台灣的少數大陸精英牢牢占據權力中心。為了控制輿論，1951年宣佈報禁政策，將雄心勃勃的競爭者堵於牆外。由於國庫通黨庫，黨國儼然積聚了一個媒介帝國(擁有報紙的大半，壟斷三家電視台)，津貼聽話的「同路人」，並扶植兩大報系的發展，以防言論陣地淪入潛在政敵之手。所幸當局一味迷信高科技，低估小媒介的政治意義，總算容忍它們繼續在邊緣生存，沒有給報禁政策一網打盡。國民黨在台灣長期推行的「內在殖民」，製造族群分裂，不同的方言和歷史記憶竟演成權力失衡的標記。隨後幾十年，族群衝突鼓動本地人的民主抗爭，卻也助長排他性的媒介論述，阻礙民主社會裏正常公民性格的形成。

1987年報禁解除。民進黨領袖康寧祥獲得報紙登記證，開辦《首都日報》，十五個月以後財力不支，黯然草草收場。台灣的電視官資商營，一方面利潤掛帥，一方面鞏固保守的現狀與意識形態，具體而微地彰顯了台灣若干產業的關係與形態，包辦了權力、財富與是非，積心慮地壓抑本土語言文化和反對勢力(第八章)。報禁開放了，國民黨還壟斷電視，醜化反對黨和抗議運動，民進黨率眾示威抗議無效。明顯處於劣勢的反對黨得找個宣傳的出路，終於覺悟廉價的廣播電台比資金密集的報紙更合他們的利益，電台平時播放音樂和廣播劇，選舉時搖身一變又是宣傳動員的利器。幾位反對黨領袖向行政院新聞局申請廣播執照，紛紛被拒，所得的藉口無非是「頻道已滿」(鄭瑞城，1993)，後來證明原來是軍方不肯讓渡廣播波段而已。1990年，民進黨終於在立法院的《選舉法》加入一個條款，規定政黨有權公平使用公共媒介。但這頂多是一條具文，沒有約束力，民進黨向國民黨所控制的三家電視台購買廣告時間，居然吃閉門羹。民進黨憤而集合非法有線電視台的網路，成立「民主台」。

台灣山陵起伏，1969年共同天線出現，為的是改善偏遠地區收視的清晰度。1974年錄影帶入台，價昂非普通家庭可以負擔。1976年商人開始用簡單的錄影帶、廉價的同軸電纜和基本的放送器材播送節目，安裝費是微薄的美金四十元。民眾付月費美金二十元，可以看到8到30個頻道，包括日本電影、西方電影、摔跤，偶爾還有色情片。這些商人根本談不上製作成本，到店裏租美金二元的影片，或買盜版電影碟片放送即是了。不久，全島各地如星火燎原般出現「第四台」。「第四台」有別於官方所控制的三台，它們採取低姿態，以防政府干預或抽稅，台與台沒有完整的組織架構或共同文化，目的是商業性的，初期毫無政治取向。

1981年，行政院新聞局開始抓非法的有線電視業者。次年新聞局引用修正的《廣播電視法》，對非法的有線電視業者開罰單，沒收器材。然而在商業利益的驅動下，業者把牽到住家的電纜線貼在公家的電線桿上，1983年和1986年新聞局剪掉他們的線路，嚇阻一時。1985年，全台灣已達120萬人(約40%人口)收看「第四台」。「第四台」受人歡迎，政府很難全面禁絕。1988年到1989年，台灣的泡沫經濟還沒有戳破，股票一年爆增一倍，很多人看「第四台」追蹤股市行情。這時政府顧左右而言其他，偶一禁之，也不太認真，只要業者不罵國民黨、不播色情片就算了。

分水嶺是1990年。民進黨決定不再跟國民黨玩不公平的遊戲，於是用微波技術建立第一座「民主電視台」。開台日期是二月二十八日，寓意紀念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其時國民黨軍隊屠殺一萬七千名台灣人。當天新聞局工作人員在場剪線，引起摩擦。1990年10月倏忽派400員警，包圍台北市民進黨議員的有線電視台。後來支持民進黨的廣播界名嘴吳樂天，用從菲律賓走私進口的五十磅便攜型發射器，成立「無線」民主電視台。一般人違法默不作聲，吳樂天竟公開向政府叫陣。其他反對黨人士成立有線電視台，無非想選舉時替自己做宣傳。1991年9月，全島各地21台聯合成立鬆散的「民主電視網」，宣稱要結

束黨國的電視壟斷。共同天線不再是商業性的，而是政治性的了。雖然達不到民進黨的預期，但抗爭已逼黨國採取斷然的反應。吳樂天被判刑期，政府憚於底層聽眾對他的擁護，不斷減他的刑，甚至沒有執行法院的判決，另六案也不追究。

解嚴以後首次重要選舉落在1991年。為遏止權力流失的頹勢，國民黨必須全力維護國會和市長的席次，兼防民進黨用「第四台」作為攻擊它的平台。正逢此時，美國政府開始向台灣施壓，要求終止有線電視業者侵犯美國影片的版權。行政院長郝柏村下令動用整個政府的公權力掃蕩有線電視台。政府未免誇張了民主電視台的影響力：台北市四十家有線電視台，只有三家是反對性的；多數民主台資源匱乏，連播放時間都不穩定，節目乏味，充滿枯燥的群眾遊行和長篇的政治演說。郝院長下令掃蕩以後，約有一百名業者與民主台保持距離，保證在未來的選舉保持中立。另外有四十台希望政府給它們合法化。那年有133家有線電視被迫關門，但很快恢復作業，業者保證不倒向民進黨候選人，新聞局開始軟化掃蕩措施，幾個月以後鐵腕行動草草落幕。

政策失敗的原因有三：

一、掃蕩政策沒有道德的認受性，也缺乏堅強的法律根據。民進黨公然違反禁令，口號是結束黨國的電視壟斷，至少表面上名正言順。政府的取締沒有法源，《廣播電視法》的原版(1976)和修訂版(1982)未能全面涵蓋有線電視的管制，而軍方強烈反對開放有線電視，致使《有線電視法》遲遲不能推出。而且，政府官僚機構疊床架屋，許多單位插手染指有線電視，其實沒有一個單位負全責，新聞局更無力維持龐大的人員檢查全島200到300台的業者。政府檢查人員既不是站在道德高地，又沒有法院頒發的搜查令。許多業者和「白道」(議員、員警、安全人員)、「黑道」掛鉤，事前由他們通風報信，事後由他們出面解說求情。有些業者罔顧政府的徵稅和罰款。

二、有線電視技術刁蠻，讓政府禁不勝禁，掃蕩難竟其功。廉價發

射機藏在高樓裏面各角落，從何查起？即使被沒收部分器材，整個系統照常播放不誤。一位業者誇說：「他們花一整天剪線，我只要花一個鐘頭接線；他們花400美金剪線，我只要花40美金就能接起來。」業者先把電纜非法貼到公家的電線桿上，再接通到各家庭用戶，線有粗有細，故意混淆剪線人員的視覺。技術先進，瞞不過業者哪些線被剪，訂戶打電話抱怨接不到信號，業者立刻知道哪裏要修復。

三、民進黨與國家電視絕緣，只好拿「第四台」和其他小媒介與國民黨媒介廝纏，調門故意煽情辛辣，肆無忌憚，常煽動支持者跟員警對峙。吳樂天更戲劇化，故意干擾軍方控制的華視電波信號。在他干擾其他兩台以前，警方沒收了他的器材，國家不得不正視打科技游擊戰的可能性。混亂的情形正顯示通過《有線電視法》有多迫切。

政府這樣色厲內荏，許多「第四台」膽大起來，在1992年和以後的選舉播放選舉廣告大力支持反對派候選人，民進黨在選舉中穩定成長。掃蕩愈來愈沒意義，政府無奈在美國的壓力下實行《有線電視法》，招安「第四台」。

### 衛星溢播、美國壓力和《有線電視法》

1990年，台灣接受境外衛星的溢播信號，有線電視訂戶大增。解嚴以後，交通部在1989年解除Ku頻衛星和C頻衛星碟的禁令。美國的有線電視發展比較迅速，然歐洲的衛星電視比較普遍(Boyle, 1992)。有一段時期，台灣的衛星碟數大增，但衛星的功能終於被有線電視接收，因為買一個Ku頻衛星要美金720元，另加維修費，而從有線頻道收看衛星節目不必附加費用。台灣有線電視業者不受版權法的約束，傳送衛星節目也不付版稅。

四個衛星足跡覆蓋台灣：日本的BS-3a與BS-3b，亞洲衛星1號，印尼的Palapa-B2P衛星。日本的BS-3a提供 NHK公共頻道，Bs-3b所在WOWOW給台灣的教育階層送來高頻節目。在香港的星空衛星電視(Star TV)給台灣的非法有線電視打了一支強心針。第一個泛太平洋衛星「亞

衛1號」是1990年由多國資本共同發射的，包括香港的和黃、英國的大東和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CITIC)，足跡遍及亞洲38個國家，270萬個家庭，即全世界家庭的一半。星空衛星電視(Star TV)從亞衛租了12個雷達收發機，1991年起提供免費服務，目標自稱是爭取亞洲5%最富有、教育層次最高的觀眾。星空衛視有五個全天候的頻道：plus頻道(播放西方電影和有中文字母的電視節目)，MTV，體育頻道、BBC以及華文頻道。中文頻道(鳳凰衛視)以普通話播放，對於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和東南亞的華人有很大的吸引力(Chan, 1994)。

表9-1比較亞洲各國電視總量、衛星碟總量和星空衛視所深入的家庭總量。南韓的電視總數是台灣的2.2倍，把人口算進去比例差不多。但台灣比南韓有更多的衛星碟。早年台灣沒有版權意識，它的衛星碟在亞洲除了日本以外最多。最重要的還是星空衛星電視，據報導台灣的電視家庭中有46%可以從有線電視看到星空衛視。在90年代初，星空衛視在台灣的深入程度超出亞洲任何國家，直到後來中國和印度迎頭趕上。衛星電視中文台比台灣官方所控制的三台在黃金時間(晚上9：00至11：00)的收視率還要高。雖然星空衛視免費提供節目，台灣也成為它主要的廣告收入來源。

表9-1 亞洲各國電視總量、衛星碟總量和星空衛星電視(Star TV)所深入的家庭比例

	電視總量(單位：百萬)	衛星碟總量	星空衛視所深入的家庭(%)
台灣	4.60	325,000	46
新加坡	0.62	0	0
香港	1.49	15,000	21
南韓	10.10	250,000	2
馬來西亞	3.40	20,000	0
中國	277.00	40,000	22
日本	400.00	2,500,000	0

來源：電視總量的資料與衛星碟總量的資料，參見《遠見》雜誌(1991年8月15日，頁148)；星空衛視所深入的家庭總量，參見Chan(1994: 116)。

中國擁有亞洲衛星一號部分的主權，送上中央電視台和雲貴台給海外的華人地區收看，因此透過衛星和有線電視的銜接，它們公然進入台灣家庭的客廳。說來諷刺，中央電視台和雲貴台都長驅直入了，台灣政府卻死守內部的電視壟斷。看到星空衛視的成功，香港的TVBS也於1993年開始租用印尼的Palapa-B2P衛星，把許多節目傳輸到台灣。一些美國的付費節目，如HBO、Discovery、Showtime、CNN以及ESPN都接踵而至。

如上所述，國民黨繼續控制三個電視台，罔顧民間抗爭，遲遲不肯接納初生之犢的有線電視於法律架構內。最後逼政府採取行動，壓力來自一個莫名其妙的地方：美國。多年來美國企圖改善貿易逆差，1992年把版權問題放到與台灣的雙邊談判中。自從台灣在1974年引進錄影帶，有線電視業者明目張膽地盜映美國電影，連帶侵犯國內錄影帶銷售商和電影導演的權益，後者池魚遭殃，便呼籲政府嚴懲有線電視業者，但政府因循苟且。現在美國威脅要動用貿易法案301報復條款，讓台灣進口美國的貨物不再享受優惠的稅率。國民黨政權的支配地位已經開始下降，它對國內挑戰者採取拖延戰術，但對保護國美國的憤怒可不能當耳邊風。

《版權法》原只保護印刷文字，1992年擴充，適用範圍擴及電影、鐳射(激光)音樂唱片、電腦軟體和各種資料庫，於是有線電視業者再也不能用盜版節目，播任何的錄影帶都須付費。為回應美國的壓力，1992年初新聞局向行政院提出《有線電視法草案》，準備在年底(美國限定的期限)由國民黨控制的立法院通過。但行政院提出的法案在立法院觸礁，問題有二：其一，美國自己在國內電視不准播煙酒廣告，美國政府卻接受國內煙酒商的壓力，強迫台灣有線電視允許播煙酒廣告，台灣抗議無效，不得不勉強接受無理的條件。議員指責政府膽怯無能，卻無法改變談判的結果。其二，《有線電視法草案》規定台灣分52個區，每區一個電視系統，最低資本額2800萬美金，門檻設得這麼高，大概只有親國民黨的大財團跨得過。泛民進黨的民主台已經生存四年，絕不甘生路被一



紙禁絕；非民進黨的業者也自組聯誼會，爭取法律承認，並獲得從國民黨分支出來的新黨支持。有線電視驟然變成政治勢力較量的場域，除非政府照顧各方既有利益，否則政治人物不會通過《有線電視法》。

果然，政府未能如期在1992年底通過《有線電視法》，美國立刻把台灣擺在到商務報復的觀察名單上。鑒於市長選舉在即，國民黨投鼠忌器，不想把有線電視業者推向民進黨或新黨，因此改變初衷，投機行事。新聞局突於1993年決定接受既成事實，讓現有的業者全部合法化。合法經營的業者不滿，包括共同電視業者、錄影帶經銷商(大批侵犯版權使錄影帶租賃店由最初的6000家降為2000家)以及電影導演。新聞局向現有利益妥協，允許每區有5個頻道，全台灣共達260家。許多非法台就這樣變成合法。

1993年通過《有線電視法》時，有線電視在台灣已經存在24個年頭了。游擊媒介搖身變成正規媒介，然而台灣的規模經濟太小，彈丸之地無法消化260個頻道。政治邏輯向市場邏輯讓步，兩大財團迅速併吞小經營者，台北75%的頻道就給力霸集團所鯨吞。原來《廣電法》規定電視節目的75%必須本國製作，新的《有線電視法》把本國製作率降為20%，以致好萊塢產品充斥，國家逐漸尚失自主性，被整合到全球和跨國資本的架構裏。政府為保護電視壟斷，發給民進黨領袖一張飽受垂涎的第四個無線台執照，其他申請者資金更厚、經驗更多，卻都繳羽而歸。

## 全球化與文化自主

讓我回答文首提出的三個問題：第一，為什麼威權政權坐視非法的有線電視存在這麼久？馮建三(1992)提出「文化賄賂」的說法，聲稱當局容忍有線電視業者明目張膽侵犯版權，而且罔顧外來節目造成的文化影響，主要是想用多頻道的有線電視節目來「收買」都市中產階級和文化精英的胃口，免除他們對於電視壟斷的憤怒。究其意，頗酷似西諺所說的「吱吱作響的椅子會得到加油」或「會吵的小孩有糖吃」。當局的

動機難測，與其說這是有計畫的政策，不如說是政策亂無章法產生意外的功能(latent function)，但我認為真正的原因尚不在此。

我認為，當局從頭即未視有線電視為其權力的直接威脅。世界上各威權政權無不一心一意維護權力基礎，台灣當局在50年代到70年代鎮壓黨外雜誌決不手軟(第七章)，對有線電視初而淡漠繼則遷就，其故安在？或曰，黨外政論雜誌生存的空間在戒嚴時期，而多數有線電視則出現於解嚴政治自由化以後，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國家暴力不再容易任意支配；何況電波比文字難管，於是當局對待有線電視比對待黨外雜誌寬厚。是耶非耶？「寬厚」與否，端看媒介對國家的權力是否有直接的挑戰，台灣當局對非法商人牟利尚可容忍，對侵犯國家權力卻不可坐視。當局着眼於控制三家強大而賺取暴利的電視台，對小媒介(例如有線電視)則掉以輕心——當時電視覆蓋全島，有線電視頂多是都市現象(收視者占總人口的10%至12%)，靠微薄的收視費勉強維持，當局實在沒有太多理由杞人憂天。當局打擊第四台業者時通常都像打擺子，有一陣，沒一陣；等到民進黨利用為政治工具時，當局才驚醒於其政治意義，並在一連串的選舉壓力下考慮全面施壓有線電視業者。

第二個問題關乎小媒介與大媒介的互動。台灣的有線電視是「大衛對抗巨人」的一場鬥爭：有線電視起於寒微，經歷非法的「第四台」歲月，從邊緣走向中心，現在則儼然變成全面科技文化系統的一環。有線電視的發展跟整個社會鬥爭糾纏在一起，彰顯權力和傳播資源的不平等。有線電視沒有淪入國家的壟斷，因為科技在當時是粗糙的，業者的社會地位是邊緣的，而且多數對政治冷漠。如非民進黨抓它來對抗電視壟斷，國民黨才不會認真對待這個潛在的威脅。台灣的個案佐證了前面所舉的大量文獻。

表9-2比較了三家電視台和有線電視業者在90年代中期的重大差異。三家電視台的覆蓋範圍是全國性的，有線電視只是地方或者是地區性的。三家電視台是親官方的、親國民黨的，資金和勞力俱皆密集。多

數有線電視台規模小，政治立場極端。三家電視台在90年代中期占廣告量的九成，家庭的滲透率也是有線電視的三倍。但後來有線電視逐漸分薄了電視廣告，直到2003年無線電視台和有線電視台玉石俱焚，少有能賺錢者。小小的台灣能夠容納260家有線電視嗎？當局向既成事實投降，讓所有的業者不分青紅皂白合法化。民進黨已經躍上政壇主流。有線電視的競爭白熱化，規模經濟將為大財團掌控有線電視產權鋪路。面對大公司的壓力，有線電視能否保持地方特色值得懷疑。

表 9-2 比較台灣電視廣播網與有線電視業的特點(90 年代中)

	電視廣播網	有線電視業
數量	3	260
傳輸範圍	全國	本地或特定區域
政治傾向	國民黨	國民黨、民進黨、新黨；以及一些無黨派取向的
經營者與董事會成員	政府指定	私人所有者
資產	447 萬	145 萬
員工群體	龐大	小
專職新聞採編人員	每個廣播網 60% 的人員	每個電視台 0-10 人
衛星連接	沒有	有
每個系統的頻道數	1	大約 17-32
國內自產節目數所占比例的底線	70%	20%
收費情況	免費	20 美元一月、另加安裝費
廣告收益(1994)	5.1 億美元	6400 萬美元
廣告收益占總收入的比例(1994)	90%	10%
每條 10 秒商業廣告	1320 美元	大約 200-300 美元
政治廣告	名義上禁止，但親國民黨的廣告存在	類同於商業節目運作
煙酒廣告	禁止	允許

來源：資產數據，參見《工商時報》(1993年4月10日)；廣告費資料，參見Lang(1994)；國內自產節目數所占比例的底線值，參見《廣播電視法》和《有線電視法》；廣告收益以及廣告收益占總收入比例，參見《中國時報週刊》(1995年1月15日，頁41)。

第三個問題是全球化的角色，以及全球化如何促進內部文化政治的民主化。台灣有線電視政治的根源來自內部結構的不平等，外部壓力不過是個助緣。很多小商人和反對黨的政治人物同床異夢，卻都盼望利用境外的信號解困，填滿頻道。當局先漠視，繼以無效率的打壓。但如果境內境外節目混合證明有市場的吸引力，當局就不得不重新考慮改變有線電視政策。當局有沒有善意適應全球化的力量並不重要，問題是它能否有效控制科技所產生的效果嗎？當局屈服於美國壓力，通過《有線電視法》，促使頻道開放。威權政府不理會內部民主的呼聲，卻無法逃避宗主國的壓力。台灣有線電視資源開放，多家財團聯手控制的確比國民黨單獨壟斷好一些。停止國家壟斷，無論如何是值得額手稱慶的。民進黨領袖取得第四個電視台(民視)執照，分到了一杯羹。台灣的公共領域是不是成熟，能不能台灣的立場綜合各種觀點？外來的CNN、NHK、TVBS以及中國的中央電視台湧進，呈現類似多種多元並起的觀點，也比當局所呈現的單元觀點好。費瑟斯東(Featherstone, 1990)指出，我們不應該認為全球文化製造雷同，而是代表通俗和本地論述的多元性、多樣性及其豐富性。全球化與本地媒介的交叉在台灣既製造了文化多元性，也製造了雷同性。但民主化所追求的境界豈止如此？台灣有線電視的大門敲開以後也發生了經濟剝削。台灣所面臨的「全球性」的對手，不是什麼平等無私、為人類目的共同奮鬥、求同存異的團體，而是跨國巨霸公司和美國霸權，它們都想侵佔台灣富裕的市場。台灣商人侵犯著作權固然不足為訓，但美國強壓台灣的有線電視播放煙酒廣告卻足見其偽善。難怪科技的傳佈被認為是一種「殖民化」的過程，而非「全球化」的過程。

為爭取多文化的觀眾，減少政治上的抗拒，星空衛星電視和其他國際媒介故意製造思想貧瘠、不涉及政治的速餐內容，這可能是「全球文化」的特徵。台灣當局顯然認為有線電視只是娛樂媒介，毋須太認真，因此只規定20%的國內內容即可，而電視台必須播放70%以上的本國製

作節目。台灣以前頻道缺乏，現在頻道過多，若只播一些廉價的製作，或成為好萊塢、日本或香港電影的通道，形成對外依賴，則斷不會促進文化的多元性。當年加拿大政府鼓勵發展有線電視，是為了自立自主，逃避美國文化的鯨吞蠶食，奈何加拿大人購買有線電視正是為了看更多的好萊塢電影。這種前景難保不在台灣重演。

### 插曲：地下電台對抗地上電台<sup>2</sup>

除了有線電視的游擊戰，順帶略述地下電台抗爭的一段插曲。國民黨在解嚴後仍壟斷廣電特權，民進黨申請廣播電台執照被拒，乃於1992年宣佈成立第一家地下電台(成本比「第四台」還低)，公開對峙。次年出現「台灣之聲」，言論更為激進。其他地下電台爭相仿效，在選舉期間燃燒成燎原之勢，族群仇恨和意識形態的矛盾徹底爆發。解嚴瓦解了舊秩序，權力遊戲重新洗牌，各陣營相激相盪，對台灣的前途爭論不休。國民黨高層的權力鬥爭如火如荼，黨內大陸籍的保守政客分裂出去，共同反叛第一任本土總統李登輝。本地人崛起意味他們既得利益的降落，他們又懷疑李登輝勾結民進黨推動台獨。1994年底，台北市長選舉最高峰時，近半(24家)的電台都地下非法廣播，各吹各的號，立場南轅北轍，效忠對立的政治陣營(馮建三，1995)。民進黨和新黨對罵，又合罵國民黨。形勢失控，地下電台不斷湧現，使當局鎮壓的腳步跟不上。

地下電台給社會邊緣人物和被遺忘者(特別是計程車司機和勞工)一種虛幻的權力感。在1994年的台北市長選舉期間，地下電台全天候播各種扣應(call-in)節目，呼籲黨徒：只要打個電話，就可以抒發怨氣。計程車掛着不同顏色的黨旗滿街跑，司機強迫乘客收聽地下電台的黨派宣傳，還粗暴地審查乘客的政治傾向。衝突沸騰時，各電台紛紛號召同情

---

2 取材自 Lee (2003b)。

本黨的司機在某時到某地集會，以致癱瘓了全市的公共交通。此外在廣播中公佈若干官員的電話號碼，鼓動民眾向他們「問候」。司機員警對峙，社會動盪，不同陣營的司機時生暴力衝突，甚至造成流血傷亡。

這些扣應節目投合先入為主、固執己見、一邊倒的聽眾，挑動他們一觸即發的情緒，刺激族群仇恨。節目製作不要多少成本。匿名電話通常極盡煽動之能事，反反覆覆，充滿人身攻擊。地下電台和其他的游擊媒介凸顯了媒介資源的結構失衡，但它顯然不是民主問政最好的方式。真正的傑佛遜式民主讓不同意見者通過理性辯論和勸服求同存異。地下電台不過是個蠱惑人心的粗暴工具，點燃種族仇恨，釋放群眾鬱積的集體挫敗感，並以妖魔化「他者」取得精神勝利。多數地下電台沒有廣告來源，只依靠義工和捐贈，選舉狂熱過後難以為繼。

其實，政府於1993年底即已迫於壓力開始發放電台執照，只因起步太晚，規模太小，擋不住地下電台的蔓延。地下電台造成社會失序，消耗龐大的公共資源，觸犯眾怒。選舉過後，國民黨發放另一波電台執照，以維護自己現有的優勢；民進黨擁有的地下電台最多，是自由化政策最大的受益者；新黨在市長選敗後迅成泡沫，失去生命活力，其市長候選人趙少康後來獲得一張電台執照，卻轉辦為盈利的飛碟商台，惹得黨友懊惱不堪。多數地下電台浮出水面，獲取合法身份。1997年新電訊法案面世後，100多家新電台湧向市場，但多忙着賣醫藥廣告，跟推動民主風馬牛不相及(馮建三，1998)。

### 餘論：自由化，沒有全面民主<sup>3</sup>

台灣從威權統治到形式民主的崎嶇路上，威權政體前後三次遭遇「媒介游擊戰」的反叛：首先是黨外政論雜誌(1976-1986)，其後是統稱為「第四台」的有線頻道(1990-1993)，以及後來的地下無線電台(1992-

---

3 本節取自 Lee(2003b)。

1995)。主流媒介與黨國威權政體建立侍從結構，把意理霸權「自然化」，使嚴密的社會控制轉為看似天經地義的「共識」。而游擊媒介處於社會邊緣，資源貧乏，成本低，規模小，科技條件粗糙，卻和黨國審查制度及主流媒介纏鬥，挑戰其意理霸權。當然，游擊媒介不能在社會真空裏生存，而是結合了政治運動的需要，逐漸成為抗議團體主要動員和意理的堡壘。它們講出被壓迫者壓抑在內心中的話，為他們爭取權益，大聲喊出「國王原來沒有穿衣服」，並嚴厲抨擊當局開「民主憲政」的空頭支票。最後，週邊終於威脅到中心，游擊戰鬥動搖了權力支配的根基。

游擊媒介是台灣民主化故事的一個樂章，既反映整個政治經濟變化的脈絡，也促進政治變革的進程。冷戰賦國共鬥爭以合法性，國民黨借反共之名行威權統治之實，整肅異己，壟斷台灣的權力、資源乃至是非標準，並剝奪本地人的政治參與和媒介聲音。這是游擊媒介生沒起落的基本背景。不過，倘若游擊媒介沒有結合政治運動，它頂多繼續在邊緣掙扎，無關痛癢。台灣的政治運動團體資源匱乏，無法攀上主流的大媒介說話，別無選擇，只好退而求諸游擊媒介。游擊媒介對政治運動來說，便是充當早年芝加哥社會學派所說的「組織性的情報」(organized intelligence)。反對勢力的游擊媒介挑戰不公平的權勢結構，更長期顛覆支配性的統治意理，久之開闢另類和敵對的言路，洵非當局始料所及。

游擊媒介所需要的成本小，科技程度低，當局以為只要控制大媒介即可安心，以致低估小媒介的顛覆效果；然而，正因為相同的道理，小媒介作為弱勢反對派的動員工具，卻顯得機動靈活，以致如虎添翼。從歷史的眼光來看，政論雜誌突破報禁的封鎖，美國壓力和國內挑戰「意外」促成有線電視頻道的開放，以及地下電台公然違抗當局，都證明「大衛」未必打倒不了「巨人」。可是游擊媒介終究無法突破自身的局限，以致損傷長期發展；政論雜誌末期言論漫無節制，「第四台」一直混亂不堪，地下電台根本無法無天。難怪社會一旦開放，它們就失去了

生存的空間。說到底，游擊媒介不能自外於資本主義的市場運作，若為求生存而自毀公信，則任何社會理論都不應該為它塗抹太多浪漫色彩。

國民黨政府在全球資本主義依賴發展(dependent development)的環境中締造佳績，長期維持權力和意識形態的優勢(Gold, 1986)。但國民黨的合法性從來受到或明或暗的挑戰，不可高枕無憂。它對付挑戰的第一本能就是鎮壓，致使人們長期噤若寒蟬，敢怒不敢言。及至反對勢力風起雲湧，當局的鎮壓愈到後來愈失靈，雙方分別用大媒介和小媒介周旋、角力、捉迷藏。解嚴以後，民間的挑戰方興未艾，當局機關算盡，無計可施，為了盡量保全既得利益，不惜和權力競爭者、反對派精英妥協，討價還價，終至政策和作風急轉彎，默認游擊媒介所造成的既成事實。當局始終沒有全盤規劃，更枉談甚麼深謀遠慮了。報禁解除後，100多家新報紙一窩蜂湧入市場，只有一家在市場上立足。國民黨不分青紅皂白把「第四台」合法化，可謂因循苟且，不負責任，獲利的不是反對派精英搖身而變的商人，就是原來的大財團。媒介秩序如此扭曲破碎，猝然交由市場邏輯接管，無非為國內大財團和跨國資本控制市場鋪道。

反對派領袖躍上權力要津，便不必倚重游擊媒介了。民進黨在2000年選舉中意外擊敗國民黨而執政，這在台灣是史無前例的。焉知民進黨上台，竟和國民黨亦步亦趨，信奉扭曲的新自由主義市場私有化。民進黨在野時曾經聯合進步知識份子，至少在言辭上擁護一些進步的主張，例如提倡改組官資商營的電視台為公共電視，其中特別提及科倫(Curran, 2000)所倡議的民主媒介體系藍圖，讓民間、專業、社會市場和私人企業各領域的媒介相容並蓄。民進黨上台，逼國民黨從媒介控制中卻步，卻遲遲沒有履行選舉承諾，排除政治和市場對廣電媒介的干預。商業電視體系普受社會詬病，公共電視卻仍在邊緣聊備一格，民進黨人的民視台節目也像其他三台一樣庸俗。不管是國民黨政府還是民進黨政府，俱如水中倒影，黨益當頭，公義讓路。

媒介自由化是全面民主化的先決條件，但並不等於全面民主化。解



嚴不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支配與從屬有多層的結構，民主不是完美的烏托邦或固定的成品，而是不斷追求、止於至善的過程，在各時期都面對層出不窮的問題與關懷，以促進人類更大的解放。自由化把政府控制送入歷史廢堆，媒介從檢查制度的桎梏中解放，這是不可輕易抹煞的成就。可惜台灣未進一步建構全面民主的媒介秩序。市場在戒嚴時期抗衡政府的媒介控制，解嚴後卻逐漸取代政府成為媒介自由的羈絆；市場控制比政府控制較不着痕跡，後果卻一樣不可小覷。目前，任由這許多媒介在扭曲的市場秩序中廝殺，個個都是財務的輸家，但最大的犧牲者莫過於「公共領域」。

媒介沒有充份發揮民主啟蒙的功能，只顧應付激烈的市場競爭，甚至模仿當年游擊媒介——倒不是學它們向威權統治宣戰，而是學它們製造民粹的、煽動的、言過其實的、疲勞轟炸式的言辭，既無解放的積極意義，也不利於培養正常的政治公民意識。當年游擊媒介先反抗頑強的戒嚴體系，後來又遭逢市場壓力推波助瀾，變得肆無忌憚，不惜殺雞取卵，聳動虛假材料甚囂塵上，到頭來只有自毀公信。解嚴後18年，政治箝制解除，但我們每晚看的電視(有線和無線)又是甚麼樣的奇觀？是六七個脫口秀、扣應節目和現場訪談，一個疊一個，喧囂又自戀，來來回回都在炒政治醜聞和隱私，製造無謂的爭論。台灣的民主化一方面生氣蓬勃，一方面問題重重，媒介是具體而微的縮影；其日趨小報化和瑣碎化，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猶有過之(Sparks and Tulloch, 2000; Gunther and Mughan, 2000)。論者說，在穩定的民主國家裏，一般公民已覺得宏觀的代議民主乏味，落入公式窠臼，無生氣；他們寧可擺精力到關乎日常生活的媒介報導，關注切身的微觀政治(Dahlgren, 2000)。台灣不是這樣，因為長年累積的精力還沒有完全釋放，全民隨時隨地準備政治動員，社會精力消耗在代議選舉的輸贏上面；活躍份子積極投入各論戰陣營，電視上的政治劇碼提供免費娛樂，也讓旁觀群眾看得津津有味。

台灣在族群矛盾的節骨眼上何去何從？統獨問題糾葛不清，身份認

同懸而未決。國民黨治下的權力失衡以省籍差異為分水嶺，省籍和血統、出生地都屬於人類學家紀爾茲(Geertz, 1973)所說的「原始關係」(primordial ties)，與生俱來，無法以人為後天改變。國民黨建構特殊(particularistic)的「泛中國」意識神話，箝制本地人的身份認同，剝奪他們的參政權利；黨外以普世價值抗爭，要求回歸民主憲政和保障人權等「公民關係」(civil ties)，這是符合民主精神且深具解放意義的。問題是，如紀爾茲說的，政治現代化和民主化剛起步時，不但不會平息「原始關係」的作用，反而會激化它(頁269)。所以70年代末、80年代上半葉黨外雜誌代表一種解放，到了90年代中期，地下電台竟退化為反民主的象徵。在威權時代爭取本地人的權益是民主的，是解放的；但權力已經完成再分配的過程，本地人掌權，如果媒介再刻意渲染簡單化、本質化的身份認同，在歷史傷痕上撒鹽巴，這是傷害、報復和排擠大陸族群的意識形態。此一時，彼一時，好比馬克思所說「異化」，同一件事在不同的情境可以從民主走向反民主，從解放走向反動。

現今，媒介充滿了墮落的政治閒話，極盡挑動族群這些「天生」差異之能事，沒有致力把這些差異轉化為公民秩序。媒介不斷炒作黨派和種群衝突，小事化大，無中生有。那些在媒介上喋喋不休的，不外是一小群尖刻的政客、憑一個觀點走遍天涯的學者，加上冒充專家的記者們。公眾的聲音何在？媒介應該處理一個困難的關鍵課題：民主的公民性(democratic citizenship)。媒介只在黨派爭鬥的窄格子打轉，沒有嚴肅探討深層的社會、經濟、文化題材。族群矛盾鋪天蓋地，中國大陸的新聞和國際新聞卻少得可憐——雖然大家明知台灣是個貿易島國，又在強鄰虎視眈眈之下，為了國計民生必須知己知彼。媒介也沒有為社會正義和生活素質這些核心民主理念、或為台灣與中國的關係這些重要議題建立廣泛的共識。庸俗化在某種程度上可說是游擊媒介在錯誤的時間借屍還魂。一言以蔽之：媒介自由化，沒有全面的民主化。

## 政治經濟的分與合

香港媒介結構、新聞自由和政權遞嬗<sup>1</sup>

---

新聞自由難道不可分割嗎？報紙在小問題上面妥協，是否因此就永遠喪失了編輯的貞操？讓香港的務實主義去閃躲前頭的迷宮，不是比發表(文章)挨批更有效？至於報紙決定少給篇幅報導北京的批評者，又怎麼着了？決定政治路線不是報紙的權利嗎？

——《南華早報》總編輯芬比(Jonathan Fenby)

接受英國國家廣播公司訪問，1997年4月(引自 HKJA, 1997:48)

有信心的釀酒人會選擇盡量少干預，讓酒自己釀成。畢竟酒是無法逃出瓶子的。

——錢果豐，預委會委員(Gargan, 1996)

在現代資本主義裏，媒介是文化產品，也是意識形態的工具。香港回歸中國，媒介首當其衝，深刻感受整個政治經濟巨大變化的壓力。媒介深植於豐沃的語言文化土壤上，不像一般企業可以連根拔起，移植到國外硬生生的環境從頭開始，因此媒介對權力結構和權力關係的觸角特別敏感。它們一邊吸收權力集團施加的政治經濟壓力，一邊界定議題，聚焦公共的注意力，增加或減少社會辯論和想像的空間。它們和社會上流通的各種資訊產品競爭，迎合各階層受眾的口味和廣告主的需求(其中

---

1 原載於 Chin-Chuan Lee (2000b), "The Paradox of Political Economy: Media Structure, Press Freedom, and Regime Change in Hong Kong," in Chin-Chuan Lee (ed.), *Money, Power,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p. 288-336.

有些不見得怎麼高尚)。如果公眾認為某一家傳媒機構缺乏公信，或搖擺不定，不管它是全面庸俗的，或是口味嚴肅的，它必然無法在市場上生存。本章旨在分析媒介面臨政權轉移時的雙重角色，它們既要照顧國家的認受性(legitimation)，也要穩固自己在市場經濟的認受性。

媒介總是反映權力結構的觀點，也回應權力關係的改變，但這個過程不是機械庸俗的一對一，更不是一成不變。媒介平常支援、鞏固建制的主流精英觀點，然而如果精英共識崩潰，或者權力結構面臨認受性的危機，媒介的觀點再也無法定於一尊，則須建構正反各種不同的多元現實。權力結構重新洗牌，影響到媒介的政治組合，從而改變了媒介內部的操作規範和文化生產；等到政治秩序恢復正常，媒介也會相應地回歸原來的軌道運行(Chan and Lee, 1991)。我贊成唐納休、提琴納和歐林(Donohue, Tichenor and Olien, 1995: 15)提出的「警衛狗」(guard dog)假設：「媒介不是為整個社區站崗的，而是為可以創造控制他們安全系統的權勢團體站崗的。」許多學者儘管理論取徑各異，但他們大致都同意：媒介在很大(但不是全部)程度上依賴權力結構建構現實(Hall, 1977; Dreier, 1982; Tuchman, 1978; Gitlin, 1980; Herman and Chomsky, 1988; Chomsky, 1990; Hallin, 1986b; Said, 1981; Entman, 1989)。

班內特(Bennett, 1990)指出，媒介報導是社會上合法聲音(legitimate voices)的指標，充分反映權勢團體的觀點，而落在官方辯論範圍之外的聲音可能偶受媒介注意，但經常被消音或邊緣化。媒介架起一副敏感的天線，經常收聽外在環境變化的蛛絲馬跡。在正常的情況下，媒介有惰性，抗拒變革。如果變革不可避免，寧願縮小變革的範圍，因此會盡量修補一部分新聞典範(journalistic paradigms)的操作規範，以企圖保留整個典範結構的完整(Chan and Lee, 1984, 1991; Bennett, et al., 1985)。假如外在環境動盪擾攘不安，這時只靠在技術範圍內修修補補已經不能解決問題，媒介結構和新聞典範勢必大規模改造——在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的前前後後，政治經濟大環境的變化帶動了媒介結構的變化，即為明證。

且慢，在掉進化約主義的陷阱以前，我們不妨重溫威廉姆斯(Williams, 1977)的洞見：媒介既支撐支配性的現實，也通過吸納、邊緣化、乃至對抗另類的或反對性的解釋，來維持那個支配性的現實，所以整個支配過程不斷受到挑戰和鬥爭，不是一成不變的。

香港媒介面臨什麼挑戰？當威權新主接收一個成熟的資本主義，兩套內在邏輯格格不入，必然激發「市民社會和市場經濟」的鬥爭以及「市民社會和官僚國家體制」的鬥爭(Dahlgren, 1995: 128)。這些鬥爭，簡言之，就是政治經濟的辯證性。北京能不能一方面承諾給香港「高度自治」，另一方面又持續威脅它的新聞自由？香港要是沒有自由的傳媒，經濟還能繼續繁榮嗎？市場力量阻擋得了潛在的政治干預嗎？資本主義的邏輯追求「利潤理性」(profit rationality)，整個經濟環境能否促進媒介本身的理性考慮？新聞是公共財(public goods)，媒介有足夠的聲譽與認受性以抵擋國家的干預嗎？資本的累積會不會犧牲非經濟的價值，以至於扭曲媒介的文化生產？公民權和公民自由如何界定，才不會踐踏和限制公民社會的媒介表述？最後，媒介如何估算經濟利益和政治壓力，如何正面和反面互動？

本章採取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從歷史脈絡考察香港傳媒的變局，以及限制新聞自由的種種條件。首先要分析席莫爾－游瑞(Seymour-Ure, 1974)所說的「報業與黨派的並轡主義」(press-party parallelism)之起起落落。以往整個報業在組織、財務和意識形態上都跟國共鬥爭亦步亦趨，這個關係在各階段如何隨政治局面而變化？港英政府過去50年縱橫捭闔於各種勢力之間，踩鋼索，取得主導空間，這個報業與黨派的並轡就是一幅生動的側寫。從原來的港英獨大，轉變為中英共治的雙元權力結構，到最後由中國接管，導致政治權力重新分配，社會力量重新組合，其間過程轉折多變。新的政治經濟對媒介結構和內容產生不均的和互相矛盾的影響。第一，媒介盡量逃避嚴肅而危險的政治新聞，一味以煽情追逐市場利潤，因此產生了許多反民主的傾向；大企業(其中很多積極爭取北京的好感)兼

併傳媒機構，嚴重限制意見流通的多元性，尤其是前所未有的局面。第二，具體而言，為了準備承受中國當局的壓力，許多媒介工作者和傳媒組織紛紛自我繳械，進行新聞檢查(Lee, 1998a)。第三，政權轉變使得媒介必須重組「新聞網」(Tuchman, 1978)，以適應新情勢的變化；但媒介的經濟考慮卻也創造了政治喘息的空間，何況新聞專業主義的信條維護媒介的自主性和認受性，給媒介若干緩衝的餘地，抵禦國家機器的控制(Lee, 1998a)。政治經濟學的矛盾性影響，正如本書第二章所闡述的，「自由多元主義」和「激進批判主義」是政治經濟學的兩個悖論。

### 報業與黨派的並轡主義以及政治變遷的階段

香港媒介涵蓋了整個意識形態的光譜，呈現「報業與黨派的並轡主義」(Seymour-Ure, 1974)。在歐洲許多國家和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報界與黨派密切聯繫，例如英法各國各有各的報紙支持保守黨、工黨或社會黨，社論比新聞報導還要旗幟鮮明，甚至黨同伐異，但廣播電視多半力求中立(Patterson and Donsbach, 1993; Donsbach and Klett, 1993; Freiberg, 1981; Hadenius, 1983; Suine, 1987; Kocher, 1986)。對照之下，美國媒介動輒以專業和無黨派色彩自豪，其實就是走美國社會主流的「中間派」路線，只差沒有明言是以既有秩序和主流價值為基準罷了；畢竟媒介只有在既有秩序的前提下才能談客觀、公正和不偏不倚，所以「價值中立」並不真是沒有價值判斷(Tuchman, 1978; Gans, 1979; Schudson, 1978; Fishman, 1980; Weaver and Wilhoit, 1996; Manoff and Schudson, 1986)。香港報業的意識形態的分野依據的是外來的國共對峙，而不是內部政黨的分歧，因為港英根本長期不允許內部政黨的成立。整個媒介意識形態的變化大致可分三個階段：

#### 第一階段(1949-1984)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隨後冷戰揭幕，直到1984年《中英聯

合聲明》簽訂，港英的權力至高無上，外來的國共勢力都處於從屬的地位。香港是中國通向西方世界的主要視窗，中國靠它賺取40%的外匯。50年代和60年代初，新華社(中共在港的權力中心)和本地共產黨報紙在周恩來的指令下保持低姿態。

殖民地政權並未賦與本地民眾應有的政治權利，而是選擇地吸納商界和專業精英(包括某些媒介老闆)，讓他們進入各種疊床架屋的諮詢組織，扮演有名而無實權的榮譽角色，金耀基稱之為「行政吸納政治」(King, 1975)。本地政黨是明白禁止成立的。香港有充分的人身和新聞自由，沒有民主，拿選舉權來說並沒有跨越19世紀的門檻。港英制訂並操控政治的遊戲規則，然後允許國共雙方在香港的架構內建立輿論基地，它們相互攻伐，矛盾化暗為明，文鬥不武鬥，港英則居中操縱局面。其實，香港令人欽羨的「新聞自由」，無非是批評國共的自由，但對殖民政權的批判是寥寥少見的(Mitchell, 1969)。媒介主要的功能就是調節港英行政官僚體系的弊病，並防範大眾不滿於未然，而非促進體制的變革(Miners, 1977)。

多數華人難民向來以香港為暫時棲息之地，華文報紙關心國共政治，而漠視本地的政治事務。在文革時期(1967-1976)，港英搗毀香港本地的共產黨組織，贏得多數居民的擁護，新華社前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在其回憶錄(1993)有詳細的敘述。這樣的左右報界與國共聯盟存在將近20年，直到1970年一群中立的報紙抬頭，格局才有改觀。中立報紙後來成為主流，主要歸因於香港的經濟成長，廣告收入不斷上升，以及人口結構的急速變化。到此時，香港本地出生的人口已經超過大陸移民，這一批新興報紙以本地的新聞爭取讀者，對國共衝突採取比較疏離的態度。

社會運動很少，基礎也很小。港英政府建立了龐大而能幹的新聞機器——政府新聞處，派遣新聞官進駐所有政府部門從事政府公關。用葛蘭西(A. Gramsci)的話來說，就是製造一種同意基礎，讓港人無形中普遍

而自然的認同殖民統治(Lee, 1985; Lee and Chan, 1990a)。媒介幾乎壓倒性地親英。1982年到1984年香港主權談判時期，港英打的就是媒介支持港英繼續統治的「民意牌」，對抗中國打出的「主權牌」。

## 第二階段(1984-1989)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一個中英雙元權力結構登場，但中英當局在港人心目中的認受性都有問題。一方面，港英無法繼續辯護殖民統治，何況在談判期間港英各種期許一一落空，首先是希望在1997年以後保持治港的主權，後來又提出「以主權換治權」，全部為中國所拒。這時，除了塑造一副活躍、正面的「親民」形象，維持公共的信任，還能有什麼作為？另一方面，中國收復香港主權是強加的既成事實，港人無由置喙，對中國高度疑懼，因此中國必須改善自我形象(Lee and Chan, 1990a)。英國準備適時光榮撤退，而中國已經取得香港的監護權；雙方既競相爭取媒介的好感，以提高合法性，又彼此謀求合作，以營造順利交接的氣氛。中英鬥爭的多變使得媒介的角色混亂又矛盾。

中英雙方盡量籠絡社會精英，有形的包括給廣告和給新聞，無形的包括給地位、給注意力以及給接近權勢的機會，而媒介更不想得罪中英雙方。港英一貫擅長吸納社會精英，頒發爵位，成立各種諮詢委員會，行之數十年，籠絡工作卓有成效(King, 1975)；這時更全力爭取媒介的友善和同情。中國當局也開始效法港英，吸納許多原先親英人士(包括媒介老闆和明星記者)進入中方控制的權力圈，包括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和諮詢委員會，金耀基(King, 1988)說這是「政治吸納經濟」，有別於港英傳統的「行政吸納政治」。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頻頻接見香港各界代表。香港新華社在許家屯主持下積極吸納社會精英，並與本地媒介建立友好關係(Chan and Lee, 1991; 許家屯, 1993)。

80年代中期以後，香港回歸大局已定，但雙方為政制齟齬方興未艾，壓力團體和社會運動隨之風起雲湧，媒介獲得嶄新的機會投身於這



些活動的報導。社會運動轉趨活躍，部分源自中國宣示「港人治港」的原則，又受港英推行「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運動所鼓舞，爭取本地人更大的自治權利。政治變遷的不穩定性讓各方無所適從，媒介竟提供了一面「反照鏡」(looking-glass mirror)(Lang and Lang, 1981)，中英彼此透過媒介來猜測對方的意向，並各自設計因應的策略。為了把《基本法》具體落實，媒介躍居公共辯論的中心舞台，各方壓力團體都在上面展開戰鬥。媒介只能默認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事實，但總希望在《基本法》的框架裏爭取最有利的條件。中國迅速進攻香港的政治意見市場。港英政府顯然希望利用本地媒介抵抗中國的統戰攻勢，頻頻呼籲媒介不要「自我檢查」。港英政府提出了各種民主改革的方案，但遲遲不能推行，媒介也開始放膽指責港英。港英政府不願激怒中國的情緒，又只許在它控制的速度下實行民主改革，半推半就，民主人士和媒介同感沮喪。這些年間民主發展遲緩，直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才改變整個政治生態。以前媒介反對「一國兩制」的政策，現在卻希望中國能真正實行「一國兩制」，因為這是香港的最後保障(Chan and Lee, 1991; Lee and Chan, 1990a)。

### 第三階段(1990-2000)

第三也是最後的階段從1990年開始，象徵港英的「淡出」和中國的「淡入」。中英關係跌到谷底。1989年天安門事件爆發，香港及其媒介極力支援北京學生，中國當局對此一直耿耿於懷。中國在香港的影響力愈近1997年主權移交日愈顯著。研究調查顯示，1986年76%的人相信香港政府，1988年掉到49%，1990年持續下滑到43%(劉兆佳, 1992)，在1997年主權移交以前始終在40%左右徘徊。港英政府的籠絡政策愈來愈失靈，本地精英一窩蜂爭取中國的青睞(Tse, 1995)。然而主權問題已定，中國漸漸覺得不需要籠絡的政策了，態度漸趨強硬；面對外國政府和國際壓力，中國的黨國領袖不能示弱。港英政府已經淪為跛腳鴨，媒

介肆無忌憚批評它們，但是愈來愈怕得罪新政權。

1992年，彭定康就任最後一任港督。他是專業政客，不像以往港督多是出身於殖民部的官僚或從外交部派來的中國通。彭定康認定這是主權移交以前拓展選舉改革最後的時機。他主持1994年和1995年一系列的選舉，而到1996年改選新的立法局，有三分之二的議員開放民選，而不是由官派。中國一再恫嚇，也不能阻止民主黨擊敗親北京的民建聯和替富人講話的自由黨。中國譴責這個選舉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和雙方所達成的一系列協定，並詆譏彭定康是「千古罪人」。北京拒絕再與彭定康周旋談判，乾脆一逕推出自己的權力結構，包括港事顧問和特區立委會預備委員會，都是《基本法》上所未見的「違章建築」(Dimpleby, 1997)。80年代中國還有雅量籠絡一些批評者，此時只願吸收親中人士，批評者一律掃出局外。1997年7月1日回歸當天，北京任命的臨時立法會取代1995年民選立法局，馬不停蹄通過限制性更大的法律。一年以後，立法局重新改選，但改選的規模大幅下降。

在這個階段，媒介既反映自我利益，也反映大眾的關注。對於中英之間、彭定康與新華社之間、以及香港各政治團體之間的齟齬，媒介皆報導得巨細無遺。由於各權力結構對局勢界定和利益分配看法南轅北轍，議題進入哈林(Hallin, 1986b)所說的「合法性的爭議區」(sphere of legitimate controversy)，媒介獲得很大的報導空間，呈現各方的意見。但媒介再也沒有興趣和新興政黨建立並轡的關係。傳統報業與政黨的並轡制度成為歷史陳跡。黨報漸趨式微，有黨派傾向的報紙發行量和影響力直降，而中立性的報紙自我檢查，媒介所有權和內容都發生重大變化(Lee, 1998b)。

自從1997年7月1日主權移交以後，北京遵守基本法的承諾。以前北京仇視港英，現在則力挺特區政府，不像先前預料的那樣明目張膽干預香港的民間生活。北京既然操縱了特首和立法會，有條件同實際政治運作保持距離，不必公開說長道短，處理以前的種種威脅也小心翼翼。回

歸後塵埃落定，媒介繼續訪問中國的政治異見人士，報導每年六月四日紀念天安門事件的燭光晚會也比回歸前幾年較無顧忌。特區行政首長董建華取代北京，成為媒介的眾矢之的。廣播節目和卡通漫畫對政治人物和政策的批評毫不留情(香港記者協會[HKJA]，1998)。香港媒介鬆了一口氣，但這並不代表它們對中國有信心；疑慮和不穩定使得中間派的報紙壓低對中國當局的批評，而且變得非政治化和庸俗化(Lee, 1998b)。因為自我檢查已經轉變成一個結構性的問題，香港記者協會的報告(1998)說：「不能掉以輕心」。特區政府公佈政府消息態度遠比港英政府不開放。香港記者到大陸採訪的限制仍多。特區政府可能重新引進限制性更強的法令，例如《基本法》23條。大眾媒介市場為兩家報紙所控制，專業倫理下降。財政拮据的媒介被擠出市場，中資更有機會在香港獲得強勁的聲音，如香港記者協會(1998)所指出的，為一個已經不確定的環境投下更大的陰影。市民普遍不滿媒介踐踏倫理，政府在1999年試圖建立有立法權力的新聞評議會，但徒勞無功。

## 黨報

政治變遷最立竿見影的，莫過於親國民黨報紙的相繼淪陷。50年代親國民黨的報紙受反共人士支持，後來看到蔣介石回不了大陸，國民黨在香港的影響力式微，最後被擠到邊緣地位。港英政府受北京的壓力，鎮壓親國民黨團體的活動，例如不許台灣官員入境，禁止敏感的台灣影片公映。台灣影響力滑落，一來是支持國民黨的群落或老、或死、或移民，二來戰後新一代對傳統國共鬥爭愈來愈不耐煩。80年代初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呼籲國民黨遵守「一個中國」政策，不搗蛋，繼續留在香港。《中英聯合聲明》1984年簽訂之後，國民黨團體與香港的政治生活更脫節。

第一個犧牲的就是何世禮的親國民黨《工商日報》。50年代《工商日報》影響力大，但它無視人口結構和政治環境的變化，繼續僵硬反

共，以致70年代讀者群被新興的中間派報紙蠶食，而於70年代末再也沒有辦法攀升回去。如今前途更暗淡，終於在《中英聯合聲明》草簽以後兩個月——即1984年11月——黯然告別讀者。國民黨官方喉舌《香港時報》繼續出版十年，但是內部時有激辯是否應該軟化僵硬的反共立場以適應新的政治生態。台灣於1987年解除戒嚴，國庫再不能通黨庫，國民黨不肯挹注資本到《香港時報》補貼這類賠錢的言論機構。《香港時報》於1993年關門是不可避免的事，引得香港本地國民黨老人的怨憤。

1992年，台灣兩大報系在香港搭起橋頭堡：《香港聯合報》、《中國時報週刊》。它們受到蘇聯解體和海峽兩岸和解的鼓舞，寄望以香港為中介基地進入中國大陸。台北《聯合報》1992年受到「退報運動」的衝擊，罪名是親北京和提倡統一，這是島內統獨情結發酵的惡果。香港《聯合報》以報導中國見長，同情大陸民運人士，並嚴厲批評台灣總統李登輝。《中國時報週刊》一開始就推出「中華聯盟」的概念，提倡中國大陸與台灣建立更緊密的關係。唱這種政治調子並不討好，雜誌一度改名《中國時報經濟週刊》，提倡全球華人經濟制度的整合。但是提倡經濟也不討好，無奈回復原名，取消「經濟」二字。《香港聯合報》和《中國時報週刊》無法在飽和的香港市場立足；積極尋求大陸傳媒的合作關係，也因北京緊握終審權鐵羽而歸。即使《中國時報週刊》唱柔軟的經濟調子，也不能讓北京放寬限制，反而在台灣島內引起統獨的爭議。這時中國開始批評彭定康在香港的政治改革，95和96年更對台灣發動飛彈恐嚇，台灣經濟雪上加霜，1995年底香港發生報紙價格戰，兩大報不得不忍痛從香港撤退。台灣的媒介至此在香港全面封閉。

另外左派那一頭，中共自1989年以後就開始加緊控制《大公報》和《文匯報》。80年代中，兩報實行本地化政策，新華社放鬆控制，以體現北京對「一國兩制」的誠意。不料1989年天安門事件爆發，兩報都鮮明支持改革派的趙紫陽，反對最後鬥爭獲勝的強硬派(Lee and Chan, 1990b)。秋後算賬，《文匯報》發行人李子誦和他的高層幹部被掃地出

門，他分裂出去自創短命的《當代》雜誌。從1989年到1997年，強硬派控制國務院港澳辦和香港新華社，新華社從大陸輪派意識形態效忠的人士來掌握《文匯報》和《大公報》，而不再起用感情上更接近香港的本地人。

左派報紙信譽一直低落，銷路小得可憐。中資和內地地方政府提供豐厚的廣告收入，《文匯報》獲得更多官方資金來「改善『六·四』的形象」，《大公報》透過跟各省黨委書記的關係，也開拓大陸市場。兩報在1992年到1994年期間獲利甚豐。《文匯報》1995年的銷路列香港第12位，但廣告卻躍居第5位。該報沒有一天不罵彭定康，沒有一天不刊登新華社用匿名寫的罵人文章。它們想加強中國的報導，《文匯報》派有香港淵源的大陸記者去內地設立了12個記者站，但格於黨的嚴格控制，也無明顯建樹。兩家左報互爭相同的讀者群和收入來源，不時放明槍暗箭，中傷對方。《香港商報》影響不大，後來賣給左派的三聯書局，現在又賣給《深圳特區報》。《晶報》和《新晚報》都相繼關門。

主權移交以後，香港新華社(及以後的中聯辦)和左派報紙刻意保持低調，以免干預特區政府的權力。殖民政府的主人已回老家，本地的媒介愈來愈討好北京，左派報紙能發揮的意識形態功能更可憐。北京的統戰策略從「敵我矛盾」轉變為「人民內部矛盾」——殖民地的香港同胞已歸入「人民」之列了。90年代兩左報大量投資廣告賺取的收入於房地產，未料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一刮頓成泡沫。總理朱鎔基拒絕繼續津貼，討論合併甚囂塵上，雖然最後沒有合併，左報前途暗淡。

## 具有黨派傾向的報紙

因為政權遞嬗，原來中間偏右和中間性報紙的界限日趨模糊。它們都以市場為導向，都同情港英政府；然而中間偏右的報紙創立於中共政權之前，與國民政府淵源素來深厚，中間性報紙則崛起於1970年，沒有義務效忠國民黨。兩家最重要的中間偏右的報紙是《華僑日報》和《星

島日報》，分別創立於1925年和1939年，報頭一直奉「中華民國」年號。隨着政權的遞嬗，它們逐漸淡化黨派傾向，向市場靠攏，以至於和中間性報紙合流。

新華社在80年代中期開始向這兩家報紙伸出橄欖枝，《華僑日報》的岑才生正面積極回應，而《星島日報》的胡仙較多保留。兩報都盡量在中國和港英之間求取平衡，也不願疏離傳統與國民黨的友誼。他們逐漸淡化親台關係，因為國民黨在香港的基地流失，海峽兩岸關係改善，何況台灣的政治已由本地人當家，不再由傳統蔣氏家族的大陸人把持。

市場競爭激烈，政治不明朗，首先威脅到這兩報之中的弱者：《華僑日報》。80年代期間每年損失四千萬港元，岑家急於待價求售。默多克(Rupert Murdoch)打算進軍中國市場，首先買英文《南華早報》，接着在1992年以4600萬港元收購《華僑日報》，作為踏入華文報紙的第一步(Fung and Lee, 1994)。該報砍斷傳統傾斜國民黨的態度。不久，默多克放棄報紙事業，轉而經營以香港為基地的星空衛星電視(Star TV)，信號遍及亞洲，包括中國大陸。大陸官方三令五申不准收看境外電視。(星空衛視旗下的鳳凰台已獲許在廣東的有線電視頻道落地，此外涉外旅館和機構都收看得到。)馬來西亞華商郭鶴年從默多克手中收購《南華早報》與《華僑日報》。《華僑日報》後來轉讓多手，終於在1995年壽終正寢。

北京一直對《星島日報》拋媚眼，答應胡仙如果訪問大陸，會發還沒收的財產，並以高規格禮遇。可是她不信任共產黨，報紙總部於1985年遷冊澳洲，為求分散政治風險，報紙公司化上市，開始多元化投資(Chan and Lee, 1991)。她投資房地產，起初賺了幾筆錢，但緊接着負債累累，連銀行都約束她集中於報紙經營。1992年胡仙應邀訪問北京，尋求商機，受到總書記江澤民和總理李鵬接待(《成報》何文法和《東方日報》的馬澄坤也隨後訪問中國大陸)。胡仙為了扭轉旗下報紙的言論方向，特地從新加坡請來新的總編輯，試圖降低政治意味。1995年，她花

二億五千萬港元在大陸投資出版事業，賠得一塌糊塗。

《星島》跟《明報》的社論論調並無二致，中間偏右和中間性報紙已經匯流。1996年年底胡仙決定關閉《星島晚報》和《清秀》雜誌，仍不能挽回《星島日報》的頹勢，讀者群一路從1996年底到1998年跌了一半，《蘋果日報》得利最多(HKJA, 1998)。後來英文《香港虎報》偽造銷路資料，胡仙被起訴。左派商人查濟民原想收購《星島日報》，後來發現債台太高而放棄。該報終於在1999年賣給英商，即《經濟學人》和《金融時報》的母公司Lazard Asia，後又輾轉出賣多手。

### 中間性報紙

中間性報紙崛起於60年代末，不但削弱有黨派傾向的報紙，而且促使傳統報紙與政黨的結盟逐漸脫鉤。這一群報紙包括知識份子取向的《明報》和《信報》，以及普羅大眾取向的《東方日報》、《蘋果日報》、《成報》和《天天日報》。舒德森(Schudson, 1978: 119)把前者稱為「消息報」(a newspaper of information)，後者稱為「故事報」(a newspaper of story)。哈林(Hallin, 1986b: 130)稱之為「政策新聞」與「經驗新聞」。一般則以「質報」(quality press)和「量報」(quantity press)區分。中間性報紙囊括報紙銷路和廣告的三分之二。如同美國的所謂「專業性」報紙(Gans, 1979; Tuchman, 1978; Schudson, 1978; Manoff and Schudson, 1986)，中間性報紙以市場銷路為導向，支持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維護社會上具有合法性的中央機構，排除少數異見。它們從香港的觀點來解釋國共之爭，而不站在國共衝突的哪一邊。

#### 知識份子報紙

國際資本紛紛流入香港，建立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跳板。在港英時期，香港形成雙元的讀者結構，多數本地居民閱讀華文報紙，而少數外籍人士和華人精英則閱讀英文《南華早報》。《南華早報》是如同普爾

(Pool, 1952: 120)所說的「有聲譽的報紙」(prestige paper)，表達精英的看法，傳送精英所需要的新聞和判斷。香港新華社前社長許家屯(1993)在回憶錄中透露，中國當局在80年代有意收購《南華早報》，因財政拮据而未果。1993年該報產權由默多克賣給郭鶴年。郭鶴年是該報最大股東，占34.9%股份，約值三億4900萬港元。他也擁有香港最大的無線電視(TVB)股權三分之一。他曾是新華社任命的港事顧問、特區預備委員會和選舉委員會成員。中資不斷流入香港媒介：與中國軍方關係密切的劉長樂於1998年收購亞洲電視，又投資於默多克的星空衛視。

郭鶴年在中國內地大量投資。1994年《東方日報》及時推出英文《東方快報》，在廣告上自稱是香港唯一獨立的英文報紙。《南華早報》不過是郭鶴年資產的一部分，自從接手以後，該報不斷稀釋中國的政治報導(HKJA, 1996)。即使如此，多數世界上威權政府都比較容忍英文報紙，因為讀者品位較高，而且攸關對外形象。《東方快報》從來沒有認真威脅過《南華早報》的優勢，經營兩年，終於不支而於1996年關閉。星島集團的英文《香港虎報》也不能動搖《南華早報》的地位。但《南華早報》再也無法恢復往昔那樣支配性的優勢。在主權移交前夕，該報突然自北京請來一位編輯顧問，引起公眾猜測。

默多克着手經營星空衛視之初，曾誇口要用衛星傳播擊敗共產專制政權。但事實證明中國市場比政治動機或新聞理念更重要。默多克動員他的全球媒介王國，開拓中國領導人的關係：紐約的HarperCollins出版鄧榕的《我的父親鄧小平》，並於1995年邀她赴美巡迴售書；北京當局不喜歡BBC World Service，默多克便把它從遍及東亞的星空衛視剔除；鳳凰衛星電視為中國官方的有線電視系統提供娛樂節目，任由官方剪裁新聞，這是錢與政治奇怪的結合。許多鳳凰衛視的人員來自中國中央電視台，完全領會北京容忍的限度。1998年，默多克下令他在英國的出版社取消與彭定康回憶錄《東方與西方》的合同，該書後來由Random House出版，封面的廣告說「這是默多克拒絕出版的書」。默多克把二



十世紀福克斯(Twentieth Century Fox)的電影《鐵達尼號》放給江澤民私人觀賞，為其所喜愛，准予進口(中國每年限額進口好萊塢大片十部)，創下票房紀錄。江澤民讚揚默多克「客觀報導」中國，以及「他的友好合作讓世界更瞭解中國」。

華文報紙產權最重要的改變，當屬以知識份子為導向的《明報》。創辦人查良鏞主政時期，《明報》以中國報導見長，在冷戰時期提供很多深刻的分析。文革時期該報反對極左的領導人，80年代查良鏞堅決擁護鄧小平的經濟改革，甚至禁止報紙指名道姓批評鄧小平。他參加《基本法》起草，1988年提出一個保守的方案，反對加速民主選舉，為的是怕組織嚴密的共產黨占上風(Chan and Clark, 1991)。他還在他的報紙宣傳他的方案，激起許多憤怒的示威者在《明報》門前焚報。香港記者協會要求他退出基本法起草會和諮詢委員會，避免利益衝突，為其所拒。1989年天安門血腥鎮壓發生後，他宣佈退出這兩個委員會表示抗議，但過後不久他與北京當局修好，表示瞭解為什麼當局需要使用暴力。

查良鏞在1991年把報紙賣給于品海。于品海好大喜功，幻想建立華文媒介王國，遂出三億多港元成立中天電視網(CTN)。查良鏞勸他，共產黨絕對不會讓媒介、軍隊和黨的控制權旁落，但他不為所動。中天果然得不到內地經營的許可，最終淪為財政負擔。1993年，他關閉了在廣州的《現代人報》，虧損甚巨。接着報紙披露，于品海當年在加拿大留學留下犯罪紀錄，他的聲譽、地位和財務深受打擊，被迫辭去香港報業行政人員協會主席。他在中國大陸的房地產投資大量虧損，而更新《明報》的印刷設施所費不貲。1994年，負債累累，他迫不得已出讓10%產權給印尼華商，也是親中的《廣角鏡》發行人，與中國商業關係密切。這樣做還不能讓于品海脫離困境，終於1995年將報紙賣給馬來西亞華商張曉卿，此人在大陸也有很多投資。于品海保留中天電視，1996年才賣給台商。

《明報》自稱中國報導最見長。90年代中期中國版14位編輯有11位來自大陸，採取窄狹的民族主義基調。《明報》於1995年2月連登數篇

社論，提倡從中國的眼光看西藏和世界問題，宣稱作為香港的報紙不夠，必須變成全中國的報紙。這個宣告引來讀者非議，認為是中原心態作祟。即使如此表態，該報和北京關係卻十分緊張，新華社不斷挑它出來公開指責，原因是1993年《明報》派記者席揚（兩個月前才移民到港）赴京採訪，不料被捕，罪名是「偷竊國家機密」。其實，他報導匯率變動和國際黃金買賣的消息，左派的《文匯報》也曾報導，北京抓他不過殺雞儆猴罷了。于品海在員工的壓力下，公然向北京施壓：該報說席揚沒有觸犯法律，中國沒有公開公平審判他；員工參與抗議示威；報紙登很多專家和讀者的批評，甚至說這個案子對香港居民產生寒蟬效應，並損傷中國的國際形象。

對北京那些崇尚父權領導的頭面人物來說，沒有什麼比報紙公開批評他們做錯事還不能忍受了。後來于品海透過私交親自到北京道歉，也在報紙上向北京告饒，但為時已晚。席揚1994年被判十二年監禁，香港記者嚇破膽。早前，《快報》記者在北京「偷竊」江澤民演講的預備稿被抓，她的老闆低調，即刻赴京道歉，記者在數日內獲釋。于品海在員工的壓力下，不可能保持沈默；既然《明報》自詡為香港公信第一的報紙，捍衛新聞自由自然責無旁貸。中國當局一點也不讓步。1995年、1996年，《明報》在大陸投資共損失2200萬港元，完全繳羽而歸。近年來，該報避免在社論嚴厲批評北京當局(HKJA, 1996: 42)。張曉卿接手以後，改善與北京關係，北京在97回歸以前釋放席揚。近年，原來為《明報》寫社論的大陸人紛紛離開，該報言論比較沒有搖搖擺擺。而且董建華政績乏善可陳，《明報》對他的批評也不斷升級。

### 通俗性的大眾報紙

通俗性的大眾報紙一直是由《東方日報》和《成報》領風騷，直到《蘋果日報》加入戰團為止。它們用生動的、庸俗的、聳動的犯罪新聞，再加上大量的娛樂界八卦新聞和所謂鹹濕內容招攬讀者，相互模

仿，內容大同小異。《東方日報》有80位突發新聞記者和30位社會新聞記者，配備採訪車和先進電子設備截聽警方無線電資訊，誇稱比員警還提早趕達犯罪現場。該報只有10位政治記者和20位經濟記者，故意追求非政治化的路線，開拓維護下層與勞工階層利益的形象。它不想得罪北京，也不像《明報》那樣跟北京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黃色新聞(yellow journalism)的報紙不合北京當局的道德潔癖，好在北京官員不斷保證97年以後香港「馬照跑，舞照跳」，允許港人保留種種腐化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

市場因為黎智英創辦《壹週刊》而打破平衡。黎智英經營佐丹奴成衣生意而致富。他在《壹週刊》以個人名義寫社評，嚴詞批評總理李鵬，導致中國當局報復，關閉北京的佐丹奴成衣店。他被迫出售股份，退出董事會。《壹週刊》的銷路一鳴驚人，促使《東方日報》出版《東週刊》，互相比賽誰的性和暴力更引人，聳動成了商業的獵物。當政治不明朗，資金紛紛外流時，黎智英偏偏在1995年投資七億港元，創辦《蘋果日報》，高薪資從其他報紙挖來10位經理，253位記者。創刊首月每份打六折賣港幣三元，光推廣費就花費一億港元，其他對手根本無法匹敵。數月內銷路攀升到30萬份，直逼《東方日報》。有人批評黎智英玩法不公平，他說他沒有義務照顧競爭者的弱點。

《蘋果日報》學《今日美國》，圖案設計多彩、誇張而奪目，繪影繪聲，寫作簡短明白，信息量大。廣東方言用得地道高妙，生動又會心。犯罪、八卦和性的攻勢玩得盡興，每天刊登婦女胴體照片，教讀者去何處招妓；以「耙糞」為名，派遣所謂「狗仔隊」任意揭發娛樂界人士的隱私，以滿足讀者的偷窺癖。北京不讓黎智英的記者北上採訪，他還是有本事把中國新聞「在地化」(domestication)(Gans, 1979)，以「淫、賭、毒、黑、邪」的主題製造新聞，都是傳統犯罪新聞公式的變奏。中國新聞成了香港犯罪新聞的延伸，讀者看來熟悉，因為故事的主題和情節千篇一律，但犯罪主角變成大陸人，反而別具異地風味。

政治上，黎智英精打商業算盤，小心翼翼引領《蘋果日報》的編輯政策，準確估計政權遞嬗的壓力點在哪裏。在香港回歸前夕，他曾經向外界宣稱不再反共了。豈料回歸前前後後，各報逐漸退縮不再對抗北京，《蘋果日報》反其道而行之，從自由主義右派竭力捕捉並激發港人潛在的反共恐共情緒，強烈支持民主黨抗共，疾言厲色攻擊本地政客的無能(特別是董建華)和商業大亨的貪婪(特別是李嘉誠)，對渴望穩定繁榮的中產階級尤有號召。2003年7月1日香港50萬市民上街游行，許多人手上拿的標語就是《蘋果日報》橫跨兩頁黑底黃色大標題：「不要董建華！」評論版許多文章直呼董特首為「廢董」。

這兩個通俗報儼然以「小人物」的代言人自居，其實它們剝削最乾淨的不是別人，正是弱者中的弱者：妓女。它們誇張煽情的手法未必是甚麼新鮮的發明，早在美國「黃色新聞戰」中赫斯特和普立策就已經玩盡了，只是在香港的場景重現另有一番意義罷了。

《蘋果日報》和《東方日報》的犯罪新聞隊伍這麼龐大，政治組的規模相形見绌，實在稱不上甚麼嚴肅的政治報紙。只是《蘋果日報》特別懂得以精明的商業策略包裝，化政治為商品；它借用犯罪新聞的巧妙手法處理政治議程和反共情緒，無論語言、畫面和風格都是盡民粹式煽動之能事，甚至血淋淋，矛頭直指可供捉摸笑罵的個人。但在粗俗的、情緒化的故事以外，還像《花花公子》的手法，聘請幾支健筆寫專欄，讓一般知識人讀報不必臉紅。《蘋果日報》的批共除了反映本身的意識形態，實在還因為香港人內心深處懼共疑共，造就了反共的特定市場。別的報紙愈轉向，愈烘托它的「勇敢」，雖然在敘述風格上，《蘋果日報》的草根批共和《信報》的精英批共迥異其趣。《蘋果日報》口口聲聲說，「只求傳真，不扮高深」，讀者要什麼，它給什麼，一切以「市場」為主，所以除了政治商品化，《蘋果日報》也提供大量有用的生活資訊，貼近讀者，很受歡迎。——彷彿以「市場」為借口，它就可以逃脫北京的憤怒，或排除市民對它「道德沉淪」的指責。無論如何，

由於黃色新聞全面「革命化」，這張報紙擺脫了傳統的使命感和道德包袱。

### 價格戰

黎智英於1995年創辦《蘋果日報》，掀起價格戰。當時正值經濟不景，廣告蕭條，全球白報紙緊缺，一年內價格飛漲一倍，對各報更是雪上加霜，所以黎智英減價時，其他各報原價不動。但1996年初，《東方日報》看準時機復仇：各報統一每份售價五元，《東方日報》獨減價至二元。各報再也不能坐視，因此飲鳩止渴，紛紛降價求售，並用送車、送樓的方式舉辦贈獎活動。不到兩個星期，就有許多報紙「陣亡」，包括《快報》、《香港聯合報》、《電視日報》、《華南經濟日報》，600個新聞工作者失業。

1996年的價格戰延續六個月，直到黎智英親自和馬澄坤談判才告終。在價格戰期間，各報相互攻擊，無端變價，不斷背信於讀者。幾乎所有的報紙都賠錢，報業股票價格大跌。因為市場的分割，兩家英文《南華早報》和《香港虎報》，以及兩家財經《信報》和《經濟日報》所幸受損不大。1996年中，各報價格回升每份五元，廣告戰再度點燃，無奈經濟情況太壞，香港報業廣告收入慘跌(1995年比前一年跌了12%)。為填滿篇幅，各報主動大幅殺價，房地產方面更砍到三成以下，有的甚至願意刊登免費廣告。《東方日報》和《成報》盈利各減三分之二，《明報》甚至轉贏為虧，其他報紙的情況更慘。《東方快報》、《星島晚報》、《清秀》雜誌相繼關門。香港報業市場空間已經被占滿了，《蘋果日報》在1996年年底銷路攀升到36萬，意味其他報紙平均都要喪失10%的銷路。《蘋果日報》的母公司壹週刊在1995年、1997年兩次嘗試上市，卻沒人願得罪北京為它做保。《東方日報》繼之三次減價，保護銷路，更多報紙和雜誌相繼關門，又有400個記者失業，但是《蘋果日報》地位穩固，無法撼動。壹週刊又出版《忽然一周》，《東

方日報》也辦類似的刊物。《東方日報》在1999年出版更庸俗的《太陽報》，希望挖走《蘋果日報》的年輕讀者。市場集中化的趨勢更加牢固。

## 受市場驅動的新聞

國際資本和親中資本加強兼併的活動，滋生許多反民主、反新聞專業的趨向。80年代中期，因為政治前途未明，家族報紙紛紛公開上市，在股票市場集資，分散風險，為集團化鋪路。集攏的巨資必須找出路，於是開始收購其他媒介，或進入房地產市場。後來，《明報》、《星島日報》、《東方日報》和《蘋果日報》都派生出各式各樣的報紙和雜誌，擁有其他非媒介的生意。郭鶴年是經營跨媒介的好例子：除了《南華早報》，他擁有TVB電視台股權的三分之一。

學界認為，大公司壟斷使家族報紙難以生存，也防止潛在的競爭者進入市場，因此降低意見的多元性(Garnham, 1990; Golding and Murdock, 1991; Jansen, 1991; Keane, 1991; McManus, 1994; Mosco, 1996)。理論上，如果媒介由多元的家族、黨派和團體所擁有，則「經濟交換和權力互相抵消」(Caporaso and Levine, 1992)，任何老闆無法享有過大的影響力。在寡頭壟斷的市場裏，大公司有「制訂價格」的潛在權力，影響產品的水平、科技、品味等經濟參數(Caporaso and Levine, 1992: 167)。黎智英的例子證明大老闆擁有直接或間接的權力：他們可以用自己的媒介「直接」自我宣傳，還可以「間接」設立遊戲規則(Golding and Murdock, 1991)，諸如設定價格，打價格戰和昂貴的宣傳戰，把潛在的競爭者屏擋於門外，或把財力薄弱的趕出市場。它們銷路廣，有資本大打折扣，搶走對手的廣告，甚至用法律騷擾批評者。

市場產權集中決定媒介大環境如何行使「分配的控制權」，從而影響個別媒介組織如何實行「操作的控制權」(Murdock, 1982)。結構上，自從政治變遷開始，香港多元媒介組織的數目一直急降，倖存者和極少

數新入場的媒介相互競爭，內容雷同，但它們的考慮已經從新聞轉向口袋裏的錢。一旦《蘋果日報》拋出七億港元大張旗鼓問世，《東方日報》拿出相同多的錢應戰，市場門扉已向長於新聞理想、短於資金的個人或公司關閉了。兩大報擁有最好的人才，但所做的無非是眾多評論者所說的「掏糞」罷了。大資本家深明利害，通常政治上保守(黎智英例外，已如上述)，商業上精明。許多報紙模仿兩通俗大報，追求逃避性的娛樂新聞，將一些流言蜚語、性、暴力、醜聞粉飾為新聞。這些東西不但政治安全，商業上回報也高。中國當局有道德潔癖，藐視黃色新聞，但這些內容畢竟無礙其統治，故能坐視它們在香港存在。除非政治轉化為錢，財大氣粗的媒介總是用精美製作來逃避嚴肅的新聞。甚至所謂的「質報」，特別是《明報》，眼見讀者逐漸流失到兩大通俗「量報」，也不能免於市場競爭的壓力，開始推出聳人聽聞的照片和標題(HKJA, 1998)。

各報誇張銷量，用各種粗俗的策略刺激銷路。兩大報併吞報紙讀者總數的七成，其他報紙逐漸邊緣化，只能分食殘羹。整個環境粗糙聳動，優良的品味和嚴肅的議題只能艱苦作戰。《星島日報》曾經風光一時，現在連生存都堪虞，其他報紙更被迫關門。倖存的「量報」只能在市場上找定位；市場蠶食鯨吞，更多報紙可能跟着關門(HKJA, 1998)。享譽的政治評論雜誌《九十年代》曾被列入北京的黑名單，於1998年關閉，倒不是出於政治壓力，而是市場(特別是年輕一代)普遍不在乎政治分析了。前此，《百姓》和《當代》雜誌都被親中商人買進，不旋踵間關掉。香港原為全球華人知識份子的政治論壇，現在政論雜誌卻前途暗淡。一個小插曲，在1996年，電台節目主持人黃毓民出版《癩狗日報》來咬北京，但是曇花一現。中方駐港機構及其盟友出版《鏡報》、《廣角鏡》、《中銀經濟月刊》、《紫荊》、《香港之窗》，影響力微不足道。

專業水準沉淪，但只要市場對聳動的東西趨之若鶩，報紙就管不得

道德約束或專業批評了。兩大報銷路廣，但如表10-1所顯示，一般新聞工作者對它們的尊敬度很低。《東方日報》聘請專職律師，只要有人對它有點批評，立刻提出控訴；這些案件在法庭上多半未能成立，但萬一誰被控告，應付起來可費時費力費錢，以致許多人寧願沈默，不敢批評該報。該報抗議法院判決有利於《蘋果日報》，除特派狗仔隊跟蹤英籍法官，並在報紙連月猛批司法機構，最後被判以藐視法庭罪。

表 10-1 香港記者對媒介公信的考量

媒介組織	1990(平均數)	1996(平均數)	差異
香港電台(RTHK)	7.6	7.07	-0.53*
無線電視(TVB)	7.6	7.07	-0.70*
亞洲電視(ATV)	7.2	6.72	-0.72*
信報	7.4	7.38	-0.02
南華早報	7.7	7.20	-0.50*
明報	7.0	7.16	0.16
經濟日報	6.7	6.75	0.05
星島日報	6.9	6.73	-0.18
香港虎報	6.6	6.55	-0.05
東方日報	6.9	5.85	-1.05*
成報	6.5	5.74	-0.76*
天天日報	5.5	5.12	-0.39*
蘋果日報	-	.03	-
香港商報	5.0	4.90	-0.10
文匯報	5.1	4.69	-0.42*
大公報	5.1	4.66	-0.44*
香港時報	5.1	-	-

\*統計資料顯示顯著差異。公信力量表從1到10，愈高愈好。1990年間隔隨機抽樣調查522名記者，1996年則是間隔隨機抽樣調查551名記者。來源：蘇鑰機、李金銓、馮應謙(1996)。

許多主流媒介風光不再，紛為與北京領袖有密切私人、商業和政治關係的人收購。親中商人查濟民原來準備購買《星島日報》，後來發現



該報財務情況嚴峻才作罷。亞洲電視出售51%股權給有中國大陸背景和關係的商家，最大股東劉長樂出自中國軍方。除了亞洲電視，他從默多克的鳳凰電視中文台買進部分股權，並手腕靈活，勸動北京容忍鳳凰衛視在大陸落地(HKJA, 1998)。雖然媒介產權與內容未必完全等同，但產權是否損傷言論獨立卻普受關注。

「量報」借用市場力量疏解政治壓力(中方不在乎香港媒介聳人聽聞)，嚴肅報紙得在政治要求和經濟利益之間取得平衡：一方面在政治上屈服，進行自我檢查；一方面維護脆弱的專業聲譽，這畢竟是經濟命脈之所在。既不得罪當局，又讓讀者覺得報導公平、勇敢而可信，如何平衡這兩套相悖的邏輯殊非易事(Lee, 1998b)。香港的老闆在中國有重大投資者，其掌握媒介的內容是否與眾不同，值得關注。

### 自我檢查與專業主義

無論中國再怎麼厭惡新聞自由，也曉得香港的言論獨立在某種程度是可以接受、甚至需要的——只要它們不觸犯中國的重大利益就好。中國不可能在香港赤裸裸施暴，或設立嚴密的檢查系統。為了統戰傳媒，它主動籠絡一批人，再嚴批另一批人。媒介試圖對中國示好，又要保持自身的認受性，這種衝突凸顯新聞自我檢查的矛盾。

「自我檢查」範圍很廣，記者、傳媒組織和整個新聞界趨吉避邪，故意刪除、稀釋、扭曲或改變新聞的重點，選擇彎曲的表達方式，全都違背明白而有普遍共識的新聞規範。新聞尊重事實，而記者在中央合法性的機構能最有效率搜集事實，因此新聞機構往往以它們為敘述基準(Tuchman, 1978)。香港主權移交重新界定哈林(Hallin, 1986a)所說的「共識區」(sphere of consensus)和「歧見區」(sphere of deviance)。媒介的聚光燈放在特區政府上面，不算自我檢查；有意無意誇張或淡化有關主權移交的消息或觀點，則另當別論。

證據顯示：報紙逃避政治爭議，聘請親中人士居高職，照北京政策

變更社論調子，重設版面以減少政治意味，解聘高風險的作者，發布指令詳示編輯如何處理敏感新聞，還把敏感新聞推到不顯眼處。1996年媒介斤斤計較特區首長和臨時立法會選舉誰輸誰贏(Lee and Chu, 1998)，卻看不到中國如何操縱遊戲規則；這個選舉違反基本法和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媒介可謂明察秋毫，不見輿薪。有些傳媒主動接受新聞限制，無線電視和中天，甚至《美麗佳人》(Marie Claire)中文版，在藏獨、台獨和疆獨問題上自我檢查(HKJA, 1998)。媒介所有作為的方向明確：不願激怒北京。

我們的調查顯示(Lee, 1998b; 蘇鑰機、李金銓、馮應謙, 1996)，香港記者害怕批評中國當局，但很少人害怕批評出局的港英政府。調查又顯示，許多記者怕批評大商家，怕觸犯報紙的衣食父母。縱然實際表現與理想懸殊，多數香港記者自稱服膺客觀、平衡、不偏不倚這些西方媒介專業精神(Lee et al., 1996)。他們鄙夷國家控制，卻須竭力「中和」北京的控制。表10-1顯示，香港記者認為媒介公信從1990年到1996年大幅下降，原因包括割喉競爭、庸俗化，和自我檢查。這段時期傳媒公信沒有一家上升，但名次還是清楚而穩定：無線電視和《南華早報》遙遙領先於「量報」(例如《東方日報》和《蘋果日報》)，而左派的《大公報》和《文匯報》殿後。

政治經濟學者(Lukes, 1974; Galbraith, 1983; Boulding, 1990)聲稱，權力可以透過獎賞和處罰的機制行使，但更根本的是透過思想霸權制約人們的信念，使之順從權威而不自知。凱爾曼(Kelman, 1961)提出，意見改變有三個過程：順從、認同和內化。中國當局掌握很大的賞罰權力(Chan and Lee, 1991; Allen, 1997)，香港媒介自我審查並非出於自願，而是認為沒有更好的選擇，只好順從外在的要求。順從是藉着改變言辭和外在取態，以達成工具性的目標，但未必改變個人信念；它關心「行為的社會效果」(social effect of behavior)，也就是賞罰，而不是「行為的社會錨準」(social anchorage of behavior)或「行為價值的一致性」(value

congruence of behavior)(Kelman, 1961)。「順從」也許最後會結合「認同」與「內化」，或發展成為「認同」或「內化」，因而從純粹賞罰的工具性考慮轉為制約的思想霸權。目前，香港的自我檢查主要是順從的行為，談不上認同或內化。香港媒介從來懷疑中國當局，歷經中英鬥爭(主權談判，民主改革，政黨形成)盡皆聲援英方反對中方，直到最後情勢所迫放棄挺英。就算盡量避免與北京衝突，它們還是不願被貼上「親中」的標籤，免失公信。這種策略其實防禦性多於攻擊性。

自我檢查可以發生於個人層次，也可以發生於組織層次。自我檢查大致涵蓋三個廣泛的範疇：直接間接對媒介組織施加外在的壓力，媒介組織內部的壓力，以及記者吸收若干價值(HKJA, 1997)。媒介組織從頭篩選記者，保證他們的價值觀與組織一致或接近(Sigelman, 1973; Chan and Lee, 1988)；接着，記者進入組織以後，還受各種不同的非正式機制規範，即是布里德(Breed, 1955)所說的「新聞室的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記者從周遭環境學習各種象徵和實踐的規範，吸收、內化以至加強組織的文化，把組織的規則變成自己的信念。編輯偶而會告訴記者怎麼樣避免或處理哪些故事，但通常記者習以為常，不需要點明，記者便知道界限在哪裏。根據我們的調查，香港記者中，認為沒有受到組織嚴密控制的比認為受到組織嚴密控制的還多(Chan and Lee, 1988)，那是因為他們已經把組織的控制內在化、自然化，成為判斷口味和行為的指標。他們被組織文化馴化而不自知。

自我檢查必須付出重大的社會代價，這是不得已的防禦措施。外在壓力可能是真實的，可能是想像的，或兩者兼有。真實壓力通常從幕後操縱，以免曝光，致遭公眾批評。如果不順從「想像的」壓力，後果模糊，有時比真實壓力更可怕。自我檢查的程度取決於想像的建構(例如中國當局容忍到什麼地步，會有什麼賞罰措施)。歐波特(Allport, 1937)指出，民意牽涉到「想像的群眾」(imagined crowd)。諾里諾曼(Noelle-Neumann, 1993)的「沉默螺旋理論」(spiral of silence)說，「意見氣候」

(climate of opinion)站在哪一邊，愈來愈多人會跟着靠邊，支持看似主流的意見，並扼殺認為不受歡迎的意見。這種群眾心理(crowd psychology)是感染性的。

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回歸是史無前例的，充滿曖昧甚至矛盾的可能性。真正的戰線在哪裏未必說得清楚。在資本主義的市場裏，國家與媒介的關係隨時改變，操作的方式也不穩定。香港各方自問：「我能走到多遠？」誰也沒有「正確」的答案，如何估計對方的對策會引發或限制自己的想像力。中國如何控制香港媒介，而不令政策失信？香港媒介如何跟北京建立政經關係，而不惹讀者懷疑專業公信？這些界限難定，是在「意見氣候」下的主觀想像，在現實中不一定有客觀的基礎。所以，這個界限在不斷鬥爭中調整，以適應整個社會運動的情勢。外界爭取新聞自由的公眾鬥爭與新聞室內部的鬥爭互通聲氣，相輔相成。外界若批評新聞界見風轉舵，可能增加媒介組織內部民主力量的籌碼，防堵媒介不那麼快一面倒。<sup>2</sup>

中間性報紙訴諸專業主義，建基於中產階級的共識。意見市場呈常態分配，多數人口在中間地帶，民主國家的官方意見與社會共識重疊，遂為新聞報導的基準。許多媒介社會學家(Tuchman, 1978; Gans, 1979; Fishman, 1980; Schlesinger, 1978)指出，媒介編織的新聞網主要圍繞着中央的合法性機構轉，新聞工作的節奏同它們的節奏合拍。哈林(Hallin, 1986a)辯稱，媒介主要跟隨制度化的議程，不會提出新的有創造性的方法來解決問題。香港媒介的新聞來源已從港英移轉到特區政府，從英國移轉到中國。在1995年直選中獲得64%選票的民主黨，回歸前後受到中

---

2 由於顧慮主權回歸，80、90年代多達60萬香港中產和專業人士移民加拿大，聚居溫哥華和多倫多，《明報》出當地版。1997年初民主黨領袖到北美洲募款，所到處，集會無不嚴批《明報》向中國當局靠攏。此時香港公眾也紛紛質疑《明報》公信，其廣告和銷路大跌，資深記者辭職，《蘋果日報》繼續採取強烈批共的高調路線，這些都迫使《明報》減緩向北京輸誠的腳步。論者屢屢批判《明報》蘋果化，其庸俗化的步伐前進未已。

方嚴厲抨擊；民主黨人士抱怨媒介給他們的注意力愈來愈少，親中勢力愈來愈顯著，聲音愈來愈大。民主黨拒絕參加1997年臨時立法會，翌年參選獲勝。在港英末期，他們是媒介寵兒，如今得跟其他政黨領袖平分秋色。民主派人士仍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媒介會報導他們，但不再像90年代初那樣獨占鰲頭。2003年，行政特區首長董建華施政失誤，不顧民意，硬要粗暴進行《基本法》23條顛覆罪的立法，引起50萬人上街游行。在這種情況下，民主派在媒介的形象多半正面敢言，被外界稱為「保皇黨」的民建聯成為媒介和選票最大的失分者。

### 策略性的儀式

新左派學者批評，媒介所有權高度集中，損傷新聞的獨立性。這是深具洞見的。他們又批評媒介專業主義是意識形態的建構，一味強固既有現狀，抗拒變革(Hall, 1977; Tuchman, 1978; Fishman, 1980; Gitlin, 1980)，這一個批評則似乎過火，至少不合香港情況。多元主義者認為，媒介專業主義是一道意識形態的防火牆，使國家不能直接專斷地控制媒介，這個觀點對於處在壓力中的香港媒介似頗有啟發。媒介建立塔克曼(Tuchman, 1978)所說的「策略性儀式」(strategic ritual)，發展一套例常的工作程序和習慣(例如決定什麼叫「事實」，如何引述新聞來源、如何褒貶人事，如何選擇敘述方式)，以指引新聞的收集和現實的觀察，並防媒介遭受公眾批評。她說，「策略性儀式」把媒介的新聞網和社會上中央合法性機構綁得太緊，媒介專業主義是支配性意識形態的再生產，把異見邊緣化。

塔克曼的見解鞭辟入裏，但我要重新界定「策略性儀式」，給它比原來更富正面的意義。我指媒介機構用扭曲的方式把新聞工作常規化，以應付外來巨大的政治壓力，並維護其脆弱的認受性。既然說是「扭曲」，必然指偏離正常的實踐。一些「非常的」做法逐漸吸收到組織的架構裏，積非成是，久之習慣成自然。我不是把「策略性儀式」浪漫

化，或故意高估它的力量，而是說弱者靠着媒介專業主義的「策略性儀式」獲得抗爭的武器(Scott, 1985)。在媒介專業主義的武裝下，記者和媒介援引「消費者權益」、「公共知情權」，訴諸社會公認的一般原則，例如公平、客觀和不偏不倚。據此，他們聲稱對專業的理解比別人強，更接近事實本身。媒介專業主義是一個不完美的理想，卻可以把空間撐開一點，使記者日常工作免受外界侵犯，並辯護社會給媒介巨大的權力和信任。「策略性儀式」和媒介的自我檢查同是防衛措施，對新聞自由的結果卻一正一反，大相徑庭。

以香港為例，我在下面要概括媒介應付曖昧變局的三種「策略性儀式」，但我們還得做很多經驗和歷史研究才能發現其他「策略性儀式」的結構。說來諷刺，市場競爭把媒介非政治化，已如前述，卻又幫助媒介捍衛認受性。媒介的「策略性儀式」看來也是悖論，有時掩蓋自我檢查的行徑，有時為新聞工作者抗拒新聞檢查提供道德基礎，其間關係尚待進一步分疏。在意識形態的層次，多數香港記者服膺媒介專業主義，媒介公信與專業程度成正比。任何媒介若被認為魯莽向中國屈服，斷難在市場立足。如何維持自主形象，又減少政治風險，洵非易事。

### 正反意見並陳

要是有選擇的話，中國當局寧願在背後施展非正式的影響力，而不是明目張膽攻擊媒介。回歸前後香港新華社的措施兩者兼而有之，社內宣傳部養一批人，各有責任區，碰到不順眼的意見，立刻用種種化名寫文章和讀者投書針鋒相對反駁，但文章不乏強詞奪理，或涉及人身攻擊。新華社這麼做已經有年，不但在左派報紙以各種名義登出，在回歸以前出現於非共報紙也愈來愈頻繁。一個編輯怎樣處理新華社主動送來的宣傳稿？完全不理會，或一口拒絕，兩皆不通。解決之道，則訴諸專業平衡和客觀的原則，並陳各種正反意見在一起，新華社的觀點成為整個意識形態光譜中的一環。這樣做，各方壓力中立化，媒介少得罪人，

又捍衛自身的專業聲譽。回歸以後，正反意見一齊陳列的趨勢愈來愈明顯。這也是因為許多議題變成爭議，媒介有責任反映兩面的觀點。

### 各類言論的分工

社論代表報館立場，通常不願觸犯權力結構；但埋在內頁各種專欄代表個別作者，不受社方干預。許多受歡迎的專欄仍然淋漓盡致批評中國當局，與膽怯的社論形成鮮明的對比。以前查良鏞主持《明報》，社論時與專欄作者(例如膾炙人口的「哈公怪論」)立場出入，社論正確，躲避政治壓力，專欄迎合市場需要，也算是利益矛盾的創造性統一。社論與專欄意見不一致，足可以專業主義的說辭合理化。《信報》的評論多元而勇猛，依賴世界各地來稿，人事費用低，也借此作為盾牌，免除權力中心對它的批判。當然各種媒介做法不可一概而論。「反意識形態霸權」(counter-hegemony)本身是不勻稱甚至矛盾的，而反意識霸權這個領域本身也有限制(Williams, 1977)。許多報紙取消反共專欄，但還是有作者每日撰寫批判辛辣的專欄。《明報》在回歸前增添許多軟性非政治專欄，減低政治話題的份量；在政治話題上，邀左中右各意識形態陣營人馬分頭寫專欄，以創造「形式上平衡」的假相。該報以「意見市場」的隱喻誇耀如何呈現多元聲音，未始不是責任外推，免於自己擔當道德與政治責任。在特別的情況下，中國當局對個別的專欄作家或發行人威脅利誘，只能小心處理；發行人接納這種壓力，只能偶一為之，而且是有選擇性的，否則事情公開鬧大，大家都失面子。

### 敘述方式的選擇

另一個新生事物是敘事方式的改變。第一，媒介可能批評中國政府當局，而不攻擊個別領導人。中國政府或共產黨目標模糊抽象，較不明顯。中國領袖往往用境外媒介增強內部鬥爭的籌碼(Hood, 1994)，媒介對於個別領導人的攻擊很可能招來報復。80年代中，查良鏞禁止《明

報》指名道姓批評鄧小平。90年代中，黎智英在《壹週刊》攻擊總理李鵬，付出很大的代價。即使批評中國當局也要用集體的名義，避免讓個別領袖難堪。在批評特定的事件或領袖時，也常常有選擇性地訴諸《基本法》。

第二，精英媒介多敘述，少評論，多用中立、不判斷的語氣。「中立」不是沒有價值判斷，而必須深植於社會上恆久的價值，但是「中立」語言在權勢者看來較不刺眼。第三，媒介愈來愈會用「一方面，另一方面」這種模稜兩可的敘述方式。表達批判性的意見，會埋在各種條件語句裏。例如，在回歸以前港督彭定康批評親英的香港精英「向北京磕頭」(Elliot, 1996)，本地報紙先批評彭定康損害外資對港的信心，再轉過身來要求中國當局建立良好的紀錄，以證明彭定康的謬誤。這種曲筆、模稜兩可和條件式的語言，其實想磨平批評的棱角，聽起來不至於太逆耳。媒介可能有選擇性地引述最高領袖的談話，例如鄧小平的「一國兩制」，來批評現有的政策。

## 新聞自由的一些問題

意識形態的霸權不是鐵板一塊的，不是全面的，也不是唯我獨尊的。威廉姆斯(Williams, 1977)說得對：這個過程不斷受到更新、再創造、捍衛和修改，也不斷受到另類的和敵對意識形態的抗拒、限制、變更和挑戰。有控制就有反控制，人們畢竟可以忽視、談判、妥協、顛覆、反擊政治的壓力。香港的新聞自由要看整個媒介的各種政治經濟勢力——各種「反新聞」的力量(非政治化、自我檢查、媒介產權集中)對抗媒介專業主義的力量——如何相激相盪。

歷史是多面相的，可以從上看，可以從下看。假定從上施加的壓力使香港人完全無力表達聲音，那是大謬不然；在許多重要時刻，包括彭定康的民主改革、政黨成立、選舉以及《基本法》，香港人民和媒介都發出過許多聲音(Chan and Lee, 1991)。為了適應新情況，媒介必須發展



出一系列專業策略來吸收或解除中國的政治壓力。專業意理在某個程度為記者、專欄作家、編輯提供喘息的空間，讓他們對現實作出不同的解釋。中國不可能操控所有媒介老闆，不可能讓他們革除所有批判性強的記者——如果他們的口誅筆伐觸及香港的神經線，受到市場的普遍歡迎，整肅他們則必三思。

從文化的觀點來說，1997年的問題提供機會，讓香港凝聚新的身份認同，有別於當年「泛中國」的認同，香港人要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50、60年代的難民心態作祟，中國意識壓倒香港意識；但在回歸前夕，媒介充滿各種討論，圍繞如何培養香港的意識。各政團都以「親港」為立場號召民眾，當時連親中的「民建聯」以及親中的候選人都說他們親港，親民主。民建聯主席曾鈺成辯稱該黨親中，但更親港；他抱怨民眾不知道其中的分別，而媒介經常扭曲他。民建聯想建立的形象，是一個為草根服務、而不是向中國點頭的政黨。回歸之後，香港本土意識的發展中挫。各政黨必須靠近中間選民。特區政府取代北京成為眾矢之的，媒介鼓勵民粹主義，充當民間的出氣筒，抨擊特區政府的無能和行政長官董建華空洞乏味的政治話語。

媒介維護香港認同，才能維護公信。這是為什麼《明報》社論自稱代表全中國而受到廣泛批評。有些親中的專欄作家還苦口婆心，規勸北京了解港人的利益、價值和觀點。任憑中國有多大的權力和資源，也無法全面強加意識形態霸權於港人頭上。香港人向來不信任北京，媒介更為這種情緒推波助瀾。從這個觀點來說，彭定康所說的不完全錯——他說：「你可以解散一個機構，但我不認為可以破壞讓香港之所以成為這麼特殊地方的那些價值」(Elliot, 1996)。1998年，香港回歸後一年，徐四民在北京開政協大會時，炮轟香港電台的獨立性，香港各媒介立刻批評他邀中央政府干預，破壞一國兩制。

新聞自由本來就是波動不穩的。《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雖然保障新聞自由，但徒法不足以自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也正

式保障過出版和言論自由，怎麼會以言入罪？立法和執法本身是一個政治過程；在美國，社會運動爭取更多言論自由時，法院解釋憲法保障新聞自由的第一補充案更寬鬆。爭取新聞自由代表了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的鬥爭，也代表了政治與經濟的鬥爭。在香港，那就要看自由市場、社會多元、市民警覺程度有多高了。

在法律方面，民主派人士批評90年代間港英政府廢除不合時宜的殖民法規太遲太慢，而中國當局卻批評港英政府在最後一分鐘實行民主改革是偽善，不但一概不承認它，而且矢言要恢復彭定康放鬆的各種條例。彭定康任內修正四十多個條例，六個涉及限制行政權對集會、緊急權、公安、廣播和電信管理的權力。廣播和電信管理法規授權政府以安全理由撤銷執照，亦可事先檢查影片和電視內容。為防中國當局濫權，港英政府先在1996年修改《公安條例》，認為言論不是反國家罪的一部分。但主權移交當天，中國一手操作選出的臨時立法會立刻修正《公安條例》，使遊行、集會和結社的限制更嚴。至於偷竊國家機密，港英政府自相矛盾，從英國幾乎原封不動引進《官方秘密法案》，對新聞自由的影響惡劣。《人權法案》和《資訊自由法》前途未卜。更嚴重的是《基本法》23條，授權特區政府立法禁止「對中央人民政府的叛亂、獨立、顛覆的行為，以及偷竊國家機密」。一般人擔心引入中國法律觀念到香港普通法系，因為中國把網撒得很大，寧枉毋縱，限制性很強。

從動態的眼光來看這場鬥爭，我相信各種政治經濟壓力觸發媒介的反映是不均勻、局部而矛盾的。媒介可能表現週期性的勇猛和膽怯，也可能表現週期性的功利或自私。新聞工作者因時因事處理外在壓力，通常對世界缺乏宏觀；只要一個記者、編輯或是媒介在特定的時候採訪到一個敏感的故事，其他競爭者必然跟進或追蹤，不管政治壓力多大都得如此。新聞屬於「公共財」，不止生產者和購買者的專利，只要消息進入公共領域，勢必迅速傳播，引起注意。市場競爭要求媒介繼續追查，

記者和媒介必須根據專業標準，參考同事間的集體行為，不斷考量各種壓力。香港的新聞自由在中國的管制下必將下降，但社會的透明度仍會相當高。

中英衝突已經轉化為中央「一國」和香港「兩制」的衝突(Chan and Clark, 1991)，這也是將來政治裂痕的根源。中國當局希望用香港作為對台示範單位，但1995年、1996年對台軍事威脅顯示已經偏離這個軌道。總之，如果北京侵犯香港的自主權的話，媒介必須挺身維護香港的利益。技術問題可以商量，但「一國兩制」的基本架構是不容置疑的。

如果香港經濟奇蹟是「硬體」，社會和政治自由就是不可或缺的「軟體」。如果中國珍惜香港對中國經濟的貢獻，言論自由和經濟資訊的自由流通將是香港成功故事的支柱。經濟、文化資訊應當流通無阻，香港的媒介與內地的經濟、文化機構交往會更密切。媒介如何報導甚至批評當局比較難講，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在政治上，有人說香港會步新加坡的後塵：經濟繁榮，然而犧牲新聞自由。這種說法像拉丁美洲學者歐達諾(O'Donnell, 1973)所說的，經濟發展會造就、鞏固「官僚威權主義」(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而不是促進民主。這個比較是誤導的：香港的新聞自由是從多到少，新加坡的新聞自由是從有到無，本質不同。香港太複雜，太矛盾，不可能一刀切，政治運動的苗子也不可能一把掐死。初嚐民主改革的果實，不可能從此喪失胃口。香港社會有多元的利益、意識形態、權力基礎，不可能回到三十年前的樣子。我懷疑新加坡在李光耀時代以後父權統治是否可以繼續。除非像當年台灣和南韓實行戒嚴，靠強大而複雜的國家機器壓迫，香港的新聞自由不可能比台灣和南韓的威權統治還少。除非「一國兩制」完全崩潰，香港的新聞自由不可能低到中國大陸的程度。

香港的新聞自由最後的保證就看中國的自由化，以及中國是不是有決心貫徹「一國兩制」。經濟改革把中國的「全權主義」(totalitarian)軟化為「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媒介在非政治領域已經享有較多柏林

(Berlin, 1969)所說的「消極自由」，酷似當年台灣戒嚴時期的情形。但中國媒介的「積極自由」和「民主化」仍遙遠得很。香港的通俗文化和媒介口味影響及於華南和沿海都市，正如香港的貿易、財政和經濟一樣強勢(Gold, 1993)。相對於中國，香港在地理和政治上都是邊緣的，但在文化、經濟和科技上可能是創新的中心(Tu, 1991)。北京對香港的影響不完全是單方向的。「一國兩制」充滿緊張和矛盾，可能因為不同情況和議題而改變。危險就是機會，這些緊張和矛盾是將來與國家抗爭的沃土。北京對香港的公開承諾，及其種種私下作為，充滿矛盾，但中國不可能完全滅絕香港在公共領域的抗爭。

## 敲打民主之鼓

美國傳媒對香港回歸的議題建構<sup>1</sup>

---

(美國自認)在世界各地糾正錯誤，追擊暴政，守衛自由，不惜代價。

——薩伊德(Said, 1993: xvii)

柏林牆倒塌不過十年，就看到亞洲之珠轉手給獨裁政權，令人神傷。

——《芝加哥論壇報》社論，1997年7月1日

他們過份渲染。我在美國的朋友打電話來，以為香港戒嚴了。

——CNN香港分社主任齊邁可(Mike Chinoy)

評論美國哥倫比亞電視網如何報導解放軍進城

哈林(Hallin, 1994)說，在「高度現代性」(high modernity)的年代，美國的新聞在內政上恪守羅斯福新政的自由政策，外交政策方面則立基於冷戰期間兩大政黨對圍堵共產世界所達成的共識。然而「高度現代性」是否像他所說已經過去了？以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來看：照說這時西方應該已經贏得冷戰了，但美國媒介的政治理性、議題及敘述大體仍緊貼着「大美國主義」的標籤。福山(Fukuyama, 1992)在一篇頗富爭議的論著聲稱，冷戰結束說明沒有別的制度可以取代西方自由主義。如今蘇聯解體，只剩美國唯一的超級強國，中國成為重建美國為首的自由國際秩序(Burchill, 1996)的主要障礙，何況中國的民族主義日益抬頭，讓整個地區(甚至全球)同感不安。在這個

---

1 原載於Chin-Chuan Lee, Zhongdang Pan, Joseph Man Chan, and Clement Y.K. So (2001), "Through the Eyes of U.S. Media: Banging the Democracy Drum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1, 2: 345-365.

背景下，香港的主權移交是一個大舞台，提供場景給各國媒介展開激烈的論爭。

新聞通常報導預料不到的、非凡的和異常的人與事，然而這些人與事只能放在可預料、平凡而正常的架構裏才能理解。西方主流媒介不承認它們的「共識」(consensus)是一種「准意識形態」，而將它自然化(naturalize)成為大家所能接受的「常識」(common sense)。媒介報導的「前景」是香港主權回歸，中英權力過渡彷彿是一場歷史的斷裂，然而貫穿媒介報導潛伏的「背景」卻牽涉各國對中國的意識形態，也就是中國共黨政權即將奪取香港這個自由城市。媒介強調「事實」，背後的意識形態隱而不現(van Ginneken, 1998: 31)。民族社群在危急時刻或特別場合會凝聚一定的論述，提供豐富的文化符號，成為媒介報導的參照點。喻之以公共舞台，媒介為民族社群提供重要的場所，表達共同的經驗，彰顯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基本假設(Edelman, 1988; Esherick and Wasserstrom, 1994)。每當重大歷史事件發生，例如「資本主義明珠」(香港)歸還共黨政權，民族社群總會調動公共舞台的資源(Hilgartner and Bosk, 1988)，也就是動用媒介強調社會的核心價值，再確認權力結構的威信。在這個意義上，國際新聞是在打一場意識形態的戰爭。

籠罩在全球化影子下的國際新聞仍然以民族為本位，以國家甚至政府的立場為軸心。由於每一件事都得置諸前因後果來理解，媒介總是依賴宏大的文化和民族觀點來選擇「事實」，建立其間的關係。許多證據顯示，在國內報導上，媒介的框架通常符合、呼應和支持體制內的精英共識，以致排除了激進者或弱勢者的觀點(Hallin, 1986a; Bennett, 1990; Tuchman, 1978; Gitlin, 1980; Herman and Chomsky, 1988)。國際秩序通常比國內秩序混亂，政府(而非特定個人、階層或部門)是「國家利益」的總匯(Garnett, 1994)，是外交政策的擬訂者，也是國際新聞論述的競爭者(Snyder and Ballentine, 1997: 65)。薩伊德(Said, 1981, 1993)論證，媒介建

構「東方主義」的論述，無不以國家利益為上。遙遠的異國所發生的政治態勢複雜又模糊，記者們只有通過「內在化」(Cohen et al., 1996)的機制，才能解釋得讓國內受眾明白。甘斯(Gans, 1979: 37)說，美國媒介把外國新聞當作國內曲調的變奏，「聯繫於美國人或者美國利益」，並「從美國的主旋律來解釋它」。媒介假定政府高層知道甚麼最符合美國利益；兩黨在國內議題上也許爭得頭破血流，在外交政策上卻建立廣泛的共識(美國的海外利益畢竟不分黨派)，所以國際新聞的框架是由外交政策所形塑的(Lee and Yang, 1995)。媒介報導外交危機時是政府的「小幫手」(Zaller and Chiu, 1996)。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吸引美國108家新聞機構1047位記者來採訪。他們不是對香港有興趣，而是對中國有興趣。他們一古腦投入當代各種「主義」的論爭中：西方對抗東方，民主對抗威權，資本主義對抗社會主義。媒介唱的主調是美國與眾不同(exceptionalism)。美國及其媒介以打擊共黨政權為對象，總自認「在世界各地糾正錯誤，追擊暴政，守衛自由，不惜代價」(Said, 1993: xvii)。美國媒介的對華報導一向在樂觀浪漫和悲觀激憤之間徘徊，香港主權移交不過是整個故事的新篇章(Lee, 1990)，這次媒介觀察香港的透視鏡則是1989年天安門血腥鎮壓。在天安門事件中，美國媒介從頭到尾熱烈聲援中國學生所揭櫫的意識形態，相對而言日本媒介卻最關心中國政局是否穩定、對其在華經濟利益有何影響(Lee and Yang, 1995)。美國電視戲劇化地呈現流血事件，借郝爾曼和喬姆斯基(Herman and Chomsky, 1988)的話來說，美國可以因此「證明」資本主義民主的優越性。中國當局的血腥鎮壓當然引起世界公憤，問題是美國有許多反共盟邦蹂躪人權，美國媒介卻常淡化之。<sup>2</sup>自從1989年，美國媒介始終將中國描繪成死不悔改的專制政權，是最後一

2 美國盟邦蹂躪人權的事件多被媒介淡化(Mahlasela, 1990; Herman and Chomsky, 1988)。對天安門事件的報導主軸也失諸簡單化、一味反共掛帥、缺乏許多歷史和社會的面相(Wasserstrom and Perry, 1994)。

個該被鬥倒的共黨巨霸，它對香港的承諾絕不可信。另一方面，中國對香港恫嚇不斷，杯弓蛇影地認為西方意圖把香港變成顛覆祖國的基地。

香港主權轉移的歷史意義也許非凡，但以新聞論新聞，卻只是個早已事先佈置好的景觀，稿本成於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新聞故事乏味而無新意，達揚和卡茲(Dayan and Katz, 1992)稱之為「媒介事件」(media event)。記者們事先假定回歸會引發這種暴動或那種騷亂，結果居然風平浪靜，因此他們只能退而做「劇評」(theater criticism)，在事後道說誰的表現如何，而無法爭分奪秒去追蹤當下發生的事件(Knight and Nakano, 1999: 129)。劇評家理應冷靜客觀，骨子裏卻炫耀各國的意識形態：美國媒介敲打民主之鼓，英國媒介緬懷帝國餘暉；中國媒介炒作民族主義大勝利，台港則對此狐疑滿腹；日本媒介只關心經濟利益的維護，而非當地人對民主的追求；加拿大媒介強調加港的「特殊關係」，澳大利亞媒介呼籲建立獨立於英美的外交政策(Lee et al., 2002)。總之，各國媒介「召喚和慶祝(不同的)事件和人物，(代表)各世代和各文化的認同以及他們共同的瞭解」，因而「凡是對過去所作的相反解釋都得噤聲」(Middleton and Edwards, 1990: 8)。

## 新聞的社會學

本章探討美國媒介對香港主權移交的報導，交叉整合分析(1)六份主流報紙和兩家電視網的話語；(2)與美國主要媒介九位記者深度訪談；(3)公開出版的文獻、新聞報告、媒介討論會與座談會的記錄；(4)我們的筆記。主要證據來自媒介內容的文本話語分析。研究期間從交接(1997年7月1日)前兩周起，到交接後一周止。內容分析的結果(表11-1)概括媒介報導的基本傾向。深度訪談每人長達一至三個小時，旨在瞭解新聞的社會學，包括記者們的專業經驗和理念、媒介組織的資源和策略、新聞同業競爭與合作的生態，以及記者們採訪主權轉移所用的文化圖像。訪談所得的見解幫助我們提出和論證話語分析的假設。公開出版的文獻、新



聞報告、會議記錄和田野筆記填補了背景的空白，例如各政權與關鍵人物的動機和行為，以及幕後各種斡旋，以穿透媒介內容的表相。當然，整個比較分析的框架使我們對美國媒介內容的解釋更銳利。

表 11-1 美國媒介對主權移交之後局勢變化的預測

	將發生變化(n=335)	將變壞
民主/公民自由	34.8%	73.7%*
香港的自主性	15.2%	28.0%
新聞自由	14.0%	54.3%
日常生活	13.7%	57.8%
法治	10.4%	50.0%
經濟	7.6%	0.0%
政治/社會聯盟	3.4%	70.0%

\*335 則故事中有 34.8%(114 則)說「會改變」，114 則中有 73.7%(84 則)說「會變壞」。

我們分析六份「有聲望的報紙」(Pool, 1952)：《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華爾街日報》、《芝加哥論壇報》和《地莫恩記錄報》(但該報主要依賴外電，我們把它包括在內容分析之內，排除在話語分析之外)。美國沒有全國性報紙的傳統(Bagdikian, 1971)，但我們所選的這些「有聲望的報紙」乃執輿論之牛耳，反映精英的觀點，而精英觀點的分合會左右媒介對民意的影響(Zaller, 1992)。這些精英報紙號稱「資訊報」(newspapers of information)，有別於所謂的「故事報」(newspapers of story)，理應提供理性並脈絡清晰的分析，追求「更可敬的抽象感官」而非討好「較不高尚的情感」(Schudson, 1978: 119)。連《紐約時報》都覺得香港的「微型故事」(microstories)很難寫。該報香港分社主任加根(Edward Gargan)告訴我們，每件事情得放在比較廣的脈絡裏看，「竭盡你的敘述能力」，「把歷史放進去」，「賦以深遠的意義」。但該報許多「軟性」新聞還是有嘩眾取寵之嫌，似乎在安撫那些「較不高尚的情感」。

在這三周裏，我們檢視了335則故事(新聞、特寫、評論和社論)，其分佈是：《紐約時報》54則(16%)，《華盛頓郵報》47則(14%)、《洛杉磯時報》54則(16%)、《華爾街日報》32則(9.6%)、《芝加哥論壇報》36則(10.7%)、《地莫恩記錄報》22則(6.6%)，CBS新聞35則(10.4%)，和CNN共55則(6.4%)。着眼點是它們是否提到香港在主權轉移後會轉變，變好還是變壞。每則故事可能(1)提會變，(2)提不會變，或(3)根本不提。提到會變，那麼(1)會變好，(2)有的會變好，有的會變壞，(3)會變壞，或(4)很難講。內容分析只是保守的估計；意識形態根深蒂固，隱藏不露，內容分析未必充份衡量得出，但在話語分析應當可以看出端倪。從表11-1，我們看到：美國媒介最關心香港的民主自由會改變(34.8%)，其中十分之七說會變壞。此外，它們的關注點是新聞自由(14%)，日常生活(13.7%)，和法治(10.4%)，一半以上的報導都說這些領域會變壞。約15.2%的報導說香港的自主權會有變化，但不一定變壞。美國媒介似乎深信香港的經濟會繼續繁榮下去。

各媒介派出的新聞隊伍有大有小，投下資源有多有寡。《紐約時報》有5個「中國通」操盤，他們對中國和香港都很瞭解。<sup>3</sup>加根說因為該報有44個記者「採訪全世界」，香港主權移交雖然突出，卻非壓倒一切。該報文章大都很長，以解釋深入見長，不純鋪陳事實而已。《華盛頓郵報》由柯富城(Keith Richburg)帶領一批同樣能幹的隊伍，與《紐約時報》的作業方式略同。《華爾街日報》得香港在地的《亞洲華爾街日報》之助，如虎添翼。《洛杉磯時報》沒有那麼鋒芒畢露。《芝加哥論壇報》僅「空降」駐北京記者，人手單薄，只能報導事實，文章短而不深入，同時引述各方的話拼湊成文，並靠外電和摘錄外國報紙填補新聞網的漏洞。

3 他們是加根(Edward Gargan，香港分社主任，前北京分社主任)，法森(Seith Faison，上海分社主任)，泰勒(Patrick Tyler，北京分社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前北京分社主任，現東京分社主任)和他的妻子伍潔芳(Sheryl WuDunn)。紀思道和伍潔芳因報導天安門運動獲得普利策(Pulitzer)新聞獎。

《紐約時報》可以代表美國「新聞網」(Tuchman, 1978)的運作。它報導的主題首先強調正式和組織性的移交活動；其次還有「等待中國」(Waiting for China)系列，由記者輪流寫側面的、有趣的和多采的故事，捕捉生動的「氣氛」，這種文章較允許滲入個人價值。第三個主題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報導，包括天安門廣場上民族主義高漲的群眾集會，以及台灣和北美、英國華人社團的反應。換言之，這個「新聞網」是以香港的「現時現地」為中心，再聯繫擴展到美國、中國、英國和台灣。這五份報紙都發表社論和專欄作家或投稿者的評論。

我們選擇CBS新聞和CNN為研究對象。在研究期間，通過衛星傳送，香港每天播出CBS晚間新聞。在美國，電視網的受眾已持續下降多年，但電視新聞的觀眾還是遠超過精英報紙的讀者，何況電視觀眾橫跨社會各階層(Wilensky, 1964)。CNN在世界各地重要城市都看得到，其訊號常被各國電視系統按照各自的意識形態需要所剪輯、扭曲、再播放。1989年天安門事件期間，兩台(尤其是主播)都十分活躍聲援學生(Salisbury, 1990; Chinoy, 1999)。CNN在海灣戰爭中一鳴驚人，算是現場播報史上特殊而富爭議的一章。ABC、CBS和NBC在天安門事件以後對中國心灰意冷，連帶對中國於90年代期間翻天覆地的變化了無興趣，CNN只側重報導中國的異見者、人權和中美的外交衝突(Chinoy, 1999)。

我們的研究證實了哈林(Hallin, 1986a)的發現，由於電視需要追求簡單而統一的主題，它比精英報紙的意識形態更鮮明。如果說精英報紙提供派克(Park, 1940)所說的「knowledge about」，即是較有系統而抽象的分析，可以綜觀全局，聯繫事物的脈絡；電視充其量只能提供「knowledge of」，即是較直覺、感性、具體的事相。電視新聞編串點滴零碎的映象成為故事情節，訴諸想像，而非訴諸瞭解(Nimmo and Combs, 1990: 49)。主播人扮演提示主題的功能，在節目開始和結束講話，然後調節、穿插、提問於各記者之間。電視有時只作直白的報導，有時則充滿「強烈道德和意識形態意味」的語言(Hallin, 1986a: 120)。

這四位電視網主播(CBS 的Dan Rather, ABC 的Peter Jennings, NBC 的Tom Brokaw, 和CNN 的Bernard Shaw)忙着在世界各地穿梭，如今遠從半個地球以外飛來香港，磨拳擦掌，準備趁機利用先進科技大顯一番身手。是現代的大眾電視把他們塑造為明星的，沒有報紙記者比他們看起來更風光更有智慧。美國的電視網和香港媒介都廣泛報導這些電視明星翩然抵港的消息。《南華早報》準備一個名單叫他們認香港領袖的名字，發現他們「對香港的一般知識肯定是模糊的」(Buerk, 1997)。無知並無礙於他們的報導，只是他們更需要依賴刻板印象罷了。美國國內觀眾對世界事務頗為無知，也不致批評他們的陳詞濫調。

CBS新聞從6月25日(主權移交前6天)開始從香港現場直播。<sup>4</sup>以「紅旗冉冉升起」(Red Flag Rising)為題，它把香港放在「中國試圖成為世界超級強國」的脈絡裏(Buerk, 1997)。主播拉若(Rather)說，龐大而日益強盛的中國發出的迴響，「在美國每一個村鎮震動」，可惜他沒說為甚麼CBS退出香港已經多年。CBS隊伍全是一群明星記者，<sup>5</sup>但他們只是「歷史的旅客」，對中國頂多一知半解。主播其實沒有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消息靈通，他們關在固定的小房間裏，籠罩在強烈的聚光燈下。CBS撒出的「新聞網」窄得很，訪問甚麼人全料得到：最高領導人、英語講得漂亮的民主派人士、穿插幾個英國人士(特別是有英國背景轉而親北京的香港議員)，再加上有爭議性的電台脫口秀主持人。在香港，研究中國的人才濟濟，CBS現場直播竟然只邀羅騰勃格(Sidney Rottenberg)上特別節目(他是同情毛澤東革命的美國人，在中國住了數十年，曾數度入獄，現在美國從事對華貿易)，主播的提問也非常膚淺。<sup>6</sup>現場採訪與歷史最脫

4 在拉若到港前10天，從6月15日到6月24日，播過10小時有關移交的報導，都以秒計，其中包括宣布主播抵港。從6月25日到7月1日，製作了25個長篇的報導，皆以分鐘計。拉若還在6月30日移交當晚主播一小時的現場直播特別節目。

5 Bob Simon, Tom Fenton, 以及 Bob Scheiffer。

6 拉若首先介紹羅騰勃格「作為一個美國人，他在中國或對中國的專長，從毛澤東到市場經濟，從囚禁年代到資訊世紀，是沒有人可以比得上。」接着問他：「以你的經驗，你怎麼認為？」

節，最無反省力，難怪卡茲(Katz, 1992)斥之為「新聞的終結」。

CNN要填的時間較多，除了平常的「世界觀」(Worldview)節目(週一至週五播一小時、週末播三十分鐘)，還有特別報導。香港分社在齊邁可(Mike Chinoy)的領導下有16人，主播蕭伯納(Bernard Shaw)帶來59人工作群，考普爾(Andrea Koppel)的北京分社也起來增援。蕭伯納從6月23日即在香港開播，比拉若早兩天。6月30日主權移交當晚，他從11時30分開始播整晚，<sup>7</sup>蕭說要向全世界「盡可能完整」報導交接過程(Buerk, 1997)。它撒的「新聞網」比CBS廣，但仍以親西方人士為主，中國官方沒有機會出聲。他們在演播室的兩次討論，請的嘉賓一位是本地學者，一位是美籍華裔教授，都拿美國的學位。CNN的「世界觀」節目結束時，播出香港的輕鬆特寫片段，形容它充滿「東方神秘異國的情調」。<sup>8</sup>這些片段貌似中立，其實意識形態掛帥。某特寫照攝一雙跑鞋，描述香港生活節奏匆忙，CNN的旁白說：「他們現在能夠自由行走，但還能持續多久？」

## 媒介的框架

我們採用建構主義的「架構分析」，先把新聞內容解構然後再重構為基本框架，來剖析美國媒介的論述(Gamson, 1988; Gamson and Modigliani, 1987, 1989; Pan and Kosicki, 1993)。記者用這些框架來勾勒他們的材料，使他們的寫作連貫一致；我們也用這些框架來討論和瞭解一些重要的議題。吉特林(Gitlin, 1980: 7)說：「媒介框架大抵不必明說或承認，但它幫報導

7 蕭伯納抵港以前的八天之間(6月15日到22日)，CNN每日一小時的「世界觀」節目總共只播了5則香港消息。他到達之後，6月23日到7月1日，同一個節目播出了45則香港主權移交的新聞。

8 這些輕鬆的片段包括賽馬(2:48分鐘)、船民生活(5:25分鐘)、黃包車夫(1:46分鐘)、鞋、「瘋狂的步伐」和算命(1:53分鐘)、輪渡(2:06分鐘)、漁民的生活(1:53分鐘)、主權移交的紀念品(1:19分鐘)。許多顯然是沿政府新聞處安排的遊覽和參觀路徑拍攝的。

(新聞)的記者組織世界，在某個重要程度，也幫我們(吸收)這些報導時組織世界。」我們首先解構五份報紙、兩家電視網的內容，將它們重組為蓋姆森和勒希(Gamson and Lasch, 1983)所說的「信號矩陣」(signature matrix)，也就是排列關鍵框架，提煉「意識形態集束」(ideological packages)，包括隱喻、事例、警句、描述、視覺映象和訴求的原則。

我們從美國媒介的論述提煉出四個「意識形態集束」(表11-2)，因果相連，內在一貫。首先，美國現在躍居香港「新的監護者」，保護它免遭中國的蹂躪。美國之所以宣稱負有這個責任，在意識形態上是根據第二個「集束」：美國是自由世界的領袖，有權力和義務帶領打另一場正在興起的冷戰。這兩個抽象的「集束」為另兩個「集束」所具體化。第三個「集束」關注共黨專政會如何摧毀香港的民主和自由，第四個「集束」認為資本主義的香港終將把民主自由散布到共產中國。這兩個「集束」貌似相悖，其實都是假設資本主義為善、共產主義為惡的。

在國際新聞的領域，國與國的差別大過國內媒介的差別。電視和精英媒介競爭再激烈，唱的都是同一主題的變奏曲；它們和權力結構的關係並無二致，意識形態和文化光譜也大致一樣。它們擁抱、複製(而非挑戰、弱化或顛覆)精英的共識。哈林(Hallin, 1986a)分析，如果議題在他所謂的精英「共識區」(sphere of consensus)內，媒介通常只是外交政策的啦啦隊；如果議題在精英建立共同的「歧見區」(sphere of dissent)，媒介通常也跟着權力中心走；只有議題進入「正當的爭議區」(sphere of legitimate controversy)，媒介才需要客觀平衡，反映各主流權力或利益集團(如行政與立法部門失和，或兩黨衝突)的觀點。美國對香港主權移交的主流意見相當一致，精英內部幾乎沒有爭議，媒介根本不必「索引」(index)歧異的觀點(Bennett, 1990)。因此說各國的確有「各國」的觀點。

### 新的監護者

美國據說已從英國接過監護香港的責任，保障香港這塊資本主義的

表 11-2 美國媒介報導的意識形態集束

	新的監護者	新冷戰	民主自由的式微	木馬屠城記
框架	美國接任香港的監護者。	柏林牆倒塌後，中國成為自由世界的威脅。	權移交導致香港民主自由的式微。	香港的資本主義與民主將散佈到全中國。
隱喻	全世界在注視中國。	有效而立即的外交工具——取款機；柏林牆。	中國的「病毒感染香港的軟體」；傀儡等主人發號施令；「瀕臨絕種」的粉海豚；「貧瘠的混種」洋紫荊。	「舞動巨龍的尾巴」；「龐大的特洛伊木馬」。
例子	克林頓希望「把中國拉進來」；要中國對香港負責。	柏林牆倒塌之後將「資本主義的明珠」還給中共；「天安門血浴」。	天安門鎮壓；民主台灣；威權新加坡。	恆生指數和紅籌股空前高漲。
警句	「英國離開，美國進來。」	「陳舊而頑固的中共」；「紅旗冉冉升起」。	「一國一制」。	紅星照耀香港預示毛時代的終結。
描述	阿爾布萊特給「這個由中國領袖所任命的非民主團體一點顏色看」。	中國軍隊「湧進來」；中國「試圖成為世界強權」。	中國「欽定的議員」；「民主的立法機構解體」；「香港是唯一的脫離殖民地，而自由和民主更少的地方」；香港的主要媒介「風尚未刮就彎腰了」。	香港作為「顛覆基地」；香港的資本將塑造中國的前景；香港熱會傳遍全中國；中國又大又老又重，而香港又年輕、又輕盈、又成熟。
視覺映射	「亞洲明珠」墜入獨裁政權之手；彭定康駛入黑暗。	坦克，武裝軍車。	雙城記；董建華是「船王」；一個國家、兩個世界。	香港是「水晶球」；是「中國可以有所成就的範例和旗艦」；恆生指數飛漲。
原則	積極來往。	後冷戰時代的自由民主。	新聞自由與選舉自由。	資本主義民主。

寶地，不受共產黨的淫威所蹂躪。美國無權繼承香港的主權或領土，憑甚麼聲稱做它的監護者？唯一的理由就是意識形態。記得天安門事件爆發時，老布什甘犯眾怒，拒絕採取強烈措施制裁中國，以致競選期間克林頓奚落他「縱容北京屠夫」；克林頓上台以後，前兩年也將貿易和中國的人權嚴格掛鉤。但他發現掛鉤政策效果不彰，遂改弦易轍，採取「積極來往」的政策。他現在小心翼翼宣佈：美國的對華政策包括維護香港的自由。他要把「把中國拉進來」，不要「把它關在外面」（《華盛頓郵報》，6月14日）。國務卿阿爾布萊特(M. Albright)重申，沒有任何事件，包括香港主權移交的過程，能夠左右美中「複雜多面的關係」。專欄作家布洛得(David Broder，《華盛頓郵報》，6月24日)引述美國前駐華大使李潔明的話說，美國應該延長中國「貿易最惠國」的待遇，在每一點都同它接觸。

《華盛頓郵報》在一篇措詞強烈的社論(6月24日)批評「來往政策」沒有說明倘若中國踐踏香港的自由會負擔什麼後果；它舉中國對待魏京生和香港的「傀儡立法局」為例，聲稱「有時候政府好像要提倡人權，卻不願意犧牲對中國的友善。」社論呼籲，克林頓要保證「中國可別因此壯了膽，覺得虐待香港的六百萬人不必受處罰。」專欄作家霍格蘭(Jim Hoagland)指責克林頓「拿『沉默外交』的老藉口」，束手不過問中國的人權(6月29日)。他說：香港的移交「給華盛頓一個機會和責任來想一想，並且更清晰地說明中國的未來，以及美國對中國的期望。」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保守的共和黨主席郝姆斯(Jessie Helms)寫了一篇非常尖銳的評論，題目是《英國離開，美國進來》(《華爾街日報》，6月25日)。他說香港主權移交「代表了維護香港命運的責任移交給美國」。80年代中英談判中美國沒有施展影響力，他深以為憾，認為這是「不可否認的錯誤」。無論英國要不要在國際法庭追問，他說美國必須「援用法律上站得住腳的策略」，直到中國符合承諾為止。他下結論說，英國走了，只有美國「有意願和辦法維護香港」。另外，羅森索(A.



M. Rosenthal)是《紐約時報》經常批評中國的專欄作家，他指責「中國貿易游說團」試圖說服克林頓以人權作為美中關係的祭品(7月4日)。他那篇專欄的題目叫做《北京在發笑》。

### 新冷戰

儘管幾乎所有的西方媒介都厭惡中國，只有美國媒介從全球超強的觀點來看香港主權移交。因為中國的人權紀錄惡劣(但或許跟中國的人權未必相干)，中國已經踏進來取代蘇聯，成為美國心目中的敵人。《芝加哥論壇報》社論(7月1日)說：「柏林牆倒塌不過10年，就看到亞洲之珠轉手給獨裁政權，令人神傷。」《紐約時報》當天的社論語氣也差不多。兩報都用「柏林牆」的隱喻暗示香港岌岌可危。

拉若踏上這次旅程，先重訪天安門廣場，並憶述尋訪1989年學運的種種，「在香港回歸前夕，(北京)發生稀有抗議共黨當局(房屋政策)的遊行。」他用這兩件不相干的事在象徵意義上具體而微連綴起香港回歸和中國的人權鎮壓。6月20日他從天安門報導：「今天的游行，重要的在時間，不在規模。」電視報導他從北京搭火車，穿越好幾個沿海和內陸省份緩緩抵港，彷彿北京在後面扯一條神經線掣肘香港。CBS播報主權移交的新聞時，常插播天安門事件的流血鏡頭，不但喚回人們對共黨暴政的記憶，也預示移交以後香港的前途堪虞。拉若站在美麗的維多利亞港前，背後襯托着點綴於海岸線上的摩天大樓，他宣布香港的自由企業「正回到陳舊而頑固的中共手裏」(6月25日)。以採訪戰事著名的賽蒙(Bob Simon)穿着獵裝評論說：「共黨政權沒開一槍就控制了一塊地產」。他贊揚英國離開香港很有格調，沒有夾着尾巴跑，不像美國當年退出越南那麼狼狽。記者們常以戰爭術語形容香港回歸。

在整個世界末日的論調中，也有人預測資本主義終將勝利。《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理德曼(Thomas L. Friedman, 7月3日)形容中國是「一國無制」(one country, no system)，大體已經放棄共產主義，卻未完

全擁抱資本主義。他說，如果中國不履行對香港的義務，它「會被最殘酷、有效而立即的外交工具——取款機——處罰」。他指的是在香港的100億美元外資，其中多半是容易流動的基金。前美國助理國防部長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在《紐約時報》撰文(6月22日)稱，股票和房地產攀升得這麼高，可見多數香港人相信中國會遵守諾言。他指責港督彭定康在1995年推動選舉，槍聲未響就已偷跑，把鄧小平對香港的布局攪亂——鄧小平想在香港建立一個「仁慈的專制」，經濟自由，政治威權。傅立民顯然不同情香港脆弱的民主：「美國政客因為『敵人缺貨』而難過，老想跟中國打一場新的冷戰，這樣做只有讓香港比北京更神經緊張。」彭定康的新聞秘書(6月22日)投書批駁他。另一篇讀者投書也說，「只有自由的社會才有繁榮的市場經濟」(6月24日)。當然，弗理德曼或傅立民都沒料到主權移交才一年亞洲金融危機就刺破了香港的經濟泡沫。

《華爾街日報》共登三篇社論，另外特約三篇評論，包括郝姆斯、前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香港民主黨領袖李柱銘，言論對中國的態度更強硬更不妥協。該報用語較強烈，諷刺更尖銳，也不故裝公正。它的社論(7月1日)說：「不管華盛頓、倫敦或者其他首都的人民如何抱怨，都無法阻止北京為所欲為」，也不能阻止北京「絕對控制」香港。另一篇社論(6月26日)兩次提到「天安門流血」，懷疑中國答應給香港「高度自治」會變成一個諷刺。第三篇社論(7月2日)譴責歐洲各國領袖——包括德國首相科爾(Helmut Kohl)，法國總統希拉克(Jacques Chirac)，前英國外相豪伊(Geoffrey Howe)——為種種理由向北京磕頭，而不顧香港的死活。

中國媒介借這個機會，大肆渲染民族主義打敗西方帝國主義。英國媒介則強調，小小的英倫島國竟把現代文明帶給全世界，並在香港留下良好的治績，包括自由、繁榮、法治以及廉潔的政府。撒切爾夫人重申她毫不難為情地為大英帝國的紀錄辯護，因為「它將法治和自我改善的

前景帶給數以百萬計的人，否則他們根本不知道有這麼回事。」（《華爾街日報》，6月27日）。她一方面表現緬懷帝國餘暉的情緒，一方面急於反駁外界對她的批評，否認自己當首相時「出賣」自由的香港人給共產黨。她企圖把中國民族主義的美德和英國殖民主義的罪惡「非本質化」；換言之，中國的民族主義沒有那麼好，英國的殖民主義沒有那麼壞。薩伊德(Said, 1993)描述英法帝國建構「東方主義」論述，說他們老自誇把文明帶給原始和野蠻的民族(頁xi)，「你們有今天全靠我們，我們走了，你們就回到糟糕的狀況」(頁35)。撒切爾首相不正為薩伊德提供一個天衣無縫的例證嗎？

英國媒介的主要框架是宣揚港英的治績，美國媒介用它做次要框架，以建構資本主義對抗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抗爭。《紐約時報》社論(7月1日)稱，中國領袖對殖民主義的邪惡嘔嘔不休，但假如尊重事實，他們「必須承認英國的遺產，包括港人對民主的追求和物質繁榮」。另一則新聞贊許「英國人留下不可磨滅的標記」(6月29日)，並引述許多人說殖民主義帶來了「重要的利益」。西方媒介喜引港督彭定康(Patten, 1997)的話：「香港是帶有英國特色的中國人驚奇成功之例」。查爾斯王子這樣歸納英國的遺產：「英國是香港歷史的一部分，香港是英國歷史一部分。我們是各自的未來的一部分」(《芝加哥論壇報》，6月30日)。很少英美記者提及英國在殖民地如何反民主，尤其回歸前「北京動不動刮來一陣粗糙的風暴」，相形之下這一點顯得不重要了(Chinoy, 1999: 397)。少數史學家如馬思樂(Maurice Meisner, 《洛杉磯時報》，6月29日)提及，當代中國各個領袖無不致力廢除殖民統治，二戰後期羅斯福支持蔣介石收復香港，但為邱吉爾所反對。

媒介借用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的一些比喻，強烈暗示「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國」，也就是在給威權政權施加國際壓力。《洛杉磯時報》(6月23日)引述參加移交典禮的美國國會代表團成員考克思(Christopher Cox)和德國總理科爾，他們都說相同的話。還有一位台裔美籍人士的投書(7

月17日)也贊成這種說法。克林頓總統也說要「密切注意」香港的自由。(《華盛頓郵報》，6月15日)。

《華盛頓郵報》懷疑「威權的中國」怎能拿香港做示範單位吸引「民主的台灣」回歸。社論(7月1日)指出，台灣不像香港，它不是殖民地，而是一個民主的國家，有權利決定自己的未來。另一篇報導(6月27日)說，台灣人對香港主權的移交不是冷漠得很，就是愛恨交加，或完全敵視，以至於電視報導香港回歸的節目收視率很低。為了回應北京「一國兩制」的壓力，台灣官方向國際媒介爭取同情，提倡「一國一制——較好的那個制度」，指的是台灣的民主改革(Pan et al., 1999)。

除了台灣，還有一群國家或實體，包括西藏、越南、印度和新加坡，也被捲入新聞的漩渦裏。國際政客與媒介借香港這個地點、主權移交這個場合打意識形態的仗。一位國際難民組織的顧問指出，中國當年對西藏背信違約，自由世界必須「高度警覺，密切注視香港的發展」(7月2日)。雖然當年越南經過長期血腥內戰，《華盛頓郵報》和CBS卻仍把香港政權移交和北越(共產主義)奪取南越(資本主義)相提並論(6月29日)。《洛杉磯時報》孟捷慕(Jim Mann, 7月2日)引印度獨立時尼赫魯的著名演說：「在凌晨這個時刻，世界沉睡了，印度卻向生命和自由覺醒。」孟氏說香港充滿生命活力，但它的自由「仍是一個大問號」。他捧完尼赫魯，接着諷刺江澤民神情木然，演講充滿陳詞濫調，沒有人會記得他說甚麼。

除了天安門鎮壓，媒介最愛提的是新加坡及李光耀。首先，新加坡《海峽時報》唱官調，指責「英國(在香港)的代理憑弔者，包括西方媒介、人權遊說者以及華盛頓和歐盟各地的政客辯護士」，中國在未來的歲月「必會擊敗這些批評者的惡意」(引自《紐約時報》7月3日)。《紐約時報》社論說，行政長官董建華特別喜歡新加坡的威權制度(6月29日)。董建華在接受CNN採訪時讚揚新加坡模式，被認為「跟香港自由運作的現實脫節」(Chinoy, 1999: 396)。紀思道在同一篇《紐約時報》文章

(6月25日)，兩次提新加坡視新聞自由為奢侈而非必要，根本是反面教材。柯富城在《華盛頓郵報》(6月30日)報導，董建華任命親中政客(有的以前還是親英的)進入行政會議，「酷似島城國家新加坡，政治辯論噤聲，政府則是威權的、家長式的、有效的」。《洛杉磯時報》(6月28日)說北京當局和香港從商界引進的新領導層，分別以新加坡為模範，但兩者所持的理由不同。最後，港督彭定康抨擊李光耀是「威權政府伶牙俐齒的辯護士」，既不代表亞洲的價值，更不體現儒家的價值。他的批評廣受媒介報導。彭定康問：「為什麼講李光耀體現亞洲價值，而不是安山素姬或者李柱銘呢？」(《華盛頓郵報》，6月25日)

### 民主自由的式微

新的冷戰在香港本地是環繞着民主自由之役。英國治港150年從無民主，末代港督彭定康卻在1995年最後一刻推動選舉改革，雖然時不我予，但港英想借此光榮撤退，兼以防範共黨濫權於未然。北京震怒，斥彭定康為「千古罪人」(Dimbleby, 1997)。CNN的蕭伯納這樣形容彭定康的告別：「香港脆弱自由的保護者駛向黑暗」。《紐約時報》社論(7月1日)宣稱：「在習慣上，在意識形態上，北京都很可能擊垮香港的自由」。新政權解散民選立法局，為「北京欽定」的「傀儡」取代(《華盛頓郵報》社論，6月24日)。《紐約時報》社論(6月29日)讚揚國務卿阿爾布萊特未參加香港臨時立法會的開幕禮，給「中國領袖任命的非民主團體一點顏色看」。它又宣稱，支持民主的人「將來游行可能被當局騷擾」——幸虧這個預言並未成真。

許多美國的文字記者要求訪問董建華，好幾個星期都無下文。他倒是上了CBS和CNN。蕭伯納單刀直入問董建華：「你是不是北京的傀儡？」彭定康抨擊許多港商向北京靠攏，深獲美國記者的同情。《紐約時報》說：許多富商「在向北京輸誠以前，已拿到美國、英國、加拿大的護照，準備好了逃生門」。這些富商勸記者別睬民主派李柱銘唱衰香

港的言論。《華盛頓郵報》指名道姓說哪些知名人士放棄英國護照或爵位(6月29日)，轉而追求董建華頒發的獎章(6月30日)。媒介形容董建華是北京支持的船王，李柱銘則是民主的英雄。李柱銘在《華爾街日報》(6月30日)撰文說，自由把他父母那一代難民從中國大陸帶來香港，創造香港的經濟奇蹟；他矢言自己這一代將繼續為自由奮戰。李柱銘的英語流利，辯才無礙，是媒介的寵兒。他知道「外國媒介等待有些甚麼事情即將發生」，他的撰稿人覺得外國記者把他包裝為反華人物是個「好賣點」(Knight and Nakano, 1999: 43)。然而李柱銘在公開演講時總先聲明「以生為中國人而驕傲，現在比過去更驕傲。」

民主派人士被逐出臨時立法會之外，多數西方記者很容易採訪到他們。《紐約時報》在通篇批評當局的文章裏(6月15日)，也採訪兩位親中議員以示平衡：其一是房地產商朱幼麟，他興高采烈說，主權移交一切照常，什麼也不會發生；另一位自由黨領袖李鵬飛——彭定康批評他轉向北京效忠(Dimbleby, 1997)——辯稱主權移交「並不是民主的結束」。《華盛頓郵報》(6月29日)引述一位本地警署督察的話：「我們不想改變效忠，我們不能為中國的共產黨政府服務。」

「可怕」的人民解放軍「滾進來」(CNN)或「湧進來」(CBS)，令人「擔心」(《紐約時報》)。CNN的齊邁可(Chinoy, 1999: 400)說：「軍事占領的畫面加重了天安門歷史的份量，對後殖民的新香港來說實非佳兆」。《華盛頓郵報》社論(7月1日)批評解放軍「表現愚蠢，進城的時空(不對)，不管本地人或全世界數百萬人很難不下一個不愉快的結論」。6月27日，CBS的賽蒙報導，英國人是「在音樂聲中離去」，中國人「在坦克聲中進來」。6月30日CBS新聞又勾起天安門鎮壓的回憶：

拉若：156年的殖民統治創造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轉向站在旁邊面向鏡頭的賽蒙)首先，我們來談談軍隊。我想全世界都在談這個……4000人的部隊。你在香港，人們相當傷心吧？

賽蒙：是的，很傷心。它帶回來記憶。對這裏的人，解放軍就是天安門。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門屠殺以後，一百萬人上街示威，每六個香港人就有一個。

6月30日移交當晚，拉若先介紹天安門廣場歡欣鼓舞的氣氛，然後說：「八年前四月份的民主運動就是這麼開始的。」他接着說，「拂曉時分，有一卡車的軍隊進城。士兵看起來並沒有武裝。」但這時畫面即轉駁到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門，軍人端着來福槍在背後濫射。這則新聞所沒說的比所說的訊息還有力，暗示香港可能淪為「天安門第二」。事件一旦被放置於這個政治脈絡裏，媒介即「毫無節制地散布偏見，不必怕有人反對」(Said, 1981: 45)。

CBS和CNN常提彭定康的名言：「香港是唯一脫離殖民地而自由民主更少的地方」(Patten, 1997)。《紐約時報》的泰勒說，天安門事件發生以後，香港的地下「黃雀計劃」走私了百名左右大陸異見人士入境，北京很可能會掃蕩這個「顛覆基地」(6月22日)。《華盛頓郵報》引述布政司陳方安生的話：「管好我們自己的事最能保障我們的自主權」，萬一中國「懷疑我們允許香港成為顛覆基地」，它必然鎮壓無疑(6月23日)。在移交前夕，北京不斷恫嚇香港，竟成山雨欲來之勢，不但香港人喪膽，港英政府也建議異見人士在7月1日前離境。事實上，解放軍進城後，一夜之間氣氛驟變：他們退回軍營，在公開場合再也看不到。數十位群眾夾道歡迎解放軍，更讓期待示威行動的外國記者大惑不解。

媒介一直預測香港新聞自由會下降(Chan and Lee, 1991; Lee, 1997)。紀思道在《紐約時報》(6月25日)說，批評中國的人在未來幾年勢必「和共產黨的死硬派對峙——對這些死硬派來說，沒有甚麼刊物他們不想管制。」他警告，北京可能制裁道瓊斯和路透社的荷包，從而威脅香港作為亞洲資訊中心的地位。《華爾街日報》報導，香港的主要媒介「風還沒有刮就彎腰了」。《華爾街日報》社論(6月26日)和《紐約時報》(6月25日)引述民意測驗說，50%民眾與86%商業主管擔心香港在中國統治下

會喪失自由，和官方一派樂觀唱反調。最後，法森(Faison)在《紐約時報》(6月30日)說：「即使在香港歷史的轉折點上，大部分報紙所登的還是搶劫、性騷擾和離奇的人間悲劇。」

### 木馬屠城記(特洛伊木馬)

美國媒介敘述香港受到中國的蹂躪之餘，也借古希臘神話「木馬屠城記」，暗示香港是中國經濟甚至政治變革的樞紐。媒介炫耀香港經濟繁榮的神話，製作很多五顏六色的圖表，顯示恆生指數和紅籌股空前高漲(當然料不到一年後亞洲金融危機就把它們衝垮了)。《紐約時報》說，再樂觀的人也沒料到「在不明朗的歷史時刻前夕，居然還出現這麼喧囂亢奮的情緒」(6月25日)。該報形容香港是「舞獅的那根尾巴」，經過13年的變化，已成為中國金錢的首都(6月27日)。此文的配圖是一張中國銀行大廈和香港俱樂部並列的照片，象徵新錢和舊權以香港的資本主義方式合流。

紀思道說：「中心問題是香港像一隻巨大的特洛伊木馬：戰利品如此光榮，中共不可能將它留在門外，但它一旦進入門內，就會破壞當權者。」(《紐約時報》，7月1日)。他說孫中山受到英國在香港的成就觸動，才會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他還引述本地的專欄作家，比喻香港是一粒怪藥丸：「這東西你吃的時候很小，不怎麼樣；但進到你的胃裏，它會看不見地膨脹，而且效果很好。」此文的結論是：紅星高照香港，就是毛澤東主義的結束。弗理德曼在7月1日的外交專欄配了一張插圖，描繪香港是中國的龍頭。他用速度和重量來比喻，說在一個資訊時代，中國又大又老又重，香港又年輕、又輕盈，又成熟；中國已經過去了，「中國長大後」，就像香港這個樣子。

撒切爾夫人說，未來一代「回頭看6月30日的儀式，不會認為是紀念香港殖民統治的終結，而是象徵推動中國和亞洲各地自由民主力量的新生」(《華盛頓郵報》，6月27日)。在回答CNN蕭伯納的提問時，她強



調：「香港熱」終將傳遍全中國。她說，香港是一個小水晶球，提供大的解決方案，是「中國可以有所成就的範例和旗艦」。另外《華爾街日報》有一篇史坦(Peter Stein)的文章(7月1日)，說明香港大亨都把未來下注於中國廣闊的市場。《華盛頓郵報》也引述在中國內地投資建高速公路和酒店的企業家胡應湘，他說香港和中國之間的差別現在像「法國和保加利亞」，但50年後就會像「法國和西班牙」(6月15日)。

## 結 論

美國媒介報導香港主權移交，這是一個「媒介事件」(Dayan and Katz, 1992)，它所透露有關香港的訊息和透露有關美國的訊息一樣多。主權移交是中英雙方所安排的既成事實，香港人對自己的前途沒有置喙的餘地。天安門事件以後，整個90年代英國突然急轉彎，決定推行選舉改革，招致中國強烈的反應，幾乎無日不在媒介開罵(Dimbleby, 1997; Lee, 1997)。中英交惡日甚，中國恫嚇不息，社會陷入悲觀的情緒，彷彿世界末日即將來臨；加上彭定康雄辯滔滔，不斷敘說香港民主自由將行倒退，使國際媒介感到中國統治下的香港前途茫茫(Patten, 1997)。在移交前幾個月，《幸福》雜誌刊登聳動的封面故事，預言《香港的死亡》。《新聞週刊》美國版的專刊題目〈香港：倖存者的土地〉，改為亞洲版的〈香港：能夠倖存嗎？〉，看來意識形態的壽命實在頑強。

美國是冷戰後僅存的超級強國。美國媒介關注香港主權移交，並不光因為對這個小島有興趣，美國是以代表西方的聲音踏入香港的。英國拱手交出最後也是最繁榮的殖民地，給最後一個社會主義巨霸，即使是成為它的資本主義特區，也不啻是對西方價值的攻擊。美國媒介圍繞「星條旗」敲打民主之鼓。它們的基本論述是美國必須在新冷戰中對香港負起「新的監護者」責任；這場冷戰具體而微地體現在香港自由民主的日趨式微，但也象徵香港資本主義的民主終將戰勝中國社會主義的威權。媒介用的這些框架，取自於精英共識、外交政策和主流的文化價

值。這種意識形態內部連貫一致，記者們即使面臨矛盾的證據，仍然把這些框架「自然化」，視為當然，而且這樣做不會受無知的大眾所挑戰。除非我們比較各國的媒介論述，否則很容易誤以為美國媒介的意識形態可以普及全球(Lee et al., 2002)。

媒介重新確認全國共識和支配性的價值，同時也深化外交政策。全球化理論有的提出「全球現代性」(Tomlinson, 1999)，有的說國家相對於國際和地方實體已日漸式微(Featherstone and Lash, 1995)。我們的研究顯示，國家(特別是外交政策)對於界定國際新聞還是扮演中心的角色。我們不贊同哈林(Hallin, 1994)的講法，至少對美國媒介來說，冷戰邏輯仍然是活生生的，也是壓倒性的。電視容或更粗糙更赤裸裸，但美國媒介之間沒有多少意識形態的差異。記者是懷疑主義者，但在深層結構裏，他們的世界觀還是美國的。

回想起來，媒介採訪的香港回歸毋寧是一樁重大的假事件，無事忙。世界各國776家媒介組織的8000多位記者群聚在這個熙熙攘攘的城市，見證所謂具有全球意義的事件。在很多方面，美國媒介發揮帶頭作用。壞消息就是好新聞。但因為種種理由，主權移交並沒有預期那麼壞。這麼多國際記者本身就是新聞，是「媒介奇觀」(Edelman, 1988)，比「媒介事件」還重要。嚴格控制的喧囂場面，多彩的表演，以及精心演練的升旗降旗，哪裏值得媒介投下這麼多資源？在這種情況下，記者能夠一顯身手擊敗對手的餘地少之又少。各國記者採訪的來來往往都是同一批人，20到50個左右，以精英圈為主，再加上少數「普通人」做樣板，甚至還訪問其他同業。但他們必須把故事簡單化，然後賦予普遍的意義，所以意識形態的鬥爭仍然激烈。

當事件的發展證明記者原先的估計錯誤時，等於破壞了新聞典範結構的完整，他們必須設法補救。他們可以修補部分的假設，找出更多支持的證據，不理睬相反的證據，或者把故事放到媒介事件的話語結構裏(Bennett et al., 1985; Chan and Lee, 1991)。美國媒介把事情炒熱，所用的

方法有四種：複製衝突事件，聚合相似的事件，賦新聞以本地的意義，修補視覺的效果。這樣不會大幅度放棄原來的意識形態，而是用不同的面貌鞏固這些原則。再輕鬆的報導其實也充滿了意識形態，有些比較微妙，但許多是赤裸裸的。

事情的發展大出意外，沒有暴亂或騷動，不管媒介怎麼炒熱，受眾也不在乎。香港新聞迅自美國媒介的聚光燈中淡出，它們已經移到下一個地方去匡正弊病了。除非發生重大的災難，香港很難再領風騷。香港已經喪失獨特的身份，而成為整個中國新聞的一部分。不管是好是壞，主權移交是世界媒介關注香港的巔峰時刻。



## 跟隨權力結構起舞的傳媒

兼評喬姆斯基的「宣傳模式」<sup>1</sup>

---

不管建制是甚麼，我都反。

——喬姆斯基(引自 Horgan, 1990)

有怎樣的社會，就會有怎樣的媒介；而有怎樣的媒介，也就會有怎樣的社會。沒有一個傳播媒介是完全封閉自足的系統，它們都是特殊政治、經濟和文化傳統的產物，自然也反映了這些獨特傳統的風格與環境的限制。美國社會與媒介的主流思潮均以自由多元主義(liberal pluralism)為基底，即使下面再粗分為自由派(liberals)和保守派(conservatives)，也不過是程度之差，而非本質之別。像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教授，似可歸類為追求自由主義理想「徹底實現」的激進派，這種人不論在美國或是在西方各國都是空谷足音，寥寥無幾的，而他們論政攻擊的焦點往往是有血緣之親的自由派，對於互相視為異端的保守派反而懶得理睬。

美國的民主制度以資本主義為本體，便是建立在這個自由主義的基礎上面。大家在討論新聞自由時，總無可避免地要拿美國媒介作為比較的原型或基準，於是它就集全世界羨慕、鄙夷和咒罵於一身了。美國媒介當然沒有不可批評的道理，但任何批評務須嚴肅地觸及自由主義的基本假設。中國大陸以及其他共產國家長期以來的官方宣傳都企圖從根本否定自由主義，它們認為美國媒介只是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工具，資

---

1 原載於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1995年4月號，第28期，頁15-23。

產階級用媒介來壓迫無產階級，而世界上沒有「超階級」的新聞自由，資本主義的新聞自由就是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類似的指控在某些比較嚴肅的學者中也常聽見，其是非未必有定論，其論證是否周延畢竟可以斟酌；但是類似中國官方對西方媒介的教條式批評缺乏深刻分析，特別是在參照「黨有、黨治、黨享」的媒介體制之後，更叫人難以接受。

自由主義豈是不堪一擊的？歷史上，自由主義曾經把人類從專制皇權的桎梏中解放出來。1992年福山(Fukuyama, 1992)曾出版一本頗受爭議的書《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他說在本世紀內自由主義先打敗法西斯主義，然後又逼現行共產主義制度紛紛瓦解，一一崩潰。因此他信心十足，宣稱人類終於在自由主義找到最後的答案。其實，福山的許多基本假設恐怕站不住腳，共產國家崩潰未必就會平穩過渡到自由民主制度，何況人類社會是否會再從自由主義逆轉殊難預料。福山的話不能盡信，但有一點殆可斷言，那就是自由主義發展至今遭遇了種種難題，卻絕非一般庸俗的教條者憑空壯膽罵得倒的。今天美國國內的弱勢團體和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在抗爭過程中(包括反美運動)所揭舉的旗幟，主要還是自由主義的一些理想。就近取喻，橫跨中國近代史上的將近百年之中，從「五四運動」(1919)到「六四運動」(1989)，法國大革命的口號和林肯解放黑奴的宣言都衝破時地阻隔，而響徹北京的天安門廣場。

## 自由報業的挑戰

在學術界對於各國新聞模式的比較研究中，以《報業的四種理論》發其端，這本書的作者席伯特(Fred Siebert)、皮特遜(Theodore Peterson)和宣韋伯(Wibur Schramm)都是50年代美國新聞學界開風氣的人物，他們所提出的四種規範性報業理論自然代表了當時西方的主流觀點(Siebert, Peterson and Schramm, 1956)。他們首先批評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模式的報業，這個模式原來涵蓋了傳統式的家長制與皇權制，但在全球化冷戰格局下實亦可指涉在美國扶植下的右派軍事政權。作者們接着鞭伐蘇

聯模式，其實蘇聯模式更可以引申概括多數共產國家的全權主義 (totalitarian) 模式，它們的特徵就是用黨的紀律使權力史無前例地集中化。另外兩個則是自由主義模式和所謂的「社會責任」模式。「社會責任」模式嚴格地說不能獨樹一幟，頂多是自由主義模式的旁支，代表溫和的自由主義者肯定市場的運作，但也抨擊市場運作過程中所造成的偏差。

換言之，過分的商業掛帥驅使媒介競逐暴利，不惜使用聳人聽聞的方式進行人身攻擊，報道偏離事實，誹謗橫行。尤其在1930年代美國報閥普立策 (Joseph Pulitzer) 和赫斯特 (William R. Hearst) 惡性競爭，無所不用其極，製造了醜陋的「黃色新聞」 (yellow journalism)，嘩眾取寵，足為殷鑒。在這個背景下，芝加哥大學校長哈欽斯 (R. Hutchins) 主持的「報業自由委員會」於1947年發表了一份報告書，重申自由的基本原則，但呼籲新聞界在自由的基礎上負擔起更大的「社會責任」，務使報紙的報道真實全面，成為公眾評論交流的議壇，並能如實地代表社會的群體，以及澄清社會的原則與價值。他們主張靠媒介的倫理自制，而不是政府的外力干預，來解決這些弊端。

論者更進一步批評媒介無法充分體現、甚至背離傑佛遜式的民主理念。傑佛遜原以新英格蘭的小規模城鎮為藍圖，人際接觸頻繁、密切而融洽，彼此互通聲氣，而媒介提供真實多元的資訊給市民，使他們在平等的基礎上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問題是一旦美國發展為大陸型高度都市化和高度工業化的社會，傑佛遜的浪漫情懷就難以落實。資本主義的市場邏輯使包括媒介在內的生產工具日益集中，李普曼 (Lippmann, 1922) 在1922年寫《民意》(或譯《輿論學》) 時對這個趨勢即已慨乎言之。不料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着跨國公司的奔騰躍進，大舉侵佔國內國外的各種資源，媒介所有權的集中勢頭愈演愈烈，不但美國各城市只能獨沽一報，貝戈狄肯 (Bagdikian, 1992) 的研究更指出，全國半數以上的報紙集中於29家大公司之手。其他媒介領域(廣播電視和傳播新科技)的壟斷則比報紙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冷戰結束後，跨國媒介集團更銳減為個位數，

它們結合傳統媒介和新媒介，壟斷資訊和經濟利益的程度為歷史上所未有(McChesney, 1999)。這個問題至今還是解決無門。

第三類的批評者是更激進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站在美國和歐洲資本主義民主社會的邊緣地位，一方面攻擊以蘇聯為首的僵化列寧主義使媒介淪為黨官僚組織的壓迫工具；一方面又批評資本主義媒介所有權高度集中於少數大財團之手。多元(尤其是激進改革的)思想言論的表達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媒介非但不能成為解放的力量，反倒鞏固了社會的異化與加深了人對人的剝削。他們承襲激進人文主義的思想傳統，企圖在兩極之間尋求理想的「第三條道路」，而他們所描繪的這條道路也往往取決於他們對社會主義的不同詮釋。他們的言論激越，分析精彩，在各國學術界發展出多彩的風貌，例如在德國有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在法國馬克思主義又與結構學派合流，在英國則採擷歐陸各學派(特別是意大利葛蘭西的「霸權理論」)而發展出文化研究的顯學，然後再遠渡大西洋到美國生根。總的來說，這套學說對自由主義的衝擊和激盪非常深廣，但其影響力畢竟局限於知識界與學院牆內，對於牆外的實際政治卻油生強烈的無力感和疏離感。

### 喬姆斯基反對一切建制

我覺得若要找個最激進的學者兼知識份子，當非麻省理工學院的喬姆斯基教授莫屬。他是享譽三十年的語言學大師，也是美國外交政策和媒介意理控制最雄辯、最尖銳的指控人。儘管喬姆斯基自認為他的語言學理論一直是「少數的立場」，《大英百科全書》卻說：「今天語言學上的重大理論問題無不在他所界定的範圍內辯論。」另據《藝術人文引述索引》指出，在過去十二年中他在學術期刊被引述的次數最多，《紐約時報》甚至讚揚他「或是在世最重要的知識份子」。

據喬姆斯基自述，他從小就接受激進的思想，長大後立場益加堅定。他言行合一，數十年如一日。60年代中期，他跳出來強烈反對美國



的越戰政策，曾為此短暫入獄，並名列尼克森總統那張惡名昭彰的「敵人名單」。近二十年來，他更義無反顧地抨擊美國在中南美洲扶植軍事專制政權，又在中東偽善地支持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進行恐怖壓迫，因此他素為其猶太族裔所憎恨。有人說他是美國知識界的良心，但主流媒介和權力階層則避之唯恐不及，洵是「譽滿天下，謗亦隨之」。

喬姆斯基實在不拘一格，他一方面是自由主義的激進派，沿襲着傑弗遜式的民主理想，還帶有頗濃的民粹和啟蒙色彩，對所謂的精英或意見領袖的虛偽絲毫不假辭色；另一方面又表現出無政府主義傾向，他說：「不管建制(establishment)是什麼，我都反。」(Horgan, 1990)此外，他在意識形態上與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者互通款曲，對媒介的政治經濟分析也形似馬克思主義者的取徑，但他的整個學術淵源卻並非馬克思式的，至少在著作中不大使用馬克思的概念和詞彙。他固然反對美國的建制，也抨擊布爾什維克革命毀滅了社會主義。60年代在反越戰的聲浪中，許多美國左派一廂情願地支持北越的胡志明，而喬姆斯基則指出胡志明是個獨裁者，但這並不表示美國有權利侵略別的國家。

### 媒介只能在小範圍內發言

在他諸多的媒介批判的著作中，《製造同意》和《必要的錯覺》兩本書可為代表(Herman and Chomsky, 1988; Chomsky, 1990)。喬姆斯基把戰線拉得很廣，首當其衝者是自由派的言論堡壘，特別是《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及其內部自由色彩鮮明的專欄作家(例如Tom Wicker和Anthony Lewis)，因為這些一言九鼎的自由派媒介雖然時常批評美國制度和政策，但畢竟只限於執行上的細節，其實全力維護整個基本政策的中心假設，因此喬姆斯基企圖擒首，從他們開始斷源截流。他說《紐約時報》根本就是「官報」(official press)，對既得利益只知小罵大捧，製造貌似社會上有不同意見的幻覺，其實「只表達狹隘的政府與大公司的意識形態(state-corporate ideology)之一支，而且是特別有用的一支，(因為

它)隱含的信息是：到此為止，不能再進」(Chomsky, 1990: 13)。他說如果哪一天《紐約時報》開始評論他的書，第一個問題他要問的是：「我作錯了什麼？」(Horgan, 1990)至於保守派對美國政策載歌載舞，在喬姆斯基看來大概是不值一駁的，反而着墨殊少。

喬姆斯基說，正如專政制度需要靠暴力使人屈服，民主制度也需要透過宣傳為既有秩序製造統治的共識，把人民對體制的效忠自然而然地消融於無形之中。自由派認為媒介靠着在多元客觀的「自由意見市場」運作，一方面有自我矯正和調整的功能，一方面制衡既得權力結構的腐化。喬姆斯基完全否定這種說法，指斥自由派只不過是在製造幻覺罷了。他提出一個「宣傳模式」(propaganda model)，宣稱美國不啻是個製造恐怖主義的超級強國，而媒介就是它一名得力的「宣傳員」(Chomsky, 1990: 8)。他說：

總之，主要的媒介——尤其是設定議題給別人跟的精英媒介——把有特殊地位的視聽大眾「賣」給其他大商家。如果它們所呈現的世界圖像反映買賣雙方和商品本身的觀點與利益，則是不足為奇的。媒介的所有權高度集中，而且愈來愈烈。此外，位居媒介經營或評論要津者，同屬特權精英，他們都抱持類似的看法、期望和態度，反映階級利益。進入這個系統的記者只能同化於這些意識形態的壓力，通常是把新聞價值內化，否則難有發展；講一套相信一套是不難的，誰無法同化則會被熟知的機制所淘汰。

他指出，美國媒介只能在政商利益所劃定的範圍內講話，凡逾界挑戰基本體制的思想言論，不被淘汰出局者幾稀矣。但環顧全世界，只有美國憲法明禁國會立法箝制新聞自由，媒介在日常報道中復勇於揭發政府與大財團的濫權腐敗。他說，因為既得階層中發生「技術性的分裂」，若形諸媒介，表面上看起來很熱鬧，其實並未超出狹窄的允許範圍，更沒有危及核心的假設。「水門案」的矛頭只針對尼克森總統本

人，何曾直搗制度的核心？何況總統一去職，媒介更乘機忙着為體制運作如何順利大喝其彩。他說，既然既得階層有辦法把媒介的內容圍限在小圈圈內，就不怕(甚至可以鼓勵)它們報道表面的紛爭，以塑造美國新聞自由蓬勃的假相，這對制度的穩定徒有利無弊。他諷刺說，蘇聯人民至少知道被專制文化所統治，美國人反而被徹底洗腦了，竟把細致的思想控制當做自由呢。

### 雙重標準以美國利益為依歸

喬姆斯基作了一連串配對(paired)的對外報道個案研究，結論是只要抓到美國的敵對政權蹂躪人權，美國的媒介必大報特報，以證明美國制度的優越性；但碰到美國的附庸國貪污腐敗或侵犯人權，媒介則視而不見。因此，過去美國媒介先把尼加拉瓜扣頂「恐怖份子」的大帽，然後順水推舟，賴到國際共產黨的身上，這樣媒介就可以義正詞嚴地開罵。反觀美國在尼國鄰近所培植的薩爾瓦多，人權紀錄其實比尼加拉瓜更惡劣，美國的媒介卻如輕舟已過了無痕。媒介持雙重標準，何厚薩而薄尼？說穿了，就是端看美國的利益所在。又如美國長期撐以色列的腰，任其欺壓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主流媒介當然是一面倒向以色列，想出種種理由替它粉飾罪行。<sup>2</sup>喬姆斯基又指出，美國媒介譴責赤柬屠殺一百萬人，但美國支持的印尼政府在東帝汶進行滅絕屠殺，慘絕人寰，居然長期逃脫了美國媒介的「法眼」，這樣明顯的「遺漏」豈是偶然？以此類推，天安門事件之所以舉世喧騰，原因很多，但這不也正好提供樣板證明美式市場經濟勝利在望、共產主義走向破產邊緣嗎？

除了把媒介辯論框在小範圍以內，媒介還注意遣詞用字的技巧，以擴大意識形態的效果。喬姆斯基指出，媒介反正假定美國外交的動機總是高尚純潔的，世界各地又普遍「渴望美式民主」。美國不管是打越

2 例如《紐約時報》的猶太裔專欄作家羅森索(A. Rosenthal)，只要碰到有人對以色列稍有微詞，他就會暴跳起來。

戰，或侵略巴拿馬，或制裁尼加拉瓜，都是在抵制「國際共產黨的野心」，以及「捍衛民主與人權」的秩序。以此順推，美國有干預別國內政的正當性，當地人民則無權自衛，也無力抗拒。他說，美國在第三世界各地煽風點火，扶植若干以文人為名、以軍事獨裁統治為實的政權，以及製造種種暴行，都受「反共」、「民主與人權」和「世界和平」等等漂亮的名義所掩護。凡是反對美國的民族主義者，無論政治立場和社會承諾多不同，多半還被冠以「親共」之名，必須清除而後快，好讓親美的「民主人士」取代之。

### 長於批評，短於理論

喬姆斯基在語言學上的權威地位，我是完全沒有資格置喙的。他在媒介領域的成就，我想也許可以一分为二：作為一個社會批評家(social critic)，他所關注的範圍廣泛，立場穩定一致，炮火隆隆，時間上縱貫三十年，全神投入，舉重若輕，無論敵友都不出其右。若以研究傳媒的學術來衡量，很多人無法接受他分析的結論，姑不置論，但許多意識形態的知音者也會略嫌他的理論取徑粗疏空泛而武斷，往往不能曲盡其致。

說來有趣，喬姆斯基反對一切權威與建制，卻身不由己，變成一顆閃亮的媒介明星。其實，他最自豪的是「宣傳模式」的準確性，他說他已寫了數千頁的東西，「以社會科學的標準可說是證據確鑿，其預測能力尤有過之：誰能對這個結論提出嚴重挑戰，我沒聽說過。這個題目偶爾能上主流(媒介)探討時，反駁的論據皆足以證明它(宣傳模式)確實鮮活」(Chomsky, 1990: 9)。如果這個「宣傳模式」已成不移的定論，則萬變不離其宗，他那些一個接一個的個案研究——包括過去所寫的幾千頁記錄，正在寫的，和還沒寫的——豈不只是重複的注腳而已？這樣說來，他的一本本書主要的貢獻在政治評論，卻無助於理論的繼續發展。

必須指出：喬姆斯基的理論應該概括國內國外，證據卻幾乎全來自媒介的對外報道。就在國內國外這個關鍵上，媒介的表現確是「內外有

別」的。美國的兩大政黨同是中間選民的階級屬性，政綱重疊，故被喬姆斯基譏笑為「一黨兩派」：媒介在歷史上為了回應市場經濟的勃興，逐漸與政黨的立場脫鉤，崇尚所謂中立客觀的專業意理。（在西歐、香港和許多第三世界地區，傳統報業與政黨的關係也受到市場的衝擊而正日漸式微。）事實上，新聞界如今已是「簡單經驗主義」的最後堡壘，因為媒介不能憑空談客觀公正，只能凍結特定的意識形態而後為之，以致媒介受到意識形態制約而不自知。進一步說，美國媒介如何「內外有別」呢？在國內，媒介的場域即使排除激進意識，甚至壓抑少數的聲音，卻大致反映了主流社會內（即市場的中間地帶）各黨派、族群、階層和地區相對不同的利益。外交問題上卻連類似「相對多元」的聲音亦不可聞，美國的國家利益畢竟高於一切，結果兩黨常捐棄成見，媒介則成了外交政策的啦啦隊。在這個意義上，喬姆斯基的幾千頁著作不愧是社會批判的傑作：但以理論視之，則不免透露了若干限制和窘境，對媒介國內國外報道的異同尤乏反省。

### 「宣傳模式」太絕對化

質言之，至少在國內事務上，自由派有現實的理想面，也有偽善的現實面。他們強調社會不完美，只能靠溫和漸進的改革，故少作烏托邦式的幻想。激進派的眼睛則容不得一粒沙，由於任何類似絕對性的價值系統多少帶有宗教成份，他們道德批判的感染力特別強。喬姆斯基似乎把美國的自由制度太視為當然，然後又以理想的境界來批判媒介，他在荒野上發出一片吶喊，其道德力量沛然。他不甘在體制內作象牙塔的純學者，而是負擔社會正義、維護理想火苗的知識份子。正因為這個緣故，喬姆斯基似乎把他的「宣傳模式」絕對化，幾乎提到無限上綱的抽象層次，如何叫人不印證他的命題？媒介的確是服務既得利益的，主流媒介總是把激進思想邊緣化，舉世皆然。正如「人生必有一死」，這個命題縱然是天經地義的，但一經絕對化，死得「重如泰山」或「輕於鴻

毛」都變得無關緊要了，問題是那個上綱式的命題對人生意義究竟有什麼啟發？因此，也許我們應該把論據適當地相對化，才能在各種情況和架構裏捕捉現實的複雜面和矛盾面。

這樣，我們一方面肯定媒介是為既得利益服務的，但也承認兩者的關係並非一成不變的，媒介的控制方式與強弱隨制度而異：我們可以說，美國的新聞自由儘管距離理想甚遠，卻是真實的(不是虛偽的，也不是完美的)，是可觀的(不是微渺的，也不是無限的)。同時，媒介與權力中心的基本利益未必完全契合，權力中心對媒介一方面利用，一方面防範，反之亦然，彼此的確存在着結構性的緊張，這也不能一概簡化為「技術性的分歧」。不這樣看，未免太藐視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嚴肅意義，也無從解釋世界各國為什麼羨慕美國享有的新聞自由。再說美國媒介造成全球的文化霸權，引起第三世界普遍的不安與反抗，卻為被壓制的知識份子提供與外在世界溝通的櫥窗(這一點連喬姆斯基同期《二十世紀評論》的訪問中也坦承)，可見美國媒介發揮既宰制又解放、既封閉又自由的效果。這個微妙的兩面辯證性格雖在此處無法詳論，卻有必要提出來強調。要之，如果說激進派抽象層次提得太高，那麼自由派的謬誤則在於把它降得太低，以致誇張媒介對體制的制衡作用，而低估體制對媒介的制約功能，我們最好把問題放在抽象階梯，讓它上下自如地滑動，這樣觀點才可望融會貫通。

### 政經分析未能曲盡其致

「宣傳模式」宣稱採用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其實它的分析成份是「政」少「經」多，甚至是經濟壓倒政治。政治經濟學可以從經濟着眼看政治，也可以從政治着眼看經濟，最後總要把政治與經濟的互動聯繫起來。由於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的權力深植於資本主義經濟的體系之中，其分析的角度多從經濟出發；但在後進資本主義社會，權力分配和經濟發展通常由威權的國家機器所主導，故多從政治分析着手。政經學派的

優點在於從大處着眼，不糾纏末節，但缺點則是對過程的交代不清楚，有太多跳躍式的因果推論。為什麼媒介是權力結構的宣傳員？喬姆斯基說，因為新聞必須歷經以下五個「過濾器」才能抵達大眾的身上：(一)媒介產權集中，利益掛帥；(二)廣告為媒介的主要財源；(三)媒介依賴政府、企業和它們贊助的「專家」獲取新聞；(四)政商可用種種方法反擊媒介的負面報道；(五)「反共」成為美國的宗教和控制機制(Herman and Chomsky, 1988)。

這個分析全無辯證的味道。他把這五個過濾器並列，可惜從未說明它們是否直線運作，或它們如何互動、聯繫或衝突，以及政商與媒介如何既合又離，相反相成。其實，資本主義的媒介受市場的制約，首先必須照顧它們本身的公信，否則也不可能成為有效的意理機制。為此它們可能有時要反映「反體制」的聲音，至少常叫在位者難堪，這不全是「技術性」的爭執而已。英國文化研究的先驅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反對把馬克思的「下層建築」和「上層建築」視為兩個分隔的「領域」，他強調霸權是控制與反控制的實踐過程，所以必須用動態的具體分析來取代傳統靜態抽象的因果推論。他說：「鮮活的霸權是一個過程。……它必須不斷地被更新、再生產、保衛與修正。同時，它也不斷地受到本身以外的壓力所抗拒、限制、改變和挑戰」(Williams, 1977: 112)。可見媒介在製造霸權的過程當中不可能沒有出現抗拒、挫折、迂迴或逆轉，並不像喬姆斯基所描述的那樣理所當然或無往不利。

喬姆斯基對美國媒介的激烈批判能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他經常穿插幾句話說，蘇聯不必管記者怎麼想，只要用暴力讓他們服從就行了，可是像美國這種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卻得把記者徹底洗腦，讓他們自然而然、心悅誠服地效忠體制。這個講法的精神頗神似於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權」(hegemony)理論，晚近文化理論學者，例如威廉姆斯和侯爾(Stuart Hall)，對它的發展創造尤具新意，可惜喬姆斯基只用這幾句話來過場，語焉不詳，從未認真分析個中精義。一個文化評論者有權把批評的對象鎖定

在美國，讓別國人管他們自己的家務事吧；但一個媒介學者的視野若孤立於美國，則結論就可能下得太絕，有流於粗疏而武斷之虞。如果用比較的格局看問題，美俄媒介截然不同，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也有異有同；再說，從自由社會看威權主義和全權主義，也許同為一丘之貉，但對於實際生活其中的人來說，兩者可能有天壤之別。如果要我用一句話來概括十幾年來的中國經濟改革的成果，那就是它把一個全權體制轉變成威權體制，採取政經分離的路徑，使媒介在非政治的領域得到初步喘息的機會。這一轉變雖似微不足道，但它的實際影響卻太大了，那是有目共睹的。

前面說過，政治經濟學勝在提供宏觀的圖像，對媒介日常運作的過程則不贊一詞。對此，媒介社會學在意理、專業和組織方面的近距離研究，業績豐碩，足以互補。舉其著者，甘斯(Gans, 1979)教授指出，美國新聞界的客觀信條其實深植於一組中心價值之上，包括文化自我中心、利他的民主、負責的資本主義、對小鎮田野的嚮往、個人主義和溫和漸進。美國媒介以此出發看世界，它們的成就與限制也盡在於斯。塔克曼(Tuchman, 1978)用現象學的濃筆栩栩如生描述媒介組織怎樣與社會上占據中心位置的機構聲氣互通，利益結合，新聞採編的周期配合政府單位的作息和財團勢力的脈搏，以及新聞價值內化成為記者的工作規範。吉特林(Gitlin, 1980)用霸權理論詮釋主流媒介用什麼框架(frames)去醜化60年代的學生運動和反戰運動，哈林(Hallin, 1986a)細緻地檢查媒介如何報道越戰，均遠比喬姆斯基的分析鞭辟入。在國際方面，文化批評界巨擘薩伊德(Said, 1981)提出「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建構，其轉折多致更非一般政治經濟分析所能企及。

### 媒介霸權與解讀

最後不免要觸及文化霸權的問題。傳播研究始終在媒介霸權與反霸權之間徘徊。喬姆斯基(還有很多政治經濟學派的人)主張：誰擁有媒介的產權，或誰能上媒介發言，誰就能夠製造意理霸權。許多實證論者長



期以來卻強調，視聽大眾受到林林總總的心理和社會條件所中介，不會無條件當媒介子彈的靶子，可惜此派的着眼點多半局限在體制以內，對於社會權力結構的宰制與支配缺乏深刻分析。依照威廉姆斯的慧見，主流的支配性意識形態必用盡方法，時時刻刻有選擇性地吸納或收編另類和敵對的意識形態(Williams, 1977: 112)。最近，有些批判性的文化學者受到後現代主義學派的影響，鼓吹受眾從各方面去解讀主流媒介的支配性信息。他們宣稱，文化背景的差異(如社會形成、階級、宗教和年齡)使媒介信息的解釋獲得「多元歧義」(polysemy)，大凡支配性的信息都可能被顛覆為另類的乃至敵對的意義(譬如Fiske, 1989)。以上這些觀點正逐漸滲透合流，儼然向霸權理論提出修正或發出攻擊。當然，強調受眾的自主性可以彌補傳統霸權理論中一些「全體性」(totalistic)的武斷意味，但就怕走火入魔，馴至以為世界上果真沒有支配，即使有也可化解它。有些浪漫的新左派在邊緣性的弱勢團體找到答案，一如當年的老左派在無產階級身上看到前途一樣。邊緣團體沉醉在若干非主流的通俗文化裏(如香港有些青少年的「無厘頭」音樂)，明明是淹沒於文化消費的商品堆中，居然硬被說成顛覆體制。歸根究柢，他們顛覆了什麼，解讀了什麼，改變了什麼支配性的權力關係？說來可憐，有些「前進」的知識份子因為政治無能，只能意淫文化逃避，又美其名為「解讀」，這樣一廂情願，真是對激進政治莫大的褻瀆。



## 超越東方主義話語

薩伊德、亞洲媒介、民主化<sup>1</sup>

---

共和國是個夢。除非先作夢，甚麼事也不會發生。

——聖柏格(Carl Sandburg)

烏托邦把社會現實降為單一的原則；通常，就是理性的勝利。相反的，民主在本質上是反對烏托邦的。

——托瑞音(Touraine, 1997: 187)

亨廷頓(Huntington, 1991)用「第三次浪潮」來形容民主變遷，這個浪潮首先是1970年代始自葡萄牙和西班牙，然後在80年代初傳佈到拉丁美洲，接着又蔓延到亞洲各國。最不可思議的，莫過於90年代初共產主義政體在東歐和前蘇聯一一崩潰，全球冷戰終於宣告結束。傑出的社會科學作品往往是對過去或現在的事提供成熟的分析，但事過境遷這些年，媒介在這一波複雜萬端的民主變遷過程中扮演甚麼角色，我們知道多少？

媒介和民主化的關係是一個重要而微妙的課題。不同的社會理論提供不同的民主圖像。現有研究中殊少從宏觀角度看社會轉型中的媒介角色，而如文化人類學家紀爾茲(Geertz, 1973)所說的「稠筆描述」(thick description)，勾勒媒介與民主的內在關聯和分析來龍去脈者，良莠不

---

1 原載於 Chin-Chuan Lee(2001c), "Beyond Orientalist Discourses: Media and Democracy in Asia," *Javnost-the Public*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8, 2: 7-20. 張詠譯。

齊，充其量才剛剛起步。政治學家們(O'Donnell et al., 1986; Przeworski, 1991; Friedman, 1994)多半視媒介為民主轉型過程中的附帶現象，而不是主要的動力或問題，所以頂多輕輕一筆掠過。鞏舍和慕根(Gunther and Mughan, 2000)算是少數的例外，他們「紆尊絳貴」，選擇媒介為比較研究的主題；可惜取樣偏頗，逕以日本代表亞洲(民意測驗顯示，有一半日本人認同西方國家，而不是認同亞洲)，同五個穩定的民主社會(美、英、德、意、荷蘭)及另外四個「第三次浪潮」的範例(西班牙、智利、俄國、匈牙利)互比，鬆鬆懈懈，有點各說各話，沒有扣緊主題——這種取樣別說忽略了台灣和南韓可能提供的豐富涵義，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更在視野之外。另外，科倫和朴(Curran and Park, 2000)編了一本頗具前瞻但仍不完整的書，尋求傳播理論的「去西方化」(de-westernize)。他們提出的問題是：從穩固民主社會裏所生長的理論和見解，如應用於民主轉型的社會，極限何在？這就牽涉到理論的特殊性和概括性的緊張關係了。在這個論題上的英文著作，東歐和中歐研究(Sparks, 1998; Downing, 1996, Splichal, 1994)大致比拉丁美洲和亞洲研究更細緻；在亞洲則以中國吸引的學術關注最為熱切(如Zhao, 1998; Lee, 2000, 2003)，我們對北韓、越南、老撾、柬埔寨和緬甸的瞭解則簡直一片空白。

亞洲各地區的歷史和地理差異懸殊，應該粗略分為東亞、東南亞和南亞三部分，所以在概括「亞洲」經驗時，必須謹慎為之。這一期 *Javnost* 專刊登載五篇迥然不同國家的分析：中國、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本文應編輯盛邀為之引介。第一部分討論一些薩伊德(Said, 1993, 1994)概括為「東方主義話語」的理論概念。亞洲的媒介和民主化之間的關係本是辯證、複雜和互動的，但我們可能迷惑於類似「歷史的終結」、「自由民主」、「亞洲價值觀」、「儒家文化」和「文明的衝突」之類的東方主義話語，而將這種複雜關係化約為貧瘠的原教旨式概念。如果不超越這些東方主義的陳詞濫調，我們對亞洲的媒介和民主的認識恐難進一步發展。第二部分討論三個相關的問題，尤其着眼於

亞洲國家和美國在冷戰前後的交往，並以此建構橫跨亞洲媒介圖景的一個比較而概括的視野。

## 揭開煙霧

冷戰結束，福山(Fukuyama, 1992)提出「歷史的終結」的命題，宣稱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政治作為統治的體制，不但其合法性得到公認，而且成為「人類意識形態演進的終點」和「統治的最後形式」。這個歷史建構把西方自由民主神聖化和本質化，誇大其合理性，顯然遺忘了西方民主在歷史上其實包含威權主義的根源。一般總認為，西歐民主發展是政府不斷理性化的過程，是大眾參與政治參與不斷擴大的結果；但歷史社會學家提利(Tilly, 1975)的結論恰恰相反：西歐民族國家的形成乃是從徵兵和抽稅演變過來的，在本質上是榨取的、強迫的，和壓制的。西歐(主要是英、法)走上民主道路是歷史的偶然選擇，運氣好，這個過程不是必然的，其他國家也未必複製得了。回顧美國民主的興起，最早是為白人和有產階級爭取權利，而與被壓迫的女人和黑奴的權益沾不上邊。穆爾斯(John Stuart Mills)的《自由論》奠立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但那只是為大英帝國子民撰寫的，和殖民地(如印度)風馬牛不相及。還有，美國的自由民主毋寧伴隨着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而擴張，對內講民主，對外卻常採取徹頭徹尾帝國主義的霸道行徑。連馬克思這麼一位最激進的人文主義者，也曾認為黑人種族相對低劣，斯拉夫人和立陶宛人之間生來有種族差別(Feuer, 1969: 25)。話說回來，我們不能因為西方自由民主當初埋有威權主義的根源，就簡單化地宣稱當今的第三世界國家不需要民主。

福山認為，自由民主制度擊敗了二十世紀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座大山，成為歷史的終結點。這種直線分析是否正確呢？民主發展的過程充滿變數，隨時可能爆發衝突、鬥爭和變化，也可能出現反覆或轉折，似乎沒有福山所說的那麼平順。許多亞洲國家即使允許定期的精英

選舉，廢除政府的新聞審查，已具民主之形，但遠未確保民主之實。1973年、1979年和1992年，平素溫和的泰國民眾分別爆發三次示威游行，抗議政府控制新聞媒介，甚至兩度憤怒焚燒國家廣播電台，至今鬥爭仍延續未歇。同樣，菲律賓的「人民力量」1986年推翻腐敗的馬可仕政權，經過十幾年搖搖欲墜的民主統治，2001年再次風起雲湧(拜賜於短信和網站的組織力量)，推翻了另一個腐敗的艾斯特拉達政府。馬來西亞的當權者對西方民主沒有多大信心，總挑撥種族情緒，來維護馬來族的統治特權。當權者(無論是被驅逐下台的艾斯特拉達，還是由終身異見者當選為韓國總統的金大中)一着急就用查稅、緊縮廣告和商業投資等手段，報復尖銳批評他們的媒介。不同的團體、階級、個人和機構總爭辯不休民主是什麼。國內政治自由化廢除了政府的新聞檢查制度，但跨國媒介集團如影隨形，踏着經濟自由化的步伐，壟斷意見市場，形成另一種「市場審查」(market censorship)。韓國民族主義高漲，政府向來嚴密保護國內的媒介市場，如今卻為默多克成功進軍併購，可見政府和財團都是新聞自由潛在的蝨敵。民主是一個無止境的奮鬥過程，不是完全迎刃而解，也沒有一了百了(如福山所暗示的)，除非戒慎恐懼，否則民主可能得而復失。

### 民主與冷戰

自由民主在亞洲和其他地方獲勝，必須放到一個更大冷戰的歷史脈絡中來理解。美國的外交政策有兩個目標，一是反共，二是借「現代化」之名傳播資本主義民主。顯然，這兩個目標之中，以反共為主，民主居次。美國自稱是「西方文明的守護者」，「在世界各地矯正錯誤，追擊獨裁，保障自由，任何地方和任何代價都在所不惜」(Said, 1993: xvii)。在東西衝突中，華盛頓站在對抗共產主義的最前沿；但是在南北衝突中，美國發現自己為多數貧困國家所敵視，因為它們認為世界經濟和信息資源之所以分配不均，美國的霸權必須負首要的責任。70年代期

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導「國際信息和傳播新秩序」辯論，第三世界鞭撻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壟斷全球資訊的製作與流通。列根總統不耐煩，終於在1984年斷然退出該組織，英國和新加坡踵繼，這場辯論遂失去國際論壇，難以為繼，弱國和小國的微弱抗議只給強國和大國當耳邊風。美國以「民主」對抗共產主義，但它的「民主」顯然採取雙重標準：1970年代和1980年代，美中結盟對抗蘇聯，美國對中國的人權問題避而不談，但冷戰一結束，1990年代期間中國的人權問題立刻躍居雙邊關係爭論的焦點。

華盛頓置反共於民主之上，故在冷戰期間經常為右翼獨裁政權撈腰。鷹派政治學家兼駐聯合國大使克派翠克(Kirpatrick, 1982)為此辯護說，右派威權政體比左派全權政體更有可能轉型為民主政體。但此說在實證上並未形成定論。誠然，美國在它的勢力範圍內推行自由民主制度，如二戰後聯軍強制日本和西德效仿美式民主和新聞自由的制度，華盛頓試圖為異見份子(如南韓的金大中和菲律賓的阿奇諾)提供保護傘，此外還鼓勵威權政制在有限空間內發展媒介的多元。但這些都是在反共前提下的次要目標，部分為維護美國的民主價值和信仰，部分毋寧是為居中平衡那些國家不同黨派的勢力。儘管美國同情「體制內」的政治抗爭，但設若群眾運動威脅到其保護國的體制本身，則必遭美國堅決反對。

對多數亞洲國家而言，美國憑藉強大的政治和經濟力量，製造巨細無遺的文化和媒介形象，對外輸出現代化和「美國的生活方式」。美國官方信息部門通過出版物流通，贊助官員訪問、記者培訓，但更重要的是無所不在的好萊塢和媒介網絡傳播滲透，成就了獨特的文化霸權。換句話說，美國希望以自身形象作為樣板改變這些國家。菲律賓的自由報業傳統歸功於美國。美國的媒介專業精神(主要指客觀、平衡、不偏不倚地報導新聞)傳入亞洲各國，與當地新聞控制的背景格格不入；即使理想和實踐有差距，自由民主的理念已經寫進《聯合國人權宣言》，對韓

國、菲律賓、泰國和台灣的民主運動提供若干解放的力量。在反共的前提下，美國也施加民主壓力於若干亞洲威權統治，迫其打開政治和媒介的空間。

我們不可否認這些自由主義的正面影響，但是民主變遷的過程和原因比想像的要複雜、動態得多，並非直線發展，而是充滿矛盾和緊張。現代化理論(比如 Lerner, 1958)認為，經濟發展是政治民主的必要非充分條件，媒介為社會變革創造了有利的心理環境。同時，資本主義市場提供了「相對獨立於國家控制的社會區」(Berger, 1986: 79-81)。然而，在過去幾十年裏，我們看到韓國和台灣(還有新加坡)都曾假「現代化」和反共之名，行政治和媒介壓制之實，這恰恰應和了奧唐納(O'Donnell, 1978)關於「官僚威權體制(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regime)」的論述——為了經濟發展，一切以政治安定為先，於是壓制新聞自由成了合法合理。在這些國家裏，自由主義秩序獲得最終勝利的同時，市場卻為媒介集團化鋪路，取代政府成為宰制的來源。1998年亞洲經濟風暴由泰國爆發，擴及馬來西亞、印尼和韓國，媒介如何發揮「看門狗」的角色更是挑戰。亞洲國家在民主和新聞自由的發展到底符合現代化理論還是印證「依賴發展」(Evans, 1987; Gold, 1986)理論，仍無定論。

1980年代後期，中國總理趙紫陽的改革班子宣揚「新權威主義」，翻出亨廷頓(Huntington, 1968)二十年前發表的政治秩序論，引介到中國做理論根據。改革精英們援引南韓和新加坡的例子，聲稱政治穩定是經濟發展的必要前提。一部分人最初受馬克思主義激進人文思想的啟發，另一部分人則是受自由主義的影響，但他們對美國民主的理解都是既抽象又斷章取義。他們嚮往美國的民主制度，主要是因為他們對「解魅」後的共產制度深感失望。改革派在天安門悲劇後被清算出政治高層。從1992年起，中國擁抱全球資本主義結構，庸俗消費主義日益膨脹，貧富差距急劇增長，部分早期崇拜自由主義者轉為激烈批判社會者。資本主義在中國進一步發展，似乎將知識份子吸離了民主的社會關懷，而將媒



介扔入「商業大潮」。媒介商業化在非政治新聞領域中造成「消極自由」(negative freedom)，但民主卻遙遙無期。沿海城市的媒介積聚大量的財富，中產階級擁有一定的社會特權，但社會邊緣的農民和工人卻被媒介遺忘了。

### 亞洲價值與儒家文化

如今沒有一個政權敢否定民主和自由報業，儘管他們可能試圖曲解其真正涵義。印尼蘇卡諾的「指導民主(guided democracy)」和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異曲同工。韓國、台灣、菲律賓和泰國的當權者不得不考慮民眾對民主和自由報業的要求。李光耀是最雄辯、最堅定的「亞洲價值觀」的提倡者，他說在亞洲社會集體認同高於個人主權，和諧高於衝突，紀律高於自由。他同時強烈抨擊西方媒介。但是究竟什麼是「亞洲價值」？如果「亞洲」是一個統一的歷史、地理、文化的實體，所謂的「亞洲價值觀」(相對於非亞洲價值觀)或許還有些道理，但如不進一步在特定的情境解釋，這個概念就嫌空洞無當。事實上，亞洲各國的實際情況如此不同，何必泛泛把「亞洲」當作為一個整體的概念？泰國和菲律賓對亞洲價值觀的認同與韓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認同可能殊異。而且，新加坡怎能代表整個亞洲？

下一步，我們得問：誰擁有話語權？是掌權者(如李光耀)有話語權，他們壟斷主流的闡釋，排斥另類和敵對的解釋。他們建構的主流闡釋假定歷史一成不變，以致壓抑歷史變異的一面，凍結區域、國家和各種次文化的多樣性，弱勢群體的聲音更是渺不可聞。香港末任總督彭定康曾批評李光耀是「威權政府雄辯的倡導者」，既不屬於亞洲價值，更不符合儒家精神。他說：「為什麼我們要假設李光耀是亞洲價值的化身，而不是安山素姬或李柱銘呢？」(《華盛頓郵報》，1997年6月25日)。李光耀不啻為北京在香港威權統治辯護。但英國在香港殖民統治長達150年，居然在主權移前夕才匆匆推行民主政制改革，是不折不扣的

偽善。如是，所謂的「亞洲價值觀」便是典型的「東方主義」話語。歷史文化所呈現的現實是多變的、具體的、交織的，甚至矛盾的，「亞洲價值」把它化約為鐵板一塊的整體，突出「我們」與「他們」的對立，為威權統治服務。

有壓制，就有反抗。無論在韓國、台灣、菲律賓或泰國，政府的高壓導致民眾的抗爭，而新聞自由總是抗爭的目標。在新加坡，李光耀個人魅力把他的統治意識形態轉化、馴化為日常生活實踐中的公眾意識和媒介輿論，以致把順從權威看作理所當然。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還有其他人，都躍躍欲試，卻始終未能奪走李光耀的意識形態領導權。這些「亞洲價值觀」的論調自以為是，傲慢，反自由，和若干美國「中國通」聲稱民主不適合中國或與中國文化格格不入的論調如出一轍。他們不願承認，民主理想雖然源自西方，制度性的表達方式容或有別，但民主的理想已經成為全世界、全人類共同的願望。不論在李光耀之後「亞洲價值觀」還有沒有生命力，類似的本質化解釋還會以不同面貌出現。

現在連帶說一說「儒家文化」。韋伯(Weber, 1964)最早論斷：清教徒倫理促成資本主義在歐洲的興起，而儒家卻阻礙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最近在一個會議上曾有一場激辯：儒家文化是不是罪魁禍首，阻礙了韓國和其他國家獲得全面的民主和新聞自由？我要強調，任何思潮或倫理(如儒家)在東亞各國實踐數千年，必然是多面向、複雜的，而且必然經過地方化的洗禮，不能化約為孤立或靜止的特質。儒家不是一成不變的歷史和文化整體，而應恰當地解構成不同的面相，以便聯繫到其他因素建立因果關係。韋伯學派的社會學家勃格(Berger, 1986)區分俗世(secular)儒家和國家(state)儒家。他認為，後者定官方意識形態於一尊，箝制活潑多元的思想；但俗世儒家尊重教育、家庭，強調勤勞節儉等工作倫理，創造出異乎西方資本主義的東亞資本主義。如果費正清(Fairbank, 1979)認為中國的共產主義是穿着列寧制服的儒家，狄百瑞(DeBary, 1983)和杜維明(Tu, 1991)則在儒家裏重新發掘自由主義的傳統。

當然，這種以文化為主的解釋一直受到制度學派的挑戰(Friedman, 1994)。我認為，東亞資本主義應是引進的資本主義制度和廣義上的儒家文化之間的辯證互動的結果。

冷戰結束，中美對抗蘇聯的戰略結盟隨之瓦解。西方媒介和部分知識份子描述中國為旭日初升、對美國形成潛在威脅的政經力量；中國取代蘇聯成為美國的敵人。與此類似，亨廷頓(Huntington, 1991)認為，冷戰的兩極關係已經被西方、儒家、伊斯蘭等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所取代。對他來說，中國向中東地區的「流氓國家」出售軍事武器，是儒家和伊斯蘭文明夢囈式、反自由的結盟。這樣的解釋有很多問題：中共政權是反儒家的，這筆帳為何算在儒家頭上？儒家文明一定反自由主義嗎？美國軍事武器擴散全球，為什麼沒有人說這是西方文明的內在特徵？亨廷頓似乎將儒家等同於北京的政治中心。而新儒家杜維明則認為，即使政治中心在北京，媒介和流行文化的創新卻始於政治邊緣的台灣和香港，而後擴延到大陸。薩伊德(Said, 1994: 347)的論述最有說服力，他認為文化和文明混雜在一起，差異很大，又「互相關聯，互相依賴，很難單一或簡單地勾勒它們的個體性。」

總之，「儒家文化」要成為有效的分析單元，至少必須有力解釋哪些特徵是「非儒家文化」所不具備的。假如層級分明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特徵，那麼在非儒家文化中是否就沒有這個特徵或較微弱？更進一步，「儒家文化」應具有解釋因果關係的能力：如果X這樣，那麼Y就應當那樣。例如，儒家文化(哪一種?)解釋新聞記者的腐敗，它通過怎樣的因果機制發揮負面影響？受儒家薰陶的韓國記者收入頗豐，他們拿紅包，非儒家傳統的菲律賓那些窮記者也拿紅包，這個惡習有何不同？如果儒家是罪惡之源，何以韓國和日本記者的賄賂(通過嚴密的記者俱樂部)，反而比香港和台灣這些華人社會還猖獗，還全面制度化(我想，韓國賄賂的惡習是從日本引進的)？同樣，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華人眾多，其媒介實踐的異同何在？提出這些簡單問題可免於陷入化約的概念陷阱。

## 重新聚焦

本文的第二部分將強調三個問題，是理解亞洲媒介和民主化過程的基礎，也是未來做比較研究的起點。

**民主本質** 在穩固的西方民主社會中，人們已經厭倦宏觀層面的代議民主制度，把精力擺在日常生活的微觀政治(Dahlgren, 2000)。這在亞洲是一種奢談。多數亞洲國家的代議民主制剛剛起步，經過多少抗爭，犧牲多少生命，多少人身陷囹圄。台灣媒介是社會運動最大的獲益者，韓國、菲律賓的媒介工作者走到抗議活動的最前沿。亞洲民眾推翻威權政府，建立選舉制度，媒介逐步脫離政府控制，漸漸樹立專業自主的理念。政府若有能力在制度框架中化解民怨，民眾抗爭將會減少，否則新的權力結構仍將面對由下至上的挑戰。

在代議制民主中，主流媒介的意識形態代表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我們不禁要問：媒介是否呈現邊緣團體的聲音？它們能上媒介公開表達意見嗎？只有穩定的中產階層占人口大多數，代議政治和媒介才可能真正發展。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很小，很扭曲，他們犧牲窮人的利益獲得社會特權。馬來西亞華人多屬富裕的中產階級，但政治和媒介聲音微弱。無論杜威或哈伯馬斯，都批評代議民主的缺點，他們強調大眾參與式的民主(popular-participatory democracy)，認為民主不是權勢者的專利，凡是公民——不止中產階級，還有弱者和邊緣群體——都不應該僅僅被動當精英政治的旁觀者，而應該積極參與公共話語，積極參與媒介內容的生產、分配和消費。理想主義可能背馳現實，當民主化漸漸消蝕威權統治，大眾開始失去政治激情，注意力轉移到消費需求。在消費者和公民的辯證互動中，媒介究竟扮演什麼角色？

在所有全民參與的民主制度中，沒有比毛澤東的群眾路線更激進、更浪漫的了，無論在政治生活或媒介實踐上，都徹底反組織，反立法，反專業主義。問題是毛澤東的政策恰恰導致了前所未有的大獨裁——中

國這個大國不通過政治自由和媒介基礎，如何實現民主？然而，毛主義終結，參與式民主卻未死亡：泰國人為控制社區媒介而鬥爭，菲律賓人利用小媒介(手機短信和網絡傳播)來組織社會運動。新媒介強化支配，也可以幫助反支配。

亞洲民主並未完全穩固，我們必須研究主流媒介如何與代議政體和民眾運動互動。證據顯示，精英不能達成共識時，或民眾抗議的聲音響亮到無法忽視時，媒介往往介入其間，扮演促進民主的角色。一旦權力結構重定，媒介很快回到重建的官方話語上去建構。如將焦點擺在精英整合、分裂、重整這幾個關鍵時刻，當可判斷大眾話語場域何時擴大，何時縮小。我們應關注媒介和其它公共領域的競爭場域，以及那些被邊緣化了的聲音。同樣，我們應當探討主流媒介和激進、另類媒介(如小電台、低成本的政治刊物和互聯網)如何互動，看它們如何互相競爭、合作和互相滲透，以及另類媒介如何被邊緣化。在台灣，那些打游擊的政論刊物曾是民主運動的旗手，但建立民主制度之後，有線電視普及，編輯自主權擴大，政論刊物反而失去存在的理由。反之，韓國的異見記者在民主變革中創辦了激進的《韓民族報》(*Hangarae Shinbum*)，繼續監督政府、商業機構和主流媒介。

**市場角色** 在多數亞洲國家裏，政府採取「國家統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與媒介建立「侍從關係」；政府透過公開的政策和種種暗盤措施，把媒介資源開放給小圈子內的盟友，鞏固意識形態，保證雙方利益整合。屈從於政權的媒介享受巨大的經濟利益和政治特權，敢於向權力結構挑戰的注定被無情壓制。

市場力量是正面的，讓政府以外的其他聲音聽得到。市場競爭促進媒介多元和專業主義，開創意識形態的空間，抗衡赤裸裸的獨裁政權。提若尼和桑克爾(Tironi and Sunkel, 2000: 191)研究智利時提及：「皮諾切自由市場的哲學擴大了經濟自由與政治領域的限制，其間的矛盾變得不可調和」。換言之，既然走自由市場的路線，其他領域也非跟着變不

可。他們的論述需要放在不同的歷史情境實考，但可用來解釋中國暗地接受資本主義的市場邏輯，對媒介實踐產生了深刻而矛盾的影響。為了論證市場化的複雜角色，我們可以比較中國與俄國、東亞與東歐和中國、東亞與東南亞，也可以比較亞洲或歐洲內部的不同國家。

媒介擁有權形式的互動也很重要。當官方媒介逐漸喪失公信，國家吸納成功的商業媒介於權力圈裏。即使這些商業媒介屈服於當局，有時候商業利益還是會和黨的利益背道而馳，此時媒介必須偏離官方話語場域，批評政府的政策。它們通常敵視反政府的抗議運動，但一直力倡抽象民主的價值而不懈，所以市場力量直如一刀之雙刃。另外，邊緣的商營媒介有自己的定位，它們報導社會運動，也對抗主流商業媒介的話語；特別是激進媒介，受眾群小，卻公開動員反對力量，追擊那些被政府籠絡的商業媒介，逼它們講真話。諷刺的是激進媒介可能是民主化的第一個犧牲者：民主化解開了主流聲音的禁忌，天下沒有獨裁政權要抗爭，人們對政黨政治轉趨淡漠，甚至覺得民主力量阻礙他們世俗的追求，激進媒介完成歷史使命遂退出舞台。

顯然，一個已經高度發展的市場可能從解放的力量變為反動的力量，將話語權集中到大的媒介集團手上，而限制了其他聲音。在民主新興的亞洲國家裏，國家權力已被削弱，但仍占主導地位。國家必須與市場討價還價，既合作，又鬥爭，形成一種交叉、辯證、流動甚至模糊的新型關係，對媒介擁有權和新聞自主有深刻的影響。我們得研究：國家和市場關係的重構如何影響媒介的民主角色？誰是新的贏家和輸家？在多大的程度上，商業動機和割喉競爭會使媒介變成反民主？商業化媒介的內容一定變得冷漠、「去政治化」和「小報化」麼？邊緣媒介會更邊緣化嗎？最後，冷戰後政經全球化，這些問題超越民族國家的自主範圍嗎？

**全球性和民族性** 冷戰意識形態已，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的全球化貿易體制取代，為鬆綁管理、自由貿易和新的科技傳播營造了單一的全球市場。有人說，現在商貿就是政治，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歐洲共

同體就是顯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在處理亞洲金融危機時的角色，生動說明國家必須同全球結構打交道。韓國經濟衰退，加上傳播新科技推波助瀾，政府不得不開放有線電視和電信市場給跨國財團。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譴責索羅斯(George Soros)利用新科技衝擊該國金融市場。而在香港，默多克的衛星電視向中國和印度輸出了一系列以「全球化」為包裝的形象。

共產主義在中國已經破產。國家資本主義如果不能維持繁榮，政府的合法性將會受到嚴重挑戰，因此當局竭力在媒介鼓吹國家民族主義。媒介動不動以中國的經濟成就對比蘇聯的破落崩潰，流露民族的驕傲；同時，媒介又敲着邊鼓灌輸民族危機感，儼然「敵人就在那裏」，等着毀滅中國，彷彿中國已陷入國際敵對勢力的重重包圍中。然而為免重蹈歷史覆轍，政府小心翼翼，控制民族主義情緒的火焰，生怕它掉轉頭來反對政權本身。

中國媒介大張旗鼓，宣傳加入世貿和主辦奧運是中國「走向世界」的象徵；中國由於經濟和軍事力量上升，特別渴望獲得國際地位。然而，對加入世貿後農民和城市工人大量失業的圖景，媒介只一味輕描淡寫。同時，華盛頓的對外政策也不變，從冷戰時期封鎖共產主義，轉為後冷戰時期推進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美國媒介支持中國入世，藉以督促北京遵守國際法則和全球市場規範。為了加入世貿，中國政府不得不對外資開放電信市場。為了將來能與進入中國的外國媒介競爭，政府吸納核心和盈利的黨報組建媒介集團(Zhao, 2000; Lee, 2003a)。互聯網在中國迅速發展，論證了科技、商業和意識形態的互動關係。

在日益全球化的過程中，國家主權有多重要？在後冷戰時期會有哪些新的挑戰？全球化過程將如何影響電信業，進而影響傳統的大眾媒介？新科技發展的信息以及貿易全球化，會鬆動中國政府對新聞流通的控制嗎？大國(如中國和印度)是否比小國(如尼泊爾和斯里蘭卡)就更有資

本和條件應付全球化的挑戰？

或許，我們還可以問這些問題：媒介文化在全球化發展的過程是混雜的，媒介擁有權國際化、媒介形象的跨國傳播，一定會產生全球文化的同一性嗎？如是，文化創新和文化多元如何表現在全球化媒介？非西方國家可以引進西方媒介的標準和技術，來發展本國的特色文化產品麼——正如俄國電影工業，寄望借此回到1930年代的藝術電影黃金時期？全球化和民族國家的聯繫，現代性與傳統的接軌，其極限何在？我不一味看好全球化，倒是祈望看到更多更好的研究互相爭鳴。



## 中國媒介的全球性和民族性

話語、市場、科技以及意識形態<sup>1</sup>

---

富裕的媒介，貧瘠的民主。

——馬克切斯尼(McChesney, 1999)論全球性跨國媒介集團

鮮活的霸權恆是一個過程。……它必須不斷地被更新、再生產、保衛和修正。同時，它也不斷地受到它本身以外的壓力所抗拒、限制、改變和挑戰。

——威廉姆斯(Williams, 1977)

冷戰結束後，中國媒介一直糾纏於民族主義和全球化之間。自從在天安門事件中迷失政治方向，中國不得不擁抱資本主義以挽救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和民族主義取代了破產的共產主義，為政權的合法性提供新依據。另一方面，中美聯合對付蘇聯的策略結盟隨冷戰結束而瓦解，天安門事件更使美國振振有辭地抵制中國。1990年代中期，美國的對華政策有幾次轉向，先從圍堵逐漸變為來往，又從來往變為企圖將中國納入全球化的軌道，以便促進中國的「和平演變」(Lee, 2002a；本書第六章)。儘管中美時陷對立的僵局，中國卻擁抱資本主義，渴望加入世貿組織和獲取奧運會的主辦權，以提升它在新的國際秩序中的地位，乃至於跨進國際「精英權力俱樂部」的門檻。

---

1 原載於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2002年2月號，第69期，頁71-82，張詠譯。Chin-Chuan Lee (2003a), "The Global and the National of the Chinese Media: Discourses, Market, Technology, and Ideology," in Chin-Chuan Lee (ed.),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London: RoutledgeCurzon, pp. 1-31.

民族主義和全球化是矛盾的統一，既共存又競爭。本章旨在討論兩個主題。第一，它們之間的關係如何形塑中國媒介的生態、話語、市場和意識形態？第二，在「國家利益」的口號下，中國社會各股力量或競爭或聯盟，以爭取社會優勢，媒介如何展現這個過程？具體說，我想把這兩個主題貫穿於以下六個子題：

- (1) 中國媒介如何發動反美的浪潮，展現強烈的民族自豪和國家認同，以贏得媒介的市場利潤？
- (2) 經濟改革使中國的階級結構發生巨變，社會集團的利益差別加劇，中國進入世貿組織後，農民和工人首當其衝，承擔劇痛，媒介話語如何關注他們的困境？
- (3) 政府所推動的媒介集團化能否與跨國資本競爭？
- (4) 中國媒介和電信市場迄未開放給外國和私人資本，入世對國際資本占領中國市場有何影響？
- (5) 中國媒介和記者在意識形態上如何應對政經現狀？信息科技的發展對媒介的結構和意識形態有何影響？
- (6) 各知識陣營(自由派、老左派、新左派，加上馬克思主義的改革派)在媒介上激辯，他們如何定位中國在世界與民族之間的主軸？

## 民族驕傲和全球政治

中國當今已經沒有共產主義，只有共產黨。這個黨失去了革命理想，卻壟斷着巨大權力和資源。中國人厭倦了宣傳，對黨八股漠不關心，或半帶嘲諷，或陽奉陰違。只有國家主權受到外來威脅時，官民才會合流，形成侵略性很強的「愛國民族主義」，以致國家和民族的界限模糊(Chang, 2001: 182)。官方宣導的民族主義和民間湧現的民族主義在媒介上面匯合，處處充滿了集體犧牲的歷史回憶，仇外又自憐，彷彿中國正再度被潛在的敵人重重包圍。難怪在一連串危機事件中(包括美國轟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雙方在人權、經濟和台灣問題的歧見，中國

間諜偷竊美國核武資料案，以及中美海南撞機事件)，中國媒介總是認定美國為真假敵人。同時，與民族情緒相對的(其實也是合拍的)則是中國渴望提升其國際地位，這從媒介拼命宣傳「申奧入世」成功可見一斑。

### 兜售民族主義

聚焦「他者」能夠轉移注意力，淡化內部不滿的情緒。民族主義多半由國家政權所界定，以致「我們」和「他們」壁壘分明，一方面強化恐外仇外的情緒，一方面壓制民族內部(如西藏和台灣)或泛民族(如泛中亞)追求不同的身份認同。唯因民間的民族主義是自發性的，太亢奮時難以收拾，甚至鞭撻官方的外交政策太過委曲求全，所以官方企圖把它限制在既定的軌道上，以免脫韁而威脅其他的政策利益。這種民族情緒還可能掉轉槍口，對內瞄準政權的腐敗。民間的網絡聊天室裏，有許多人罵總理朱鎔基是「賣國賊」，對美國「太軟弱」。在國家政權內部，宣傳部門和軍隊對美國的態度強硬，但外交和外貿機構則主張修好。歷史上，仇外情緒總是和內政虛弱有關(Liao, 1984)，目前中國民眾大量失業，官僚腐敗橫行，如果處理不當，難保不會觸發政權危機。

中國，甚至全世界，對美國的態度一直愛恨交加。美國內部可能民主進步，對外卻傲慢自大，我行我素，甚至是橫行霸道的(Herman and Chomsky, 1988; Nye, 2002; Said, 1981)。為什麼中國從80年代的「崇美」轉向90年代的「反美」？我認為，冷戰結束和天安門事件置中美關係於衝突的境地，中國成為美國領導新世界秩序的絆腳石，中國的人權問題也成為美國政治和大眾媒介的焦點。北大學者戴錦華(Dai, 2001)形喻中國在80年代渴望美國的愛，到了90年代因為失寵而轉為哀怨。如果把她的比擬伸展一下，可以說80年代中國只是美國追求的對象之一，但中國似乎把美國當成唯一的戀人，一旦失戀痛苦更巨，美國從天使驟變成魔鬼。這兩種內外因的解釋可說相反相成。

90年代期間，媒介為香港回歸製造民族主義的奇觀，並因此獲得巨

大的市場利潤。媒介一再宣傳香港回歸是民族主義的勝利，不但象徵中國共產黨擊敗西方帝國主義，也標誌台灣將在鄧小平的「一國兩制」下回歸祖國懷抱。這種化約和本質化的敘述，顯然忘卻了毛澤東在50年代為了反抗西方封鎖而刻意留下香港這塊殖民地，甚至不惜和二戰以後民族自決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馳。社會主義祖國高唱民族獨立，卻在家門口姑息腐敗的資本主義殖民地，70年代初中蘇交惡時曾因此遭莫斯科奚落。中國媒介從不承認英國在香港的治績，更不回答港台對一國兩制的疑慮(Lee et al., 2002)。

在中美撞機事件後，連官方的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都想打政策的「擦邊球」，利用民族情緒獲取商業利益。但民族主義的調子不僅僅是黨的意識形態工具在唱，更重要的是國家民族主義隨着戲劇化的事件滲入了大眾意識。中國愈富裕，愈自我中心，對政治愈冷感，也更易於接受狹隘民族主義和反美話語所左右。兜售民粹式民族主義既安全又賺錢，受市場驅動的媒介(特別是小報)自然衝到最前面，製造聳人聽聞的民族主義話語。從90年代中期起，出現了像《中國可以說不》和《妖魔化中國的背後》這些歇斯底里的暢銷書，而且效者風起。它們反自由，反民主，心態狹隘又傲慢，斬釘截鐵地反西方，理性分析不足，感情用事有餘(見本書第五章)。

每一個與外來勢力(特別是美國和台灣)對抗、衝突和危機，都會被中國媒介趁機用來製作民族情緒的商品。試想如果《人民日報》的頭條報導海峽兩岸緊張，再帶上一張煽動的人民解放軍登陸作戰照片，當在國際上引發何等外交交涉和軍隊動作？幸而這種新聞手法並非出於《人民日報》，而是1999年6月登在屬下外圍的《環球時報》；當時李登輝宣稱中國和台灣是「國與國的關係」，《環球時報》為了遷就市場，似乎覺得有權聳人聽聞，不必顧政治後果。中國科學院出版的周報《科學時報》也不甘示弱，發表了一篇題為《解放軍的新型定向導彈能夠直搗李登輝的辦公桌！》的文章。

## 民族的面子：奧林匹克運動會

當中國經過長達15年的談判而入世，人們只覺解脫而不狂喜。2001年7月13日宣布中國取得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權，國家主席江澤民主持電視現場直播，反而舉國欣喜若狂。入世為中國政經帶來的改變必然深刻，奧運與一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無關痛癢，媒介卻把這兩件事渲染為中國在世界舞台崛起的象徵。奧運讓「中國走出去」，讓世界把「中國帶進來」。中國花了2500萬美元雇用國際公關公司包裝申請材料，預料將再花250億美元籌備2008年的奧運。城市富裕階層(特別是北京)在「國家利益」的名義下，將從奧運會中獲利匪淺。美國並不像1993年那樣反對中國的申請，理由是它想要以奧運推動中國的民主改革。美國的一位評論員嘲諷道：「如果你讓流氓參加紳士的遊戲，他也會學點文明的禮儀。」

正如達揚和卡茲所說，體育是「媒介事件」，是一種儀式性的政治，「表達了對團結一致和民族融合的嚮往」(Dayan and Katz, 1992: 8)。在中國，奧運提高當權者的地位，整合社會團體，因為所有的眼睛都「聚焦在儀式的中心」(Dayan and Katz, 1992: 15)。奧運會其實是「行事曆新聞」(calendar journalism)，老早計劃在前，一路培養宴樂的氛圍，以吸引眾多觀眾，但調子定於一尊，壓制非主流對歷史和現實的闡釋。可以想像，中國希望利用這次電視奇觀，讓世界看到中國的「進步」，爭取中國在世界「應有的位置」，於是個別運動員的競技場變成各國的特展會。中國必將不惜代價，培養一支進軍世界的參賽強隊。

作為奧運會的暖身，中國國家足球隊首次進入2002年世界杯決賽圈。這個消息擠掉美國對阿富汗宣戰的新聞，成為各報的頭版頭條，與入世、申奧同列三大盛事。正如朱迪(Polumbaum, 2003)所說的，奧運會從準備、上演到餘波，都包含「全球化」元素。奧運會是個集中的舞臺，通過先進的電子科技，讓不同地區和國家交流人力、物力、資源、

形象和消息。在地方的意義上，北京從上海搶回優勢；在國家的意義上，中國增強自我認知，提高它投射到世界的身份；在國際的意義上，則象徵了中國在全球權力關係中往上爬。她認為，北京當局會利用新聞媒介宣揚，由於奧運會必須注入大量金融和科技，故將促進中國現代化的步伐。當然，它也會粉飾太平，避而不談中國社會日趨嚴重的不平等和階級分化。為了向世界權力中心傳達資訊，中國將會通過開幕式、閉幕式，以科技和公關手段，來形塑外界的報導。給北京主辦奧運會，對國際奧林匹克組委會一舉兩得：既可表現對亞洲和發展中國家的慷慨，又可借機拔出它本身的醜聞，恢復國際精神的奧林匹克神話。自從1984年在洛杉磯開始，奧運會已公認為發展商機的金礦，北京會實現並擴大這個「美麗的傳說」。此外，希望奧運會為中國擴張國際貿易、旅游、勞力輸出和資本流動，但這是一把雙刃劍，奧運既加速中國融入世界體系，也要求它遵守全球經濟的遊戲規則。

### 進入世貿組織：贏家與輸家

全球化有支持者，有反對者。諾貝爾經濟學的得主阿瑪蒂亞·森 (Amartya Sen) 說：「如果它是公平的，那它就是好的」(Sen, 2001)。他認為，全球化是「無法逃避，也沒有理由逃避」的進程，違反全球化的聲音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但他們的疑慮必須受到重視。全球化是不均衡、有選擇性的發展，一些國家受益，另一些則未必。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反對「普適化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 of the universal)」，也就是把一個特殊(指美國)經驗擴張成全球的標準模式，主流國家轉化不平等的國際權力關係為遊戲規則，自己受益，貽害別人(Bourdieu, 2001)。艾姆斯登(Amsden, 2002)說，世貿組織雖說應該公平競爭，但少數富國控制國際組織和全球市場，利用漏洞設置貿易障礙，將不肯變通的規則強加到窮國頭上，阻擋它們進入世界貿易體系發展。

中國官方對世貿組織的態度格外熱情。以前中國關心全球化的公平性，關心世貿組織帶給國內經濟的負面影響，如今這些彷彿不是問題了。世界銀行的研究顯示，地球上約有20億人(包括非洲和穆斯林國家)愈來愈不全球化，另外30億人(包括中國、阿根廷、巴西、印度和菲律賓)屬於《經濟學人》所稱的「低收入的全球化國家」(*Economist*, 2002, 2, 2: 66)。對中國而言，入世和主辦奧運會的意義遠在經濟得失之上，而關乎民族尊嚴和國家榮譽。在入世的過程中，中國媒介順着官方的調子，反覆宣傳入世會給中國帶來一大筐的好處，困境是短暫的，可以克服的，甚至可以化困境為機會。媒介把中國描繪為全球化進程中的勝利者，入世是「雙贏」，卻始終不曾解釋中國為什麼要割斷社會主義的過去，要擁抱全球資本主義。政府壓制反對入世的聲音，並用傳媒喉舌為政策唱頌歌。中國表面上沾沾自喜，其實底子裏緊張，這在朱鎔基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報告上表露無疑。<sup>2</sup>中國入世成定局以後，媒介開始分析機會與挑戰，但基調仍強調利大於弊。

即使中國能從世貿組織獲得應得的利益，但國內哪些團體、行業和階層是贏家，而哪些將付出代價？媒介在描述全球格局中的中國，總是使用高度化約和抽象的話語。國內的發展其實相當失衡，入世的受益者主要是正在抬頭的消費市場、城市中產階級、服務業和外資企業，而將農民和工人排除在外，但媒介卻構築了一個如同趙月枝所謂的全民「消費者天堂」的海市蜃樓。中國現在的「劫窮濟富」，與毛澤東的「劫富濟貧」恰恰相反，致使中國社會和經濟發生巨變，階級對立加劇。市場鬆綁，政府推卸責任，不再為窮人和弱勢群體提供就業、教育和醫療保險的安全網。如果市場是一隻「看不見的手」，它就只認得「適者生存」中的適者。

2 據《紐約時報》(2002年3月6日)報導，朱鎔基在報告中說了100多次「應該」、「必須」提高農民和工人的收入，但完全沒有提到具體要怎麼做。該報(2002年5月15日)又說，中國最富有的兩成人已幾乎佔有總收入的一半。

在這個半資本主義的賭場裏，中共背棄了傳統支持者(即城市工人和農民)，逕向日據優勢的城市工商和專業階層靠攏。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調查顯示，工人和農民已經跌落到新階級結構的最底層(陸學藝，2002)。中國農民約占全國人口的70%和勞動力的50%，他們的收入從1997年開始急降。更糟的還在後頭：官方估計，入世後七年內，會有1000萬農民失業。工人方面，1996年至2001年，國有企業裁員3500萬人，政府控制的集體企業「下崗」1600萬人，入世後另有3000萬工人也將失業。知識份子和學生一向最不满意政府，現在工人和農民的不滿則猶有過之，每年都有成千次的抗議、罷工和抗爭，原因從單位或政府不支付津貼、官僚腐敗以至於工作危險都有。

在「國家利益」的帽子下，入世好像變成自然的、不可避免的過程，各地方、行業和階層都無由置喙。馬克思說，統治階級通過霸權的意理工具將特殊階級的利益概括為普遍的利益。連《工人日報》和《農民日報》都一味聽命於黨，而不是為工農利益說話。在電視熒幕上，工農的身影愈來愈少，聲音愈來愈弱。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的氣象播音員2001秋天播送天氣預報時順口加了一句：「現在正是農民播種和秋收的繁忙時刻，我想說，你們辛苦了。」沒想到隨後幾天，收到上千個電話和感謝信，農民們說太久沒有聽到這樣的關懷了。中國知識份子和記者一向懷着精英情結，不信任老百姓的政治能力，甚至敵視工人和農民。不論黨的機關報還是市場取向的報紙，它們責備和壓制弱者的情結殊無二致，竟然要求工農擦乾無用的眼淚，充實技能，接受入世的挑戰。它們對於在西雅圖的反世貿抗議示威都只淡化處理。

### 國內媒介集團對抗國際資本？

冷戰後，強國解除經濟管制，資本主義飛躍發展，媒介集團跟着全球化。這些國際傳媒集團早就看中了中國市場，企望抓住其加入世



貿組織的契機，納中國於全球資本主義的軌道，把它「融入文明的世界」。這些媒介帝國通過橫向和縱向的兼併，囊括了所有的媒介形式，從電影、廣播、電視、有線電視、運動節目、音樂、家庭影院、出版、雜誌，一直到多媒介(Bagdikian, 2000; McChesney, 1999)。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媒介市場，大體瓜分成三塊：最大的美國在線一時代華納(AOL Time Warner)，迪斯尼(Disney)和維亞康姆(Viacom)占三分之一；四個名義上的「外國」集團，包括斐凡迪—環球(Vivendi-Universal)，貝塔斯曼(Bertelsmann)，新聞集團(News Corporation)和索尼(Sony)，占三分之一；剩下的美國媒介加在一起占40%(Tunstall, 1999: 64)。這些媒介巨霸把新聞看作另一種工業產品，而且新聞的利潤遠不及娛樂節目。嚴肅的新聞節目愈來愈麥當勞化和瑣碎化、信息娛樂化，小道消息和醜聞充斥，一味滿足消費者瞬間的感官快感。媒介集團既競爭也合作，合開子公司，共享利潤，共同製作產品，並交換地方媒介的產權，不一而足。

媒介全球化說穿了就是媒介美國化。美國是唯一真正跨媒介的全球出口商，英國僅在新聞領域有全球性的影響，其他西歐國家(法國、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更不足道(Tunstall, 1999: 2)。美國電影協會組織了中國貿易關係委員會，用媒介巨頭游說國會，要求通過對華貿易法案，絕非偶然。90年代媒介集團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運用政治手腕，拚命想打通中國市場，但這十多年多以來它們卻對外國(包括中國)的新聞愈來愈沒有興趣。邁克切斯尼(McChesney, 1999)寫了一本書，書名就叫《富裕的媒介，貧瘠的民主》(*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由於資訊高科技股票的泡沫化，全球媒介集團可能會減緩但不會阻止它們進軍中國市場的步伐。

全球性傳媒巨霸千方百計想打入中國市場，它們或結交權貴，或和當地公司聯盟，不斷尋求商機。中國允許香港的華娛電視進入廣東省，提供普通話節目給有線電視台。為了回報，華娛電視的母公司——美國

在線時代華納，答應在其所屬的紐約、休斯頓和洛杉磯有線台播出中國中央電視台的英語節目。<sup>3</sup>旗下的CNN為了打入中國市場，正在香港籌備製作中心。迪士尼也在香港建造主題公園，作為通向中國市場的大門。貝塔斯曼在上海擴大讀者俱樂部。默多克討好中國當局已有時日，他的香港鳳凰衛視(與中資合作)1998年覆蓋中國4400萬的電視家庭，約占16%，並吸引可口可樂和摩托羅拉等大廣告商。此外，中國批准30個外國電視頻道進入廣東，廣東成了全國的試驗場。外國頻道都將集中到一顆中國衛星來轉播，它們的節目沒有性，沒有暴力，當然也沒有新聞。有人一廂情願認為跨國傳媒公司會在中國傳播民主的價值。非也。跨國公司在中國為了減少成本，往往限制勞工權益，傳媒公司預計也會「政治正確」，不會捋虎鬚(Rosenberg, 2002)。它們講的語言不是民主，而是資本。

這些大公司發表公關浮詞，往往講好聽話，我們千萬不能逕自當真，以為它們在市場上大有斬獲。例如，1960年代ABC矢言建立衛星世訊(Worldvision)，覆蓋遍及亞非拉美，後來發現利潤根本太薄，終於無疾而終。現在一般又盲目樂觀估計中國市場的潛力。其實，所謂的「全球巨霸」是不是「全球」或「巨霸」都是問題：麥凡迪一環球擴張太快，涉務太廣，無法招架，幾致崩潰，並非傳聞中的「航空母艦」；而高科技泡沫化，迫使「美國在線—時代華納」(AOL-Time Warner)把「美國在線」剔除於公司名稱之外，科技商業種種誇誇其談盡付東流。須知這些公司架子搭得這麼大，彷彿「全球」毋遠弗屆，不是因為文化生產提高所需，而是貪婪鯨吞兼併所致。最有決心敲開中國市場的默多克，在中國苦苦經營了至少16年，還獲得當局表揚為「中國之友」，然而他在中國市場的進路始終停滯不前。因此，斯巴

---

3 華娛電視已經出售給李嘉誠的 tom.com。但中央台的節目仍透過時代華納的有線電視在美播放。又，因為受創於資訊高科技泡沫化股票慘跌，美國在線的「美國在線—時代華納」已易名「時代華納」。

克(Sparks, 2003)力排眾議，質疑這些跨國傳媒公司究竟對中國的興趣有多大。中國傳媒雖然發展迅速，但廣告量只不過是香港彈丸之地的兩倍，而且在中國賺錢的前景不明朗不穩定，背後總感覺到有一隻黨國的手在左右。

西方傳媒公司走上支配的道路通常是坎坷不平的，它們來到中國只能低聲下氣，不是頤指氣使。它們在中國特意選擇不同的市場策略：維亞康姆強調出售音樂和兒童電視節目給地方電台，新聞公司以發展衛星電視為主，時代華納集中於電影市場，而迪斯尼發展主題公園和卡通、體育節目業務。它們對出版報業都不感興趣，中國當然也不願讓渡言論喉舌的陣地。此外，我們不應該誇大西方傳媒公司在中國呼風喚雨的能力，而忽視日本、台灣和南韓在中下游電訊業的關鍵角色。全球傳媒公司短期內難於中國獲得巨利，只覺得無論如何必須留守等待，以防萬一。

中國的對策是「以毒攻毒」，效仿國外的媒介巨霸，組織由國家主導的傳媒集團，來應付全球化的挑戰(表14-1)。90年中期，中國批准第一個廣州日報集團，當時因為政府停止津貼媒介，所以把收入好的黨報當成海綿，吸收那些不賺錢的、混亂的、經常違命的「小報」和雜誌。此前，中國一直批判西方媒介給資產階級的集團統治所操縱。現在的新說辭是要以媒介集團擴大規模經濟，入世後和外資一較長短。截至2004年，中國已有38個報業集團，8個廣播電視集團，6個出版集團，4個發行集團，和3個電影集團。將來，政策上還會不斷走向媒介合併的道路。2000年成立中國廣播電視電影集團，把國家資源併在一起，涵蓋了電影、廣播、有線電視到互聯網，應有盡有。

表 14-1 中國的媒介集團

部門領域	集團	評注
報業	廣州日報報業集團(1996) 南方日報報業集團(1998) 羊城晚報報業集團(1998) 光明日報報業集團(1998) 經濟日報報業集團(1998) 文匯新民報業集團(1998) 深圳特區報報業集團(1999) 北京日報報業集團(1999) 解放軍報報業集團(1999) 四川日報報業集團(1999) 浙江日報報業集團(1999) 大眾日報報業集團(1999) 遼寧日報報業集團(1999) 瀋陽日報報業集團(1999) 哈爾濱日報報業集團(1999)	1998年，廣州日報報業集團擁有4億美元的聯合資產，年收入達2億美元。其中《廣州日報》的廣告收入占一半。廣州日報報業集團擁有13家報紙，4份雜誌，1個出版社、一個網站，還有廣告、印刷、報紙發行公司、連鎖超市、旅館、飯店和俱樂部等。 1999年，33家報紙的11億美元廣告收入，占全國的80%。
廣播、電視、電影	湖南廣播電視電影集團(2000) 上海廣播電視電影集團(2001) 中國廣播電視電影集團(2001)	中國廣播電視電影集團包括中央電視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和中國電影集團公司。它的固定資產240億美元，收入40億美元。
互聯網	中央電視台網站(1996)，人民日報網站(1997)，新華網(1997)，千龍網(2000)，東方網(2000)，南方網(2000)，報紙新聞網(四川2000)，浙江在線(2000)，Shun網(山東2000)，新浪、搜狐、網易。	千龍網是一家股份公司，包括9家北京的地方新聞媒介。東方網是由上海的12家新聞媒介聯合組建的。南方網由廣東新聞媒介組建。新浪、搜狐和網易都是商業網。

來源：紀寧(2001)，Sun, Xupei(2001a)，周偉(2002)。

中國媒介的暴利靠國家特權的保護，而非靠自由市場的競爭。如果說要靠規模經濟才能與國際資本競爭，問題是舢舨能否編成航空母艦？中國最大的《廣州日報》報業集團，比起外資還是小巫見大巫。更糟的，中國媒介集團都是行政指令和長官意志下的產物，造成浪費，低效率，工作重疊，高成本。它們在非媒介領域(如房地產或超市)的投資更

雜亂無章。中國廣播電視電影集團看似龐大，其實內部傾軋，官僚內耗。官方只是搬動機構，並未改變控制的機制。

### 「中國，我來了！」：國際傳媒資本搶灘

入世對中國傳媒的影響可分三環。首先，電信、金融和保險將首當其衝(李江帆，2001)。它們長期受惠於國家的壟斷政策，服務低質，卻坐收暴利。90年代，電信產業的利潤每年達33%，而第三產業平均利潤只有24.6%。其次受影響的是廣告、電影、出版、旅遊業，和資訊服務，市場潛力大，利潤較低(8—19%)。第三環是傳媒和電視市場，仍將門扉緊閉。

為了入世，中國做了部分讓步，承諾逐步開放媒介和通信市場(表14-2)。中國必須制訂與世貿組織條款接軌的具體法規，屆時將產生很多爭議。中國入世最初五年內如何應對外來的挑戰，必將影響長期的政策。官方希望利用新媒介科技來發展信息和知識經濟，又要保護和維繫意識形態。官方把媒介分成硬體和軟件。在信息基礎設施、服務條款和科技知識上，歡迎外國投資。那些看似「非意識形態」的內容也可以商量：迪士尼的ESPN和Viacom的MTV已打進內陸的有線台，中央電視台的體育頻道把麥克喬丹捧為最有名的美國人。外資可能投注於媒介廣告和管理。但中國無論如何不會放棄編輯權。新聞和電視是黨國的宣傳喉舌，也是賺取暴利的最後堡壘，將可免於外國競爭。90年代期間，新聞媒介的廣告收入增長平均每年35%，2001年總額達100億美元。摩根士丹力(Morgan Stanley)估計，投資中國媒介約需八年就可以回收——比醫藥、能源、銀行和建築的回報快得多(李永樂，2002)。儘管跨國媒介巨霸虎視眈眈，等待攫取中國的電視市場，黨國卻抓牢不放。中央電視台仍將保持領先地位，在2008年奧運會挖一個廣告的大金庫。喻國明(2002)預測，中國媒介廣告收入仍有空間生長，但不同集團的競爭抬高成本，會使增長率由每年的35%降到10%—15%。

表 14-2 加入世貿組織後外資在中國傳媒和電信行業的影響

部門領域	外國投資程度	政策改變
出版	中	時尚和休閒出版物將允許。
廣告	中到高	未來三到四年，廣告會開放，而後美國可能在中國建立完全獨資的廣告分公司。
有線電視	中	外國投資有線電視的基礎設施(但不是內容)很有可能更容易。
電影	中到高	進口好萊塢大片將由 10 部增加到 20 部。到 2005 年，每年將增加到 50 部，中美雙方平均分享其中 20 部影片的利潤。外國資本將獲許投資或整修中國的電影院，未來三年裏可以最多持有 49% 的股份。對電影發行(運輸、零售和售後服務)的限制會在未來三年裏解除。合作生產電影、VCR 和 VCD 將會被允許。
資訊科技	中到高	進口半導體、電腦、電腦設備、電信設備和其他資訊科技的關稅會在 2003 年前由現在的 13% 降到 0%。
電信服務	高	從中國入世起，外資獲許持有電信服務公司 49% 股份，兩年內將增加到 50%。
互聯網	高	美國公司將獲許投資網絡公司，也可以在網上提供內容，但必須合法，不能聯結到海外的網站上，或轉載海外的新聞資訊。股票上市需國家許可。
新聞印刷	低	進口木材和紙張的關稅會在 2003 年以前從 12-18% 和 12-25% 分別降到 5-7.5%。
新聞媒介	低	在世貿組織「優惠待遇」的條款下，新聞媒介不向外國開放所有權和操作權。
電視	中	投資地方電視可能被允許，但中央台不會被允許。進口的電視新聞仍可以通過旅游旅館和外國駐中國辦事處收看。

來源：Sun, Xupei(2001a)、李江帆(2001)、周偉(2002)。

中國的電影產業將成為全球化自由競爭的犧牲品。官方在 1995 年答應每年進口十部好萊塢大片，當時製片業和電影創作人員都寄望大片帶來更開放的創作氛圍。但好萊塢電影的到來恰與中國電影的迅速衰落同時發生(Zhao and Schiller, 2001)。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進口好萊塢電影將由每年 10 部加到 20 部，最後達 50 部。外資也獲許在中國建造和擁有電

影院。好萊塢估計，中國進入世貿組織後5年，電影票房將達10到50億美元，其後每年會增長15%(多維新聞網，2001年12月14日)。這些估計是否太樂觀，有待觀察。進口電影的數量其實不重要，因為大部分中國人不會到影院裏看好萊塢大片，只會買盜版的VCD和DVD——這些大片剛剛在美國放映，中國的大街小巷裏就有人廉價兜售了。短期看，盜版損害好萊塢片商的利益，但戴錦華認為，從長遠看，盜版餵養了好幾代中國觀眾的文化品味(戴錦華，2002)。

中國的戰場前沿在互聯網和電信市場上。雖然媒介由中宣部控制，電信領域主要是由經濟和金融部門管理。電信比傳媒多元化、市場化和全球化。中國後來居上，可以直接跳越過時的科技。美國商業部視中國為世界上第二大電信市場，未來幾年可能超越美國成為第一。<sup>4</sup>資料顯示，1991年到1999年，中國郵政服務增長375%，1999年達24億美元，同時期電信業更增長2,050%。1999年中國電信達376億美元。90年代，政府積極鼓勵外資投資於電信設備，輸入科技，卻壟斷了高利潤的電信服務。電信和互聯網市場都有長足的增長，外國競爭者將與政府的壟斷鬥爭。

中國市場潛力很大，電信基礎設施仍然落後。2000年，互聯網僅僅占全國1.4%的家庭，北京、上海、廣州和青島就囊括一半(DeWoskin, 2001)。中國想以調整、控制國內競爭來加強競爭力。僅2000年就發布了七個關於互聯網的條規，重申政府的權威，一再警告互聯網不能傳播非法(即批評政府)的信息或連接到「反動」的外國網站。政府和企業網頁故意侵占和瓜分網絡的空間，截至1999年底，約有1,000家報紙和200家廣播電視開設網站，但只有中央、省級和部級的媒介可以在網上發布新聞(Sun, 2001a)。上網報紙與印刷版本無異，在嚴格控制下，真正的公共話語的空間微乎其微。

---

4 <http://infoserv2.ita.doc.gov/ot/mktctry>。1999年美國輸出5.47億美元的先進網絡設備給中國，從中國進口15.5億美元的電信產品(主要是電話和答錄機)。

跨國媒介集團嘗試與中國地方上的電信網絡公司合資，或簽訂商業合同，但步伐未必隨着入世而加快。政府規定只許有一定資金和專業人員的公司營業，營業者多半黨政關係良好，自然支持嚴格的政策。新政策將如何依照世貿協議，規範電信領域的外國投資、合資和股票，目前尚未可知。無論如何，科技發展將繼續向中國加壓，總的趨勢會走向市場開放和價格改革。

### 話語、科技和意識形態

中國當局堅拒外資和私資控制傳媒。但媒介管理受到科技發展的影響，尤其互聯網和衛星勢將削弱官方控制資訊流通的權力。目前報紙政策上不准跨省發行，但有競爭力的報紙(如《南方周末》或《羊城晚報》)還是覆蓋全國，連《揚子晚報》也一直想「走出江蘇」。將來當局很難把新媒介限制在特定的地理範圍內。中國加入世貿後，媒介在國家和市場之間、國家和全球之間角色愈來愈重要。麥康勉(Barrett McCormick)和劉擎問：科技和全球化給中國媒介的意識形態和商業文化帶來什麼影響？他們認為，互聯網為媒介創造自由的空間，所傳遞的一些內容對官方意識有潛在的顛覆性，進口的商業文化也可能推動個體和企業的自主意識。在此，容我再補充幾點。首先，官方熱衷把新科技應用於商業上，卻又想控制科技的政治影響；全球傳媒巨霸想在中國賺錢，不可能違背官方的意旨，它們在推動民主化的角色不能高估。第二，中國的網絡傳播和電信發展會繼續加大社經差距，我們不應高估新媒介的顛覆性，但城市精英的確更容易獲得商業和學術信息。第三，電信促進了商業文化，但它如何與當局合作又作對，值得密切注意。第四，知識份子電子報(包括網絡雜誌、BBS論壇、數字化的學術資料檔案)既非官方的，也無商業取向，它們是自由派、老左派和新左派意識形態鬥爭的主要場域。舊的網站被關閉，新的網站又出現。因為沒有盈利機會，國際資本不會投資於此，政府迄無明確的規範。



新科技和全球化對中國新聞工作者和公眾有什麼影響？這個問題很難答，也少有結論性的實證研究。湯普森(Thompson, 1995)提出媒介產品的「全球化的擴散傳播」(globalized diffusion)和「地方化的吸收」(localized appropriation)的辯證雙重關係，說明全球政經和文化中介的複雜互動。如果只用政治經濟學看主流文化的生產過程和分配結構，而未能留心各闡述群體的話語意義，其結果可能誇大「文化帝國主義」的論斷。反之，如果只在微觀上看受眾如何解釋進口的媒介文本，而漠視全球控制和依附的宏觀結構，也很可能武斷地抹煞意識形態的涵義(Tomlinson, 1991)。問題不在於是否有文化帝國主義，而在於這種帝國主義產生什麼霸權效果。宏觀歷史和具體社會語境必須兼顧，展開辯證的討論。

市場化給中國媒介帶來了混合的意識形態，充滿了矛盾的身份、認同、形象和主體性。媒介已成為意識形態競爭和意義重建的場域，既有共產主義的革命話語，也有市場化的實用話語。用威廉姆斯(Williams, 1977)的語言來說，這就是主流意識結構(dominant structure，即共產主義強調革命先鋒隊的宣傳)、剩餘意識結構(residual structure，即傳統儒家強調士大夫的道德責任)以及新興的意識結構(emergent structure，即符合市場邏輯的媒介專業主義)的鬥爭與調和。

潘忠黨和陸曄借法國社會學家史鐸(Michel Certeau)的概念認為，中國記者在日常新聞實踐中，有選擇地使用不同的話語資源和技巧，以規避、吸納和抵制官方的權力控制，正是以不同的「對策」來對付上面的「政策」。記者用官方辭令來正當化自己想做的事，例如(1)用黨八股來論證媒介上馬的項目；(2)賦過時的宣傳路線(群眾路線)以新意，並融入市場和專業主義的邏輯中獲利(如市場調查)，以及；(3)順着政治氣氛講話。他們除了消極的陽奉陰違，也積極地從黨國意理找市場根據。然而這些策略看情況應變，很不穩定，是「弱者的武器」，使他們與權勢對抗時贏得一些小勝利。必須指出，游擊戰和靈活策略確能贏得小勝利，

但這些策略能否制度化，以抗衡統治意識？我覺得，它們多半會被主流結構吸收、削弱、以至擊敗，因此誇大主體性而忽視結構的控制只見樹不見林；那些小勝利流於短暫、自戀和逃避，並不能改變、抵抗或顛覆深層的支配。80年代，改革派希望重新闡釋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自由面」，一旦在權力鬥爭中失勢後，他們的努力付之東流(Lee, 2000c)。萊瑟姆(Latham, 2000)認為，到了世俗化的90年代，多元的意識形態凸顯出官方意識形態愈來愈脆弱和分裂。其實黨國結構仍然牢固，媒介只拍蒼蠅不打老虎，也不像80年代那樣倡導政治改革。即使在美國，民粹式的文化主義者和後現代主義者也遭致批評，吉特林(Gitlin, 1997)說這些人用幻想的文化政治代替制度性強有力的社會運動，不啻掩飾自己的政治無能。

何舟在一篇論文說，中國媒介已從洗腦的國家工具轉型為「黨的公關公司」，任務是宣揚黨國的正面形象(He, 2000)，中國媒介已經戴着社會主義的面具，裝着資本主義的身體。我知道很多中國記者認為這個描述相當中肯。何舟描述，在全球化和官僚資本主義的衝突中，媒介用五種策略來減少意識形態的不和諧，包括：(1)重新調音；(2)意識形態分割；(3)淡化不協調音；(4)契約性的合諧；(5)尋求國家保護。下一步，我們應該問：媒介組織和記者如何在「市場化的權威媒介體制」生存、妥協和爭取空間？經濟自由化、市場競爭和全球滲透如何形塑媒介生態環境、話語和意識形態？葛蘭西的分析角度，即解釋霸權和反霸權的動態鬥爭過程(Williams, 1977)，會為傅科式的話語分析提供更辯證的一面。

## 中國在「國家－全球」的紐帶中何去何從？

中國知識份子在媒介辯論中國何去何從。我在表14-3列出老左派、自由派，和新左派(外加80年代的改革派)，構成當前中國意識形態的光譜。這些辯論與社會運動脫節，但還是澄清了政策取向的一些問題。

表 14-3 知識份子關於中國進入世貿的論述

	老左派	馬克思主義改革派	自由派	新左派
意識形態和理論來源	毛澤東思想	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自由而重新闡釋	自由多元主義	新馬克思主義、後殖民主義
毛澤東思想	忠於計劃經濟	接受毛澤東思想的「自由面」	反對毛澤東的計劃經濟和威權主義	含糊，但認為毛的烏托邦民主理想是誘人的
市場化	模稜兩可	大致贊成鄧小平的市場改革	支持自由市場	反對全球資本主義
理想政體	嚴格的、正統的黨國體制	改革的黨國政制	一個自由民主的政制	強大的社會主義民主政制
經濟改革對媒介的影響	反對淡化毛澤東思想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上升	有條件的接受	支持「消極自由」，因為導致黨國的日益削弱	反對全球資本主義和消費文化
民族主義	支持國家主權和自力更生	含糊	支持理性的民族主義，反對非理性的民族主義	尋求中國特色的、以大眾為基礎的浪漫民主形式，以別於資本主義民主。
世貿組織	反對資本主義復辟	不適用	大體支持	反對西方和美國帝國主義
代表性的網站	<a href="http://www.maostudy.org">http://www.maostudy.org</a> / <a href="http://redflagsh.myetang.com">http://redflagsh.myetang.com</a> <a href="http://marxisminchina.top263.net/">http://marxisminchina.top263.net/</a> <a href="http://www.zhl.org.cn/">http://www.zhl.org.cn/</a> 全部遭禁	當時沒有網站	<a href="http://www.wtyzy.net/">http://www.wtyzy.net/</a> <a href="http://www.sino-liberal.com/">http://www.sino-liberal.com/</a> <a href="http://www.chinamz.org/">http://www.chinamz.org/</a>	<a href="http://www.tianya.com.cn">http://www.tianya.com.cn</a>
代表人物	鄧力群、喻權域	蘇紹智、王若水、胡績偉、孫旭培	李慎之、劉軍寧、劉曉波、秦暉、徐友漁、朱學勤	崔之元、甘陽、汪暉、王紹光、張旭東
附注	不再掌權	1980年代很活躍，1990年代被清算或放逐	李慎之曾經是馬克思主義者，劉軍寧被官方解雇	很多人在海外任教

老左派承襲毛澤東的教條，以胡喬木和鄧力群為首。他們在80年代末清算改革派，但未料隨即在90年代失勢。這一派攻擊世貿組織為美國霸權和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把俄國、東歐、巴西和非洲的動蕩歸咎於西方宰制的全球化(Garrett, 2001)。老左派常向江澤民提萬言書，尖銳質疑現行政策偏離毛澤東路線。他們不相信中國除了加入世貿別無出路，不相信中國加入世貿利大於弊。老左派在互聯網上緬懷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無產階級風尚：平等(雖然是「均貧」)，民族獨立，反西方。江澤民在2001年7月1日建黨80周年紀念時宣布資本家可以入黨，以前的「剝削者」儼然變成了「聯合力量」。老左派立刻展開新一輪的攻擊，罵江背叛馬克思主義，出賣共產黨。《真理的追求》更譴責江澤民等為「黨內的資產階級」，江下令關閉《真理的追求》和《中流》——這兩本刊名就公然蔑視現政權。如果貧富差距繼續擴大，老左派可能借屍還魂，得到廣大的支持。

自由多元主義在中國多災多難。自由主義思潮一直遭禁，後來在90年代死灰復燃。他們反對威權統治，支持自由市場，但在中國入世這個問題上，卻成了當局的同盟。劉軍寧認為全球化是「民主的同義詞」(劉軍寧，1998：244)，是普世價值的座標，能夠避免戰爭和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自由派認為全球化會給中國帶來民主和富強，柏林牆和前蘇聯是在全球化的力量下倒塌的。他們相信世貿和全球化能夠為中國引入法律機制，提高管理透明度，擴張經濟改革。此說與美國對華政策不謀而合。他們極力反對民族主義，認為它為政治獨裁準備了道德和文化基礎(劉軍寧，1998：256)。在反駁老左派和新左派的攻擊時，自由派聲稱，中國腐敗的真正原因是威權主義，不是市場化和全球化(劉軍寧，1998; 徐友漁，2001)。朱學勤(1998)指出，中國的情況是「看得見的腳(政府權力)」經常踐踏「看不見的手(市場)」，而國際資本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用並不重要。劉軍寧(2000)認為新聞自由是由經濟自由和私有財產為前提的。

自由派陣營裏有一類是不再迷信毛澤東極端主義的老激進份子(如李慎之)，另一類是相信西方民主的改革派知識份子。奇怪的是自由派對公平和市場支配這類話題大致緘默，對農民和工人的慘狀很少發言。他們認為自由高於平等，機會平等高於結果平等。他們相信全球化帶來民主潛力，不知他們如何解釋新加坡的反例(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專制統治，正是中國當局所羨慕的)以及阿根廷的崩潰。何況國際工業資本在中國的紀錄也未必太民主。徐友漁強調，中國要在全球化環境中成功，完全「事在人為」(徐友漁，2001)。這未免忽略了全球化限制性的一面。

8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改革派隨着改革官僚體制浮沉，當時他們多在黨國的宣傳和意識形態部門中位居要津。對文革的反思，使他們致力於重新解釋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發現它們的「自由面」，倡導政治改革和新聞自由。他們支持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政治改革，直到天安門事件中清算為止。改革派的言論包括蘇紹智的社會主義民主論，王若水的馬克思主義異化論，以及胡績偉的黨報「人民性高於黨性」的論述(詳論請參閱本書第六章)。孫旭培提出多層次的「社會主義報紙體系」，唱的合諧曲既包括黨國媒介的主旋律，也包括非盈利民辦報紙的音符(孫旭培，1988；Sun, 2001b)。1989年以後改革派要麼被驅逐，要麼被邊緣化；1992年以後商業文化席捲中國，擁抱全球資本主義，他們已經退出辯論。在尚存的聲音中，孫旭培更接近自由派了(Sun, 2001a)。

90年代，國家引導的市場經濟帶來的殘酷後果漸漸浮現，新左派對此提出了及時的激評。他們攻擊80年代的改革派和90年代的自由派有精英貴族情結，過於保守。新左派自稱「自由左派」。他們既不用國家與人民的對立來歸納中國的癥結，也不認為壓制性政體是中國的首敵。新左派不少成員在海外大學任教，或在國內擔任文化職位。他們攻擊全球資本主義在中國蔓延，製造消費文化和市場狂熱，與草根民主格格不入。甘陽譴責「自由右派」贊頌的「自由」只給富人、強人和能人所特

享(甘陽, 2000)。新左派的觀點把自由與平等對立, 其實真正的自由主義總是有意識地調和這兩個基本價值。自由派鼓吹「有限的政府」, 以減少濫權; 新左派則要建立強大的「民主政府」, 來重新分配社會財富, 尤其是中國加入世貿以後為然——好是好, 怎麼做?

《讀書》主編汪暉是新左派最雄辯的作者之一, 他攻擊西方現代性中的非理性成份(Wang, 1998)。在一篇分析中國現狀的長文中, 汪暉(2001)聲稱六四運動不僅是一場自由派學生和知識份子要求政治改革、新聞自由和憲法權利的運動, 也是廣大城市勞工要求社會公平的抗議運動。在建立新左派為六四的繼承者之餘, 他進一步抨擊新自由派是在過去20年推動「激進私有化」的既得利益集團。這個利益集團正通過世貿組織, 在結合國家資本與跨國資本, 重塑中國的社會和市場的版圖。自由派回擊新左派不願批評專制政體。汪暉的論述頗有見地, 但一竿子打倒「政治自由主義者」(一直受當局壓迫)和「經濟自由主義者」(當局的政策顧問), 不免有打倒稻草人的味道。

張旭東呼籲要建立新的社會主義民主, 比資產階級的制度更民主、更自由、更平等, 照顧全民的利益(Zhang, 1998 b:135)。他要重燃烏托邦的想像, 建構一個論述, 也就是「在尚存的社會主義框架裏, 為政治參與和人民民主創造新的可能性」(Zhang, 1998b: 130)。據說這個新模式比自由主義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或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更民主。同樣, 崔之元建議從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試驗中片面挑出一些東西, 來開展中國的制度創新(崔之元, 1994)。毛澤東思想到底是威權(極權)主義的本源, 還是一個「新型的民主」? 新左派似乎把抽象的毛主義剝離, 罔顧那些實際的、具體的恐怖、饑餓和流血等活生生的歷史經驗(lived experience), 然後想像出一個激進浪漫但缺乏實踐意義的政治制度。正如韋伯(Weber, 1978)在一篇名著所言, 政治倫理不僅僅關乎意圖, 而應對行動的實際後果負責。通往地獄的路可能鋪滿了高貴的意圖。魔鬼總是存於細節: 除非新左派提出具體方案, 否則他們頂多是烏

托邦的想像。

在引進西方激進馬克思主義時，新左派似乎犯了懷海德所說的「具體情境錯置的謬誤」。全球資本如何宰制中國經濟？加入世貿後中國如何嵌入全球資本主義結構？全球化與地方性(包括國家和統治階級)如何互動？這些複雜的課題亟待批判評估，不是簡單的哲學冥想可以解答。新左派似乎把「全球—國家」的天平傾斜到全球化的一端，忽略了國家的一端；他們反對帝國主義，比反對專制主義更熱衷。他們自稱是毛澤東的繼承者，可是毛在革命年代提出要反帝國主義也要反封建主義。在幾個國際衝突事件中，新左派幾乎倒向國家民族主義，聯手反對西方。趙月枝(Zhao, 1998)既批判黨國的控制，也批判市場的異化，值得贊揚。

老左派靠邊站了，馬克思主義改革派早就邊緣化了，剩下自由派和新左派多少有基本教義的傾向。他們把西方理論普遍化，運用到中國這個具體的、複雜的、矛盾的環境中。自由派接受海耶克古典自由主義的視野，例如劉軍寧甚至排斥實踐主義(如John Dewey)或社會民主(如Harold Laski)的修正(Liu, 2000)。而新左派拘泥於反帝國主義的論述，進而抹煞自由精神在中國的意義(比如認為新聞自由是資產階級自由)，同時將解放的理想寄托於西方後馬克思主義或毛主義的烏托邦。全球化是一個悖論——普世化與地方化並存，同質化與異質化並存，中心化與去中心化共存(Featherstone, 1995; Tomlinson, 1999)。按此，自由派未能關注全球媒介集團主宰市場的負面，而新左派不願承認建立國際規範、加強法治對中國有種種好處。兩個陣營都是以簡化、誇張和非黑即白的方式來論述全球化。新左派不同意穆爾(Moore, 1967)「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的論斷，而自由派拒絕接受「政府是公平再分配的主體」的主張。總之，我們需要重構新的論述，以期「在全球化過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聲音」(王岳川，2001：163)，不脫離地方性而能超越它，帶來啟蒙而立足於本土。我們必須承認「消極自由」的益處(Lee, 2000a; Lee,

2001a)，也必須調和全球普遍論述以及區域性、國家性和地方性的具體論述(Lee, 2000c: 571)。該做的事實在多得很多。

## 結語

這篇文章是我編的英文書的導論(*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也是前面三本書的續曲(Lee, 1990, 1994, 2000)。本章提及的作者如無特別注明，都見該書的篇章。在編這四本書時，我的目標一以貫之：(1)兼顧理論與實證；(2)為媒介研究和中國研究兩個領域架橋；(3)為中國媒介研究和更廣的人文社科研究建立生動的對話。美國主流媒介研究視野偏窄，中國媒介研究只能位處邊緣，而中國研究又認為媒介可有可無。但學界的中心與邊緣本是社會建構，並非必然，也只有處於邊緣的人才能會通不同的知識體系(Lee, 2000a)。我很清楚媒介研究(理論發展)和中國研究(動態追蹤)之間有若干緊張關係。我寧可保持對位的緊張，而不膚淺地消解它。

這本英文書橫跨好幾個學科的觀點，並不是所有的聲音都是合諧的。我把衝突的觀點放在一起，是希望這樣的對話能夠繼續。我們分析了政治、經濟和文化各類主題，但終極關懷是媒介和民主的關係，既有中國的具體歷史情境，也有比較的視野。讓我再重述這本英文書論題：

- 外國媒介在電信科技的投資對中國民主的影響不可估計過高。中國將依照世貿條款，允許跨國公司投資中國的電信基礎設施和媒介管理，但絕不會放棄黨國對媒介的擁有權和編輯控制。全球性媒介集團也不太可能挑戰中國政府的意識形態。最近美國電腦網絡業泡沫化，傳播科技業萎縮，可能影響全球性傳媒集團對外擴張的步伐。
- 中國以組建國家主導的媒介集團，與全球和跨國媒介競爭，但那只是進一步牟利和控制的藉口。
- 中國媒介製造反美、反西方的民族主義話語。在這個意義上，



「民族的」就是「反全球化」的。另一方面，它極力渲染中國加入世貿和申奧成功是了不起的「民族成就」。在這個意義上，「全球的」是「民族的」，「民族的」是「全球的」。

- 在處理中美關係的過程中，媒介製造形象、話語和意識形態，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 媒介既反映也加劇中國不均衡發展的主要矛盾，犧牲共產黨的傳統支持者(農民和城市工人)，嘉惠新興城市知識份子、專業人士和經理階級。這樣，「國家的」壓制了「地方的」。這一趨勢隨着中國融入全球資本主義會愈演愈烈。社會經濟差距是社會不穩定的一個主要因素，已引起知識份子和媒介的激烈爭論。
- 新媒介科技將挑戰官方對傳媒的控制。新媒介科技對新興商業文化和公共空間也會有影響，但究竟性質是什麼，變化的過程如何，尚待繼續研究。
- 從意識形態上講，中國媒介及其工作者正在變動中。在政經變革的背景下，他們正在清理相互競爭的意識形態——共產主義、儒家思想和市場邏輯的專業主義。
- 大眾文化避免與國家意識形態直接衝突，用民族主義來包裝可以促進市場的成功。
- 評價全球媒介巨霸在中國投資的影響，需要有歷史的關照，來解釋全球和國家的互動。

這本書關注民族性和全球化的互動關係，卻忽略了中國地方性的發展。我們要用理論的視野和恰當的方法來研究媒介的內容，以及人們如何吸收和解釋它。末了，我在最近一個關於中國和全球化的國際會議上聽到兩個有趣的說法：首先，有人說學界流行研究中國的經貿巨變，忽視糟糕的人權狀態。其次，華裔以前比外國學者對中國的未來感到更悲觀，現在卻感到更樂觀。第一個顯然與此書不符。至於第二個說法，就請你自己評價了。



## 附 錄

# 中國傳媒研究、學術風格及其他<sup>1</sup>

---

以歷史為經，以世界為緯。做中國研究，要放眼全世界；主體性還是中國，眼光包含全世界。

見樹又見林。要看到局部，又看到全部，才能夠曲盡其致。規律和意義在某個地方是可以結合的。見其大，又能見其小。主題要言不煩，提綱挈領，層次分明，因果嚴謹；但每個主題轉折多致，柳暗花明，意義豐富。

## 媒介與社會之間

**黃煜：**你如何進入傳媒研究的領域？

**李金銓：**我是1971年赴美國的，第一站到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在宣偉伯(或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創立的傳播研究所唸碩士，重點放在媒介與國家發展的關係上面。宣偉伯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撰寫的《大眾傳媒與國家發展》(Schramm, 1964)是我的入門書，文字淺白易讀，非常吸引初學者。第二本書是勒納(Lerner, 1958)的《傳統社會的消逝》，後來又接觸到羅吉斯的《創新傳佈》(Rogers, 1962)。在夏威夷兩年，我幾乎遍讀了宣偉伯和羅吉斯的著作；後來又仔細閱讀卡茲(Elihu Katz)的文章。我無意中系統閱讀這幾個重要人物，對那個時候美國媒介研究的脈絡掌握就清楚了。

---

1 根據兩次座談整理而成，第一次參加者為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各系研究生十數人，第二次承香港浸會大學黃煜博士撥冗提問，給我有機會整理思緒。錄音由石琳整理。本文曾刊載於《媒介研究》(北京)，2004年3月，頁31-45，及《新聞學研》(台北)，2004年10月。

1950年代有過失敗的「統一科學」(unified science)運動，企圖建造一個統攝所有學科的科學；在這種氣氛下，宣偉伯認為每一個社會科學領域都得處理communication的問題，他在伊利諾大學成立全國第一所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時，敦聘各學科的專家(語言、心理、資訊工程等等)去任教，腦力激盪。後來恍然發現社會科學家只在communication這個十字路口路過，而不逗留。60年代初，貝瑞森(Bernard Berelson)宣稱communication已經死亡！這是個諷刺的局面：一方面聲稱要建立居高臨下的統攝科學，一方面發現自己的學科原來如此邊緣。其後，傳播理論的路徑愈走愈窄。這個年輕的學科缺乏信心，在從其他社會科學吸取養料的時候，眩目於狹隘的(當時是新鮮的)科學實證主義，精力一味花在探討媒介對選舉和購物行為的影響，對於社會結構和媒介組織則置之不問，幾乎和早年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家所提出來比較大的社會問題脫節。Communication在中文的泛義為「溝通」，狹義為「媒介」。第一代傳播學者做的是狹義的研究，想的是泛義的宏圖。

我讀到英國媒介社會學者坦斯多(Tunstall, 1970)編的《媒介社會學》，序言提到二十多年來經驗研究的視野不出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22年出版的《民意》(*Public Opinion*)。嚇了我一跳，怎麼會這樣說？後來，我接觸出色的媒介學者，果然多半是對媒介有興趣的社會學家。傳統新聞、大眾傳播領域的理論資源太貧瘠了。我在密西根大學唸博士學位時，六成的課都圍繞着政治社會學轉，這是大學時代興趣的延長。這條路線形塑了我的品味和風格，從此以社會看媒介，而不拘泥在媒介看媒介。其後，陸續接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還有文化研究——英國式文化研究脫胎自文學批評，美國媒介研究則受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影響，兩者迥然異趣——媒介不止是文化意義的再現，也是日常生活鬥爭的場域。這就「去媒介化」了，不再是傳統的「媒介中心主義」；不僅從媒介看世界，還可以從政治經濟來看媒介。

不斷有人問傳播(媒介研究)是不是獨立的學科，只有邊緣學科才

會有此焦慮。是學科也罷，不是學科也罷，多辯也沒有意思。現代社會不可能脫離媒介而存在，沒有人可以否定媒介研究的重要性，關鍵是能不能提出創新的研究議題，並賦以比較滿意的解答。因此，我覺得不必太計較學科地位，學科地位是公認的，不是誰說是就是，或誰說不是就不是。

順帶一提，我早年讀到的美國現代化理論(以宣偉伯、勒納、羅吉斯為代表)，在70年代末開始受到西方馬克思批判學派攻擊。兩派學術論戰引起我的興趣，我的博士論文後來出書(Lee, 1980)，題目就叫做《傳播帝國主義再思考》，分析兩派的理路和證據。這本書無論是褒是貶，至少20多年後還有課堂拿來當教材，所以我每年接到茈萋版稅時格外開心。

## 區域研究與理論建構

**黃煜：**1990年，你發表那本*Voices of China*，是改革開放以後外國學界對中國傳媒的系統研究彙輯。從那以後，你和其他學者都保持一種清晰的思路，自覺或不自覺地希望建立主體性的軌道。你還出版了*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1994)、*Money, Power, and Media* (2000)，還有*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2003)，能不能圍繞你的選題談談主體性的建立？

**李金銓：**1989年我獲得一個偶然的機緣，開始組織學術會議，着眼於媒介研究與政治經濟之間的聯繫，一方面看中國的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控制的矛盾如何影響媒介的運作和內容，一方面探討美國媒介怎樣看中國。前一個主題貫穿以後四本書，牽涉媒介政治經濟學的辯論。

關於後一個主題，我要多說幾句話。記得1970年代初剛到美國讀書，中國的文革餘波盪漾，學府內許多理想主義和機會主義的「進步」師生，一方面憧憬中美建交，一方面從太平洋的彼岸像霧裏看花，對文革充滿了「天真的革命浪漫幻想症」，把「為人民服務」、「造反有理」這些時髦口號信以為真，做了長篇大論的解釋。只要去中國轉一圈

回來，就可以在校園昂首闊步。後來四人幫垮台，他們猛然發現原來的信仰都是「假大空」，有的從此消聲匿跡，有的深覺受惡質宣傳的欺騙，紛紛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沮喪。

美國美國學者和記者觀察中國，立場總是搖搖擺擺，從來就是在盲目樂觀和悲觀兩極之間徘徊，這既反映中國的現狀，又反映美國國內的現狀，更反映了中美關係的高低起伏。美國學者七十年代寫的文章很多是站不住腳的，當時消息極端封閉，他們拚命從《人民日報》的一言堂挖點材料，企圖建立理論的空中樓閣。美國反戰、女權、學生，以及種族運動一時風起雲湧，社會動盪不安。文革的象徵層面是「為人民服務」，現實層面則是流血鬥爭。美國學者學生把國內的反抗氣氛投射到中國文革的象徵層面，直覺以為中國學生「造反有理」，為什麼美國學生不可以反抗建制？70年代他們看到中國象徵的理想，看不到現實的壓迫，這種盲目的樂觀在打倒「四人幫」之後完全改變，覺得共產黨的本質還是共產黨。80年代中後期，又有很多美國學者記者（特別是保守派）目睹中國的經濟改革，宣稱這是資本主義的勝利。等到1989年，又一次當頭棒喝——共產黨還是共產黨。在我編輯的《中國的聲音》中，着力於闡釋整個經濟改革對於媒介的影響，也看美國怎樣塑造中國的圖像。

第二本書也是延續原來的兩條理路走，書名叫做《中國的媒介，媒介的中國》。當然，我從頭就希望促成科際間的對話，兩書作者包括媒介、政治、法律和歷史學者，可謂一脈相承，一氣呵成。

第三、第四本書理論建構的企圖更明顯。第三本叫做《權力、錢、媒介》，其中例如潘忠黨和何舟，都在八十年代從中國赴美留學有成，熟悉西方社會科學的語言，並試圖將現有理論（媒介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脈絡向前推進。第四本書《中國媒介，全球脈絡》成形於本世紀之初，冷戰結束，全球共產主義的體制破產，進入所謂「全球化」的時代。碰上中國迫切希望和「全球」（是全球，還是美國？）接軌，在這個背景下媒介的角色是甚麼，全球力量和國內勢力又如何互動，便成

了探討的主題。

前兩本的取徑比較接近傳統的「中國研究」，後兩本希望跟主流理論對話。做中國研究的人比較喜歡前兩本，對理論感興趣的人比較欣賞後兩本。我覺得區域研究和理論興趣好比古典音樂裏面的「對位緊張」(contrapuntal tension)，寧可讓它們相互競爭互相協調，沒有必要用人為的力量勉強化解這種緊張狀態。例如我們研究中國記者日常生活的實踐，然後反顧西方學者的理論，看哪些視野和方法可以幫助我們解釋這個問題。中國記者的日常實踐為主，西方理論在這裏只是客。實踐的結果證實確實有對話的可能，我覺得這條路值得嘗試。我自己比較喜歡哪一本？很難講，各個階段不同，但看得出理論企圖愈來愈強。

**黃煜：**1992年底，我在大英圖書館看到《中國的聲音》，現在還記得很清楚。那時候這樣的書還太少，這本書有啟蒙的意義。你剛才提到，第三、第四本書理論企圖愈來愈明顯，能不能具體講一講？

**李金銓：**例如潘忠黨跟從美國社會家塔克曼(Gaye Tuchman)以現象學研究媒介社會學的路徑，又受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啟發，在北京等地做了大量田野訪問。他強調新聞實踐常常因「勢」(situation)而異，由於中國改革的勢頭曖昧混沌，反覆無常，記者往往無固定的常例可循，必須臨場想辦法應付局面，所以很不穩定，也沒有深思熟慮。市場調查剛在中國出現時，當局批評這是向資本主義靠攏，學者只能用共產黨的「群眾路線」為市場調查提供合理化的基礎。這種研究有很濃的文化特殊性，又有普遍理論的照明。

另外，何舟講政治經濟學，他分政治、經濟和政經混合等三個層面談《深圳特區報》，探討經濟改革對媒介的影響。他說，該報在政治控制的層面改變不多，在經濟靈活的層面改變很多；例如以前廣告的地位不重要，只從屬於新聞部門，現在則獨立作業，與新聞分庭抗禮，廣告並引發新聞作業的改變。他給政治經濟學注入新的內容。

還有，趙月枝從社會理論來探討媒介，例如她認為中國進入世界

貿易組織，加劇國內階級分化，媒介話語為新興的中產階級服務，遺忘廣大的勞工和農民。傳統的學者可能會描述這種現象，但不會放在一個政治經濟學的架構裏面來看。放入政治經濟學的架構，更能照明具體的現象。

**黃煜：**區域研究者注重歷史情景和具體細節，理論研究更注重規律。哪一個更重要？

**李金銓：**區域研究與學科研究間的確是有些緊張狀態，但未必水火不容。美國以前社會學受結構功能論影響，不太談歷史，所關懷的只是現在。在歐洲，韋伯的起步就是歷史社會學的視野。歷史社會學在美國有復興的跡象，和其他視野也有匯流的趨向。我們必須在歷史的架構裏面看問題，即使不是做歷史研究，也要有點歷史眼光。以穆爾斯(Mills, 1959)的話來說，一方面要以歷史為緯，一方面要以世界為經。做中國研究，要放眼全世界；應該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國，而不是以中國的眼光看中國——主體性還是中國，眼光包含全世界。由此出發，我們可以比較特殊性和普遍性。

### 「本土化」是虛假的口號？

**研究生甲：**台灣社會科學界首先樹起「本土化」的大旗，在三地都產生了一些影響。這個小圈子往往形成了一個學術霸權。在這裏面，一些徒子徒孫不斷繁殖，可能已經不具備或者不再願意與更大背景的學術進行交流，可以說是在「本土化」的偽飾下偏安一隅。

**李金銓：**你的憂慮是可貴的，但評價未必是公平的。學術是一個公共論述(public discourse)，態度當然應該開放而不封閉。社會科學看宇宙、看問題的方法都是自外引進的，不是中國文史哲傳統的一部分。建立一個主體性是需要，知識論裏也有這個空間讓你建立主體性，但並不是說西方的東西我們都不管——當然「西方」的概念也要解構。學術圈是一個社群，當然有權力關係，但你說的那些「第一代」人並不封



閉。台灣社會科學界追求「本土化」，有人在實證主義的範圍內添增很多本地的變項，有人反對實證主義，也有人主張「後實證主義」，還在多方摸索，不到下定論的時候。

**研究生乙：**你給我們一個場景、一個脈絡，從傳播學出發到社會科學，講了兩個主要的問題：一個是東西方「地域」差異，投射到華人學術界的影響；另一個是「宏觀」與「微觀」二元對立對理論和方法論的影響。從社會學剛進入中國開始，從吳文藻、費孝通開始，「本土化」的問題就被提上了日程。但是從五十年代停止到八十年代復興，「本土化」的呼聲沒有那麼明顯了，直到台灣從心理學出發的這個「本土努力」……

**李金銓：**我提到應該放棄區域研究的偏門，進入以區域為基地、有理論興趣的殿堂。中國人講「入乎其內，出乎其外」，從我們最切身關注的問題着手，並深入了解「西方」主流學術的視野，唯有這樣才可能對話和交流。建立主體性，不是排斥西學。以薩伊德(Edward W. Said)為例，他重新回頭看西方人對於中東的建構，提出截然不同的解釋。我們不是為不一樣而不一樣，但有些問題對我們很重要，對所謂的主流來說可能隔靴搔癢。應當歡迎多元的解釋，互相爭鳴。入乎其內，出乎其外，卑之無高論，做起來極難。「西方」理論翻新太快了，要進入它的理論精髓，談何容易？薩伊德受古典文學的訓練，然後結合葛蘭西(A. Gramsci)和傅科(Michel Foucault)的思想，提出與兩個世紀以來英法學者對中東迥異的解釋。他遵循「西方」的遊戲規則，玩出不一樣的結果，等於向「西方」算總帳；他為後殖民主義開啟了一條新河。我們甚麼時候才做得到？

我嘗試比較兩個政治經濟學在不同脈絡的解釋能力，在甲脈絡一個取徑可取，在乙脈絡另一個取徑可取，在丙脈絡兩個脈絡同時不安並存。很慚愧，我走得不夠遠。踏出第一步好難。我的世界觀不是黑白對立的：我接受陰陽思想，陰是陰，陽是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互相

滲透。同樣，一個實證主義，一個詮釋主義，表面上衝突得厲害，我認為還是有分有合，這個回頭再談。社會科學難有絕對是非，我常常將幾種說法排比來看，雖然我的工作還得更細緻。

歐洲思潮經過美國人的吸納，就穿插成為多元光譜裏面的一點。英國的文化研究，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法國的結構學派——這些對美國媒介研究原來是另類的或對抗的，但傳入美國的土壤便和美國主流思想並列，批評的刀鋒磨平。美國吸納意識形態的力量太大了。對社會理論貢獻最大的，一個德國，一個法國，社會科學的傳統深厚。中國沒有這個建築概念體系的傳統。中國哲學崇尚人生的直覺智慧，如《論語》說：「壯年人戒之在鬥，老年人戒之在得」，說透了人生，訴諸本心，不必經過中間的文字障。(韓非子說：「竊鈎者誅，竊國者侯」。這類例子俯拾皆是。佛的最高境界根本是捻花微笑，不著文字。)西方式的思維就會考慮多老才算老，「得」什麼，有幾種「得法」，在哪種情況下「得」，為什麼要戒「得」等等一連串的問題。可是今天我們講社會科學，不管你喜歡不喜歡，都必須滲透到西方的推理系統和分析方式裏面去。有一位哲學家跟我說，早年曾經悲嘆中國沒有(西方式的)哲學，頗為自悲，年紀大了才發現原來這是兩個傳統、兩套標準，何必硬用「西方」作為衡量自己的標準？中國哲學家可以高呼：我們跟你們不一樣，彼此各有千秋，分庭抗禮！社會科學講不出這樣的話，因為本來不是我們傳統的東西嘛。你們別笑我盡講「入乎其內，出乎其外」這樣沒有學問的話，其實幾個人真能夠「入乎其內」，遑論「出乎其外」？

**研究生甲：**我們可以把社會理論分成三種：一種是像傅科、德里達那種：我坐在扶手椅上，吃進大量的理論，然後將它們吐出來，這是一種生產模式，很多時候是不能印證的，甚至不能稱之為「社會科學」；另一種生產模式是像布迪厄、季登斯，從經驗研究提煉出理論來；再一種是經濟學裏面的社會理論生產模式，如納什，可能是純粹數學化的，然後推導，建立模型，再找材料驗證，與社會科學的歸納不一樣，是一

種演繹的方式。我覺得你從專業研究着手，通向更廣闊的社會理論舞台。但是在通向這個舞台時，還要處理很多問題，就像你提到的，現象學和實證主義之間的溝通；在具體的學科上，你拒絕學科的「內卷化」……我們看到姿態，沒有明確的「該通向何處去」。

**李金銓：**你說的不是我能力所及的。我完全接受你的批評。「社會理論」與「社會學理論」不同。社會理論是對於整個理想社會的描述，如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實踐主義。你所說的「實證」和「現象學」，是方法論，而非社會理論。進一步再細分，才到「社會學理論」，例如角色論和交易論。

講到宏大敘述，不是要人人講法國大革命、中國共產黨革命。我低調、實際得很：我學穆爾斯(Mills, 1959)《社會學的想像》，如果有自主選題的餘地，就盡量將個人興趣與公共議題聯繫起來，把困惑個人的問題——自由，饑餓，或別的——普遍化成為一個社會問題，讓研究連綴成一個體系，而非支離破碎的聯想。這樣做研究，總覺得有理想在召喚。每個人都得找定位，安頓個人的志業。我的位置不特別激進極端，也不是與世無爭；我從自由民主的基本關懷，探討問題背後的意義。我的東西不一定穿插自由民主這些話語，但背後的關懷還是隱然在支持研究的旨趣。

穆爾斯受到實踐主義的影響，是公共知識份子的典範。他反對脫離社會實踐或無法驗證的大理論，也反對抽離社會脈絡的經驗研究，這在年輕歲月對我的影響很大。還有，我們講宏大敘述，是在受良好技術訓練的前提下談關懷。這牽涉到知識份子與專業學者的問題：在美國只有專業學者，公共知識份子的傳統很孱弱；歐洲許多名學者都是公共知識份子，在中國的科舉制度和儒家傳統賦予士大夫泛道德的地位。今天社會多元複雜，虛矯的士大夫能不能肩負天下的責任？書沒有讀通，空喊以天下為己任，不太好。我們扮演的「角色群」(role set)必須由近而遠，不稱職的學者徒喊「俯仰天地，悲天憫人」何用？

社會賦予我們專業思想的權力，我們應以專業為基礎，對某些社會問題有所澄清，有所貢獻。我們在公共領域發言，只能透過說服的過程讓別人相信，並不是我們在先驗上有特殊的話語權。最後的決定權在誰？我們是一介普通公民，權力不比別人大；我們的影響力來自專業所獲得的說服力量。葛蘭西說的「有機知識份子」，踏踏實實凝結成一個個社群，分散到社會政治文化經濟各方面的重要領域，對公共政策能夠發言，促進公共辯論。

**研究生乙：**你提到另一條線索：宏觀與微觀。季登斯一直在為兩者勾連盡力。這個問題歸根到底是對社會的看法不一樣。台灣學者葉啟政從中國人的知識結構，對社會對人的看法出發，試圖延續季登斯的工作、打通這兩者間的壁壘。這個企圖你覺得有沒有可能實現？

**李金銓：**季登斯一直在嘗試，別人也在做，評價不一。社會與個人不是對立的，是一個negotiation的問題。這種書會繼續出現，最根本的問題往往是最難的問題。幾千年前就問什麼是「人生」，兩千年後還會問甚麼是「人生」。這是一塊試金石，想過這個問題的人跟沒想過的人視野和體驗都是不一樣的。每個人該想想這個問題，雖然不是每個人都會有答案。我們最好有些哲學素養，但不一定做哲學家。中國人有宏觀思考的習慣，美國人比較微觀，利弊互見。中國人為學容易流於空疏，議論多，尚空談；漢學家學日文，因為日本人的材料細。中國人有很好的、很空靈的見解，但我們直接訴諸於心的思維和「西方」推理不同。我們不要放棄傳統的宏觀視野，但從西方汲取邏輯思維的方式，尊重事實，尊重對材料的推理。關懷可以大一點，但每一小題都很嚴謹。

### 理論資源的「現代化」

**研究生丙：**我是做文學的。在文史哲方面中國人有自己的傳統，不像社會學的理论資源基本上來自西方。其實，現在做中國文史哲研究的術語，基本上也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經過日本人翻譯，轉介到中

國來的，很少直接用中國古代的術語。我做中國古代的文學理論，也討論古代文學的理論和術語如何「現代化」。考古學在中國也沒有理論資源，但張光直教授依賴中國古代從地下發掘的材料，還有南美洲印第安人的材料，提出一套自己的理論，與西方理論抗衡。你們講社會學，是不是將西方的理論拿來，再用中國的材料當成其注腳，還是從對中國事實材料的分析得出理論，這些理論在什麼層次是創新的，可以和西方理論抗衡？

**李金銓：**你說的是paradigm的問題，我們的看法不謀而合。所謂「paradigm」，是指學術社群用主流的典範解釋現象，但後來例外愈來愈多，不能再只當「例外」看，這時最有原創性的學者修正一些基本假設，看問題的方法就豁然更新了(Kuhn, 1970)。社會科學沒有物理數學的典範那麼嚴格，但泛意的「典範」還是有的。基本假設是什麼？中國人辯論人性本善或本惡，也許無法經驗證明，但假設不同即發展出儒家和法家。張光直教授挑戰西方主流的典範，意義重大。余英時先生的方法與「韋伯式的」取徑暗合，他講要看內在理路，理論只是外緣，材料才是最後的審判。材料有內在理路，視野、方法、理論只是為了活絡思想，讓我們把問題說得更清楚。韋伯式的方法是先滲透到當地社會演員的「意義之網」，瞭解他們如何看待生活，研究者只從中援引理論概念(例如分工、階級)，幫助社會演員闡釋他們的意義。社會演員的詮釋是第一性，學者的詮釋是對社會演員詮釋的再詮釋，這是第二性。而且這些詮釋是多重多樣的。不像實證主義認為學者可以發現「一個」外在客觀的世界規律，只有第一性，無所謂第二性的問題。這裏有學術紀律與學術社群的約束，你的解釋必須經過別人的認可，否則無異於荒野的呼聲。

**研究生丙：**西方文化理路反抗自身的傳統，值得華人學習。特別是從事「後殖民主義」研究的一支，薩伊德及其弟子，其後那些女性主義學者，以及現在做文化批評的。我們為什麼不具備這樣的素質？西方很多理論我們不一定要成套拿來用，但有些精神是我們不可能擺脫的。

**研究生甲：**我覺得後殖民主義、女性研究等等，在美國的實證研究傳統裏面是不是受到尊重是值得懷疑的。他們的學術姿態助他們成為學術名人，他們對實證研究的影響有限。一個社會理論家，雖然大家為其理論叫好，但沒有人把它運用到實踐中來，他的實際影響是甚麼？

**李金銓：**實證主義在美國還會是主流，但以實證主義衡量「非實證主義」或「反實證主義」的工作，未必太公平。影響是多方面的，例如「後現代」不太可能取代「現代性」的社會理論，但有很多東西會被有選擇地吸收。

**研究生甲：**社會科學的成熟程度不一樣。經濟學很高，門檻明確。傳播學的形式化程度低一點，就可能受到「後現代化」理論的影響。

**李金銓：**純是「門檻」的問題嗎？現在經濟學以計量經濟學掛帥，是不談政治經濟學，不談價值問題的。如果關注「人」的價值問題，本質上能不能像經濟學那樣形式化？至少我覺得知識論和方法論不必定於一尊。

**研究生丙：**所謂西方的「現代性」，有人定義為「反對自身」，這個精神值得學習。第二點，很多西方學者研究漢學和中國問題，其實不是在研究中國，只是自身理論傳統的需要，用中國材料來反抗他認為西方存在的弊端。

**李金銓：**這個陷阱是存在的。有些人以己意套中國，套世界上任何地方。正如薩伊德所描述的英國法國中東專家，多是飽學之士，但潛意識裏就是有英法的思維立場。這是無可避免的。我們有我們盲點和包袱，在廬山裏不識廬山真面目。所以要提倡discourse或dialogue：他們有他們的發言權，我們有我們的發言權，在半路相會，相互得到某種程度的理解。有一次在明尼蘇達大學聆聽著名的漢學家講儒家，他講完，有希臘教授起身問：「你講的我全聽懂，你是不是用我們懂的話來解釋孔子？這裏面有沒有危險呢？」漢學家回答說：「不用現代語言，你聽不懂孔子，但你聽得懂的西方語言和孔子必有落差。怎麼辦？」其實精微

處只能心領神會，不能完全靠語言表達，但如果反覆切磋，建立這種理解(understanding)不是全無可能。

## 學術紀律與社會脈絡

**研究生甲：**本土化是一個虛假的口號。應該進入到每一個領域裏面，社會科學是普世性的。不能說張光直是中國人，就給中國人掙得面子。不是的，應該把這個東西定位在學科的發展上面。任何一個範式的突破，不管誰來完成，都是學術共同體的進步，而不是說因為地域有了代言人，就有了看齊的模範。學術共同體的進步是沒有地域的。你作為社會學者所接觸的就是這套規範。

**研究生丁：**不對，這不是地域的問題，是意義的問題。數學沒有中國數學和西方數學之分，但是政治學、社會學有文化意義的差異。數學和物理學一定有明晰的規律，paradigm是成熟的。社會科學如果只重在揭示規律，可以稱之為「工匠」，不是嚴格意義的知識份子，研究的東西是很機械的，沒有品格，沒有特殊性。我們在知識生產時，有三個基本問題要解決，一是揭示規律，一是揭示意義，再有一個是變成行動。(我學政治學，去台灣訪問，接觸一些政治學者；他們從美國回來，有很大的激情，化為行動，對推動台灣民主化功不可沒。沒必要要求所有人都這麼做，但某些學科需要一些人這麼做。)不同學科也應該在一個多元的光譜中合力做某些事情。

**研究生甲：**遊戲規則是在學科內部制定的，與地域沒有關係。可能首先發明這套遊戲規則的是西方人，就像基督教是首先在西方發源的，但作為普世性的東西，它可能有地域的痕跡，卻不能以地區區分。第二點，你講到理論應該轉化成行動，我覺得這是學術和政治的區別。我們到底是要做一個知識份子，還是要做一個政治的傳道士？

**李金銓：**尊重學科紀律，毋庸置疑。社會科學有普遍性和特殊性。華人的終極關懷總有跟西方人不同的地方。有些人不認同特殊的文化經

驗，但另一些人或許覺得它很重要，事情只要不絕對化就無害。不是中國人就排斥西方。談主體性和本土化，不是排斥西方的學術。社會科學是西方傳來的，我們不可能排斥西方學術。學術是一個public discourse，是一個conversation，在整個公共領域裏不斷討論，而不是閉門造車。只有受過很好的訓練，要瞭解西方學術，才談建立自身的主體性。我們在選題方面有某種程度的自主性，雖然解決問題方式和理論資源需要取自西方。西方理論來到本土一定要再造，不能全部照搬。普遍性與特殊性必須求取平衡。

**研究生乙：**我贊同。理論由概念和命題構成，概念來自於社會事實。各處的社會事實不同，甚至有巨大的差異……

**李金銓：**我在台灣生長，當年我們都投入社會參與，爭取民主。現在台灣的民主素質粗糙殘缺，但一個殘缺的民主比獨裁好！選舉對台灣人非常非常珍貴。美國人投票率低，原因分歧，有人認為選誰都是一丘之貉。後現代的人說，看，西方人對「大政治」——效忠國家、民族、政府、議會——那麼淡漠，只轉而關心「小政治」，即個人生活中抽稅、性別、族群等切身事。西方人有選舉權不用，這是一回事，我們有沒有這個權利，則是另一回事。這是脈絡的問題，也是意義的問題。

**研究生丁：**的確。季登斯說，我們有兩種政治，一種是解放政治，一種是生活政治。在中國，人們衝出街頭改變權力架構，爭取選舉權，這種意念已經給鄧小平南巡和市場經濟吹滅了，大家都關注小圈子的生活政治。生活政治可能有政治內容，你可能討論某個領導人的笑話等等，裏面有話語和權力，但畢竟不同於解放政治。你剛剛講的非常對。有一個次序的問題：西方人完成了架構的問題；像普特南研究「公民文化」的衰落，在中國是隔靴搔癢的。中國沒有公民文化，怎麼研究它的衰落呢？這是把馬車放到馬的前面去了。政治學研究經常說要「顛倒他們的邏輯」，我們自覺看到他們的問題是不是我們的問題，我們的問題是不是他們的問題。強套一個理論，比工匠還不如。



**李金銓：**萬一「解放政治」不可能，只好覺得國家事不關己。人類永遠需要解放，只是不同的時間出現不同的問題。這裏面也許有階段性，西方經歷的也許若干年以後我們也會經歷，但這不是簡單複製的過程，有些地方一樣，有些地方不一樣，有些地方借鏡前人或其他社會的經驗。

### 主體性：結合規律與意義

**黃煜：**回來談一談規律與意義的結合吧。

**李金銓：**實證主義是近代自然科學的主要方法。實證主義，用懷海德(A. N. Whitehead)的說法，就是「Seek simplicity, and distrust it.」有點類似胡適說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其宗旨企圖將錯綜複雜的社會現象濃縮，然後化約到最重要的幾個變項或元素，建立其間的因果關係，並且用最簡單最經濟的語言(尤其是數學公式)精緻準確地表達出來。自然科學追求準確和普世性，成就輝煌，社會科學亦步亦趨，針對社會現象建立理論的假設，尋找最重要的因果變項，建立關係和尋找結構，然後大膽懷疑之，試圖用邏輯和證據推翻假設。可是社會科學除了因果關係，還必須牽涉「意義」的問題，而意義是要主觀解釋的，而不是客觀的再現。意義多重多元多樣，要一層一層剝解，用現象學的話說就是「互為主觀」，主觀和客觀互相交融互相滲透。尤其受人類學、史學、文學批評訓練的人從事社會科學研究，會發覺很多東西不止是規律的問題，還涵蓋人文的意義。凱瑞(Carey, 1992)把懷海德的話變一下：「Seek complexity, and order it.」換言之，要把社會現象的複雜性和矛盾性層次分明地梳理並呈現出來。我覺得這兩個取向可以合在一起，既精簡道出內在規律，同時一層一層剝離外相，將內核顯現出來，意義之中有意義，大氣候下有小氣候，關照「部分」跟「全部」的關係何在。我喜歡韋伯的立場，規律和意義兼容並蓄，本身是妥協和共處(compromise)。

**黃煜：**在一個世界性的架構中對中國問題開展特殊性的研究，而不

能強調特殊性本身的絕對性。不排除其他學科領域的介入。

**李金銓：**對，我們需要一個開放的態度。我在第一章提到，有一個教哲學的朋友說我是「脈絡學派」(contextualist)，我喜歡這種講法。任何事情把它放在一個語境中看，沒有絕對的是非。社會科學尤其「是非無實相」，昔日之「是」可能是今日之「非」，或者一地之「是」可能是另地之「非」。這些都要放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看。我這麼講，無意將其絕對化。正如類似「民主」這樣的終極價值，我是不會把它相對化的；其他議題可以置諸脈絡，把各種說法當成假設，然後檢查在哪一種條件下哪一種講法更有道理。

台灣經歷近40年的戒嚴，馬克思主義那一套政治經濟學不能套用，因為情境不一樣。馬克思主義在西歐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自由民主國家邊緣戰鬥，批評資本無窮的、盲目的累積，扭曲人文的價值和意義，這種批判具有崇高而激進的人文理想。但台灣在戒嚴時期，私營報紙即使跟政府走得近，還是比黨政軍控制的報紙鬆動，市場的確有解放的力量。解嚴以後，台灣政治經濟關係重組，經濟邏輯慢慢取代政治邏輯，互動的形態和內容改變了，這時自由多元和激進馬克思兩個政治經濟學的取徑並存，甚至糾纏在一起(第二章)。我提出一正一反的命題，希望在更高層次發展「合」的命題。這樣一方面與政治經濟學有對話的可能，一方面確可以幫助我們解釋華人社會的一些歷史現象。中港台異中有同，同中有異，必須一層一層地剝出意義來。

沒有絕對的主觀，沒有絕對的客觀。我的世界觀受到八卦思想的影響：宇宙從第一個層次來看有陰有陽；第二個層次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互相滲透；第三個層次陰尚可再分陰陽，陽也如此……用現代語言來講，就是辯證性。社會科學的左左右右，看你站在哪裏，移步換景，不同的位置看到不同的角度。如果把問題「絕對地」相對化，世界上似乎就沒有什麼價值值得保存了，學術變成一個遊戲而已！我篤信民主、自由、解放這些普世價值。「後現代」解構了許多全稱命題，甚佳。但

普世價值必須不斷賦以新意，與時俱進，不要虛無地抹煞它。「自由、平等、博愛」是法國大革命的口號，現在已經是人類共同的願望。

## 主題與變奏，形式與實質，結構與過程

**李金銓**：20多年前，我剛去明尼蘇達大學教書時，常跟學生講中國人「抽絲剝繭」的道理。因為我從小在鄉下長大，對竹有特殊的感情，乃以「剝筍」為喻，後來發現新大陸不出筍，改用洋蔥來說明，原來英文叫layering，正是此意。「剝」什麼？「剝」意義嘛。國人講「綱舉目張」：提出主題，完善細節。剛剛提到社會科學不單追求「規律」，也追求「意義」，兩者是可以結合的。

古典音樂有「主題與變奏」(themes and variations)的形式，主題清晰，變奏多端。變奏部分可以用各種手法加快、減慢主題，在主題裏面衍生另一個主題，變奏中還有變奏，從不同角度顯現這個主題。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巴赫(J. S. Bach)的Goldberg Variations，居然動用了21種變奏詮釋主題。主題簡潔(seek simplicity)，變奏繁富(seek complexity)，在某種程度可以協調得宜的。另一種古典音樂的形式是奏鳴曲(sonata)：先宣佈主題(motif)，第一主題和第二主題的合譜與衝突；接着陳述曲子要表達甚麼；再用各種方式發展主題；最後重新敘述主題，將聽者帶回原位。主題不斷出現，提醒我們跑了野馬、盡情發揮還拉得回來。這個形式頗符合中國人作文的「起承轉合」。起是破題(themes)，將規律講交代清楚，「承」和「轉」從各角度正反鋪陳，淋漓盡致，發揮論旨(argument)，最後「合」時下結論，首尾呼應。這樣見樹又見林。倘若只見樹不見林，無法得出總體印象，則局部壓倒全部；倘若見林不見樹，只有輪廓沒有細節，那是全部壓倒局部。要看到局部，又看到全部，才能夠曲盡其致。這給我的啟示是甚麼？是規律和意義在某個地方是可以結合的。我喜歡的社會科學著作，見其大，又能見其小。主題要言不煩，提綱挈領，層次分明，因果嚴謹；但每個主題轉折多致，柳暗花

明，意義豐富。中國人喜歡「小題大做」，不喜歡「大題小做」，我覺得這兩點是可以合而為一的：也就是「大題大做」，題目想得大一點，但是每一個環節都做得仔仔細細，結構嚴謹，大題目分成許多小題目，絕不空疏。

薩伊德受「主題與變奏」的影響。他深受早期傅科(分析discourse)和威廉姆斯(R. Williams)對霸權(hegemony)的解釋啟發，認為霸權是支配霸權(dominant ideology)、另類霸權(alternative ideology)以及敵對霸權(oppositional ideology)不斷鬥爭的「過程」，而非「成品」。霸權在日常不斷的鬥爭中來顯現，有迫害就有反抗。薩伊德在《東方主義》談的是西方帝國主義如何建構「東方」，服務文化霸權。《文化與帝國主義》談第三世界國家如何顛覆、抗拒西方文化霸權，裏面從小說，從歌劇《阿依達》，從建築，從現代主義，從卡謬……主題清楚，但不斷從各種的角度呈現，讓你覺得意義複雜豐富、多元甚至矛盾。如果不是完全引喻失當，我覺得主題的「規律」和變奏的「意義」可以適度結合。

順道說，實證主義是一種形式主義，認為「形」本身可以包含「實」，用數學方式表達最精簡最完美。然而社會科學的意義與脈絡必須見其「實」，不能以形式一以貫之。從五四時代開始追求現代性，當時提出的德先生與賽先生，在西方的脈絡位階一個是價值理性一個是工具理性，到了中國卻都是富國強兵的手段。既然不能富國強兵，民主這個手段當可棄之如敝屣：1903年梁啟超遊歷美國歸來，從鼓吹民主變成鼓吹開明專制，他對美式民主失望，只見其「形」而未見其「實」。下一輩的胡適留學美國，深入美國生活方式(way of life)，了解日常生活滲透的價值，不像梁啟超只是短期遊客，走馬看花，只看到制度上的弊端。胡適的形式主義成分比梁啟超少，對美國的理解更深入，畢生信奉美國式民主。丁文江、蔣廷黻、錢端升這些頂尖的留美博士，在抗戰時期責怪民主不能救國，紛紛回頭青睞開明專制：先倒日寇，再談民主。這些都是以形式主義來瞭解民主。民主是基本價值，不只是一種手段。

國人不斷在辯論「全盤西化」能不能脫胎換骨解決中國的問題，這又是一種形式主義，根本忽略了脈絡的問題。一個文化能不能全盤移植到另一個文化脈絡？

在社會研究上面結合規律和意義，其實也是結合形式與實質，結合結構與過程，結合主題與變奏。如果只看結構，忽略過程，容易犯「形式主義的謬誤」。我覺得喬姆斯基就重「形」多於重「實」。所有的激進觀點都容易抹煞其他觀點之間的差異，因為他們認為那些差異微不足道。喬姆斯基直斥《紐約時報》為「官報」，說得那麼絕對，美國新聞自由變成了虛假的，簡直和獨裁國家的喉舌媒介無異(見第十二章)。因為形式掛帥，許勒(Schiller, 1976)才會提倡蘇聯、中國(文革時期)和古巴的黨國控制模式為第三世界抗禦帝國主義的利器。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眼光只放在過程，忽略結構，可能也提煉不出具有普遍意義的見解。我的世界觀從來不是對立的。我服膺實證的精神，但以反對實證主義為檢驗一切的標準。人類學家紀爾茲(Geertz, 1973)提倡「稠筆敘述」(thick description)，細緻刻劃大中小各層次的文化意義，但他坦承只要離開「田野」(field)一遠，心裏就不舒坦。可見經驗研究者不一定要成為實證主義者。人類學推崇經驗研究，經驗研究可以一層層排比印證很複雜很多元的意義。

## 中國傳媒研究的初步藍圖

**黃煜：**你講到政治經濟學在中港台的社會歷史情境，希望發展出一套正反合的理論框架，可否談談？

**李金銓：**畫一個初步的圖像，分四個層次：一在最宏觀看政治經濟學；二在中間看媒介社會學，即媒介本身媒介機構的運作；第三個層次看文本(text)，即媒介內容是什麼；第四個層次看脈絡(context)，即解釋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ies)從媒介獲得甚麼意義。

第一個層次是政治經濟學，國際與國內互相交流。冷戰結束，全球

化議題甚囂塵上。(I. Wallerstein認為全球化的過程五百年前就開始了，不過我們暫時以1990年前後為分野。)全球化對國內的政治經濟重組有甚麼影響？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採取阻擋外國媒介進來投資的防衛措施，例如建媒介集團，而集團化勢必影響到媒介組織的具體運作。

接着談到媒介社會學，記者在這個競爭市場怎樣調配？政治邏輯和經濟邏輯如何抗爭、協調、結合，也要「脈絡化」(contextualize)，必須做很多研究，進入記者的生活脈絡和意義系統裏面，瞭解他們是怎麼想的做的。這方面的理論文獻相當精彩，但如何與中國的具體情境接通？

現在好的文本分析不多。媒介到底講什麼？我們應配合整個人文學和社會科學方法上的突破。(我、陳韜文、潘忠黨和蘇鑰機結合媒介社會學和文本分析，探討八個國家記者如何建構香港回歸，也就是*Global Media Spectacle*這本書。)下一個是詮釋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ies)的問題。文本本身不能產生意義，需要由人解釋。以中國現在的城鄉差異、階級對立，利益愈趨多元，不同的詮釋社群對媒介內容會有不同的解讀。這方面的研究很少。政治經濟學、媒介社會學、媒介文本、解釋社群賦予文本的意義，四個環節相扣相聯，也許卑之無高論，但至少能夠提供一個初步的架構。即使研究中國傳媒的社群不大，鬆散而不成形，但如果大家能夠建立文化自覺的共識也不錯。

**黃煜：**華人社會的傳媒研究，下一步那些方面比較重要？

**李金銓：**在全球化的脈絡下中國的政治經濟會走甚麼路，當然不是我們所能左右，但「共產資本主義」或「後共產資本主義」，以「共產主義」為名行「資本主義」為實的混合體，如何跟國際接軌？「國際」是甚麼？是單指美國嗎？接軌的目的何在？接軌以後對國內的政經環境和遊戲規則有何影響？威權政治會不會變形、變質，或者以新面目出現？在趙紫陽的「新權威主義」之後，江澤民以降是不是「新新權威主義」？

沿着政治經濟學的脈絡，我們看到組建媒介集團，即使現在只是長

官意志的產物，卻建造出自己的邏輯，對媒介的經營、生態、話語產生甚麼影響？我在第三章把自由主義、黨內改革派和「新左派」放到中國的架構，解釋媒介生態的變化。這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市場自由化是對威權政治的挑戰，還是權跟錢重新結合，還是兩者兼備？全球化帶來新的傳播科技，對整個行政管理產生甚麼影響？科技與意識形態不是楚河漢界，不能一刀兩割，將來的變化如何？在理論上，我覺得可以用全球化視野和「依賴發展」(dependent development)理論(Cardosa and Faletto, 1979; Evans, 1979; Gold, 1986)——中國依賴國際市場，不斷進行點(不是全面)的發展，造成國內貧富懸殊，階級對立激化——來看造成甚麼內在變化。

**黃煜：**可中國大陸是一個轉型社會，變化的目的、意義都在非常不確定的情況下，一方面要發展市場經濟，一方面又要保持那種剛性的政治制度。您是說這兩種變化相互影響？

**李金銓：**中國一方面要和「國際接軌」，一方面又怕國內權力流失。這個鬥爭過程對媒介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國的政經戰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是一個點(不是面)的發展。讓哪些人先富，在哪些地方先富？先富者的生活、消費形態和世界觀慢慢轉移，可能影響到整個階級關係的重組。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數目小而集中，他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可能在紐約或巴黎，而與國內「同胞」反而未必有共同的語言。國內條件和國外條件既是互動的過程，也是鬥爭的過程——哪邊壓力大，哪邊壓力小？國家如何處理國際資本壓力和國內工農的壓力，鬥爭的贏者和輸者壓力如何怎樣平衡，這些都與傳媒密切相關。

第二層次：媒介社會學。在這種政治經濟架構下，權力和資本如何結合？媒介是既得利益者，如何在不對抗權力結構的前提下謀取最大利益？宏觀的政治經濟影響媒介生態，如何改變主流媒介的記者對「新聞」的看法？現在講「貼近讀者」，合理化的基礎在哪裏？新聞話語與場域是不是比以前大了些？目前中國書籍、網絡和雜誌的言論比較多

元，報紙和電視的控制比較緊；電視新聞緊，娛樂節目鬆。從前台灣的邊緣媒介與主流裏應外合，有競爭，有聯合，在中國大陸如何？

中國政府積極發展網絡，背後是經濟邏輯掛帥。至於言論的管制，當局採用雙管齊下策略，一方面鼓動官方主要媒介上網，「佔據」空間；一方面只允許少數當局信任的人士經營門戶網站(portals)。

《人民日報》網絡版屬下「強國論壇」有很多言論，假如搬上母報分明必屬禁區，中宣部為什麼容忍它的存在？(黃煜：《人民日報》不辦「強國論壇」，其他機構也會辦，與其讓別人辦，不如自己來辦，這也是一個策略。)它的尺度較寬，大概有幾個原因：(一)《人民日報》全國發行，政治權威高，而網絡儘管增長迅速，目前網絡受眾卻只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六，而且教育程度高，絕對是屬於精英分子的「小眾媒介」；(二)非官方的新浪網和搜狐網不許辦論壇，有話要講，只能上《人民日報》、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的網站去；黨國不僅需要「瞭望台」，統一偵察輿論環境，防範未然，也需要給民意類似一個「出氣筒」，這樣其實便於當局管理和應對；(三)我想中宣部那些老派言論警察落伍，通常認為白紙黑字才是真理，他們未必了解小眾媒介和網絡的顛覆力量；(四)何況「強國論壇」內部有專人日夜監視，出軌的訊息貼出幾秒鐘內立遭刪除。

**黃煜：**您剛才講媒介社會學是第二個層次，第三個層次是文本分析？

**李金銓：**中國以前沒有消費的概念，但一下子直接跳到「消費至上」的極端，這裏面階級對立出現了。「依賴性發展」所培養的世界觀、生活形態，是遠方巴黎、好萊塢的「替代式參與」。以滿足這種需求為宗旨的媒介如何推波助瀾？(我現在只是舉例，不可能太詳盡，但大方向就是看媒介如何適應日常生態的變化而產生一系列新條件。)更進一步，媒介到底講了什麼？回答這個問題，需要仔細分析內容。消費、階級、黨……這些詞意起了變化。我們的研究遠遠不夠。北京的報紙各有權力靠山，風格相對多元；南方得風氣之先，比較開放大膽；上海靠的



長官意志，弄得中國金融中心的報紙這麼死氣沉沉。春江水暖鴨先知，中國的變化單看這三個城市不夠，但知過半矣。

**黃煜：**中國現在的主流媒介主要有三套話語：一套是官方話語，官方話語也「與時俱進」，十年前談建立市場經濟，十年後談與國際接軌；第二套是小資情調中產化的媒介，主要體現在非政治的金融、商業方面，現在勢頭強勁，是媒介牟利的巨大來源；第三種是平民話語，情調煽情和市場路線，較接近平民。這三個話語體系並存。自由派的立場主導了很多新聞工作者，譬如胡舒立；還有，新左派和民族主義影響力較大，因為他們站在捍衛國家利益的角度，又把西方的一些後學激進「反全球化」的理論混合在一起。中間是一些技術官僚，專業主義型的，基本上不參與論爭。在「全球化」的整體格局裏面，中國傳媒的變化在深度與廣度上延伸。

**李金銓：**政治經濟環境帶來社會分化的過程。潘忠黨與陸擘(Pan and Lu 2003)的研究顯示，有記者談到「以天下為己任」，這是典型儒家知識份子的承擔；也有人談到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群眾路線；也有人提到受眾和讀者，意識到了市場邏輯和媒介專業意識。英國文化研究先驅威廉姆斯(Williams, 1977)提出三個概念，如果用來分析中國傳媒現象的種種變化，也饒有深刻的意義：(一)支配性的結構(dominant structure)，言論喉舌內有黨國支持，外和其他勢力有聯盟也有競爭，競爭有明有暗；(二)剩餘結構(residual structure)，例如儒家知識份子的情結還在起作用，再反儒家的人都受儒家的影響，何況儒家與共產黨的意理都是政教合一的體系，共產黨怎麼「反儒」都無法全面消滅儒家的積極性或抹煞它的消極性；以及(三)新興結構(emergent structure)，目前就是市場因素的介入，驅動媒介去迎合有錢有閑階級，於是貼近平民的報紙(如《華西都市報》、《北京青年報》)和貼近大都市消閒階級的報紙(如《精品購物指南》、《申江服務導報》)應運而生。威廉姆斯說要看三種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一)支配性意識形態；(二)另類的意識形態，並不反對主

流，但提供另一種不同的解釋，這在今天的中國愈來愈多了；以及(三)敵對的意識形態，在中國目前難以存在。我們觀察主流的支配意識形態如何吸納另類的意識形態，如何攻擊、削弱另類的意識形態，給它貼「修正主義」的標籤。邊緣媒介對主流有沒有抗拒、顛覆，有沒有口是心非？威廉姆斯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分析架構。

我們的研究偏向印刷媒介——對海外學者，印刷媒介較容易獲得——而忽略了廣播電視。廣播電視是流行文化最主要的載體。要瞭解消費文化的興起，首先還是要瞭解流行文化，這一方面我們做得不夠。另一方面，我們的眼光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外加幾個零星都市，瞭解不夠全面。華人學術社群需要一種學術自覺，如果國內國外能有鬆懈的分工合作，是很有意義的。

受眾因為利益的分化，興趣與利益結合，形成一種凝聚力，這種趨勢愈來愈明顯。個人的興趣與群體的興趣不斷分殊。他們如何吸收、解釋媒介的話語，媒介組織如何瞭解受眾需要？上述四個環節不斷互動，持續思考會為我們提供新的空間。總而言之，最重要的還是在中國媒介與現代性的關係：媒介在這個政經脈絡下發展，對於民主化、自由、平等、民主有甚麼意義？如果大家這麼思考，整個研究社群當可建立旗幟鮮明的主體性。

**黃煜：**1998年以後，中國受西方影響的「新左派」提出，中國倘若按目前的方向走下去，就是西方全球體系中的一個環節。他們旗幟鮮明，反對這樣一種現代化。的確，怎麼樣的現代化，在大陸思想界產生了有趣的爭論。

**李金銓：**以前不太可能討論這個問題。新左派的精神和語境，我是懷有同情的，但將西方最激進的話語放到中國的脈絡是否完全恰當？哈貝馬斯到中國訪問，對於中國新左派急於引用他的左派論述，以建立自己反帝的立場，卻反而容忍專制政權，言下頗不以為然。我覺得他們比毛澤東在革命時期提出的反封反帝的「雙反政策」還退步。(毛專權以後

只「反帝」不「反封」，或以「封建」的罪名整肅政敵——他自己是最大的封建幫主，這是另話。)自由派現在希望以「國際」抗衡「國內」專制政府，熱衷「反封」多於「反帝」

我認為這兩派是一個悖論，不是誰對誰非——可能兩個都對，但對的理由不同。但我不是和稀泥的折中主義者，而是傾向於看在哪一個脈絡底下哪一個講法比較有道理。我對自由派反專制統治，和對新左派反對在全球化以後因政治經濟霸權衍生的文化霸權，都有深刻的同情。但在理論上，最激進的後學搬到中國，我倒是有一點保留。反對「現代化」，和反對「現代化理論」，這是兩回事；正如我們反對帝國主義，但也可以反對「反對帝國主義」的某一種理論。新左派提高人們對於全球結構制宰力量的警覺，但完全嫁禍於國際資本主義，而不將國內政府與人民的關係提上合理的討論層次，這是有問題的。

**黃煜：**英國和美國的文化應該有一貫脈絡，但是知識份子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分野很厲害。

**李金銓：**我看不必「在先驗上」像唐吉哥德般反對資本主義，全球資本主義架構，不是你要它走掉就會走掉。問題是選擇哪一種資本主義，當然各國選擇的能力不同。中國將被納入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的架構中，卻長期與歐美隔絕，現在接軌只怕得到封閉的壞處，沒有得到隔離的好處。歐美不可能吞噬中國，中國也不可能吞噬歐美，問題是如何互相滲透，取精用弘。當然，很多事不是自己主觀解決得了的，但如果知道要什麼，在主客觀權衡中也比較知所選擇。全球化不止是華爾街、好萊塢的宰制，也是人權問題國際化，對抗暴力，保護環境，真的一無是處嗎？全球化既「分」(如巴爾幹半島)也「合」(如歐洲聯盟)，很複雜。

新左派各抒己見，就是蒙中國「開放」的好處，其憑藉的理據更是歐美最新潮的激進「反現代化」或「反全球化」思想。全球化不應該只有一個權力中心說了算。自由派提到全球化提高中國的透明度，讓中國接受國際的規範——在某個程度，我同意。這次的SARS危機，倘非世

界衛生組織向中國施加壓力，情況不知會有多糟。從前閉關自守，當局幾乎滴水不漏地封鎖唐山大地震的消息，現在門戶打開了，卻無法封鎖SARS的消息。時代不同了，全球各地的命運緊綁在一起，何況中國渴望國際社群伸出手歡迎它。中國當局起初一味隱瞞SARS的疫情，為的是牽涉到民族「面子」、經濟利益和個人官位。中國後來公開疫情，怕世衛組織宣佈中國為疫區以至於打擊投資和旅遊，着眼點不在人命，而是在錢。這個傳染病關係全世界共同安全和福祉，不許中國自己關起門來撒謊。這個外在的壓力，我看是好事，不是壞事。

# 跋

---

書之有題，如人之有眉，為的是傳達整體的信息、印象和精神。我為這本文集選題，可謂躊躇再三，終於勉強定為《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但望借助它勾勒並統一各篇章的主題，鮮明其義，庶幾安頓部分與部分、部分與整體之間的聯繫。書名縱使定下來了，我仍然惴惴不安，因為人貴自知，以我淺薄的學力實在扛不動這面大旗，害怕壯膽未成，反而欲蓋彌彰。繼而思之，這不過是一種述志和勵志的期望罷了，不妨當作目前工作的報告和將來努力的方向，這樣一想心裏踏實多了。

有了這個諒解，我就可以簡單的破題了。本書的「中國」指的是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三個華人社會，即是杜維明說的「文化中國」第一圈。回想我生長於台灣，長期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任教，又乘各個不同的階段不斷回到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工作，這些年還經常到大陸各地從事學術交流。這些或深或淺的因緣難得湊合在一起，不期然培養了我思考和觀察的習慣：其一，即從世界看中國，從中國看世界；其二，我生活於「文化中國」之中，以局內人的身份熱心參與，但也跳出生活的格局，從局外人的邊緣位置冷眼旁觀，來來回回總以中港台三個實體的軌跡互相參證，求其同中之異和異中之同。

「現代性」是西方社會科學百年來所探討的主題，各種理論和學派多不勝數，我不敢也不必進去書齋裏尋章摘句辯論「現代性」是甚麼。<sup>1</sup>

---

1 可以參考陳海文(2002)，金耀基(2004)。

暫時撇開自由派和激進派的話語，我的工作定義是：政治生活民主而開放，新聞自由而負責，經濟發展富足而平等，文化表達多元豐富而自主。這些綱目已然是歷久彌新的普世價值，儘管在不同社會脈絡裏會產生特殊的闡釋，然而所有的「變奏」都不能扭曲或偏離「主旋律」太遠。近代中國經歷種種運動，發表種種宣言，進行種種壓迫和遭遇種種反抗，一百年前吹這個基調，現在吹這個基調，一百年後我確信還會吹這個基調。然而過去數十年來「文化中國」所面臨的現代性挑戰——中國大陸從「反現代性」到擁抱全球化的黨國資本主義，台灣從威權統治到形式的民主秩序，以及香港從殖民統治的自由秩序到主權回歸——代表了波瀾壯闊的變化，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也具有普遍的世界意義。「現代性」一時可望不可及，仍應懸為孜孜奮鬥不懈的目標；即令可望復可及，除非我們小心維護它，也可能得而復失。當然，這些價值必須不斷注入新的內容，才不會過時。

「傳媒」與「中國的現代性」究竟如何交叉辯證地聯繫在一起？我的取徑不是像往常許多研究，只探索單方向的簡單因果，而是全方位刻劃彼此之間的交光互影，並且盡可能從大處着眼，小處着手，宏觀微觀並舉，規律與意義互補。傳媒不是抽象而孤立地存在，而是政治經濟文化脈絡的一部分，必須納入更大歷史的架構裏具體考察；然而，傳媒畢竟是現代社會意義的重要製造者，是反映社會價值與脈動的一面窗戶，也是社會力量合縱連橫、折衝樽俎的中心場域。因此，我的分析採取兩個聚焦，一是從政治經濟文化脈絡動態地檢查傳媒的結構、過程、內容及其影響，二是從傳媒的變化窺視政治經濟文化脈絡的遞嬗與互動。追究到最後，實在是一體的兩面，關係非常複雜甚至矛盾，不能簡單化和真空化。

我長期住在美國，只能用英文撰寫學術論著，偶而抽暇用中文寫時評或雜文，在語文上不啻斷了半臂，有時不免引以為憾。所幸這次回到香港城市大學，決定遴選一束主題相聯的英文論文，逐譯或改寫成中文

彙集成冊，以償夙願，並就教於華文世界的朋友們。書內少數文章已在期刊發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的《二十一世紀》惠撥許多篇幅支持，並承主編劉青峰教授多方鼓勵。但因為當時為了遷就篇幅的限制，中文版通常比英文原版濃縮得多。承劉擎、張詠和任曉雯幫助翻譯幾篇文章，已在各章註明，現在特別再次致謝。其他篇章由我口述錄音，由研究助理石琳整理初稿，再由我自己修訂潤飾。各文均經原刊載者授權同意收入。它們幾乎都通過了黃煜博士的法眼，他是我在學術上的知音，一直用最高的標準要求我，並用最大的熱情支持我。我也借這個機會謝謝牛津大學出版社林道群先生對本書出版的費心。

本書獲得香港教資局大學研究計劃撥款委員會(CERG-City U 1246/03H)和香港城市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的資助，謹深致謝意。

最後，林雲大師三十年來在出世和入世方面不懈的教誨，我毋時或忘，本書的一些看法深受他的啟發。嘉琪無私的奉獻，聊以此書為報。居安和居明已經自立了，但我常常思念他們。

2004年8月1日於香港





# 參考書目

---

## 英文部分

- Allen, Jamie (1997), *Seeing Red: China's Uncompromising Takeover of Hong Kong*. Singapore: Butterworth-Heinemann Asia.
- Allport, Floyd (1937), "Toward a Science of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7-23.
- Amsden, Alice H. (2002), "Why are Globalizers so Provincial?"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1, op-ed page.
- Appleton, Sheldon (1970), "Silent Students and the Future of Taiwan," *Pacific Affairs*, 43: 227-239.
- Arendt, Hannah (1968), *The Origin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Press.
- Arkush, R. David, and Leo Oufan Lee (eds.) (1989), *Land Without Ghosts: Chinese Impressions of America from the Mid-Nineteen Century to the Presen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agdikian, Ben (1971), *The Information Machin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Bagdikian, Ben (1992), *The Media Monopoly*. Boston: Beacon.
- Bagdikian, Ben (2000), *The Media Monopoly* (6<sup>th</sup> edition). Boston: Beacon.
- Barme, Geremie (1999),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arnett, Suzanne Wilson, and John King Fairbank (eds.) (1985),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eck, Simon (1997), "Anchors Aweigh in the Great Ratings Wa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e 30, p. 23.
- Bennett, Amanda (1990), "American Reporters in China: Romantics and Cynics," in Chin-Chuan Lee (ed.), *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 Bennett, W. Lance (1990), "Toward a Theory of Press-state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0: 103-125.
- Bennett, W. Lance (1994), "The News about Foreign Policy," in W. Lance Bennett and David L. Paletz (eds.), *Taken by Stor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nnett, W. Lance, and R. G. Lawrence (1995), "News Icons and the Mainstreaming of Social Chang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5: 20-39.
- Bennett, W. Lance, L. Gressett, and William Haltom (1985), "Repairing the News: a Case Study of the News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5: 50-68.
- Berger, Peter (1963), *Invitation to Sociology: A Humanistic Perspectiv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Berger, Peter (1986), *The Capitalist Revolution: Fifty Propositions about Prosperity, Equality, and Liberty*. New York: Basic.
- Berlin, Isaiah (1969),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rnstein, Richard and Ross H. Munro (1997),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Knopf.
- Boulding, Kenneth (1990), *Three Faces of Power*. Newbury Park, CA: Sage.
- Bourdieu, Pierre (2001), "Uniting to Better Dominate," *Items and Issues*, 2, 3-4: 1-6.
- Boyle, Marc (1992), *The Future of Television*. Linchwood, Ill: NTC Business Books.
- Breed, Warren (1955), "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 *Social Forces*, 33: 326-335.
- Buerk, S. (1997). "Anchors Aweigh in the Great Ratings War," *South Morning Post*, June 30, p. 23.
- Caporaso, James A., and David P. Levine (1992), *Theories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rdoso, Henrique Fernando, and Enzo Faletto (1979),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arey, James (1986), "The Dark Continent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Robert Manoff and Michael Schudson (eds.), *Reading the News*. New York: Pantheon.
- Carey, James (1992),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 Carey, James (1997), "The Press,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Discourse: on the Edge of the Postmodern," in Eva Stryker Munson and Catherine A. Warren (eds.),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halmers, Johnson (1962),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n, Joseph Man (1994), "National Responses and Accessibility to Star TV in Asi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4, 3: 112-131.
- Chan, Joseph Man, and Chin-Chuan Lee (1984), "Journalistic Paradigms on Civil Protests: A Case Study in Hong Kong," in Andrew Arno and Wimal Dissanayake (eds.), *The News Media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Boulder, CO: Westview.
- Chan, Joseph Man, and Chin-Chuan Lee (1988), "Press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Control in Hong Ko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5, 2: 185-197.
- Chan, Joseph Man, and Chin-Chuan Lee (1991),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 Hong Kong's Press in China's Orbit*. New York: Guilford.
- Chan, Ming K., and David Clark (eds.) (1991), *The Hong Kong Basic Law: Blueprint for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Under Chinese Sovereign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Chanda, Kayan, and Kari Huus (1995), "The New Nationalism,"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58, 45, November 9, 20-26.
- Chang, Hao (1971),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ang, Maria Hsia (2001), *Return of the Dragon: China's Wounded Nationalism*. Boulder, CO: Westview.
- Chang, Tsan-kuo (1990), "Reporting U.S.-China Policy, 1950-1984: Presumptions of Legitimacy and Hierarchy," in Chin-Chuan Lee (ed.), *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 Chang, Won Ho (1989), *Mass Media in China: The History and The Future*.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Cheek, Timothy (1994), "From Priests to Professional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under the CCP," in Jeffrey N. Wasserstrom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Learning from 1989* (2nd edi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 Cheek, Timothy (1997), *Propaganda and Culture in Mao's China: Deng Tuo and the Intelligentsia*. Oxford, UK: Clarendon.
- Chen, Chongshan, Jian-Hua Zhu, and Wei Wu (1998), "The Chinese Journalist," in David Weaver (ed.), *The Global Journalist*. Cresskill, NJ: Hampton.
- Chen, Huailin, and Chin-Chuan Lee (1998), "Press Finance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in Joseph Y.S. Cheng (ed.), *China Review, 1998*.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Chinoy, Mike (1999), *China Live: People Power and the Television Revolution*.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Chomsky, Noam (1990), *Necessary Illusions: 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Boston: South End.
- Chu, Godwin C., and Leonard L. Chu (1983), "Mass Media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An Analysis of Letters to the Editor," in Godwin C. Chu and Francis L. K. Hsu (eds.), *China's New Social Fabric*.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 Cohen, A. Akiba, Levy, I. Mark R., Roeh and Michael Gurevitch (eds.) (1996), *Global Newsrooms, Local Audiences: A Study of the Eurovision News Exchange*. London: J. Libbey.
- Cohen, Bernard (1963), *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urran, James (1978), "The Press as an Agency of Social Control: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George Boyce, James Curran and Pauline Wingate (eds.), *Newspaper History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Constable.
- Curran, James (1991), "Mass Media and Democracy: A Reappraisal," in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Arnold.
- Curran, James (2000), "Rethinking Media and Democracy," in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Arnold.
- Curran, James, and Myung-jin Park (eds.) (2000), *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 Dahlgren, Peter (1995), *Televis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Citizenship, Democracy, and the Media*. London: Sage.
- Dahlgren, Peter (2000), "Media, Citizenship and Civic Culture," in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eds.) (2000),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Arnold.
- Dai, Jinhua (2001), "Beyond Global Spectacle and National Image Making," *Positions*, 9, 1: 161-186.
- Dayan, Daniel, and Elihu Katz (1992), *Media Event: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eBary, William Theodore (1983),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DeWoskin, Kenneth (2001), "The WTO and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167, 1: 630-654.
- Dimbleby, Jonathan (1997), *The Last Governor: Chris Patten and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 London: Warner Books.
- Dionisio, Eleanor R. (1986), "Small Media, Big Victory," *Media Development*, 22, 4: 6-8.
- Dittmer, Lowell (1973), "The Structural Evolution of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China Quarterly*, 56: 708-729.
- Dittmer, Lowell (1974), "Mass Line and 'Mass Criticism'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Fall of Liu Shao-ch'i," *Asian Survey*, 13: 772-792.

- Dittmer, Lowell (1994), "The Politics of Publicity in Reform China," in Chin-Chuan Lee (ed.),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Boulder, CO: Westview.
- Domes, Jurgan (1981), "Political Differentiation in Taiwan: Group Formations within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Opposition Circles, 1979-1980," *Asian Survey*, 21: 1029-1039.
- Donohue, Philip, Phillip J. Tichenor and Clarice Olién (1995), "A Guard Dog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of the Medi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5, 2: 115-132.
- Donsbach, Wolfgang, and Bettina Kleft (1993), "Subjective Objectivity. How Journalists in Four Countries Define a Key Term of their Profession," *Gazette*, 51: 53-83.
- Downing, John (1996), *Internationalizing Media Theory: Transition, Power, Culture: Reflections on Media in Russia, Poland and Hungary, 1980-95*. London: Sage.
- Downing, John (2001), *Radical Media*. Thousand Oaks, CA: Sage.
- Dreier, Peter (1982), "The Position of the Press in the U.S. Power Structure," *Social Forces*, 29: 298-310.
- Duara, Prasenjit (1996), "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 in Jonathan Unger (ed.) *Chinese Nationalism*. Armonk, NY: Sharpe.
- Economist (2002), "Is it at Risk?" *February 2*, pp. 65-68.
- Edelman, Murray (1988), *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 Spectac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isenstadt, S. N., and Rene Lernarchand (eds.) (1981), *Political Clientelism, Patronage, and Development*. Beverly Hills, CA: Sage.
- Elliot, Dorinda (1996), "Betrayed?" *Newsweek*, May 13, pp. 37-38.
- Entman, Robert M. (1989), *Democracy without Citizens: Media and the Decay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nzenberger, Hans Magnus (1977), "Televis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iberation," in Douglas Davis (ed.), *The New Television: A Public/Private Ar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Esherrick, J. W.,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1994), "Acting out Democracy: Political Theater in Modern China," in Jeffrey N. Wasserstrom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A Learning from 1989*. Boulder, CO: Westview.
- Evans, Peter (1979), *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Evans, Peter (1987), "Dependency and the State in Recent Korean Development: Some Comparisons with Latin American NICs," in Kyong-Dong Kim (ed.), *Dependency Issues in Korean Development: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Seoul: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Fairbank, John King (1976), "Our One-China Problem," *Atlantic Monthly*, September.
- Fairbank, John King (1979),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eatherstone, Mike (ed.) (1990),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A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Special Issue*. Newbury Park, CA: Sage.
- Featherstone, Mike (1995), *Undoing Culture: Globalization, Postmodernism and Identity*. London: Sage.
- Featherstone, Mike, and Scott Lash (1995), "Globalization, Modernity and the Spatialization of Soci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in Mike Featherstone, Scott Lash and Roland Robertson (eds.), *Global Modernities*. London: Sage.

- Festa, Regina, and Luiz Santoro (1987), "Policies from Below-Alternative Video in Brazil," *Media Development*, 23, 1: 27-30.
- Feuer, Lewis Samuel (1969), "Introduction," in Lewis Samuel Feuer (ed.), *Marx and Engels: Basic Writing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Collins.
- Fishman, Mark (1980), *Manufacturing the New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Fiske, John (1989), *Television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Fiss, Owen M. (1996), *Liberalism Divided: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Many Uses of State Power*. Boulder, CO: Westview.
- Franz, Schurmann (1968),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reiberg, J. W. (1981), *The French Press: Class, State and Ideology*. New York: Praeger.
- Friedman, Edward (ed.) (1994),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Generalizing East Asian Experiences*. Boulder, CO: Westview.
- Friedman, Edward (1997), "Chinese Nationalism, Taiwan Autonomy and the Prospects of a Larger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6, 14: 5-32.
- Friedman, Thomas L. (1999),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Fukuyama, Francis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 Fung, Anthony, and Chin-Chuan Lee (1994), "Hong Kong's Changing Media Ownership: Uncertainty and Dilemma," *Gazette*, 53: 127-133.
- Galbraith, Kenneth (1983), *The Anatomy of Pow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Gamson, William A. (1988),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to Mass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11: 161-174.
- Gamson, William A., and K. E. Lasch (1983),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Social Welfare Policy," in Shimon E. Spiro and Ephraim Yuchtman-Yaar (eds.), *Evaluating the Welfare State: Soci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Gamson, William A., and A. Modigliani (1987), "The Changing Culture of Affirmative Action," in R. G. Braungart and M. M. Braungart (eds.), *Research in Political Sociology*, Vol. 3. Greenwich, CN: JAI Press.
- Gamson, William A., and A. Modigliani (1989),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 1-37.
- Gan, Yang (1998), "A Critique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in the 1990s," *Social Text*, 16, 2: 45-66.
- Gans, Herbert J.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New York: Pantheon.
- Garnett, J. C. (1994), "The National Interest Revisited," in Kenneth W. Thompson (ed.), *Community, Diversity, and a New World Order: Essays in Honor of Inis L. Claude, Jr.*.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Garnham, Nicholas (1990),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Sage.
- Garrett, Banning (2001), "China Faces Debates, the Contradictions of Globalization," *Asian Survey*, 41, 3: 409-427.
- Geertz, Clifford (1963), *The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 Giddens, Anthony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nthony (1994),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Cambridge, UK: Polity.
- Giddens, Anthony (1996), *In Defence of Sociology: Essays, Interpretations, and Rejoinders*. Cambridge, UK: Polity.
- Giddens, Anthony (1998),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MA: Polity.
- Gitlin, Todd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tlin, Todd (1997), "The Anti-Political Populism of Cultural Studies," in Marjorie Ferguson and Peter Golding (eds.), *Cultural Studies in Question*. Newbury, CA: Sage.
- Gleick, James (1987), *Chaos: Making a New Science*. New York: Viking.
- Gold, Thomas (1986),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Armonk, NY: Sharpe.
- Gold, Thomas (1993), "Go with Your Feelings: Hong Kong and Taiwan Popular Culture in Greater China," *China Quarterly*, 136: 907-925.
- Goldenberg, Edie (1975), *Making the Paper: the Access of Resource-poor Groups to the Metropolitan Press*.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 Golding, Peter, and Graham Murdock (1991), "Culture, 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James Curran and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Arnold.
- Golding, Peter, and Graham Murdock (eds.) (199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 2 volumes. Brookfield, Vermont: Elgar.
- Goldman, Merle (1994), "The Role of the Press in Post-Mao Political Struggles," in Chin-Chuan Lee (ed.),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Boulder, CO: Westview.
- Gouldner, Alvin W. (1976), *The Dialectic of Ideology and Technology: The Origins, Grammar, and Future of Ide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unther, Richard, and Anthony Mughan (eds.) (2000), *Democracy and the Medi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denius, Stig (1983), "The Rise and Possible Fall of the Swedish Party Pre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0: 287-310.
- Hall, Stuart (1977), "Culture, the Media and the 'Ideological Effect,'" in James Curran, Michael Gurevitch and Janet Woollacott (ed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London: Arnold.
- Hallin Daniel (1986a), *The "Uncensored" War: The Media and Vietn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in, Daniel (1986b), "Cartography, Community, and the Cold War," in Robert Manoff and Michael Schudson (eds.), *Reading the News*. New York: Pantheon.
- Hallin, Daniel (1994), *We Keep America on Top of the World: Television 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New York: Routledge.
- Hallin, Daniel (2000), "Media, Political Power, and Democratization in Mexico," in James Curran and Myung-Jin Park (eds.), *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 Hamrin, Carol Lee (1994), "China's Legitimacy Crisis: The Central Role of Information," in Chin-Chuan Lee (ed.),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Boulder, CO: Westview.
- Hardt, Hanno (1992),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 Hayward, Philip (1989), "Video, Democracy and Independence," *Media Development*, 25, 4: 5-7.
- He, Zhou (2000),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ss in a Tug of War: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 of the 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 in Chin-Chuan Lee (ed.),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Herman, Edward, and Noam Chomsky (1988), *Manufacturing Consent*. New York: Pantheon.
- Higgins, B. (1977),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Seamless Web or Patchwork Quil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5, supplement: 99-122.
- Hilgartner, Stephen, and C. L. Bosk (1988), "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al Problems: A Public Arena Mode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53-78.
- Hoffman, David, and Will Duggan (1988), "Guerrilla Media: A Citizen's Guide to Using Electronic Media for Social Change, the Inside Story from Tony Schwartz," a video program produced by Varied Directions, Inc.
- 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HKJA] (1996), "China's Challenge: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 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HKJA] (1997), "The Die Is Cast: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Hong Kong on the Eve of the Handover of China," annual report.
- 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HKJA] (1998), "Questionable Beginnings: a Report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the Hong Kong SAR One Year after the Change of Sovereignty," annual report.
- Hood, Marlowe (1994), "The Use and Abuse of Mass Media by Chinese Leaders during the 1980s," in Chin-Chuan Lee (ed.),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Boulder, CO: Westview.
- Horgan, John (1990), "Profile: Free Radical - a Word or Two about Noam Chomsky." *Scientific American*, 262, 5: 40-44.
- Howkins, John (1982), *Mass Communication in China*. New York: Longman.
- Huang, Mab (1976), "Intellectual Ferment for Political Reforms in Taiwan, 1971-1973,"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28.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Huang, Philip C. (1972), *Liang Ch'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Huang, Yasheng (1995), "Why China Will Not Collapse," *Foreign Policy*, 99: 54-68.
- Huang, Yu, and Chin-Chuan Lee (2003), "Peddling Party Ideology for a Profit: Chinese Media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the 1990s," in Gary Rawnsley and Ming-yeh Rawnsley (eds.), *Chine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London: RoutledgeCurzon.
- Huntington, Samuel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1993),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1, 3: 22-49.
- Jansen, Sue Curry (1991), *Censorship: The Knot That Binds Power and Knowled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tz, Elihu (1992), "The End of Journalism? Notes on Watching the Persian Gulf Wa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2: 26-41.
- Katz, Elihu, and George Wedell (1977), *Broadcasting in the Third World: Promise and Perform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eane, John (1991), *Media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K: Polity.

- Keatley, Robert L. (2003),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a Market Economy," *China Policy Series*, No. 19.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 Kim, Kyu (1988), "South Korean Protest Movements Discover New Ways to Communicate," *Media Development*, 24, 1: 8-9.
- Kelman, Herbert C. (1961), "Processes of Opinion Chang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5: 57-78.
- King, Ambrose Y. C. (1975), "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 Emphasis on the Grass Roots Level," *Asian Survey*, 15: 422-439.
- King, Ambrose Y. C. (1988), "The Hong Kong Talks and Hong Kong Politics," in Jurgen Domes and Yu-ming Shaw, (eds.), *Hong Kong: A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Concern*. Boulder, CO: Westview.
- Kirpatrick, Jean (1982), *Dictatorship and Double Standards: Rationalism and Reason in Politic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Knight, Alan, and Yoshiko Nakano (eds.) (1999), *Reporting Hong Kong: Foreign Media and the Handover*. London: Curzon.
- Kocher, R. (1986), "Bloodhounds or Missionaries: Role Definitions of German and British Journalist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 46-65.
- Kristof, Nicholas (1992), "A Dictatorship that Grew Up: In Taiwan, Despotism Passes Posthaste into Democracy,"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February 16, pp.16-21, 53, 56-57.
- Kristof, Nicholas, and Sheryl WuDunn (1994), *China Wakes*. New York: Times Books.
- Kuhn, Thoma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ng, Gladys, and Kurt Lang (1981), *Batting for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ang, Ya-ling (1994), "Cable Television Development in Taiwan," unpublished M.A. projec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 Latham, Kevin (2000), "Nothing but the Truth: News Media, Power and Hegemony in South China," *China Quarterly*, 163: 633-654.
- Lau, Siu-kai (1982),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Lee, Chin-Chuan (1980), *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The Homogenizing of Television Culture*. Beverly Hills, CA: Sage.
- Lee, Chin-Chuan (1985), "Partisan Press Coverage of Government News in Hong Kong," *Journalism Quarterly*, 62: 770-776.
- Lee, Chin-Chuan (ed.) (1990), *The 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 Lee Chin-Chuan (1990a), "Mass Media: Of China, About China," in Chin-Chuan Lee (ed.), *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 Lee, Chin-Chuan (1993), "Sparking a Fire: the Press and the Ferment of Democratic Change in Taiwan," *Journalism Monographs*, no. 128.
- Lee, Chin-Chuan (ed.) (1994),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Boulder, CO: Westview.
- Lee, Chin-Chuan (1997), "Media Structure and Regime Change in Hong Kong," in Ming K. Chan (ed.), *The Challenge of Hong Kong's Reintegration with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Lee, Chin-Chuan (1998a), "Press Self-Censorship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Hong Kong,"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 and Politics*, 3, 2: 55-73.
- Lee, Chin-Chuan (1998b), "Conglomeration, Professionalism, and Strategic Rituals: The Hong Kong



- Press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Jerusalem, Israel, July 20-25.
- Lee Chin-Chuan (1999), "State Control, Media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Concerns: The Politics of Cable Television in Taiwan," *Studies of Broadcasting*, Tokyo: NHK. Japanese version (no. 48, pp. 227-259) and English version (no. 34, pp. 127-151).
- Lee, Chin-Chuan (ed.) (2000),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Lee, Chin-Chuan (2000a), "Chinese Communication: Prisms, Trajectories, and Modes of Understanding," in Chin-Chuan Lee (ed.),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Lee, Chin-Chuan (2000b), "The Paradox of Political Economy: Media Structures, Press Freedom, and Regime Change in Hong Kong," in Chin-Chuan Lee (ed.),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Lee, Chin-Chuan (2000c), "China's Journalism: The Emancipatory Potential of Social Theory," *Journalism Studies*, 1, 4: 559-576.
- Lee, Chin-Chuan (2000d), "State, Capital, and Media: the Case of Taiwan," in James Curran and Myung-Jin Park (eds.), *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 Lee, Chin-Chuan (2001a), "Rethinking Political Economy: Implications for Media and Democracy in Greater China," *Javnost/the Public*, 8, 4: 81-102.
- Lee, Chin-Chuan (2001b), "Servants of the Party or the Market: Media and Journalists in China," in Jeremy Tunstall (ed.), *Media Occupations and Professions: A Rea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e, Chin-Chuan (2001c), "Beyond Orientalist Discourses: Media and Democracy in Asia," *Javnost/the Public*, 8, 2: 7-20.
- Lee, Chin-Chuan (2002a), "Established Pluralism: US Elite Media Discourse about China Policy," *Journalism Studies*, 3, 3: 343-357.
- Lee, Chin-Chuan (ed.) (2003),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 Lee, Chin-Chuan (2003a), "The Global and the National of the Chinese Media: Discourses, Market, Technology, and Ideology," in Chin-Chuan Lee (ed.),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London: RoutledgeCurzon.
- Lee, Chin-Chuan (2003b), "Liberalization without Full Democratization: Guerrilla Media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in Taiwan," James Curran and Nick Couldry (eds.), *Contesting State Power*. Lanham, MD: Roman and Littlefield.
- Lee, Chin-Chuan, and Joseph Man Chan (1990a), "Government Management of the Press in Hong Kong," *Gazette*, 46: 125-139.
- Lee, Chin-Chuan, and Joseph Man Chan (1990b), "The Hong Kong Press in China's Orbit: Thunder of Tiananmen," in Chin-Chuan Lee (ed.), *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 Lee, Chin-Chuan, and Jung-hye Yang (1995), "National Interest and Foreign News: Comparing U. S. and Japanese Coverage of a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Gazette*, 56: 1-18.
- Lee, Chin-Chuan, Chi-hsien Chen, Joseph Man Chan, and Paul Siu-nam Lee (1996), "Partisanship and Professionalism: Hong Kong Journalists in Transition," *Gazette*, 57: 1-15.

- Lee, Chin-Chuan, Zhongdang Pan, Joseph Man Chan, and Clement Y. K. So (2001), "Through the Eyes of U.S. Media: Banging the Democracy Drum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2, 2: 345-365.
- Lee, Chin-Chuan, Joseph Man Chan, Zhongdang Pan, and Clement Y. K. So (2002), *Global Media Spectacle: News War over Hong Kong*.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Lee, Paul Siu-nam, and Leonard Chu (1998), "Inherent Dependence on Power: the Hong Kong Press in Political Transiti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 59-77.
- Lerner, Daniel (1958),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Glencoe, IL: Free Press.
- Lerner, Daniel, and Wilbur Schramm (eds.) (1967), *Communication and Change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Honolulu, HI: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 Levenson, Joseph (1959),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 (2nd edi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 Hongshan (1997), "China Talks Back: Anti-Americanism or Nation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6, 14: 153-160.
- Liao, Kuang-sheng (1984), *Antiforeignism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1960-1980*.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Lin, Yutang (1936),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ink, Perry (1992), *Evening Chats in Beijing: Probing China's Predicament*. New York: Norton.
- Linz, Juan (1974),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F. Greenstein and N.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Lippmann, Walter (1922),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Liu, Alan P. L. (1975), *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u, Alan P. L. (2000), "A convenient Crisis: Looking Behind Beijing's Threats against Taiwan," *Issues and Studies*, September-October, 83-121.
- Liu, Junning (2000), "Classical Liberalism Catches on in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11, 3: 48-57.
- Liu, Shaoqi (1967), "How to be a Good Communist?" in Franz Schurmann and Orville Schell (eds.),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 Lu, Keng (1994), "Press Control in 'New China' and 'Old China'," in Chin-Chuan Lee (ed.),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Boulder, CO: Westview.
- Lukes, Steven (1974), *Power: Radical View*. London: Macmillan.
- Ma, Eric Kit-wai (2000), "Rethinking Media Studies: the Case of China," in James Curran and Myung-jin Park (eds.), *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 Mahlasela, D. G. (1990), "Mass Media and Social Movement Legitimation: A Comparison of South Korean and Chinese Movements," unpublished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 Manoff, Robert K. and Michael Schudson (eds.) (1986), *Reading the News*. New York: Pantheon.
- Mao, Zedong (Jan. 5, 1979), "On Constructing Rural Surveys," *Beijing Review*, 12-15.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1).
- McChesney, Robert (1999), *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McManus, John H. (1994), *Market-driven Journalism*. Thousand Oaks, CA: Sage.

- Merton, Robert K.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 Merton, Robert K. (1971), "Insiders and Outsiders: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7: 9-47.
- Middleton, David, and Derek Edwards (1990), *Collective Remembering*. London: Sage.
- Mills, C. Wright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ners, N. J. (1977),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tchell, Robert E. (1969), "How Hong Kong Newspapers Have Responded to 15 Years of Rapid Social Change," *Asian Survey*, 9: 673-678.
- Moore, Barrington (1967),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 Mosco, Vincent (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Rethinking and Renewal*. London: Sage.
- Mowlana, Hamid (1979), "Technology Versus Tradition: Communication in the Iranian Revolu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9, 3: 107-112.
- Murdock, Graham (1982), "Large Corporations and the Control of the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in Michael Gurevitch et al (ed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New York: Methuen.
- Nathan, Andrew James (1985), *Chinese Democracy*. New York: Knopf.
- Nimmo, Dan and James E. Combs (1990), *Mediated Political Realities* (2nd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 Nolle-Neumann, Elisabeth (1993), *The Spiral of Silence: Public Opinion, Our Social Sk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Nye, Joseph S. Jr. (1990),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 Nye, Joseph S. Jr. (2002),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Donnell, Guillermo A. (1973),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Berkeley, C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O'Donnell, Guillermo A. (1978), "Reflections on the Pattern of Change in the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State," *Latin American Studies*, 8: 3-38.
- O'Donnell, Guillermo,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 (eds.) (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Packenham, Robert (1973), *Liberal America and the Third Worl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deas in Foreign Aid and Social Sci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age, Benjamin I. (1996), *Who Deliber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an, Zhongdang (2000), "Improvising Reform Activities: The Changing Reality of Journalistic Practice in China," in Chin-Chuan Lee (ed.),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Pan, Zhongdang, and G. M. Kosicki (1993), "Framing analysis: An Approach to News Discour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0: 55-75.
- Pan, Zhongdang, Chin-Chuan Lee, Joseph Man Chan and Clement Y. K. So (1999), "One Event, Three Stories: Media Narratives of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 in Cultural China," *Gazette*, 61: 99-112.

- Park, Robert Ezra (1922), *The Immigrant Press and Its Social Control*. New York: Harper.
- Pan, Zhongdang, and Joseph Man Chan (2000), "Encoding the Communist Ideological Domination: Changing Modes of Television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China," in Michael Richards (ed.), *Television in Asia*. New Delhi: Sage.
- Pan, Zhongdang, and Ye Lu (2003), "Localizing Professionalism: Discursive Practices in China's Media Reforms," in Chin-Chuan Lee (ed.),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London: RoutledgeCurzon.
- Park, Robert Ezra (1940), "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5: 669-686.
- Passin, Herbert (1963), "Writer and Journalist in the Transitional Society," in Lucian W. Pye (ed.), *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atten, Chris (1997), *Letters to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s.
- Patterson, Thomas E. (2000), "The United States: News in a Free-Market Society," in Richard Gunther and Anthony Mughan (eds.), *Democracy and the Medi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tterson, Thomas E., and Wolfgang Donsbach (1993), "Press-Party Parallelism: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 Washington, DC, May 28.
- Polumbaum Judy (1990), "The Tribulations of China's Journalists after a Decade of Reform," in Chin-Chuan Lee (ed.), *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 Polumbaum, Judy (1994), "Striving for Predictability: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Media Management in China," in Chin-Chuan Lee (ed.),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Boulder, CO: Westview.
- Polumbaum, Judy (2003), "Capturing the Flame: Aspiration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Beijing's 2008 Olympics," in Chin-Chuan Lee (ed.),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London: RoutledgeCurzon.
- Pomorski, Jerzy M. (1989), "Alternative Video in Poland," *Media Development*, 25, 4: 2021.
- Pool, Ithiel de sola (1952), *Prestige Paper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ool, Ithiel de sola (1973), "Communication in Totalitarian Societies," in Ithiel de sola Pool, and Wilbur Schramm (eds.),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Chicago: Rand McNally.
- Pool, Ithiel de sola (1990), *Technologies without Boundaries: on Telecommunications in a Global A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rewitt, Kenneth (2002), "The Social Science Project: Then, Now and Next," *Items and Issues*, 3, 1-2: 1, 5-9.
- Przeworski, Adam (1991),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ye, Lucian (1996), "How China's Nationalism was Shanghaied," in Jonathan Unger (ed.), *Chinese Nationalism*. Armonk, NY: Sharpe.
- Rachman, Gideon (1996) "Containing Chian," *Washington Quarterly*, 19, 1: 129-139.
- Rawls, John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gers, Everett M. (1962),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4th edition, 1995). New York: Free Press.
- Rogers, Everett M. (1976),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Passing of the Dominant Paradigm,"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 213-240.
- Rogers, Everett M. (1994), *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New York: Free Press.

- Rosen, Stanley (1989), "Public Opinion and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22, 2/3: 153-170.
- Rosen, Stanley (2000), "Seeking Appropriate Behavior under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Chin-Chuan Lee (ed.), *Money, Power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Rosen, Stanley (ed.) (1997), "Nationalism and Neoconservatism in China in the 1990s," *Special Issue of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November-December, No.6.
- Rosenberg, Tina (2002), "John Kamm's Third Way,"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rch 3, pp. 58-63, 81, 101-102.
- Ruan, Ming (1990), "Press Freedom and Neoauthoritarianism: A Reflection on China's Democracy Movement," in Chin-Chuan Lee (ed.), *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 Rueschemeyer, Dietrich, 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1992),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aid, Edward (1978),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 Said, Edward (1981), *Covering Islam: How the Media and the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 New York: Pantheon.
- Said, Edward (1983),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aid, Edward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Knopf.
- Said, Edward (1994), "Afterword," in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 Salisbury, H. E. (1990), "China reporting: from Red Star to Long March," in Chin-Chuan Lee (ed.), *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 Schiller, Herbert I. (1976),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 White Plains, NY: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 Schiller, Herbert I. (1992), *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 (2nd edi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 Schlesinger, Philip (1978), *Putting "Reality" Together: BBC New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Schram, Stuart (ed.) (1974), *Mao Tse-tung Unrehearsed: Talks and Letters, 1956-71*. Harmondsworth: Penguin.
- Schramm, Wilbur (1964), *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ramm, Wilbur (1977), *Big Media, Little Media: Tools and Technologies for Instruction*. Beverly Hills, CA: Sage.
- Schramm, Wilbur, and Daniel Lerner (1976), *Communication and Change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en Years After and the Next*. Honolulu, HI: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 Schudson, Michael (1978), *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New York: Basic.
- Schudson, Michael (1995), *The Power of New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chwartz, Benjamin (1994), "Culture, Modernity, and Nationalism - Further Reflection," in Tu Weiming (ed.), *China in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James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egal, Gerald (1996), "East Asia and the 'Containment' of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 4: 107-35.
- Sen, Amartya (2001), "If It's Fair, It's Good: 10 Truths about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ly 14-15, op-ed page.
- Seymour-Ure, Colin (1974),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Mass Media*. Beverly Hills, CA: Sage.
- Shambaugh, David (1996), *China and Europe, 1949-1995*. London: 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 Shi, Zhong (Wang, Xiaodong) (1997),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China,"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30, 6: 8-27.
- Siebert, Fred S, Theodore Peterson, and Wilbur Schramm (1956),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igelman, Lee (1973), "Reporting the New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2: 132-151.
- Smythe, Dallas (1994), *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Edited by T. Guback.
- Snyder, J., and Ballentine, K. (1997), "Nationalism and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in Michael Brown, Jr. O. Cote, S. M. Lynn-Jones, and S. E. Miller (eds.), *Nationalism and Ethnic Conflic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So, Clement Y. K. (1988), "Citation Patterns of Core Communication Journals: an Assessment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us of Communica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5: 236-255.
- Sparks, Colin (1998), *Communism, Capitalism, and the Mass Media*. London: Sage.
- Sparks, Colin (2000), "Media Theory after the Fall of European Communism: Why Old Models from the East and West Won't Do Any More?" in James Curran and Myung-Jin Park (eds.), *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 Sparks, Colin (2003), "Are the Western Media Really that Interested in China?," *Javnost/the Public*, 10: 93-108.
- Sparks, Colin, and John Tulloch (ed.) (2000), *Tabloid Tales: Global Debates over Media Standard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Splichal, Slavko (1994), *Media Beyond Soci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in East-Central Europ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Sreberny-Mohammadi, Annabelle (1991),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Arnold.
- Sreberny-Mohammadi, Annabelle, and Ali Mohammadi (1994), *Small Media, Big Revolution: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the Iranian Revolu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taniland, Martin (1985), *What is Political Economy? A Study of Social Theory and Underdevelopmen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u, Shaozhi (1994), "Chinese Communist Ideology and Media Control," in Chin-Chuan Lee (ed.),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Boulder, CO: Westview.
- Suine, Karen (1987), "The Political Role of Mass Media in Scandinavia,"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12: 395-415.
- Sun, Xupei (2001a), "Accession to the WTO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gital Media," unpublished paper.

- Sun, Xupei (2001b), *An Orchestra of Voices*. Westport, CO: Praeger. Edited by Elizabeth C. Michel.
- Tehrani, Majid (1979), "Iran: Communication, Alienation and Revolution." *Intermedia*, 7, 2: 6-12.
- Thompson, John (1991), *Cultural Imperialism*.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Thompson, John B. (1990), *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Critical Social Theory in the Era of Mass Communic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ompson, John B. (1995),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harles A. (1975),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ironi, Eugenio, and Guillermo Sunkel (2000),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cations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Chile," in Richard Gunther and Anthony Mughan (eds.), *Democracy and the Medi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omaselli, Keyan (1989), "Transferring Video Skills to the Community: The Problem of Power," *Media Development*, 25, 4: 11-15.
- Tomlinson, John (1991), *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Tomlinson, John (1994), "A Phenomenology of Globalization? Giddens on Global Modernity,"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9: 149-172.
- Tomlinson, John (1999),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ouraine, Alain (1997), *What is Democracy?* Boulder, CO: Westview. Translated by David Macey.
- Townsend, James (1996), "Chinese Nationalism," in Jonathan Unger (ed.), *Chinese Nationalism*. Armonk, NY: Sharpe.
- Tse, Patricia Wen-sei (1995), "The Impact of 1997 on Political Apathy in Hong Kong," *Political Quarterly*, 66, 2: 210-220.
- Tu, Wei-Ming (1991), "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Center," *Daedalus*, 120, 2: 1-32.
- Tuchman, Gaye (1978), *Making News*. New York: Free Press.
- Tunstall, Jeremy (ed.) (1970), *Media Sociology: A Reader*.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Tunstall, Jeremy (1977), *The Media are Americ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Tunstall, Jeremy (1999), *The Anglo-American Media Conne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Unger, Jonathan (ed.) (1996), *Chinese Nationalism*. Armonk, NY: Sharpe.
- van Ginneken, Jaap (1998), *Understanding Global New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 Waisbord, Silvio (2000), "Media in South America: Between the Rock of the State and the Hard Place of the Market," in James Curran and Myung-Jin Park (eds.), *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99),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Social Scie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Wang, Hui (1998),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and the Question of Modernity," *Social Text*, 16, 2: 9-44.
- Wang, Sophia (1994), "The Independent Press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e Case of Da Gong Bao in Republican China," *Pacific Affairs*, 67, 2: 216-241.
- Weaver, David, and G. Cleveland Wilhoit (1996),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in the 1990s*. Mahwah,

- NJ: Lawrence Erlbaum.
- Weber, Max (195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Scribners.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
- Weber, Max (1964),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New York: Macmilla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ans H. Gerth.
- Weber, Max (1978), "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Walter Garrison Runciman (ed.), *Max Weber: Selections in Transl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ranslated by Eric Matthews.
- White, G. (1983), "The Postrevolutionary Chinese State," in Victor Nee and David Mozingo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hiting, Allen (1995),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fter Deng," *China Quarterly*, 142: 295-316.
- Wilensky, Harold (1964), "Mass Society and Mass Culture: Interdependence or Depend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 173-197.
- Williams, Raymond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Raymond (1989), *Resources of Hope: Culture, Democracy, Socialism*. London: Verso.  
Edited by Robin Gable.
- Winckler Edwin A. (1984),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n Taiwan: from Hard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 *China Quarterly*, 99: 481-499.
- Womack, Brantly (1986), *Media and the Chinese Public: A Survey of the Beijing Media Audience*. Armonk, NY: Sharpe.
- Womack, Brantly (1990), "The Dilemma of Centricity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Chin-Chuan Lee (ed.), *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 Wu Nai-te (1987), "The Political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 Yan, Xuetong (2001), "The Rise of China in Chinese Ey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0, 26: 33-39.
- Yoon Youngchul (1989), "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Press Ideology in South Korea, 1980-1988,"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nneapolis.
- Yu, Xu (1994), "Professionalism without Guarantees: Changes of the Chinese Press in Post-1989 Years," *Gazette*, 53: 23-41.
- Zaller, John and Dennis Chiu (1996), "Government's Little Helper: US Press Coverage of Foreign Policy Crisis, 1945-1991,"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3: 385-405.
- Zaller, John (1992),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hang, Xudong (1998a), "Intellectual Politics in Post-Tiananmen China," *Social Text*, 16, 2: 1-8.
- Zhang, Xudong (1998b), "Nationalism, Mass Culture, and Intellectual Strategies in Post-Tiananmen China," *Social Text*, 16, 2: 109-140.
- Zhao, Suisheng (2000),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 1-33.
- Zhao, Xinshu, Jianhua Zhu, Hairong Li and G. Bleske (1994), "Media Effects under a Monopoly: The Case of Beijing in Economic Refor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6, 2: 95-117.
- Zhao, Yuezhi (1998),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Zhao, Yuezhi (2000a), "Watchdogs on Party Leashes? Contexts and Implications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Post-Deng China," *Journalism Studies*, 1, 4: 577-597.
- Zhao, Yuezhi (2000b), "From Commercialization to Conglomer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ress within the Orbit of the Party Stat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0: 3-26.
- Zhao, Yuezhi (2001), "Media and Elusive Democracy in China," *Javnost/The Public*, 8, 2: 21-44.
- Zhao, Yuezhi, and Dan Schiller (2001), "Dancing with Wolves?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Digital Capitalism," *Info*, 3, 2: 137-151.
- Zhao, Yuezhi (2003), "'Enter the World':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the Dream for a Strong Nation, and Chinese Press Discourses on the WTO," in Chin-Chuan Lee (ed.),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London: RoutledgeCurzon.
- Zheng, Yongnian (1999),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hu, Jianhua (1988), "Public Opinion Polling in China: a Descriptive Review," *Gazette*, 41: 127-138.
- Zhu, Jianhua, and Stanley Rosen (1993), "From Discontent to Protest: Individual-level Causes of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5, 3: 234-249.
- Zhu, Jianhua, Xinshu Zhao, and Hairong Li (1990), "Public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in China: an Empirical Profile," *Asian Survey*, 30, 10: 992-1106.

## 中文部分

### 以作者姓氏漢語拼音為序

- 蔡銘澤(1998),《中國國民黨黨報歷史研究》,北京:團結出版社。
- 陳崇山、弭秀玲(1989),《中國傳播效果透視》,瀋陽:瀋陽出版社。
- 陳峰等(1996),《中美較量大寫真》,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
- 陳海文(2002),《啟蒙論:社會學與中國文化的啟蒙》,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陳懷林、李金銓(1998),〈九十年代中國報業財政改革及其影響〉,鄭宇碩編《中國評論一九九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517-546。
- 陳力丹(1993),《精神交往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北京:開明。
- 陳一諮(1990),《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台北:聯經。
- 崔之元(1994),〈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香港《二十一世紀》,8月號,頁5-15。
- 崔之元(1996),〈毛澤東『文革』理論的得失與『現代性』的重建〉,《香港社會科學學報》,春季號,頁49-74。
- 戴國輝(1985),《台灣史研究》,台北:遠流出版社。
- 戴錦華(2002),〈從狼來了到狼群來〉,《南方周末》,3月1日。
- 戴晴(1989),《儲安平與「黨天下」》,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
- 丁邦新(1987),〈一個中國人的看法〉,《聯合報》副刊,4月9-10日。
- 方漢奇編(1992年,第一卷;1996年,第二卷),《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 房寧,王炳權、馬利軍等(2002),《成長的中國——當代中國青年的國家民族意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 馮建三(1992),《文化、賄賂、脫衣秀：解讀資本主義的傳播符碼》，台北：時報出版公司。
- 馮建三(1995),《台灣廣播資本運動的政治經濟》，台北：唐山。
- 馮建三(1998),《大媒體》，台北：元尊。
- 甘陽(2000),〈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收入李世濤編《知識份子立場：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裂》，長春：時代文獻出版社。
- 國家人事部(1994),《1993年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改革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
- 杭之(1987),《一葦集》，台北：允晨出版社。
- 何德功等(1997),《傾聽中國——新冷戰與未來謀略》，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
- 何新(1991),《世紀之交的中國與世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何新(1996),《為中國申辯》，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
- 洪永宏等(1996),《中美軍事衝突前前後後》，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
- 胡績偉(1989),《新聞工作論說集》，北京：工人出版社。
- 黃旦(2003),〈中國新聞傳播的歷史建構：對三個新聞定義的解讀〉，《新聞與傳播》，第1期，頁24—37。
- 黃宜範,〈標準語是一種形而上概念〉，收入李亦園編(1987)《辨思與擇取》，第五單元，台北：敦理出版社。
- 賈曉慧(2002),《〈大公報〉新論》，天津：人民出版社。
- 姜義華(1998),〈論平社曇花一現的自由主義運動〉，《江海學刊》(南京)，第1期，頁127—136。
- 金耀基(2004),《中國的現代轉向》，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雷震(1978),《雷震回憶錄》，香港：七十年代社。
- 李江帆(2001),〈加入世貿組織對第三產業的衝擊與應對思路〉，收入王振中編《經濟全球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北京：社會科學資料出版社。
- 李健(1999),《中國九次說不》，北京：當代出版社。
- 李金銓(1987a),《傳播帝國主義》，台北：久大。
- 李金銓(1987b),《政治的新聞，新聞的政治》，台北：圓神。
- 李世濤主編(2000),《知識份子立場——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
- 李希光(1998),《中國有多壞？》，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李希光、劉康等(1996),《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李希光、劉康等(1999),《妖魔化與媒介轟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李亦園編(1987),《辨思與擇取》，台北：敦理出版社。
- 李永樂(2002),〈入世後中國媒體的新挑戰〉，多維新聞網，<http://www5.chinesenewsnet.com>，2月25日。
- 李澤厚(1987),《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
- 李贍(1975),《我國新聞政策》，台北：記者公會。
- 李贍(1976),〈評廣播電視法〉，《廣播與電視》，第29期。
- 劉賓雁(1985),《第二種忠誠》，香港：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
- 劉賓雁(1989),《劉賓雁自傳》，台北：時報出版公司。
- 劉軍寧(1998),《共和，民主，憲政》，上海：三聯。
- 劉少奇(1998),〈對華北記者團的講話〉，《新聞戰線》，第12期，頁4-10。(原版，1948年。)

- 劉兆佳(1992)，〈香港人對香港政府的態度〉，《廣角鏡》，238期，頁48－57。
- 陸定一(1941)，〈對於我們新聞學的基本觀點〉，收入《陸定一新聞文選》(1987)，北京：新華出版社。
- 陸鏗(1997)，《陸鏗回憶與懺悔錄》，台北：時報出版公司。
- 陸學藝編(2002)，《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陸擘(2003)，〈權力與新聞生產過程〉，《二十一世紀》，第77期，頁18－26。
- 羅吉斯 殷曉蓉翻譯(2002)，《傳播學史——一種記傳式的方法》，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 呂秀蓮(1991)，《重審美麗島》，台北：自立晚報社。
- 麥康勉(Barrett McCormick, 2003)，〈中國媒體商業化與公共領域變遷〉，《二十一世紀》，第77期，頁27－36。
- 閔崎(1989)，《中國政治文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 南方朔(1986)，〈「中國結」與「台灣結」統一論〉，《中國論壇》，第226期，10月25日。收入李亦園編，《辨思與擇取》(1987)，台北：敦理出版社。
- 潘家慶、王石番、謝瀛春(1986)，《台灣地區民眾的傳播行為研究》(研究報告)，台北：政大新聞所。
- 彭光謙等(1996)，《中國為什麼說不？》，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 喬良、王湘穗(1999)，《超限戰》，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 《求是》(1990)，第9期社論，頁8-9。
- 瞿湘(2000)，《人類的希望在中國》，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
- 任劍濤(2000)，〈解讀『新左派』〉，收入李世濤編《知識份子立場：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裂》，長春：時代文獻出版社。
- 人事部工資保險福利司(1994)，《1993年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改革工作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
- 阮銘(1992)，《鄧小平帝國》，台北：時報出版公司。
- 石之瑜(2002)，〈從東方主義批判到社會主義本土化〉，《二十一世紀》，第74期，頁74-84。
- 宋連生、鞏小華(2001)，《穿越台灣海峽的中美較量》，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 宋強、張藏藏、喬邊(1996)，《中國可以說不》，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
- 宋強等(1996)，《中國還是能說不》，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
- 宋強(1999)，〈建立二十一世紀的新國格〉，收入房寧、王小東、宋強等《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蘇紹智(1992)，《馬克思主義新論》，台北：時報出版公司。
- 蘇紹智(1996)，《風雨十年：文革後的大陸理論界》，台北：時報出版公司。
- 蘇小康等(1988)，《河殤》，北京：現代出版社。
- 蘇鑰機、李金銓、馮應謙(1996)，〈新聞工作者如何看待媒介可信度〉，《明報》，12月5日，頁5。
- 孫旭培編(1988)，《新聞自由論集》，上海：文匯出版社。
- 孫永仁(1991)，〈社會主義紅旗必將在中國一代代人手中傳下去——「何新現象」的啟示〉，《中共中央黨校報告選》，第3期。
- 孫玉勝(2003)，《十年——從改變電視的語態開始》，北京：三聯。
- 唐緒軍(1997)，〈中國報業將何去何從〉，《現代廣告》，第3期，頁65-66。
- 屠忠俊(1994)，《報業經營管理》，北京：新華出版社。

- 汪暉(2000),《死火重溫》,北京:人民出版社。
- 汪暉(2001),〈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及批判〉,《台灣研究季刊》,第43期,頁1-65。
- 王若水(1986),《為人道主義辯護》,北京:三聯出版社。
- 王若水(1989),《智慧的痛苦》,香港:三聯出版社。
- 王若水(1997),《胡耀邦下台的背後》,香港:明鏡出版社。
- 王小東(1999),〈中國的民族主義和中國的未來〉,收入房寧,王小東,宋強等《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王小東(2000),〈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收入李世濤編《知識份子立場:民族主義與轉型期中國的命運》,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
- 王岳川(2001),《中國鏡像:90年代文化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王禎和(1977),《電視 電視》,台北:遠流出版社。
- 尉天聰(1985),〈三十年來台灣社會的轉變與文學的發展〉,《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台北:中國論壇社。
- 《文匯報》(香港)(2001),〈喬良:『超限戰』震驚中外〉,10月15日,C1。
- 吳非(2003),〈俄羅斯媒體與政府角色〉,《二十一世紀》,第77期,頁37-47。
- 吳國光(1997),《趙紫陽與新聞改革》,香港:太平洋出版社。
- 吳廷俊(1994),《新記大公報史稿》,武漢:武漢出版社。
- 吳一夫等(1997),《與美國對抗》,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 蕭功秦(2002),〈新左派與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分化〉,《當代中國研究》,第1期。
- 蕭乾(1999),《風雨平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笑蜀編(1999),《歷史的先聲:半世紀前的莊嚴承諾》,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 蕭新煌(1986),〈解開當前意識形態紛爭的「結」〉,《中國論壇》,第253期,4月。
- 謝長廷(1986),〈台灣文化危機與出路〉,《台灣新文化》第2期,1986年10月。
- 熊蕾(2000),〈贊賞與遺憾——我看美國媒介〉,收入顧耀銘主編《我看美國媒介》,北京:新華出版社。
- 徐光春(1997),〈正確認識與處理報紙經營工作中的問題〉,《明報月刊》,第6期,頁4-8。
- 徐佳士、楊孝濂、潘家慶(1975),《台灣地區民眾的傳播行為研究》。研究報告,台北:政大新聞所。
- 許家屯(1993),《許家屯香港回憶錄》,香港:香港聯合報。
- 徐友漁(2001),〈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收入李世濤編《知識份子立場: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裂》,長春:時代文獻出版社。
- 徐友漁(2001a),〈哈貝馬斯在中國〉,《開放》,6月號,頁46-49。
- 徐鑄成(1998),《徐鑄成回憶錄》,北京:三聯。
- 《亞洲週刊》(2000),〈喬良專訪〉,第49期,2000年10月12日。
- 楊斌(2000),《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與改革陷阱》,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
- 楊錦麟(1992),《李萬居評傳》,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尹章義、黃光國、南方朔、張茂桂(1987),〈解開「台灣結」與「中國結」的結〉,《中國論壇》,第266期。
- 喻國明(1993),《中國新聞業透視》,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
- 喻國明(1996),〈繁榮與困頓:論90年代中國民意測驗的發展〉,《傳媒透視》,香港,12月號,頁2-5。
- 喻國明(2002),〈中國傳媒業的投資前景〉,《明報月刊》,5月號,頁25-27。

- 喻國明、劉夏陽(1993)，《中國民意研究》，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 俞旭(2002)，〈入世對中國傳媒影響有限〉，《明報月刊》，5月號，頁20-22。
- 樂黛雲(2002)，《跨文化之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張海濤(2002)，〈何處是「美利堅帝國」的邊界〉，北京：人民出版社。
- 張季鸞(1944a，第一卷；1944b，第二卷)，《季鸞文存》，台北：文星(1962年重印)。
- 張寬(1995)，〈賽義德「東方主義」與西方的漢學研究〉，《瞭望》，第27期，頁36-37。
- 張學禮(1996)，《中國何以說不》，北京：華聯出版社。
- 章詒和(2004)，《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張育仁(2002)，《自由的歷險：中國自由主義新聞思想史》，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 張忠棟(1987)，《胡適五論》，台北：允晨。
- 鄭瑞城 編(1993)，《解構廣電結構》，台北：允晨。
- 《中國青年》編輯部(2000)，《潘曉討論》，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 《中國青年報》(1995)，〈中國青年看世界讀者調查統計報告〉，7月14日。
- 《中國青年報》理論部(1991)，《蘇聯政變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
- 中國時報社(1990)，《中國時報四十年》，台北：中國時報。
- 中國新聞傳播學評論(2003)，〈胡舒立：蒼蠅和老虎，壞的都想打〉，<http://www.cjr.com.cn>(2月26日)
- 《中華民國電視年鑑(民國五十年至六四年)》(1976)，台北：電影學會。
- 《中華民國電視年鑑(民國六十七年至七十二年)》(1984)，台北：電影學會。
- 《中華民國電視年鑑》(1986)，台北：電影學會。
- 《中華民國電視事業的回顧與前瞻》(1981)，台北：中國電視公司。
- 中宣部、新聞出版署(1992)，《新聞政策法規須知》，北京：學習出版社。
- 周偉 編(2002)，《媒體前沿報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
- 祝建華(2001)，〈中文傳播研究之理論化與本土化：以受眾及媒介效果的整合理論為例〉，《新聞學研究》，第68期，頁1-22。
- 朱學勤(2003)，〈常識與傲慢〉，《二十一世紀》，第77期，頁154-158。
- 朱學勤(1998)，〈1998,自由的言說〉，《南方周末》，12月25日。
- 朱雲漢(2002)，〈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深層問題〉，《二十一世紀》，第74期，頁64-73。